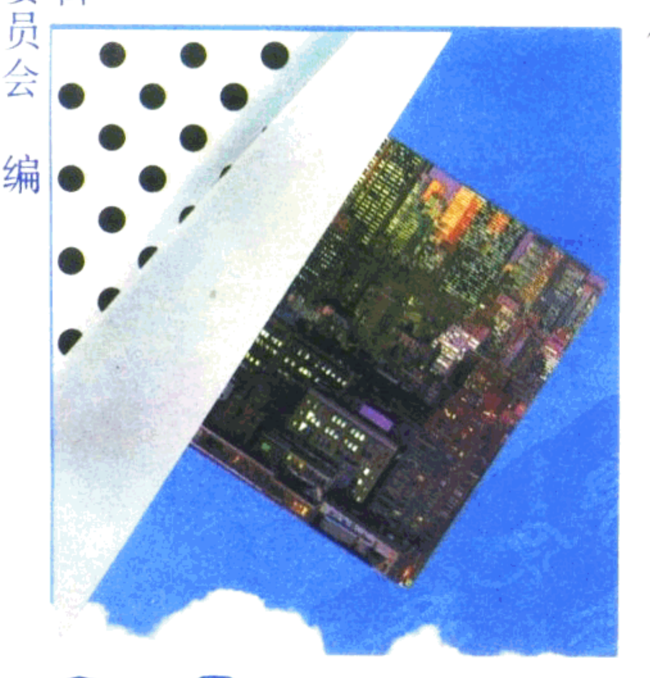
艰辛的历程

长春文史资料总第45辑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编者的话

1991 年,《伪满军官学校》通过《长春文史资料》刊发后，在史学界、老干部中，在日本、韩国均有较大反响。《伪满军官学校》一书的意义在于她真实地记录了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的存亡,客观地反映了侵略者要奴役的妄想和被统治者的反叛。人们通过此书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由培植统治势力的梦想到营造掘墓人的悲叹，可以看到热血青年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自尊的本色。

军校学生们的反满抗日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他们走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营垒的第一步。日本战败后，伪满洲国的垮台，伪满军校的解体，军校学生在摆脱锁链后，不少师生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革命之中，以后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留下他们坚实的脚步。

有许多读者希望能把伪满军校学生在祖国光复后的历史走向记录下来。

本书收录的部分军校学生的文稿，意在从几个侧面，点滴地反映他们步入革命队伍，为解放献身，为人民建功立业的历程；意在展示他们对光明自由不懈的追求，对共产主义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选择。

转瞬 50 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失去的是青春和黑发，留下的是历史的印迹和回声。但愿这印迹和回声永存于人们的记忆中。

他们这些人中，在 50 年的人海沧桑中，变化很大，情况参差，多数人还是响应了历史的召唤，贡献出赤子之心，有的人以鲜血点染了红旗的一角。

据不完全统计在各个历史时期为革命牺牲的，抗日战争时期有陈东升，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阎凤桐牺牲于吉林省长岭县与国民党军战斗中；有张雷、年文学、胡越民牺牲于长春国民党督察处；廉中辉牺牲于长春外围与土匪的战斗中；孙降生、张敬朴、崔显海、宋继唐牺牲于抗美援朝朝鲜战场。

现在仍然健在并且知道音讯的军校学生（包括教师）约有 780 余人。他们之中曾经参加解放军的至少有 100 人以上，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的至少有 150 人以上。在建国后，在党的培养下，成为教授、研究员的 49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38 人，高级工程师 55 人，主任医师 10 人，副主任医师 4 人，高级讲师 16 人，编审、副编审、总编 7 人。有高级职称的计 179 人，占已知现有学生总人数的 28%。担任各级干部职务者有 223 人，其中县团级以上者为 192 人，占干部总数的 86%。根据长春市的统计，在 77 人中现已参加共产党的有 41 人，占 53%。参加民主党派的有 10 人，占 13%。其他城市虽无统计，但其基本情况差不太多，北京市可能还高于此数。这几个简略的数字。可以使人略见概貌。

在本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要感谢原伪满军官学校的同学和其他作者们，他们得知出书的消息后，热情极高，知情者坐下来奋笔疾书。有的戴起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握笔撰写稿件；有的积极提供资料；有的找有关部门或知情人向他们索稿。刘凤卓同学既积极提供资料，又向有关部门和同志约稿，还为编好本书献计出谋……他们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并使人难以忘怀。让我们向关心过本书编辑出版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因为此前出版的《伪满军官学校》一书早已售罄，不能再满足一些人的购书要求，现将前书篇目附后，使向隅者略见梗概。

本书在搜寻史料过程中，由于这段历史时间较久，人事变化较大，可能漏掉重要材料。有的地方会有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长春文史资料

·总第45辑·

1994/1

目　录

EA94/17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 02—051 号
■印刷/新华广告公司印刷部

军校的学生生活

李亚韩

·服装· 伪满军校学生有两套服装：在校内学习与训练时着“营内服”；外出或参加活动着“外出服”。

“营内服”有军服单、夹、棉衣各一套。单军装系黄色“国防布”制，夹军装为草绿色呢料，棉装则为黄色。还有黄色半截棉半截皮的大衣一件。样式均与当时“国兵”服装样式相同。另外发有白布内衣两套，白蓝格薄绒内衣一套，领布、白线手套和袜子每学期发几次，还有布裹腿、呢子裹腿各一副，战斗帽、棉皮帽各一顶，高腰胶鞋一双。冬季则有棉军用胶鞋一双，棉袜子一双，棉手套一副。“外出服”就特殊了，样式上既异于“国兵”也异于各大学生。夏季有厚质地的“国防布”单装一套，秋冬有新呢子军装一套，呢质大盖帽一顶，筒式牛皮“腿绷”一副，高腰牛皮鞋一双，窄条牛皮带（圆形扣卡）一条，秋冬有呢子军大衣一件。“军校”学生服装与国兵不同之点还有：无论是“营内服”或“外出服”衣领上都带有两枚浇瓷五星（红、黄、兰、白、黑）领徽，“高帽”上则戴有浇瓷五星帽徽一枚（“国兵”的帽徽是布制的）。“肩章”尤其特殊，预科生“营内服”的“肩章”是“光板没有豆”，即紫地长条形呢质“肩章”上没有星花（“国兵”肩章上有1—3个黄色绿织五星）；“外出服”上的“肩章”是在绿呢子横“肩章”上外端带有一副小型无杠、无星的军官“肩章”。即在紫地长条形呢子的两边镶着两条金边，军衔的中间附金

色杠杠和金属五角凸星，“军校”学生无杠无星。“军校”学生外出还必须带“剑”（刺刀）。本科生只肩章是中士，其他和预科生一样。因此无论走在哪里的确“与众不同”，从服装上一眼就会认出是军校的学生。

·“内务”和“内务整顿”· 伪满军校学生宿舍是每连一栋，每栋十几个寝室，每室住16人。每人一床，两床对摆。床脚下的墙上每人一个拉门式手箱（小型壁柜）。手箱是寝室内学生存放衣物的唯一容器。由于学生所发衣物完全相同，所以手箱内各种衣物的摆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在学校发下的根据内务令制定的“学生生活指导手册”里都有具体规定。

所谓“内务”指的是手箱内外的各种物品；“内务整顿”指的是对手箱内外物品的整理。要求是相当严格的，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首先对床铺的整理，军校学生床铺最下面是一个厚厚的帆布棕毛垫子，上面铺两床褥子，褥子上面铺一条褥单，褥单上面铺一条包被用的大被单，上面是一床被子，被子上面铺一条军用毛毯。叠被有要求：先是把两条褥子铺平，上缘必须与垫子比齐；然后铺褥单，褥单上缘又必须与褥子比齐；其次铺大被单，大被单的上缘又必须与褥单褥子比齐，然后铺被，被子的上缘则必须比被单缩下20厘米；然后铺毯子，毯子上缘与被子比齐；而后一人把大被单翻过来包在被子上，叫“被头”，“被头”的宽度必须是20厘米；另一人在包“被头”的同时用两手把毯子、被子、被单一起卷在褥子的下面。再后两个人一起再把被子的两边“铺”到垫子的下面，最后把枕头塞进被子下面，枕头的上端又是必须与被子的上缘比齐，而后把整个床铺用手拍得平平的，两个侧面拍得有棱有角。每一个床铺都必须弄得这样，一个规格，一个样式。

对手箱的整顿要求更为严格。首先是箱内的衣服叠好之后，3个格子上的衣服必须有棱有角，上下成一条直线。为此，有的学生不但用手先把衣服叠好拍平压出棱角，有时用牙去咬，生怕弄

得不好在检查时挨训挨打。至于箱外的物品，同样要摆整齐、擦干净。枪是军人的生命，不管用没用，每天必须擦，而且必须是“一尘不染”。我区队吉林的同乡高守维第一次挨打就是因为手箱里衣物没摆好。我第一次挨打是因为枪没擦干净，枪管里残留了一丝擦枪布上的绒毛。

·吃饭· 军校有若干个学生食堂。一个食堂里要容纳2～3个连，8～12个区队，3～4百名学生同时用餐。餐桌是长条桌，两边各摆长条凳，2人一凳，相对而坐，每一区队1行4个桌。连值周军官餐桌设在全连的横头。按规定连值周军官要和学生一起用餐的，实际上等于虚设，有的干脆不来，有的来后吃两口摆摆样子就走。学生饭菜极其简单——不管肚子大小，一大碗饭，一小碗菜。学生饭菜由各区队的“食事当番”（打饭值周生）给盛好，摆好。学生吃饭有固定位置。学生伙食标准很低，1943～1945年平时1天3顿都是高粱米干饭，一周平均不上一顿大米饭或馒头。菜是日本式的居多，以日本“大酱汤”（味噌汤）为主，有时汤里放几块“天不拉”（油炸物），有时发几块“天不拉”也吃土豆汤，大头菜汤，很少吃肉。开饭是由校部用号音统一控制的。吃饭号音一响，各连的“取缔生徒”（值周学生）就高喊“开饭集合”，这时各区队的学生便同时去寝室取筷子，水碗，跑到宿舍前集合，而后由各区队的“取缔生徒”整队跑步或走步唱着军歌去食堂吃饭。到食堂门口，由“取缔生徒”下令解散，学生有秩序地进入食堂。如遇有上级生也去吃饭，则须规规矩矩地给上级生让路。进入食堂后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摆好筷子和水碗，等候连“值周军官”到场。连“值周军官”来了，由连“取缔生徒”喊“立正”，全连学生迅速立起，在得到“值周军官”的允许后，由连“取缔生徒”下令“用膳开始”，学生方可用饭。吃饭时必须肃静，迅速，不许说话。吃饭中间如果连“值周军官”退场，或校部“值周司令”前来检查，连“取缔生徒”又须高喊“立正”，这时不管你嘴

里有没有饭，都得迅速立起，闭上嘴等再下令允许吃饭时再继续吃饭。学生吃完饭可以先走，"食事当番"刷碗、擦桌、送回饭菜桶 而后回宿舍。

·服装检查· 军校规定，每天早晨上课前，在校部"值周司令"监督下由各连的"值周军官"对学生进行"服装检查"。当校部一发出"服装检查"号音后，全校所有学生连队都由连"取缔生徒"喊出"服装检查"的口令。这时各区队学生立即挎起书包，戴好帽子，穿好鞋（平时在寝室或自习室都穿拖鞋），迅速跑到连舍门前集合。由连"值周军官"指挥到学校大操场按"连横队"队形看齐、站好。校部"值周司令"到场站到"司令台"上后，各连"值周军官"指挥各连学生向"值周司令"敬礼、报告。方式是这样的："值周司令"站好后各连"值周军官"抽刀高喊："立正"，向值周司令敬礼，"向右——看"，这时"值周军官"行"撇刀礼"学生行"注目礼"。"值周司令"还礼后，各连"值周军官"则喊"向前——看"。而后由本科生徒队各连向"值周司令"报告，报告词是这样的："×科第×连，服装检查集合完毕"。依次报告完了，"值周司令"下令："服装检查开始"。各连"值周军官"开始对所属连下达同样命令："服装检查开始"。这时连"取缔生徒"向全连学生下令："各区队前排向前三步——走"。各区队前排向前三步后向后转，看齐、立正站好，等待"值周军官"前来"服装检查"。连"值周军官"带领区队"取缔生徒"从第一区队开始逐个检查。检查项目包括服装是否整齐，书包挎的对不对（左肩右肋），文具是否带齐是否带了学生"名牌"（学生每人一个木制名牌，上课时放在桌右上角）气色、神态怎样，是否有病……遇到"有问题"的学生，轻则由"值周军官"训之，重则让该区队"取缔生徒"打之。全校都检查完了（大约 20 分钟）连队归成原形，等候"值周司令"下"服装检查完了"的命令。命令一下，各连又一次向"值周司令"敬礼，报告"服装检查完了"之后，由

各连下令，由各区队“取缔生徒”指挥，跑步去教室上课。

·分兵种· 军校学生在预科时期（前二年）不分兵种，术科统学步兵知识，主要教材是《步兵操典》。预科毕业后，按自愿与分配相结合原则开始划分兵种。1944 年学校设有步、骑、炮（包括高射炮和野炮）、工、辎重（汽车）、军需、江上军和航空等 9 个兵种。报志愿前连长、区队长向学生介绍各兵种的性质特点与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兵种需要的条件和数字，让学生考虑选报。但大多数学生都要跑到自己熟悉的本科学生那里去打听、摸底。回来后几个友好的同学再在一起研究。步兵，是“军中之花”，该科要的人最多，五期生里要 70 多名。步兵比较辛苦，全靠两条腿，但训练完了背包一卸就没事了。骑兵、炮兵训练时自在，有马可骑，但是训练后必须先收拾马——洗身，抠蹄。炮兵还得擦炮，最后才能收拾自己，一般训练回来得最晚。工兵在校学习期间累，挖掩体、修工事，架桥、筑营，劳动强度太大。但是在部队任职后少尉就可以骑马，另外工兵作业一般都离前沿阵地较远，比较安全。军医谁都不愿意去，认为军医在伪满军队中叫做“军佐”不是“军官”。军需更不愿去，都把部队的“军需官”叫“军需搂子”。

报志愿时的“斗争”挺有意思。我们连第二区队一个学生叫曲含祚，大个，天天早晨利用宿舍门前的电线杆子练“臂功”（用胳膊打电线杆）。他们的区队长是日本人。他报志愿时报了“航空兵”。他们区队长找他谈话，说：“你这么大个子，飞机驾驶室那么小，不行！”曲反驳说：“个子大就不能开飞机吗？美国人个子更大不一样开飞机吗?”日本区队长笑了照他前胸给了一拳，批准了。我们区队的梁嗣祥同学，身体很棒，他也报了航空兵，在身体检查时，检查他的“手脚联合动作”时，“脚动作”得分比“手动作”得分还多。回宿舍后和我们说：“我的手比脚还笨”。后来他被分配到步兵科。有一个被分配到“军需科”的同学对分配不

满意，但无力纠正，有人问他："你分到哪科了?"他气呼呼地说："当军需搂子去了!"

我和蛟河同学王廷弼填了"工兵科"。

·入队· 预科毕业后，学生的肩章立刻换上伪国军上等兵的肩章（光板3个星）。我、王家彦、孔祥铸、关××（三连的）被分配到营口第一工兵队。该队被认为是当时工兵队（营）中较好的一个队。一行4人中我是带队人。1944年9月各兵种都去"队附勤务"单位报到。

营口第一工兵队位于市内，部队长是日本人。我们报到那天部队长指示，中午到部队长那里"申告"。中午时部队"值周军官"领我们4人去到该部队的"军官食堂"（是一个带有火炕的屋子，里面有几张餐桌），炕上坐着两位军官，一位没穿上衣，一位穿着上衣"肩章"上是上尉军衔。进屋后我们4人一字排开，我在右端。我下令"敬礼"后按照规定的"申告词"进行申告："大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军官候补生×××以下4名，到达营口第一工兵队前来队附勤务"。本来是应该向部队长"申告，我也不知道那位是部队长，结果是向那位上尉做了"申告"。其实，没穿上衣的那位才是部队长（日本人少校），那位上尉是部队"军需官"。"申告"后让我们在旁边的餐桌上午餐，那天是大米饭，菜里还有鱼肉（按规定来部队服"队附勤务"的候补生，每天中午要在"军官食堂"与"军官"共进午餐，吃军官伙食）。食毕把我们安排在早已准备好了的"候补生宿舍。"

·部队生活· 凡有接收"候补生""队附勤务"的部队，伪"军事部"早有通知。因此，在"候补生"去前部队早已做好了生活、学习和训练的安排。并指定一名军官做"指挥官"。营口第一工兵队给我们准备的宿舍是在一个连队宿舍的一头。一间房北面足可睡4个人的火炕，中间搭了1个单眼的砖火炉，靠南窗摆2个

长条形二屉书桌，4 个人对面坐。每人 1 个书立子。炕脚底下有 1 个带有四个格的被服箱，背包放在箱上，枪单有枪架。“候补生宿舍”配备 1 名勤务兵，给打扫屋子、升炉子、打饭、洗衣服。部队每天起床后有点名制度。“候补生”站在队列的最右端，其次才是各班、排士兵。点名时由“候补生”先“报告”，报告词是“候补生 4 名集合完了”。然后依次报告。一般情况下点名完了，“值周军官”发布命令、讲话，而后回宿舍“整顿内务”。

“候补生”早晚由勤务兵把饭打到宿舍在宿舍吃。一般都是一饭（高粱米饭）、一汤。部队的生活纪律虽然也很严格，但照比军校可差多了。“内务整顿”只要把衣物摆得整齐一些就可以了，吃饭都是在宿舍吃，纪律一般。我们自己也放松了，在宿舍里自己都买点咸菜、酱、烧饼，有时晚上自己还买点“杂面条”煮吃。排里的军士常和我们闲唠嗑、玩。有一个姓王的军士还领我们到乡下买鸡蛋，到煎饼铺买煎饼、豆腐脑。

·学习和训练· “候补生”在部队 不和士兵一起出操，受训。另设有“指导教官”。营口第一工兵队给我们安排的第一位“指导教官，是日本人酒井中尉，军校二期生；第二位也是日本人，阿部中尉，也是军校二期生。由于是军校的同学，对我们都很好，很热心。在学校时对区队长也好，对文武教官也好，说话时都得称呼：“教官殿”（“殿”是日本军队中对“尉官”、“校官”的一种尊称，对“将官”则称呼“阁下”）。在营口第一工兵队中“指导教官”不要求我们称他为“教官殿”而称为“先辈殿”以表示亲近。“候补生”在部队有专门的训练计划。第一工兵队对我们的安排是每周有室内课和室外课。学习内容有“战术学”（室内课）有“爆破教范”。有一次讲完“爆破要领”之后，教官领我们去到离部队挺远的一个大河里（冬季结冰后）试验“黄色炸药”的威力和绑缚炸药的方法。带去 4 块“黄色炸药”，首先是把两块“炸药”绑在一起，中间插入 1 个“雷管”，“雷管”头上插入了 1 条

导火索，爆破点选择在河中间的冰上。点燃导火索后，我们都跑出去 40～50 米远趴在地上。爆炸后，教官领我们去看“爆破效果”，结果看到只是炸药下面的冰被炸出一个几厘米深的不大的一个小坑。教官说：“炸药只有在密闭的爆破点里才能显出它的威力，在空间里只能对它的接触面产生较大破坏力，对四周没有威力。”另两块是绑在岸上的一株径粗 10 几厘米的小树上，爆炸后，那株小树干被炸断了。教官说：“使用黄色炸药爆破时，爆破点要挖成深洞，然后放炸药点燃，否则效果显示不出来的。”晚上也是自习，“教官”给我们一些关于“战术”方面的小册子，让我们抄。

在部队两个月后，改换“少士”肩章，开始实习班长职责。有一次教官领我们到市内去巡逻，检查士兵在市内的纪律。当时“国兵”在各地还是很厉害的，连警察也不敢惹，在营口市内看电影，逛公园都是不花钱的，连吃小馆也只给“半价”。我们在市内绕了一阵子没见到有国兵违纪现象，又领我们到一个妓院，妓院的鸨儿、大茶壶都是满脸笑容倒茶斟水，问及有没有工兵队的兵来时，他（她）们都说“没有没有”，还让好几个姑娘来见客，问了一会，到各屋也看了看，见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就回去了。回来的路上还去过两个饭馆检查。第 5 个月我们换上了中士肩章，6 个月后戴着中士肩章回校入本科学习。

·一堂步兵操典课· 军校预科在军事科目方面统一学习步兵知识。接受从一个列兵到怎样当分队长（班长）的系统学习和训练。使用的教材是日本陆军省编审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使用的，被日本自诩为“步兵之精粹”的《步兵操典》。其内容包括一个“兵”的“徒手教练”、“持枪教练”、“各个战斗教练”。包括“分队（班）教练”、“小队（排）教练”、“中队（连）教练”、大队（营）、联队（团）教练。预科毕业前学到“分队教练”。

我们在 1944 年夏学完“分队教练”之后，区队长寺本岛中尉（日本人）设计了一堂“训练课”。

训练科目：分队（班）的攻击。

训练目的：1.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对地形、地物的实际利用。2. 让学生学会分队长在实战中掌握一个分队的攻击指挥要领。

训练场地：在校练兵场大西边的一块坑洼较大，杂草丛生的地方。

训练方法（训练实践）：1. 首先由区队长指定一名学生担任分队长带领一个分队。10 几个人充“假设敌”。在练兵场大西头的一块地方布置一个“分队防御阵地”。武器配备有九二式重机枪 1 挺，九六式轻机枪 2 挺，掷弹筒 2 门（以上武器都是用各色旗表示），其余是步枪。火力相当 1 个加强排。各种火力的位置安排是在区队长指导下由防御分队长布置的。2. 两个攻击分队，由铁岭学生王缉绪担任第一分队长，我担任第二分队长。火力配备是每班有轻机枪 1 挺（有实物和旗），其余为步枪。发起攻击的位置距“敌阵地”300～400 米的隐蔽处。3. 攻击前的准备：攻击分队进入隐蔽地后，区队长下了第一道命令：“各分队迅速做好攻击准备！”两个分队长随即对战士下令：“戴钢盔，伪装！”这时两个分队的战士都从背上摘下钢盔和伪装网，然后在钢盔和伪装网上插满了蒿草、柳树条而后戴上、披上。接着区队长又命令：“一分队在左，二分队在右，分队间隔 10 米各就各位！”于是两个分队长各领自己的分队战士用“最低姿势”（提枪猫腰）跑向区队长的左、右，间隔 10 米。以后下令：“利用地形、地物散开！”这时战士们一字排开，人与人间隔 2 米，找好地形、地物，取卧倒姿势两眼直视前方。这时两个分队长也采取最低姿势查看了每个人对地形、地物的利用情况。而后回到分队长的指挥位置（我选择了轻机枪旁侧）卧倒后向区队长报告：“第二分队攻击准备完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分队长也做了同样的报告（分队长的这一系列动作，包括报告词都是步兵操典里规定下来的）。以后区队长下令：“攻击开始！”随之我高喊“目标正前方敌人阵地，攻击前进！”。于是战士们以“各个跃进”的前进方式边射击边前进（这些动作包括

"各个跃进"要领也都是《操典》中规定的)。大约前进不到30米,我分队一名战士喊:"报告分队长,右前方发现敌人重机枪!"("敌方"摆动了重机枪旗)。我听到后下令:"暂停前进!"区队长命令:"用轻机枪消灭敌人重机枪!"我对机枪手下令:"轻机枪向敌人重机枪猛打!"于是我旁侧的轻机枪向敌重机枪猛烈射击(快速摆旗)。一会儿敌人的重机枪被消灭了。区队长又命令各分队:"继续攻击前进!"就这样打打进进,进进打打。大约前进到离"敌阵地"30～40米的地方,急听区队长下令:"准备突击(冲锋)!"于是我对战士直接下令:"准备突击!"这时战士们停止了前进和射击,拧上了三八式步枪的保险栓,上了刺刀,趴在地上等待着"冲锋"的命令(所有这一系列活动又都是《操典》里规定的动作)。不到1分钟听到区队长发出了"冲啊!"的命令。于是两个分队同时端起刺刀冲向"敌人"。"敌兵"也端起刺刀冲出"阵地"。一阵"厮杀"后,"敌人"全部被我们"消灭"了。区队长喊:"演习完了!"

接着全区队学生集合查点物品,听区队长讲评,到此为止《步兵操典》上的"分队战斗教练"中的"攻击"一堂实践训练课就结束了。

(作者为军校五期生,离休前为蛟河县二中校长、蛟河县政协委员)

军校生活片断

刘汉中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青年时的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的生活片断并记录一二。

快准 在校内除吃饭以外，由早晨起床开始，一切活动都要求迅速、准确。

·起床要求快· 入学之初，每日起床都进行检查，一是要求快，二是要求着装整齐。起床后依快慢顺序排队，每天排在最后的 5 名被打耳光。一个多月以后，同学们已经养成快的习惯并达到了要求后，才停止打耳光。

·轻机枪射击要求准· 轻机枪射击练习，要求对近距离的敌人进行 3 发点射，对远距离的敌人进行 5 发点射。手扣扳机的节奏是不易掌握的，开始时同学们都掌握不好。区队长要你 3 发点射，如果你打出 4 发，就等于浪费一颗子弹，自己就要打自己一个耳光证命中，打出 2 发就等于没击中敌人，这时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区队长指示的目标应是 5 发点射，而你若多发或少发弹，同样的要自己打自己耳光。

·着装要快、准· 在寝室里每人一个壁橱按统一规定整齐地放置本人用的全部服装（冬季、夏季的外出服、教练服、棉大衣、棉袄棉裤，冬季的和夏季的各两套衬衣、衬裤，体操服、春秋季和夏季的营内服、棉帽、战斗帽、外出大盖帽、绑腿等）。1944 年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凌晨学校发出非常集合的号声。

非常集合号声一响，学生都象触电一样，一跃而起，所有的

灯全部熄灭，听军官的命令，迅速地穿外出服到连舍前列队集合。我们区队一位同学，在穿裤子往上提时，一摸是上衣领子，才明白是把上衣当裤子穿了，好不容易地脱下来，待他着装完毕时，别人都已在外面整齐地排好队在等他。这样快和准的训练在学校时时刻刻都有，因而要求每个人平时必须牢记服装、武器、用品、书籍等摆放的位置和顺序，到时能迅速无误地取到。

·一种特殊方式的成绩测验· 在军校日常生活、学习（包括学科和术科）以及行、立、坐、卧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术科中的战斗训练有各种操典，作战要务令、各科教程等等。日常生活方面有内务条例等等。对其中的一些规定必须丝毫不错地严格执行，否则将被视为紊乱军纪，被斥责为没有纪律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在日本军队中这是一种最污辱人的语言），因而要受到处罚。

一天，晚自习结束，点名之后，值周军官将全部灯熄灭，然后发布命令，要求学生按他的口令由自己书架上取出书放入书包。值周军官命令取什么书，学生就随其口令取书装入书包。最后命令学生从书桌前后退两步，灯亮之后，命令各区队的值周生检查每个学生书包内的书取得对者与错者都作记录。对与错就是成绩的优与劣，这是一项成绩的考核。

值周军官是我们第三区队长中尉军官村上（日本人）。亮灯之后他亲自检查我们三区队的每个同学。在他逐一下令取书时，我对面桌的张志操同学小声叨咕"我记不准了，怎么办？我把书、笔记本都取出来。"书包装不下，他把书包放在书桌上，把全部的书和笔记本都放在书包上。当时有个同学小声说："张志操你可别开玩笑，小心' 牛'（我们给区队长起的绰号）揍你。"当区队长检查到张志操时，问道："你是否全部取出啦？"张志操回答说："是"。村上区队长马上脸露笑容地向区队同学说："如果全部或多数无误地取出装入书包当然好，如果不能保证多数准确无误，就全部取出也好。"接着又说："比如作战你拿的枪和子弹不对口径

就不利于战斗，如果你拿了许多子弹虽然累赘，但有的可以对上口径，这就有利于战斗。”区队长不仅没揍张志操，反而认为他有创造性。

夜袭 1945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凌晨未明之际，同学们正在熟睡中，上级生（六期生）一个连来我们第八连进行偷袭。这种军事演习由于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叫“夜袭”。当夜在连里轮流站岗放哨的学生发现后立即喊声“夜袭!”同学们听到喊声马上从床上一跃而起迎战。这时来偷袭的上级同学已经冲进来，见到同学们挥拳就打，我们自然要还击，一时间互相大打起来。在六期生中曾担任第八连第五区队指导生的刘裕国这时冲到了我们第三区队的床头，一位同学上前挥拳要打，刘裕国喊出：“指导生不打你们，你们打指导生?”这时第三区队的李洪涛同学喊着“指导生，我以身体向你冲锋了!”（这是日本军在战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种作法）。说着躬身向刘裕国冲撞过去。这时军官下令“情况完了，”于是互相对打停下来，来夜袭的六期生撤出。靠门近的第一、二区队的同学都挨了打，有的被打得鼻口流血，有的被打肿脸，这场“夜袭”演习至此方告结束。

“夜袭”的规定是：①两个连的值周军官，事前约定，但不通知学生，学生是毫无所知；②对打时可以用拳、木枪、竹剑，但不准动用武器。

“夜袭”是军事训练的一种。通过“夜袭”教育军人时时刻刻都要有敌情观念，警惕敌人来袭，以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军人在睡觉时也要睁着一只眼睛。”“夜袭”是对值班的有无漏岗，能不能机敏的发现敌人的一次检查；也是对学生战斗动作快慢的检查。如果是上级生来“夜袭”，又是上级生对下级生的一次教育．要求偷袭者动作迅速诡秘；被袭者要及时发现，坚决迅速反击。

野营演习 野营训练的目的是以适应实战要求为出发点，进行艰苦的训练。由于日常训练是在条件较好的校内，是在连舍内及学校附近的练兵场进行。而野营训练则换了环境，在更接近实

战的艰苦条件下进行，夜宿帐篷要经受风雨，增加战斗训练的强度，克服饮食和其他困难，有利于加强友爱、团结和凝聚力。所有种种都是军队实战所必需的。

第七期生野营训练地点在石碑岭附近，从1945年5月20日开始，到6月8日结束。学生全副武装由学校出发。头戴钢盔，肩扛步枪，一个区队两挺轻机枪轮流扛，弹药盒内装入练习弹，背包内装有毛毯一条，周围绑上帐篷布及支柱、雨衣、军用锹或镐，肩挎水壶、饭盒，共计重量约35公斤。

到达石碑岭附近首先将帐篷布连结好并支撑起来，帐篷四周挖防水沟，帐篷内铺上干草，两人两条毛毯合铺一条、合盖一条。将背包、枪支等都按规定位置统一整齐放好。每日三餐，有时将米发给个人装进饭盒放在挖地筑成的灶上用木炭煮，有时由值日生统一取饭，菜不足同学们就采集小根蒜以补充。

每天都进行班、排战斗训练，一会儿冲锋，一会儿匍匐前进，有时还进行夜间演习。

由于战斗训练强度很大，帐篷里虽然拥挤，但就寝号一响同学们便都进入梦乡。一天夜里在睡梦中觉得脖子上冰凉，醒来一看，原来是由于夜降大雨，帐篷布接头处漏雨，才把我淋醒。但因无处可躲，只好横卧在同学们的脚底下又沉沉睡去。

我们在训练的往返途中和饭前饭后的空闲时间，都经常演唱军歌，一天晚上因为下雨，刘凤卓区队长（军校二期生）就组织六区队的同学们在帐篷里高唱《噫兮，我祖国》，用这个歌和《志士歌》来唤起同学们的民族觉醒，使同学们具有爱祖国、反侵略的情绪和意志。

野营训练的最后一天，全体七期生进行联合演习。日本学生二个连为一方，中国学生三个连为一方，双方从一个山的两个相对的坡面，按规定时间出发，抢占高地进行遭遇战演习。八连的突击班，跑步首先抢占了山头，随后全体学生都高喊“呀！”登上高地，双方都摆成了冲锋队形。这时，指挥官宣布“情况完了”

（即演习完毕）。讲评时，中方受到表扬。

耐热行军 长春地区的气温，冬季最冷时超过零下30℃，夏季最热时超过零上30℃。军校就选择这种最热或最冷的时刻举行耐热或耐寒行军。1945年8月6日我们第七期生举行耐热行军。出发前日本学生进行了体格普检，占3/4的合格者参加了这次耐热行军，中国学生则没有进行体格普检，全员参加行军。

8月6日晨，全副武装以连为单位在烈日似火的高温下，经过石碑岭、净月潭，向双阳县大顶山挺进。中途在净月潭附近举行遭遇战演习。演习完毕，连长向担任守备的日军司令，请示，经允许全连列队站在潭边。眺望全潭的风光。当时每个学生都汗流浃背，水壶中的水都喝光了，依然口渴。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军之后，日本学生有的因渴导致中暑休克，不少中国学生因腿肚子抽筋而倒在地上。同学用水瓶子擀腿肚子过一阵才恢复过来。预科队长溥杰中校骑马跟着我们第八连行军。午后天气骤变，下起滂沱大雨。我们越过泥泞的田野一会儿登上山岗，一会儿进入洼地。遇水涉水，有时水没膝盖，有时水深齐腰，我们继续前进。雨衣、帐篷布全被雨水淋湿。晚4时多到了双阳大顶山附近，由于地面十分潮湿无法在帐篷里住宿就六、七个人一组分别住在农民家中。火炕虽十分热，但因过度疲倦，一躺下便沉沉入睡。8月7日早晨又整装出发，中途在大顶山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抢占高地（山头）的战斗。夜间继续行军。这个季节天气多变，体力消耗很大。中间休息时，不管地上是泥或是水依着背上的背包便睡着了。休息一小会儿，起来继续前进。

狩猎野兔 1945年2月12日，拂晓前，学校本部大楼顶上吹起了非常集合号，绝大多数学生对集合后干什么毫无所知。只有七期生日本学生连，在头天晚上由值班的区队长就如何狩猎野兔向学生作了种种说明，要求把围在包围圈内的动物猎获，并介绍兔、狐狸连续速跑的能力，雉的飞行高度和距离等等。事前对非常集合有所了解。

全体学生起床后，立即穿好防寒服装，每人手持一支竹剑或木枪，迅速向石碑岭附近的广阔原野急进，当时是满天星斗，大地异常寂静，全校2000多人，每人相隔约20步，无声地逐渐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军号声中，包围圈逐渐紧缩，全体学生不断地发出喊杀声。三期生中的骑兵每人骑一匹战马，在圈内奔驰，圈里的兔子狐狸惊得到处乱跑，野雉飞起又飞落，不久东方开始发红，学生排列的队形和疾跑着的动物越来看得越清楚了，经朝霞一照，兔子、狐狸、雉的全身显得很美丽。包围圈迅速紧缩。在骑兵的猛追下，有的兔子蹬蹬腿，口吐血沫而死；狐狸和雉也因跑不动而被打死。最后指挥官宣布："情况完了！"并公布战果：俘获轻型快速战车（指兔子）××辆，重型战车（指狐狸）××辆，飞机（指雉）××架。而后列队归校。

晚饭的菜汤中有几点好象是动物的油珠，还有一些肉块，辨不清是狐狸的是兔的或是雉的，我们围猎的目的和意义不在猎获动物多少和吃它的肉，而在于平时术科训练均以区队为单位，规模小，而狩猎兔子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又是进行拂晓攻击；选择的日子是2月12日（农历12月30日除夕）之晨。由于除夕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怕中国学生这时候想家，所以由早晨到晚上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使你没时间想家。

（作者为军校七期生。离休前是长春市商业学校校长，副厅级待遇）

说说这几种演习

冯志良

在预、本科期间，军官学校内有各种演习：

游泳演习 1941年预科一年的暑期，在大连柳树屯进行了游泳演习，中间还去金州看了日本军人墓。预科二年仍在柳树屯进行游泳演习，海湾对面为大和尚山。同时去旅顺参观水师营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白玉山表忠塔、尔灵山和椅子山的日俄战迹。

野营演习 预科二年6月去白城子西两小站，葛根庙进行野营演习。同时进行班教练和斥候训练等。在那里与喇嘛同住不同吃。该庙原有喇嘛700多名，据说被张海鹏杀掉了一大批。我们去时尚有500人左右。他们以牛粪干为柴。各自分居，贫富相差甚大，吃穿住有很大差别。其中有一日本喇嘛。我们问他，信喇嘛教吗？他说他有特殊任务。

测图演习 测图演习是在后拉拉屯及前靠山屯姚家烧锅后边的兔子沟进行的，住在学校。先由军事部三角课课长三宅技正讲授并指导测绘。经过实践，我们感到他讲的用不上，无法完成测绘任务。后来改由讲武堂出身并专攻测图的刘少校重新讲授有关测斜仪、测图板、标竿等的使用理论及方法。然后再进行实际操作。这样，才算完成了此项任务。

耐寒演习 1943年严冬，全连在本科生徒队长乔明远上校和连长井上清少校指挥下，全副武装并背行军背囊，从学校出发，进行了耐寒演习。途经石碑岭、王家油房、胡家桥，最后到大蒋家

屯露营。在那儿，我们每个人把带的天幕（大雨布）连结在一起支起帐篷，地上铺了一层高粱秸，棚里边生个简易火炉，烟熏火燎没有多少暖意。就寝前搞了个夜间演习。由二期生防御，三期生进攻。在大雪地里没有伪装，进攻者大多被俘。次日返校。两天的午餐全是啃冻硬了的白面和苞米面混合蒸的馒头，吃几片咸鱼干。

耐暑行军 1944年暑期，本科二年时，进行了一次耐暑行军演习。第一天全副武装从学校出发，到石碑岭后就离开了公路，向东北方向前进，抵达放牛沟。这次演习是按兵科行动的。高炮和工兵指定在一家山村小客店的庭院中露营。由于下午下了一场小雨，地面非常潮湿。同学们支起帐棚，安设了哨兵。连里宣布发粮米油盐和菜金，饭由各兵种自己做，要找三名炊事员。大家自动报名。兰中玉、范迪厚报名后，没有人报。老范就说："冯志良来"，我说我不会做饭，老范说："那你就打杂，洗菜烧火。"到店房以后老范说："让你来有好事，你可以睡火炕不受潮了。"晚饭后，我们仨就分头淘米，掐豆角，削土豆皮，准备明天的早饭和午饭。然后睡了一宿热炕。

第二天凌晨起来做饭，分两餐做，早晨是云豆炖土豆，午间是咸鱼。做完饭又忙烧了一大锅开水，灌了水壶。全连集合以后，连长下令，都把水壶中的水倒掉。宣布，这一天的课目是：绝水行军。从放牛沟出发爬山越岭直插大蒋家屯。休息是在山坡绝水处，凡遇到河流小溪都跑步通过。太阳火热，满天无云。中午越过大蒋家屯南边的河，在它的南岸用午餐。每个人从头上的军帽到衣裤、裹腿及下边的鞋袜全被汗水湿透。连里的军士提前到屯子里烧了开水，用水桶挑来，让同学们边吃边喝，但不准灌水壶。午饭后出发，奔宿营地吴家屯。早晨行前，我看是晴天一定很热，我和老范老兰讲，应买两个生鸡蛋带上。他俩说不用，我就自己背着区队长买了两个放在了弹药盒里。下午行军途中渴得支持不住时边走边背着教官喝一个。这两个鸡蛋帮了我的大忙，使我能

一直坚持到底。下午 3 点左右，有两名同学实在走不动了，其中一人竟倒在地上说："打死我也走不了啦!"同学们分别代他扛枪，背背囊，架扶着他勉强走到了吴家屯，高炮兵教官森胁为雄上尉让先烧开水为同学们解渴，然后再做饭。这一家有两口大锅，有一口是煮猪食的。为了饭菜能同时做好，范迪厚把猪食锅刷净要用它来做菜。我说，那太埋汰了。老范说，做好你会抢着吃的。

第三天的课目是：不休息继续行军。老天作美是个阴天，还零星地下些小雨。因为不休息就不准备午饭。每人发给些混合面的饼干，谁饿了就边走边吃点。经过净月潭、两半屯、前拉拉屯，返回到学校时已是下午 3 时多了。同学们既要洗澡又要洗衣服，累得精疲力尽。第二天是放假外出的礼拜天。可六区队 25 名同学，填外出簿的只有我同阎凤桐两人。

对机甲部队演习 这次是以区队为单位进行的。演习地点在公主岭。由关东军五三五战车联队配合进行。主要演习内容是，利用射击死角登上战车及跳下动作，登车后向瞭望塔内投弹以及使用燃烧瓶、磁石地雷、集束手榴弹等。演习头两天光给稀粥喝，米面被连里军官卖掉了些，到街里饮酒做乐用了。为了抵制这种败类行为，同学们就故意在演习中和去演习地的往返途中，连续不断地请假小便。第三天一早又是稀粥，由阎凤桐挑头，六区队全体同学一致响应，进行了绝食拒餐。继之其他区队也拒餐了。迫使连队不得不从中午起改为干饭，但饭量仍不足。演习一周，最后到该联队，听一个日本大尉中队长讲有关战车战术概要，并介绍了苏联当时使用的几种坦克的性能和武器配备情况。

由于吃不饱，各区队在就寝后就偷着派人去街里买烧饼。值日官是今林繁，他有些查觉了，就到各帐篷去查铺。夜间步哨就跟在他后边，看准他要去哪个帐篷，就抢先跑到他前头喊："无异状"。这个鬼子是深度近视眼，那个帐篷出去人了，就从邻近帐篷内找来一个钻进被窝顶上，他也看不清。因此大家编了句顺口溜：夜间出去不犯难，专抓溜号是今林繁。

现地战术演习　当时两个区队配置一名战术教官。五六区队先是由武光中校担任，不久武光被调走，便由佟志杉少校担任战术教官。他是溥仪的皇亲，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他就是发展范迪厚等九人为晋察冀社会部分局情报人员的领导者。他讲授日本战术，由中队到师团长的单一兵种或多兵种联合作战指挥。也讲苏军和八路军的战术。1944 年 9 月在开原作现地战术演习时，吃住在开原市内的旅馆饭店。演习的场地是开原大孙家台以南山地，到山头堡越过铁西的瓜台子西部山地。以后还有图上作业，以开原为中心围绕一至九寨和货郎屯等地。约十多天以后返校。

高射炮兵的单独演习　1943 年 12 月，森胁上尉带领 26 名同学到小丰满北岸一个高炮连，参观他们的高炮射击。1944 年秋，到沈阳城北的清水台一个高射炮部队参观实弹射击。都是由森胁教官自兼驾驶员。1944 年初冬，美军 B29 轰炸机相继轰炸了鞍山及沈阳。森胁又率领 25 名同学（有一名同学病死）坐火车在立山下车参观三高炮一个营的指挥所。然后由该营派车将我们送到鞍山东部山区的一个高炮连。当晚该连的我校二期生张富恒少尉见到三期老弟异常亲切。在那里听各连队对空战斗以及美机轰炸的全过程介绍。同时还参观了鞍钢的一部分厂房。最后，由汤岗子乘夜车返校。

1944 年夏初，本科一连全连到吉林进行野营行军演习。高炮兵由教官驾驶高射炮汽车，另一台汽车由二、五高炮队队附勤务同学驾驶。由学校出发直达岔路河在镇北部露营。在该地住了六、七天。此间伙食自理，由高万金同学负责副食采购。在街里遇到一名警察找岔子，并掏出了手枪。老高回来之后，我们决定派三个人到警察署去向他们提了抗议。那个警察当即受到了处分。以后由岔路河出发经一拉溪在大绥河小学宿营。晚饭后擦过车炮，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有的唱歌有的嬉戏起来。这可激怒了“老歪”（大家给教官送的外号），他把大家集中在教室里让大家席地而坐。他说：“我以为谁家迎亲奏乐呢，原来是你们在那里胡闹。这样使

军风纪涣散是不行的。”接着又说：“我一发怒你们就老实就守纪律，否则就瞎闹，这样下去怎么行！大家讨论一下，今后怎么办?”我想了想说：“中国的孔夫子每天教育学生的话被记录下来，出了一本书叫《论语》。教官也天天说几句，我们把它记下来，将来出一本《森胁论语》吧！另外，请教官照一张发怒的照片，发给每人一张挂在胸前。大家一想淘气就低头看一看照片，不就老实了嘛！”兰中玉悄声说了句：“都想看个笑脸，谁愿意看那鬼脸啊！”次日由大绥河出发越过二道岭、八百垅到东大营宿营。每天到龙潭山下的松花江西岸进行武器操作、测量等演习，还坐汽车到吉林江南的小白山顶进行选择观测哨所等活动。又乘车去小丰满，位于江南岸山上的高炮连，学习高射炮阵地的选择，武器掩体的构筑，方向数字牌的设置及对高空射击和夜间照明设施等。礼拜天森胁带我们到吉林北山游览。当他见到庙内的雷公泥像时，特意把我带到前头说：“这才是你需要的照片呢！”

由吉林返校时，仍是边走边演习，最后宿营地是石碑岭东侧王家油房的山坡上。这次宿营的目的是把行军带的白面吃净，然后返校。在这次二十多天的演习中，所有兵种的伙食都赶不上高炮好。原因是向军需处报领粮食时，误将 26 人写成 260 人。因此粮食领回后，发现太多了，多了 10 倍。在退还时将大米全留下，高粱米全退回，是用麻袋装的看不出来，白面是面袋装的，必须整袋退回。范迪厚和兰中玉这两个临时炊事员想了个招儿。在炮场室内铺上苫布将应退回的面袋，用树条子抽打，面袋子没坏，可打出来近一袋子白面。这次演习就不但没饿着肚子，而且吃得满不错。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离休前为沈阳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科长）

试胆训练

栾庆常

在伪军校学习期间，1945 年 5 月上旬某日，晚自习结束后，我们刚要就寝，突然区队长村上一三通知全区队到连部门前集合，在值周生整队报告之后，区队长就带着我们向校园南门外的大地走去。

正是孟春季节，天气不冷不热，农历又是朔日（初一），一丝月光也没有，接近于伸手不见五指。全区队 32 名同学都默默地随着区队长向辨不清方向的黑漫漫的前方走着。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猜测："这又是搞的什么训练、什么演习？""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吧！"队伍走到一个小山岗前面停了下来。区队长问我们："害怕不？"我们齐声回答："不害怕！"他说了一声："好！"接着就命令："栾庆常出列！"我答应一声就向前走了三步。他手中拿着一张带有按钉的纸条，上面好象还写着几个字，命令道："越过山岗向正前方行进约 100 米，可抵达一块坟地，沿右侧走 20 米左右，有一口未埋葬的棺材，把这个纸条按在棺材头上，然后回来报告！"我复诵了一遍他的命令之后，接过纸条，独自一人向山岗走去。

因为天太黑看不清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着，起初还能感觉到 30 几名同学就在我的正后方，而且隐约地听到了他们的鼻息声，所以没怎么害怕；后来走下了山岗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千万顺利地走到坟地，找到棺材，按上纸条，好回去交差。

估计这时已过十点钟，长春的孟春干旱少雨，白天的五六级大风虽然已经停了下来，但也稍有一点轻风。我向前走着，果然，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慢慢游动着的绿色磷光、飞舞的萤火虫，高高矮矮的坟头和随风飘荡的白色引魂幡……尽管我自幼受到了家庭较好的不迷信的教育，但也感到在这漆黑的坟地里，孤零零地一个人，脱离了集体，真有些令人害怕！只要再有一个同学在身边，我也会挺得住的。此时，恐惧感一阵阵袭来，顿觉全身发冷，直打寒战，头发根子直往上竖，两条腿也不如以前灵活，我心里叨念着："父亲常说，人死如灯灭，没有什么鬼神……"我咬紧牙关，按着区队长指的路线，蹒跚地、艰难地前进着……果然，看到了一口大棺材。我壮着胆子把纸条按了上去。转过身来，用尽气力加速向回奔跑，几次被树根或土块绊得趔趔趄趄，基本上是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山岗上。也听到了同学的咳嗽声。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我故意放慢脚步，走到队前，向区队长报告完成了任务。

随后，区队长又先后命令两名同学分别往坟地里送了件什么东西，也都没出什么差错，大约到十一点钟左右，才带着我们回到宿舍。

翌日是星期天，第三天（周一）午后，上刺枪术课前，区队长宣布说我们三个人都完成了任务，还说以后全区队每个人都要分别接受这样的试胆训练。

后来听说，外连队也有个日本区队长，搞此训练。他预先布置该连军士扮成白无常（吊死鬼）埋伏在坟地里，吓唬参加试胆训练的同学。但由于事前机密泄漏，这个平日里狐假虎威，此次扮"白无常"的军士，被派去的三名同学打得鼻青脸肿，口角流血，直到他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才罢手。

后来由于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因此，区队长也就无心再搞此类训练了。

（作者为军校七期生，离休前为梅河口市政府处长）

一次遭遇战演习

祖伯群

七期生在校 9 个月，时间虽短暂，但留给我印象却最深。那是 1945 年春举行的一次以 314 高地为中心的遭遇战演习，这次演习不知校方是怎么想的，七期生共 5 个连，五、六连是日本学生连，七、八、九连是中国学生连，校方竟决定日本学生为一方，中国学生为一方进行演习，这样就使这次演习除了学习目的之外，平添了民族矛盾、侵略与反侵略的战斗气氛，中国学生无不擦拳磨掌，誓与日本鬼子一争高低。

314 高地位于学校的东南方，中国学生集结在李家瓦房，日本学生集结在拉拉屯，各距 314 高地 5 公里。

5 月 8 日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早饭后，我们着全副武装，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往李家瓦房。北国 5 月的山坡已披上了绿装，杨柳也吐出了嫩叶，远望 314 高地的三角架上一面大白旗迎风招展，学校领导和教授们都在那里观战。

我们到达李家瓦房之后，即由我方总指挥金荣潭发布命令，因为我们学校是用日语教授，一切活动都必须用日语，金荣潭命令的大意是："敌人于昨天晚上占领了南关大桥，今晨向我方挺进，我部奉命阻击敌人于 314 高地，第一批斥候长祖伯群，率领学生 4 名向 314 高地搜索前进"。随后他又宣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斥候。为什么让我当第一批斥候长呢？因为金荣潭是八连连长，我是八连一区队的，我们全副武装竞走我跑得最快，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吧？我随即在我们一区队挑了4名同学组成了第一批斥候，然后按照斥候守则，进行了服装检查，又在钢盔网上和身上的伪装网上插上了树枝，规定了手势，最后是子弹上膛。我们第一批斥候配备了两挺轻机枪和3支九九步枪，子弹是“空包”，弹头是软木的。一切准备完毕，只等演习开始。这时不断传来同学们的低声而有力的叮嘱：“祖伯群，可别输给小鬼子。”和“祝你们首先抢占314高地，坚决打击日本鬼子。”我频频地向他们点头，示意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心中十分清楚，第一批斥候能否抢先登上314高地，对胜利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抢登314高地，我暗暗地憋足了劲。

不一会，天空升起了红色的信号弹，我领着4名同学拔腿就跑，像箭一样奔向314高地，跑过一半之后，有的同学就有点跟不上了，我就一个人扛两挺轻机枪，就这样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很快地到达了314高地的山脚下，开始向山顶攀登。当距离还有几十米时，我们便按要求进行各种匍匐，迅速接近山顶。当距离山顶只有4、5米时，仍未见敌人踪影。我用手势示意他们停下，就一个人爬上山顶，在一棵蒿草的后面慢慢地抬起头来，见敌人刚登山坡，我用手左右一挥，4名同学就在我的两翼展开，大家都用眼睛盯着敌人，当敌人进入了射程时，我立即大声命令：“目标，前方的敌人，打！”顿时机枪、步枪迸发出愤怒的吼声，只见一位骑马带着红色袖标的裁判官把红旗一摆，敌人就再也不动了，这就表示若是在实战的情况下，他们就都战死了。我回头看看第二批、第三批斥候，他们也都分别占领了各个制高点，不一会大部队就上来了，一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演习结束了，校领导做了讲评，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高唱着岳飞的《满江红》。“……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愉快地回到了学校。

（作者为军校七期生，离休前为宁安县国营农场职工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一年零两个月的兵营生活——

——黄世霖

军校二期是1944年5月毕业，举行完毕业典礼，我和高治学、张信、盖阜兴4人被分配到第五军管区步兵第八旅第三十四、三十五两团见习，以后由见习军官、少尉、中尉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

三十四、三十五两团原是大汉奸张海鹏的队伍，"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热，张海鹏带兵随关东军进驻承德北大营，后改编为第八旅三十四、三十五两团。1943年冬三十四团团部迁到滦平县汤河口村，下属三个营布防在长城里侧密云、怀柔境内的三个峪口用来堵击八路军。三十五团团部驻延庆县四海冶。那时伪满派驻河北省的部队叫"出国"，官兵享受"出国津贴"。我们先到军管区司令部报到，然后搭乘司令官赫慕侠视察的军车到汤河口，我和高治学留下，张信和盖阜兴到延庆四海冶三十五团报到。

汤河口是四面环山，中间一条小河，有30多家农户的小屯。日出晚半个小时，日落早半个小时，生活十分艰苦，下车伊始我就犯愁，又听说前线有八路军，更不想呆下去了。

在军官浴室里，结识个人称小八路的秦德林，他是军队在无人区扫荡时与家人失散的，他有个姐姐，姐姐由团长刘书元作主嫁给当地一个农民，弟弟留在团部给军官烧浴池。出于对同胞的怜悯心，我天天找秦德林到我的住处谈话，教他念书写字，向他打听有关八路军的情况。

三十四团团长刘书元行伍出身，读过诗书，参加过奉直战，为

人老成持重，在日本人面前不讲什么，有中国人的自尊心。上级早就决定给他晋级少将，但因他的团发生两起军官在阵前携械投奔八路军事件，因而晋升被推迟一年。投奔八路军的军官一是军校一期生王兴国中尉，一是沈阳训练学校出身的张启严中尉。

一次在团部 军官的报告会上，团长刘书元讲世界形势，首先说敌国英美几只破军舰在太平洋上被皇军打得落花流水，沉到海底喂鱼了，接着又说王兴国、张启严两个叛贼前线投奔八路军是对皇帝陛下不忠，他死后我也要三鞭其身。他的双关语，只有少数日本人听不懂，中国人则相对一笑。会后刘书元找我和高治学到他家谈话，见面就问，听懂他会上说的话没有？接着又对张王二人投奔八路军的行动大加赞扬。最后我提出送秦德林到关里上学读书，我担负一切费用。我对未成年的儿童在兵营里伺候日本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刘书元劝我冷静一些，对团部的驹井少校要提高警惕，驹井当过北京公使馆武官，是个特务，在团部他管作战和思想工作，秦德林上学一事慢慢处理。

一个月后，我随团部移防第一线怀柔县大水峪城。途中在滦平境内徒步行军两日，经过许多三光政策后的土围子。土围子里的住户都是从附近沟沟岔岔集中的农家。他们终年吃的是一日两餐杏叶小米稀粥。穿的是衣不蔽体的破衣褴衫，住的是一家挨一家的低矮草房，人人患浮肿病。土围子入口有自卫团站岗，检查来往行人的国民证。日出土围子开门放农民上山种地，日落土围子关门农民回家。门上两副对联写的是“建设部落，振兴乡土”，这就是当时日本人宣扬的“王道乐土”。

到大水峪后，我被分配到一营一连当见习军官，连里还有一位比我早来一年的军校一期生何英昌中尉。

一营营长是新调来的斋藤少校，他为人刁钻阴狠，对官兵狂妄蛮横，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他积极执行三光政策，经常带部队出去讨伐。此时我心情沉重，惶惶不可终日，想犯点小错误，制造机会，辞职到北京另谋出路。每天和何英昌喝日本清酒，借酒

消愁，琢磨对付斋藤的办法。我对何英昌说，我们在学校学战术、搞大演习都是纸上谈兵，这回要动真刀真枪了。在鬼子的威迫下，带着中国青年打八路军，死后要遗臭万年，我们要抵制斋藤。

一次在河北在6月的烈日下，斋藤被远处高山八路军的几声枪响，吓慌了，带着部队东奔西跑，晚上宿营因日晒病，有两个兵死亡，引起全体官兵不满，我带头骂大街，说斋藤不懂游击战术。斋藤觉得丢面子，又命令连夜行军回大水峪，出村不远，斥候新兵张生子触雷，当场炸死，这引起官兵的更大不满，都窃窃私语责备斋藤。次日早八点用担架抬着死兵尸体，在地雷爆炸处枪毙一农民，给兵抵命，使全体官兵哗然。回到营地张生子的骨灰盒就摆在我和何英昌的办公桌中间，我对何英昌说："张生子的死我们有责任，今后我们要替兵说话，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应串通营里的少壮军官和斋藤斗。"我把本科刘启民区队长告诉我们："勿效刘禅"的临别赠言，张春生汉文老师讲的正气歌、过零丁洋，要学民族英雄左光斗、史可法、袁崇焕，不要学大汉奸张景惠的卖国求荣，……都讲给了何英昌。

我们在班长中宣传八路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出去讨伐时密令斥候兵进村前先打一枪给八路军和老百姓一个逃跑信号，斋藤要问就说遭遇武装八路了。

一次我在大水峪城当留守卫兵司令，斋藤讨伐回营抓来很多人，在城外交接时，趁天黑，没点人数，我挑选手上没有老茧的壮年放了几人。我在营内串通各连青年军官和斋藤顶撞。一次赵志信等几名少尉军官应邀到斋藤家喝酒，我让他们装醉耍酒疯，往斋藤的被褥上呕吐。从那以后斋藤再也不找军官借酒醉套话了。

不久，斋藤找团长要求把我调走，说军校一期生中尉被二期生少尉串通坏了，不听他的指挥。团长找我谈话，安排我去白马关八连，他说八连连长吴玉书厚道，待兵宽，不骚扰老百姓。另外告诉我到八连和一期生林春武共同团结好全营官兵，一旦时机成熟，有个加强连就能上山打游击。

10 月中到白马关三营八连报到，和林春武学长住在一个宿舍。利用种种办法搜集八路军的宣传品，在可靠的官兵中传阅，夜间零点到营部电台偷听昆明中央社对沦陷区广播，向官兵传递抗战消息。一次在一本《大阪每日》杂志里看到一篇日本南方军报道部长辻大佐写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文章，叙述他在印缅前线用望远镜看到中国青年军官身先士卒和日本兵格斗，并向日本政府献策和中国和谈。辻大佐战后是日本国会议员。这篇文章成了我给班长、兵讲时事课的教材，用来向官兵灌输抗日必胜信念。

以后，在三营成立新兵教育队，我被定为新兵教官，接着我选 班长、班副，进行新兵入营前集训。我告诫班长要把新兵看成是我们的背井离乡的难兄难弟，绝对不能打骂，对人要平等，不能多吃多占新兵的供应定量。打兵、强占兵的定量会伤人的感情，到了动乱时，兵不能和你共生死。我将自己每月应得的香烟、食品分给班长和他们建立感情。1945 年 2 月我和林春武到密云县城旅司令部接受新兵教官集训，又找到了秦德林，送他 200 元钱，资助他上学，告诉他离抗战胜利的日子不远了，能和自己的父母团圆了，告诉他要努力学习，将来为中国效力。

集训结束回到白马关，林春武调回军校当区队长，我当新兵教官。新兵入营我告诉他们，长城内外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是同一个祖宗，他们生活很苦，不准骚扰他们。杏熟季节，士兵连老百性的一个杏子也不准吃。为了维护兵营纪律，我让管给养的班长用我的薪金，给兵买水果吃。

当时军队每日定量 950 克米，这对新兵的强化训练有些不足，我和连长吴玉书、司务长赵国有密议，仓库存有半年军粮，等不到吃完日本就垮了。何不让兵不受定量限制任意吃，万一到时不垮，我负责赔偿。就这样，使新兵直到日本投降没挨着饿。

1945 年 8 月初苏军参战，三十四、三十五两团相继暴动，军校一期生孙永锡中尉亲手枪毙了斋藤少校。三十五团在一期生王志文中尉、二期生张信中尉等带动下会同全团官兵杀死了三十五

团中所有的日本军官，给长城内外死难同胞报了仇。

（作者为军校二期生，离休前为辽宁省地质局园艺师）

抗日军歌的补充

栾庆常

这里所补充的是，《长春文史资料》1991年第二辑《伪满军官学校》一书中没有收辑进去的第二期同期生歌《同学们》。

同学们，同学们。

莫忘我们的责任。

奋斗，奋斗，奋斗莫停。

打开一切，要在不可能中创出可能，

打开一切，要在不可能中创出可能。

起来，起来，

燃起青春的怒火，

誓和那恶魔抗争。

我们不求功名，

只要真理正义和平。

用我们的呼声，

唤起中华民族的迷梦；

用我们的热血，

燃起中华民族的光明。

丢开猜忌，团结精诚，

共同奋斗，贯彻始终。

《志士之歌》的写作和传唱——

——张作斌

《志士之歌》是由我写词，赵迺斌谱曲，于1944年夏秋之交，在伪满军校读书时创作的。我是1943年底由哈尔滨二高（现一中）考入伪满军校第六期的。投考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因为家境贫寒，读不起普通大学；其二是我在哈尔滨读二高时就在爱国进步教师吕振海影响下，激发起较强烈的反满抗日爱国热情，一心想如何赶走日本鬼，推翻满洲国，恢复我中华。但又认为一个文弱书生在学校传看些进步书籍，作些思想启蒙工作，是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所以伪军校招考时，启发了我先到军校和将来毕业后到军队去联络发动爱国志士，拿起武器去进行抗日战争的念头。我认为这比空口说白话有力多了。所以从1944年春进入伪军校之后，我一心注意在同学中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学，由联络感情入手，交流思想，激发爱国抗日热情，进而想在军校组织一个反满抗日组织，把在哈二高时吕振海先生传给我的抗日火种再传到这里。起初，因为一时寻不到志同道合者，深感急躁，还写过一首诗："知音难觅仅二三，昏睡冬虫上千万。吃屎奸蝇来旅大，满身媚骨与奴颜。"事实证明我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其实有许多同学都怀有很深厚的爱国思想，不过有的不敢暴露，有的引而未发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久就以我和同区队同学董世禄为中心，联系团结了一批同学，在一起阅读禁书，讲述关里抗战信息，谈论我们应当怎样开展反满抗日活动等，并酝酿组成一个反满抗日的团体。我

和董世禄商议，想把这个组织命名为东北青年抗日联合会或东北青年抗战团，最后定为前者。但并没有向更多人亮出这个名称，一怕暴露了惹祸；二怕引起同学们顾虑，反而不利于开展活动。只好等待条件成熟时再向可靠的对象逐步讲清。当时参加组织活动的成员有30人左右，知道这个名称的仅有三几个人。这里说明一下，这个组织纯属反满抗日的学生自发性组织，没有同任何党派发生过联系，因为找不到，如果能找到，无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我们都会投入其麾下的。这首《志士之歌》就是我们在开展反满抗日活动中，为激发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于1944年夏秋之交写成的。我写成歌词之后，即由同区队同学（也是哈二高毕业的同学）赵迺斌谱曲。使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歌不久就在军校第六期、第七期同学中传唱开来。这两期同学共有四、五百人，几乎人人都会唱，不仅少数人在一起唱，就是一个区队，一个连队出操上课，在路上列队行进中也敢于大胆高声的唱，歌声振动操场、校园。今天想起来，也还在惊奇我们当时怎么会如此大胆，如此莽撞。因为当时讲几句对满洲国，对日本皇军不满的话都会被当作思想犯抓去坐牢、杀头。我在哈二高的吕振海老师，就是在解放前不久被日本鬼子抓去枪毙的。

后来果然出了问题，正在这首歌曲在同学中公开广为传唱之时，被一些日本同学（同住一个宿舍，不一同出操上课）日本教官发现，他们听不懂歌词，询问我们唱的是什么歌，什么内容。我当时随机应变。按这个曲调写了一首“日满亲善”的歌词，除了交给查询的日本人外，并传抄给许多同学，以求口径一致，准备应付下一步的更大麻烦。谁知，日本人也很蠢，竟信以为真，再没过问，而歌依然照唱不误，并越传越广。这时我才发现，同学们潜在的爱国思想极强、极深，品质极可尊敬，即在那么多的同学传唱这首奋笔直书的抗日歌曲时，竟没有一个同学告密。如果有一个“奸蝇”告密。我和赵迺斌恐怕早已魂归西土了。这说明反满抗日思想之深入人心，也说明我中华民族巨大的团结力维系

力和她的不可动摇性，不可割裂性。

当时在伪军校传唱的歌曲很多，据《长春文史资料》1991年第2辑（总第35辑）亦即伪军校资料专集所载就有16首，但矛头直接指向日伪的只有《志士之歌》和吕天作的《恢复会会歌》以及于争作的《铁血男儿》等几首。其他如岳飞的《满江红》、吴佩孚的《满江红》，均是用来以古喻今的，很能启发民族斗志。也有一些高年级同学较早时作的期歌，都是用借题发挥，不是明指而是暗喻的手法，写得巧妙，注意斗争策略，同样起到了鼓斗志的作用。当时在日伪统治十分严密的伪满军官学校，竟能唱出这样多的气壮山河的抗战强音，局外人和后人是很难想象得到的。在哈二高时，我们也做了许多宣传反满抗日的工作，却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干，因此二高也没有军校那种热烈抗日活动的气氛。

《志士之歌》除了当时在伪军校流传并当作六期生期歌外，东北解放后，1945年冬，我还在哈尔滨看见过一本公开出版的抗战歌曲集，除了收集了许多著名抗战歌曲，如流亡三部曲外，《志士之歌》也收入此集。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这是我离休后，1985年回哈尔滨，见到赵迺斌同志时才知道的。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赵迺斌接受审查时，专案人员指问赵：“有人收听台湾广播（其实是他们自己偷听的）从中听到一首歌，唱完后讲到了作者的姓名，其中一个就是你，你和台湾有什么联系，要认真交待。”造反派以为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赵迺斌同志从容地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1945年参加革命时就交待了，组织上并把它作为进步行动看待的。专案组一查档案，果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文章可作了。解放后，我遇到不少军校同学都讲过去唱过我作的这首歌，并给以许多鼓励和赞许。其实我写此歌时只不过为了一泄心头之愤，并想对少数同学起一点激发爱国思想的作用，没想到能得到如此广泛流传。对同学们的赞许自然是愧不敢当了。

这首歌所以能传去台湾，据《长春文史资料》编者讲，当时军校的学生，于日寇投降后因为思想认识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持

有正统观念的同学投奔了国民党，思想进步的同学参加了革命。还有些朝鲜、日本的同学各回了本土，比如前韩国总统朴正熙就是伪军校二期生。投奔国民党的有些人后来去了台湾，有几个人还当上了中将。《志士之歌》可能就是这些去台湾的人流传过去的。

（作者为军校六期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著有诗作《逝水集》）

从读书会到一二·三〇事件——

——常　吉

读书会　那是1940年2月，我在长春伪财务职员养成所三期毕业分配以后的事。一天晚上，三期同学李金山、刘荣久邀我到南关二期同学王国贤家，听二期同学介绍社会经验。他们介绍的是老职员如何圆滑世故，如何不给日本人认真干，要爱国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树满。最后到分配地点找某个二期同学联系。陈树满介绍我到齐齐哈尔找二期生徐连汉，说他也是位爱看书的人。我到齐齐哈尔专卖署贩卖科上了班。一次在单身宿舍里碰见了徐连汉。徐邀我有空时到他家去玩。因为徐连汉早已接到了陈树满的信。

我当时喜欢看小说，徐却劝我看些社会科学书，如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郭沫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克仑泰的《新妇女论》等，这些书读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多少能从中接受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有一段时间徐连汉倡议从日文杂志中找找与抗日有关的消息来阅读，从此，有时我便在星期日去徐家（徐的妻子也在）和他交谈一些学习心得。徐有时也到我家来。我知道有些学生常到徐处借书看但未见过面。

秋天徐去长春开过一次会，回来对我说：这次去长春开会很紧张，每天都换地址，大家情绪很激昂，尤其是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尖锐，“读书会”发展到今天只是看书，没有实际行动，没有意义。冒这样大的风险，组织这样大，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找

不到领导，还不如解散算了。当时有人建议派代表去关内找领导，有人建议找东北抗日联军，也有人提出去关内参加游击队，有的认为离开东北是逃跑主义，不能放弃在东北抗日的条件。这个问题在会上无法解决，只好留待会后解决。徐说："没有领导，不知下一步怎么做，确实是个问题。天天看书空喊抗日，没有实际意义。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听了他的话，才在心里明确认识到，我们这里仅仅是"读书会"组织。听他介绍情况后，我也认为应有实际行动，不能停留在看书上。

在齐齐哈尔期间，我介绍左连贵也参加了"读书会"，我和左常到徐家谈学习情况，我知道长春是"读书会"的大本营，但我从来未向徐正面问过"读书会"的情况和有无纲领章程等等。

1941 年 3 月我离开齐齐哈尔准备入伪军校时，在长春曾在李金山和刘荣久的宿舍住过，了解了一些情况。从李金山谈话中了解到 1940 年秋天开会时提出的找领导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要去关内。从刘荣久处了解到陈树满去关内以前，表示不能白走，要搞一次对祖国有益的破坏，所以组织了放火。1941 年下半年由于王国贤案件及放火案件，"读书会"的核心人物已见不到了，我在长春只接触到马成龙和刘荣久。

我认为"读书会"是东北青年自发性的爱国抗日组织。

1940 年底我考入伪军校有两个动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我 1941 年（19 岁）将被征当兵，我想逃避这个问题，如果考大学家中经济有困难，伪军校是比其他大学提前招生而不用家庭负担的，当时和徐连汉商议，他认为考入伪军校还可以在学生中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如能发展一批掌握枪杆子的军人，到必要时是会起作用的。至少可以从中起到瓦解破坏敌人的作用。考军校一可以逃避当兵，二可以搞抗日活动这两个动机终于促使我报考了军校。

"仙洲同盟" 1941 年春入军校前在长春碰到了孟宪昌、陈东升（财职二期生）。是陈树满介绍我们相识的，陈树满说：你们三个人在军校可以多联系。过去在军校内咱们没有人。孟、陈二人

也很热情，出人意料，我们三个人竟分到一个区队，有事便于互相商量。

我人军校后，最早接触的是崔立福，因为崔是齐齐哈尔龙江中学毕业，比我晚一班。他是从学校直接考入伪军校一期的，而我却是从伪财务职员养成所又到专卖署之后考伪军校第三期的。由于这个渊源，他先来看我，星期天我也找过他。从谈话中看得出他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我也强调说青年人应该有所觉醒。

在学校内我只知道在崔立福周围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但我没有同他们接触过。

孟宪昌因脚被汽车压伤住了医院（恩赐病院）。在医院中结识了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二期生李殿儒，在三期生中也结识了几位同学，在他们中间传阅过一些书。9 月间的一个星期日，由孟宪昌负责串连，借同学郭绍文的亲戚家，开了一次会。会议由孟宪昌主持。二期生有李殿儒、刘凤卓、三期生有孟宪昌、陈东升、郭绍文、范迪厚、冯志良、徐尚丰和我共九个人参加，共同决定成立一个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地下组织。会上，大家都严肃地表示生死与共，不对任何人泄密，吸收新人参加组织要经大家同意方可。当即将这一组织命名为“仙洲同盟”（因开会地址在徐仙洲家）。这个组织以后在校内曾活跃一个时期，主要活动是在同学间传看进步书籍。有时将进步书偷偷放在教室的讲台底下。

“铁血同盟” 6 月下旬法西斯德国向苏宣战。从此，伪军校就禁止学生外出，并且取消了暑假。到大连湾柳树屯演习期间，我们和市内就断了来往，从大连湾回长春后大约是 8 月份，一个人也找不到了，由于王国贤案和放火案，敌人侦察很紧。9 月马成龙、刘荣久回到长春，听他们讲才知道事件发生的经过。不久就是朱朝英冒用抗日联军黑龙江支队长身份，骗取了马成龙的信任，马又把朱介绍给我们，马、刘开始活跃起来。我把崔立福介绍给马成龙、刘荣久，崔自己从马成龙处借过书。

当时“读书会”已经没人再提了，原“读书会”成员多是以私人关系来往，因“读书会”的头儿都跑了，朱朝英劝马成龙再把同志们组织起来，将来好工作。马认为有必要，就和刘荣久拟一个大纲，还拿去征求朱朝英意见，朱在星期日见到我们的时候还和我们交换了意见。因为这时认为已找到了抗联的关系，纲领上明确地写有“驱逐日寇出中国；信仰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字样。还规定吸收新人时要由会员介绍等等。组织名称定为“铁血同盟”。我和孟宪昌研究“仙洲同盟”只提到以抗日为目的，因而不能和“铁血同盟”挂钩。

“铁血同盟”这个名字是马成龙提出的，他表示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成立后没有开展具体活动，因为要等抗联给任务和领导。

“一二·三〇”事件 从马成龙那里，朱朝英掌握了“读书会”的情况，对马、刘的行动监视得更紧了。当刘荣久有所发觉感到有人监视他时就和马成龙商量准备离开长春去抗联工作，马表示同意。沈阳农大的杨文阁也想跟刘一同走，马、刘与朱朝英、王富等商量，朱、王答应把刘、杨送到延安去。大约11月底刘、杨两人去哈尔滨。在哈尔滨朱先把他们安排在旅馆，然后王富介绍一个人和他俩谈话，让他二人汇报个人情况、历史、活动情况、思想发展过程，刘把在长春参加放火事也讲了。

随后，王富邀马去哈尔滨，介绍他见一个所谓延安来的中共特派员、“抗大教授”。这个人伪装得很像，对马讲了延安情况，抗战形势和一些名人的动态。马本人不过廿余岁，没有社会经验，因为找共产党心切，完全相信这个人是“从延安来的特派员”、“抗大教授”。并说还有一些人要见见“特派员”，同时要求入党，化装的特务刘玉廷当即答应说可以见见各地代表，入党也可以介绍。

马兴奋地回到了长春，并利用在星期天大家见面的机会，把“特派员”要见大伙当作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我还说过“不会是特务？”马说：“这人有这样的知识水平，还能去当特务，不可能，这人绝对可靠。以后我们在一起安排甚么时候去，哪些人

去。经研究，时间只能放在寒假期间。关于各地代表，我回齐齐哈尔找徐连汉商量，因为长春“读书会”的人已解散了，与工大学生也断绝了来往，所以马叫我充任长春代表；崔立福当军校代表；沈阳锦州的代表由马成龙找，马本人地位自然在各代表之上了。

12 月 30 日清晨各代表到哈尔滨车站后，由王富把大伙领到南岗一所白俄住宅，室内空空的，外边有一个白俄在烧炉子，里边只有一张桌子，八把椅子，冒充“抗大教授”的刘玉廷身穿半身短棉袄，高高的个子，四十多岁，关内人口音，他正在等我们。他说：这间房子是新租的，还没有收拾。

大家到里屋坐下来，马成龙将每人介绍给“特派员”。刘玉廷先讲话，谈到这次组织派他来负有专门任务，不该和我们见面，为沦陷区爱国青年的热情所感动，认为这是一批可贵的力量，所以擅自决定和大家见见。他谈了一下抗 战形势，说入党问题他可以介绍但须等组织批准。他谈完后，要求到会的人，每人自我介绍一下，把思想发展过程讲一讲，活动情况谈一谈。他好回去向组织汇报。王富负责记录。首先是马成龙谈，其次是徐连汉，崔立福、我和哈医大学生徐鸿昌。当然谈的都是真实内容。但我没有谈在伪军校组织“仙洲同盟”的情况。最后表示希望入党，每人轮流讲一遍，中午也没有吃饭。到吃晚饭时候，王富说：“我去买点吃的，大家休息一下。大家别出去免得引人注意。”他出去大约廿分钟左右，抱回一些面包、啤酒、香肠、酸黄瓜等一类东西。东西放在桌上，大家开始自己动手吃，刚吃不一会，便从两边窗子看到，手枪正对着里边；门本来没有锁，特务很快地冲进来。两个人架一个人，我们一个个被扣上手扣，戴上黑眼镜拉走了，这就是震动伪满的“一二·三〇”事件。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曾任中共河北省委调查部处长，1987 年病故）

回忆陈东升烈士

王 起

陈东升，1918年农历10月15日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1938年考入伪满“财务职员养成所”。在校期间，他和同学孟宪昌、常吉一同参加了秘密读书会。1939年秋毕业后，先后在吉林、磐石从事税收工作。1941年春，他和同事，在“财务职员养成所”的同学孟宪昌，还有常吉，抱着掌握武装，以便更好地进行抗日的目的，一起考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这年7月的一天，他和孟宪昌、常吉在长春二马路徐仙洲家，主持、召开了有9人参加的秘密会议，成立了反满抗日组织“仙洲同盟”。会上大家按他起草的誓词宣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在日寇入侵，国破家亡之秋，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消灭汉奸，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他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同盟成立后，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传递进步书籍，武装同学们的头脑，并积极地与各大学同学联系，壮大进步同学的力量。这年的12月，在去关内途中，陈东升不幸被捕。敌特准备将其押回长春。陈东升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思想，自撞火车，壮烈牺牲。时年23岁。

我和陈东升在军校是一个连一个区队的同学，又是邻床住宿，受他的教育影响很深，他在部分同学中，做了很多方面的宣传工作，讲革命形势，阅传单等（介绍根据地八路军活动情况），他还教唱革命歌曲，激发同学们的革命热情，课间休息时，我们低声

地演唱着，现在我把记得比较完整的一首歌词，写在下面：

"我有敌人凶似狼，强占我地方，抢劫掠杀后，再烧我村庄，可怜我同胞们千万命遭殃，不打倒野心狼，印度做榜样，兵和民不要分，齐心打敌人，联友军杀仇人，仇和友认真，联友军杀仇人，仇和友认真！"

在陈东升烈士牺牲前在1941年冬寒假期间，我们区队的常吉在哈尔滨被骗，说延安来人，召集开会，到会的同志当场全部被捕。陈东升牺牲后，我们区队的孟宪昌也在军校被捕。

在这些革命同学的影响下，同学们反日情绪，日益高涨。1942年夏，终于发生了一场殴打日系学生的交手战。是反日情绪高涨所致，在第一食堂打的日系学生眼镜片满地（日系学生多带近视镜），我们把眼镜全部抛进了厕所的粪坑，这顿午饭，虽然没吃好，但同学们感到出了一口气。

学校当局，派人下连队，以报告为名进行威胁恫吓，课堂上文科教官横田（日人古汉语教师）也说：有人给他们的饮水中投了砒霜（红矾），宣布要追查到底，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出带头人，才未能动手抓人。虽然几位革命战友在反满抗日的斗争中倒下了，可是我们不少人继承烈士们的革命遗志，又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了。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离休前为鞍山师范专科学校教师）

我与我的老师和同学

姜显民

1945年10月，我由吉林返回长春。在抗战期间，在中条山会战中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汤恩伯部队中的一批人，被押往黑河一带服苦役，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人集结来长春。我出于对抗日战士的崇敬与同情，前去拜访了他们。恰好当时他们已被中长铁路护路总监部收编为护路队。总监部的干部李庆亿，了解到我是伪满军校学生，见我同他们谈得很融洽，商量后推荐我当了联络员，帮他们联系吃、住、服装、编制等。他们一共200多人，编成两个护路中队。原步兵连长张新民，炮兵连长赵全臣为他们的队长。编制就绪后我的联络任务结束，继续留我在训练科任科员，我的家在外地，这样一来我在长春便有了临时栖身之地。风云变幻，拉锯战开始。4月14日苏军撤走，共产党第一次解放长春。5月23日国民党新一、六军又攻占了长春。亲眼目睹这走马灯似的变化，对国共两党谁是谁非，自己应该走 那条路，心里拿不准。看了几本书，同一些同学谈论，并拜访了几位老师，其中就有佟志杉老师。佟老师言语不多但句句中肯，佟老师指出：国民党当官的只想升官发财，官场里勾心斗角；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艰苦朴素，勤政爱民，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方面，并谈到改名叫李春的三期生李宝库在华北联合大学的学习情况等，促使我坚定了到解放区去的决心。1946年7月中旬，我和刘汉宗、赵镜澜按佟老师的指引，由长春出发投奔解放区。当时的情况是，国统区与解放区犬牙交错，铁路沿线上，一段是国民党，一段是解放区，我

们在沈阳、山海关、北平几经周折，通过几次封锁线，于8月初到达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当时正是解放战争全面开始的前夜。华北联大已撤出张家口。经有关同志介绍，我们到了晋察冀行政干部学校。不久随学校转移到河北、山西一带。前一段上课学习，后一段参加当地的土改工作。1947年春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全校同学纷纷要求参军。5月，赵镜澜被介绍到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工作。7月我和刘汉宗被介绍到晋察冀炮兵旅，我被分配到三团参谋处当参谋。三团是炮兵旅新组建的团，大多数是新兵连。10月由吴成云团长率4个老炮兵连和一个干部训练队，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斗，只有我一个参谋随部队出征。吴团长放手叫我工作。在军校时学到的一点军事知识，开始在实战中得以运用，心里很是高兴。年末参加三查整风学习。我怀着一颗孩子对母亲那样纯朴的心，在自传中详细交代了我入伪满军校前后以及军校解散前后的经历。

1948年春我被调到六连二排任排长。6月参加了解放定兴的战斗。8月以后，我们炮团随华北二纵队执行牵制傅作义部增兵东北战场的任务，打下包头后马上撤出，对绥远围而不打。年末对张家口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略。因为敌人企图突围，便一举解放了张家口。接着围困北平。我们当时是从顺义县方向佯攻北平，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接着华北炮兵改组，成立了炮兵干部训练队。我在队里当教员。这期间我向组织提交了入党志愿书，不久组建华北机动炮兵团，我在团参谋处任参谋。

机动炮团就是用汽车牵引的炮兵团，当时全团除4门日制九〇野炮外，其他都是美制一〇五榴弹炮，这些炮基本都是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在观测器材中有部分炮兵射表计算尺，使用计算尺进行炮兵射击计算，自然要比我们过去查射表笔算的方法方便得多。但当时大家都不会使用，为了解决这一课题，我根据对数计算尺原理，结合炮兵射表计算尺实物以及过去查射表笔算方法，编写了《炮兵射表计算尺原理与使用方法》一书，以北京军

区炮兵司令部名义出版，发给各炮兵部队，做为军训中的补充教材。

1950 年分配给我团一批苏制炮兵观测器材。关于方位测定，以往我们沿用的与美制一样，一圆周为 6400 密位，而苏制观测器材用的是一圆周为 6000 密位，为解决美制火炮与苏制观测器材配套使用问题，我写了一篇短文《苏制密位的换算》，被刊登在《人民炮兵》杂志上。在军训工作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制观测器材夜间照明，使用普通的干电池，而苏制观测器材夜间照明使用的是“氢氧化钠液体蓄电池”。为解决这一课题，我查阅了有关参考书后，写了一篇短文《氢氧化钠蓄电池的维护保养与充液》，也被刊登在《人民炮兵》杂志上。不久我被聘为《人民炮兵》特约通讯员。

1949 年 8 月，我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组训工作及阅兵式，1950 年 2 月被批准加入共产党。7～9 月参加了 1950 年国庆阅兵式的组训工作及阅兵式。10 月以后随团执行沿天津——秦皇岛——锦西一线的海防任务，团部在北戴河，这期间我被任命为作教股副股长。1951 年 5 月，我团改称为志愿军炮兵四十一团，开赴朝鲜前线。当时五次战役刚结束，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战线趋于稳定。后来我团一直转战于金城前线（中线）。我们团装备的美制一〇五榴弹炮，在志愿军中属于现代化武器，据说全志愿军共有 108 门，远远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所以我们炮兵进入阵地后，步兵由于战斗频繁减员严重，不断换防休整，而我炮兵长期坚守阵地连续作战。我们参加过的著名战役有：1951 年秋金城防御战，1952 年上甘岭战役（上甘岭位于十五军防线，我团位于其左翼二十一军防线），1953 年朝鲜停战前的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我在朝鲜共 3 年，前一半在团部任作教股副股长，后一半任三营副营长，营长是位工农干部，不十分熟悉炮兵射击指挥。我到营以后，一直守在营观测指挥所，负责营射击指挥的作战任务。当时已进入坑道战阶段，炮阵地与观测指挥所都已进入坑道。志

愿军炮兵坑道战经验，第一个战例就发生在我们营里。当时我们七连长张德有的观测指挥所在轿岩山前一个高地上，与步兵连指挥所在一起。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步兵伤亡严重，敌人在飞机与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该高地发起冲锋。当时一切通讯联系都中断了，发现我们七连长在一个背敌坑道口，用红旗向我们发信号。按情况判定，高地上的人已全部退进坑道，要求用炮火袭击该高地。我们当即集中全营火炮向该高地猛烈射击，很快就把敌人冲锋部队打了下去。那时在白天由于敌人飞机与地面炮火严密封锁，我们的支援部队无法向上运动。但当夜幕降临，步兵支援部队及坑道中剩下来的人，又迅速占领了高地。不久志愿军司令部便派人来营了解情况，总结了炮兵坑道战经验。

我于 1954 年 5 月回国，到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任军训参谋，1958 年由于“历史不清”被清除出党并复员，以后一直在石油系统的哈尔滨石油学校、大庆石油学校、大庆石油财经学校、大庆十六中学任数学教员。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 年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改办转 业。1980 年后在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职工大学任数学教员，1984 年离休。

我们一同去解放区的其他二位同学简况是：

刘汉宗：1947 年 7 月，我们一同由晋察冀行政干部学校出来到了炮兵旅、同在炮三团参加了三年的解放战争。1950 年 5 月当时他是机动炮团通讯参谋，请假回家探亲，见其父重病卧床不起，弟弟妹妹年纪尚小，因而无心返回部队，后在海城二中任数学教师，现已退休。

赵镜澜：1947 年 5 月由晋察冀行干校出来后到军区情报处工作，1952 年赴朝在六十七军任侦察参谋，1954 年回国，1956 年夏转业到哈市二商局工作。后任哈市二商局服务研究所所长，1985 年离休，开始参加编写地方志工作。1991 年 12 月病故。死后哈市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一位副市长致悼词，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哈市模范共产党员”、“哈市离退休职工标兵”。在省、地、

市编志工作人员中，广泛宣传介绍他的先进事迹，号召向他学习。

赵镜澜在军校学习时期，具有强烈的反满抗日爱国思想，是我们秘密爱国组织“甦生会”发起人之一。他利用当五期生指导生徒的有利条件，团结并发展了五期及其他期的一批同学为秘密组织成员。

自1946年参加革命后，革命意志坚定，工作勤恳踏实，在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复转地方工作后，连年是标兵模范，一生廉洁正直，为革命鞠躬尽瘁。我认为他可称为军校同学中的楷模。

我之所以能比较及时地走上正确的道路，能把在军校学到的一点军事知识，在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奉献给祖国，是和佟老师在关键时刻对我的启发和指引分不开的，我深切地怀念佟老师。

我也深切地怀念和我朝夕相处、在一起摸爬滚打、同甘苦共命运、情同手足，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和我一道为祖国做贡献的军校同学。

（作者为军校四期生，大庆油田学校教师）

于静纯、佟志杉的革命活动——

——侯　洛

于静纯、佟志杉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两位同志。他们的事迹，有些同志写了一些。我想就我所知再作补充：

于静纯同志，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于1935年即参加由张为先、丁宜同志组建的“东京反帝大同盟”。回伪满后，曾任伪陆军军官学校教官，还任过伪满驻日大使馆武官，从此，便和我们失去联系。为了不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东京组织和于没有联系。1945年5月在沈阳和于静纯重新恢复联系，他此时正在陆军训练学校任教官。恢复联系后，于做了不少工作，也搜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45年9月我军进驻沈阳时，组织将于介绍到我部队，开始在周桓同志领导下任东北军政学校副校长，同年11月，当我军撤退沈阳时他排除家庭及亲友的一切干扰，也放弃家庭巨大财产，毅然决定携带妻子李甸秀同志及两个年幼的孩子，随我军撤退，并参加与国民党的战斗，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1946年初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佟志杉同志，1942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烈士。

“八一五”光复后，佟志杉和石迪、范迪厚三同志打入戴笠亲手组建的军统特务“滨江组”，这是一个策划暗杀活动的特务组织，在他们已掌握组长军统特务少将张勃生等三人拟起程赴重庆向戴

笠汇报之时，在苏军配合下，及时将他们三人逮捕，这是我在东北第一次逮捕由重庆派来的军统少将级特务，敌人对此甚为震动。同时，也掌握了该组策划暗杀李兆麟同志的阴谋计划，但因未引起有关同志的警惕，李终遭暗算。李被害后，由于他们提供的案情线索，对破案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佟志杉同志所领导的打入蒋军保安第二纵队的田羽，白山等同志，以蒋军军官的身份为掩护，亲自查清长春敌人城防工事、兵力部署等全部情况后，绘制成长春城防要图，并加以文字说明。敌在长春四围设防，主力部署在东、北和东南三面，城西南则力量薄弱，宜在此处突破。此情报由于及时送到东北局社会部，所以我军在 1946 年 4 月 14 日晚发起进攻战斗时，首先占领机场，切断敌人空中联系，立即从西南方面迅速攻进城内，守敌惊慌失措，战斗很快结束，除敌第二总队长刘德溥少将带领少数亲信化装潜逃外，第二、第四总队全部被歼，生俘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祯、东北行辕高参赖秉权、国民党吉林省代主席王滨华、长春市市长赵君迈等文武官吏五十多人，俘 11000 人。这是我在东北打的第一个胜仗。东北我军领导机关和东北局社会部对田羽、白山及他们的领导人给与表扬与嘉奖。

此外，何正卓同志 1942 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佟志杉同志是怎样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为何正卓同志奔走以及救援何妻崔醒亚同志的?

何正卓同志被捕后，这时佟刚刚被批准参加革命工作，他即多次表示做为一个老同志（与何在东京商船学校和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毕业，但比何早一年），老朋友（四年相处很要好，毕业后又同在伪满江上军共事），在何遇难时，应不顾一切地为他奔走，并以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佟并不知道何正卓同志与我们有组织关系，只知道是因一般国民党嫌疑而被捕）。佟说：“只有象我这样条件的人，才能为他奔走，敌人对我这样做是不会怀疑有政治问题的。”佟说的自身条件一是他出身贵族，父亲佟济煦是伪满宫

内府侍卫长，溥仪、郑孝胥的亲信，溥仪到东北后，他们全家追随溥仪到东北，因此日本人不会怀疑他和国民党有关系；二是苏联和日本在伪满边境因“干岔子岛事件”而战争，佟在战斗中被苏军炮弹碎片打瞎了一只眼睛，因此日本人不会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三是佟是从溥仪周围挑选送到日本学习海军的，同时，娶日本姑娘为妻。因此，日本人认为佟是溥仪骨干、亲日人物。我们认为佟志杉同志讲的有道理，而当时，何妻的处境也很危险，所以表示同意并反复说明要见机行事。佟到哈见何妻后，知道何正卓同志是江上军军法处长郭抱一出卖的（郭与何同住在一个单元内），同时，郭又受日本宪兵指使强迫何妻崔醒亚同志说出何被逮捕前的一切活动和与何有交往的有政治问题的人，由于崔不谈，郭便把崔当佣人对待，每天给郭家打扫房屋、做饭，不允许崔回安东（即现在丹东）娘家，使崔受尽侮辱。佟了解情况后，即与崔一同见江上军田内顾问，请在对何审判时说些好话并允许崔离开郭家，得到田内同意后即给崔搬了家并为她谋一职业，给了她安家费，使崔得到解放。佟志杉同志不顾自身危险，为何正卓同志八方奔走，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47 年 7 月东北局社会部提出：为了了解长春市蒋军部署情况和布置对长春蒋军做起义工作，调佟志杉同志去哈尔滨，佟接到限期到达的通知后，不顾爱人、孩子患病和自己体弱多病，毅然奔赴征程，闯过敌封锁线，历经艰险，长途跋涉，到哈后即病情加重，待汇报工作接受任务后，即病倒，以身殉职。佟志杉同志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我们是永志不忘的。

（作者离休前为中共山东省委调查部部长）

伪满军队中的真勇社

侯 洛

我曾在《辽宁文史资料》和《营口文史资料》中看见登载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于1948年2月25日率部在辽宁省营口起义等文章，其中提到在伪满时期王家善组建过"真勇社"的问题。但文中对"真勇社"的真实情况介绍的不够。知道组建"真勇社"内情的同志张为先、丁宜、何正卓同志已逝世多年，剩下的只有田琛、石迪、我及于清淮同志，现在把我们四个人的回忆概述如下：

1　为了把"真勇社"组建经过情况说清楚，首先要由"真勇社"社长王家善说起。王是黑龙江省巴彦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前，已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东北军队中任职。"九一八"事变后，仍留在东北，任伪满中校。1935年被伪满选派赴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整个伪满期间，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王于1938年春自日本陆大毕业后返回伪满，先后任上校、少将。由于王能掌握日本的军事理论和训练方式、方法，所以日本关东军对他器重，他对伪满下级军官不摆架子，相处也融洽，所以王在伪满青年军官中有一定声望。王家善虽然身为伪满军人中的上层人物，又受日本军事教育多年，但思想上是反满抗日的。

2　1936年3月王家善在日本与正在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的张为先认识。张是1932年在英国留学时参加共产党，1934年

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派回东北，因为没有接上党的关系，不得已1935年1月到了日本，在日本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1937年6月在北平与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之一南汉宸同志接上党的关系，接受地下工作任务，仍派回东北。党组织对王家善的工作，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6年初到1939年春何正卓同志回东北，1936年5月由“东京反帝大同盟”成员刘椿龄（东京早稻大学学生）发起，以王家善为领导，其中有何正卓同志共五人参加，组建“协行社”，以抗日为中心任务以读书会形式，每人分担研究题目，每周召开一次讨论会，暂不发展组织，主要是研究讨论国际形势、抗日形势。这时，张为先同志经刘介绍与王家善相识，张以研究国际形势、交流认识面目给与王家善以爱国反满抗日的政治思想影响。王家善正统观念很强，亲国民党思想亦深，但张为先同志仍和他保持同乡与朋友关系。据王家善与何正卓同志讲：他借1936年暑假之便，秘密赴南京，见到齐铁生（东北人，C. C分子），国防部副部长熊斌。同时，也见到何应钦，取得他们谅解后，要王仍回东北以便将来呼应抗日。王9月初回日本后，发现刘椿龄参加“东京反帝大同盟”，对刘不满，便把“协行社”解散了，与张为先也不来往了。不久，王家善组建伪满在日本各军校学生参加的“陆海军人同学会”，此学会是半官方的，因为是在伪满大使馆武官处领导下组织的。这个“陆海军人同学会”是以王家善为核心，要何参加并做他的幕后工作，武官处对同学会什么想法和意见以及同学会对外行文，王带回后都与何共同研究方答复。

何正卓同志1936年参加“东京反帝大同盟”，因为他与王家善关系非常密切，遂受组织之命，仍与王加强联系，增进友情，保持密切关系，相机进行政治思想影响。王家善于1938年春毕业回东北前，告诉何正卓同志：他有个“真勇社”组织，并介绍马德泽、邵炳麟二人与何共同研究推动“真勇社”的发展。他告诉何“真勇社”也是以抗日为中心任务，是一个秘密组织。何当时也不

便问“真勇社”组建原因，王又说是他去南京时，何应钦给起的名。王家善离开东京后，“真勇社”在日本基本上活动不多，互相来往也少。

第二阶段，从 1939 年春何正卓同志回东北后到 1942 年春何被捕。何正卓同志 1939 年春毕业后回东北，开始被分配到哈尔滨江上军（即海军）司令部。1941 年初又调到伪满治安部（即军事部），王家善不久从奉天陆军训练学校调长春，先任伪治安部上校军事课长，后任参谋司长。这样何与王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何正卓到长春后和王家善都住在长春市洪熙街伪满军官宿舍，两人住的较近，何住在王的斜对过。晚间工作之余，他们经常来往，无所不谈，有时就谈到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问题。这期间，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欧洲打起来，1940 年 6 月苏德战争又打起来；同年 9 月，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军事同盟。这在伪满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摆脱了孤立，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行列，抗日战争胜利是大有希望的，而且为期不远了。因此，在伪满军人中的一些中、下层军官的思想和伪满各种军校的学生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意识更加增强了。大约 1939 年末，何正卓同志向我们组织反应“真勇社”的问题，王家善自日本回东北后，“真勇社”成员又有了新的发展，如，齐齐哈尔就发展了二三十名，军人中有林家岳、于文泽、郝景祥等人，非军人中还有 10 名女的。何曾受王家善之托，去齐齐哈尔参加一次他们的会议，是在于文泽家召开的，于的爱人在外边放哨，会上林家岳说：“1939 年 8、9 月间，苏日诺门汗战争期间，伪满陆军被迫参加战争，其中一个营的部分官兵，在战争前线起义进入苏联，这就是于文泽领导的“真勇社”成员从中进行爱国抗日思想影响所致。这是何和我见面时讲的，何在 1953 年 5 月自传中，也叙述了这一段。我认为这是“真勇社”爱国抗日的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应当指出这种表现是功不能没的。于文泽 1946 年“四一四”我军第一次

解放长春不久又撤退后，仍留在长春，不知此人是否健在？健在时，可以对此问题说得更清楚些。由于以上这些情况，经组织研究：要求何正卓同志推动王家善搞一个类似统一战线和更加灰色的纯伪满军官组织。因此，要何试探王是否可以搞一个清一色的伪满留日军官同学会的组织（目的是不要女的参加）。然后逐渐扩大把伪满各种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和在校学生有选择的吸收进来。这对伪满说来，组织一个同乡会和同学会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并不特殊，伪满日本人中就有这种同乡会，那种同学会。我们当时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在伪满军队中的中坚分子，有许多是日本的陆、海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在这些人中有不少有爱国抗日思想，同时这些人大都和王家善熟悉，年岁较轻的有不少还是王在伪满军事训练学校所教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又送到日本军事学校深造，把这些人组织起来，首先通过他们为我们收集情报，同时，在抗日战争关键时刻，即我抗日大军打到关内时，可以起里应外合作用。搞个伪满留日军官同学会组织，王家善开始表示同意，经过一个时期后，王向何正卓同志说：是否把过去的“真勇社”这个组织加强起来，搞一个正式纲领，组织机构，纪律原则，正规化一些。“真勇社”的成员，不但要吸收留学日本陆海士官学校的伪满军人，同时也要吸收伪满各军事学校毕业的伪满军人，但条件必须是政治上可靠、有觉悟的爱国抗日的人。这样，便按照王家善的意见办了。

3　“真勇社”组建的情况。我过去写的有关“真勇社”的建设是从1941年5月算起，根据有些“真勇社”成员，如刘启民同志来信说：应从1936年算起；又根据何正卓同志1953年8月的自传中说：王家善在1938年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东北前告诉何，他有个“真勇社”组织。而且1939年在齐齐哈尔曾发展了一些成员，因此，“真勇社”组建，从1936年算起是对的。当时我说的从1941年5月算起，是根据1941年那次会议有了正式行动

纲领，建立了组织机构，确定了组织纪律。同时还明确领导核心人员的分工，以及王家善的政治报告（当时称国际形势报告），确定了总社设在长春市，其他地区为分社，如齐齐哈尔等。总负责为王家善．开会时有正式仪式，即全体与会人员向重庆方面郑重三鞠躬。关于1941年那次关键性会议时间问题，现在根据何正卓同志上述自传所叙是在1941年12月15日晚7时至次日晨3时，于长春市洪熙街伪满军官宿舍何正卓同志家召开的。我现在回忆，何正卓同志说的是正确的。而5月是根据于清淮同志回忆的。有了何正卓同志的自传作根据后，我又和于清淮同志再一次一起回忆，他也同意何正卓同志自传中所叙的日期。因此，"真勇社"1941年那次关键会议，应该是1941年12月15日。1941年12月这次会议的召集人为王家善，参加成员有：

何正卓，日本海军炮术学校毕业，伪治安部江上军（即海军）军官。

于清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教官。

关操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区队长。

刘启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区队长。

牛匡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区队长。

褚遇春，伪满军教导队毕业，伪满治安部上尉课员，后任禁卫军少校。

据何正卓同志上述自传还有马德泽（在关东军报告部临时服务）、孙镜洁等人。王在这次会上主要讲：一是东北已沦陷多年，日寇又侵占我大片领土，我们不能甘当亡国奴；二是在伪军中成立一个反满抗日组织，名叫"真勇社"，逐步取得武器和兵权；三是发展对象为伪满军中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军官；四是注意从各军管区中发展，同时要做好伪满军中、上层工作，以备将来策反；五是当前任务放在发展社员．并宣读行动纲领主要是：团结爱国青年军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相机反正策应反攻，收复失地，复兴中国。口号是：多读书，善处人。总社设在长春，分社有吉林、

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承德、通化、佳木斯、牡丹江、锦州、大连、军官学校、训练学校、江上军、宪兵总团、军需学校、军医学校等。

"真勇社"的分工是：社长王家善，政治何正卓，作战关操祚，教育于清淮，情报刘启民，组织牛匡时，后勤褚遇春，以上这些人除褚遇春外，都是由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平均年龄仅 30 岁。这 6 个人都是王家善亲自选定的，同时，也是"真勇社"的骨干，其中何正卓和于清淮是王最器重和信任的。有的参加"真勇社"的人把这次会当成正式会。因为这次会前，何与王家善研究了"真勇社"的行动纲领问题，王便委托何起草，同时，何提出要搞一个政治报告，王也委托何起草。

我是 1938 年秋经组织介绍在日本与何正卓同志联系的。何与我是同乡，我们两家相距有 20 华里彼此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有些情况都互相听说过，所以联系时比较自然。何 1939 年回东北后，仍和我有联系，我是 1940 年春回东北的，同年秋，我到了长春，因此，与何的联系比较正常。此期间，何与王的关系和 1941 年召开"真勇社"会议的问题，都是组织经过我，然后由我部署何去办的。"真勇社"的行动纲领和王家善的政治报告，都是何与我共同研究起草的，纲领基本思想和政治报告基调主要是不分宗教、信仰、党派、阶级，团结伪满军队中的爱国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复兴中华。当前任务是积极发展社员了解伪满各阶层军人动向，了解日、伪军队动向。行动则俟抗日大军到来，里应外合，打倒日本，收复失地。"真勇社"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我党的抗日十大纲领精神，但它不暴露十大纲领内容。政治报告是根据我们所讨论的国内外形势发展内容，并能为王家善所接受而写成的报告提纲，当时国际形势发展很快，日本也正在酝酿是北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进攻美国。所以王急于想再召集一次会议，但因于清淮同志又去了日本学习，何正卓同志即将调回哈尔滨江上军司令部，这次会议没有召开。但在何去哈前夕，专门与王谈

了在这样好的形势下可以加强发展"真勇社"成员。可是1942年1月末，何因国民党牵连，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拟逮捕他，何事先发觉逃跑至大连躲藏，1942年3月何被捕。从此，王家善本人也因敌人开始对他注意，而暂时不活动了。

4 "真勇社"是一个松散组织，虽然纲领规定有会议制度，但实际上，王家善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以王家善本人为主，有时在何正卓同志参加下，以碰头方式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真勇社"的成员以刘启民、褚遇春、关操祚为最积极，到了1943年共发展有70余社员。

石迪同志1941年春从日本回东北后，也到了伪满军事部（即治安部）工作，他也住在洪熙街伪满军官宿舍，与何正卓同志同住在一座房子里（是平房式）。石过去也认识王家善，由于和王住的相近，所以也时有接触。刘启民、褚遇春与石迪关系不错，也是和他们时有接触，刘、褚便把石当做发展'真勇社"社员的对象，关于"真勇社"的一些内部活动情况，他们并不回避石。石采取的态度是不即不离，这是组织上要石这样做的，我是石迪同志从日本回长春后，就和石取得联系的。根据组织指示：要石在不参加"真勇社"的前提下，与刘、褚维持朋友关系和他们接近，以便了解"真勇社"内部情况，一方面从他们那儿套取情报，一方面从"真勇社"社员中物色对我们有用的人，以便将来能为我们所用，我们在"真勇社"内部有何正卓与于清淮两同志，在外部有石迪与关克两同志（关克当时是在伪治安部次长秘书官室作文官秘书），有时也和刘启民、褚遇春接触，他们两人，有时也向关透露过"真勇社"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时期"真勇社"的一切活动情况，我们是很清楚的。

1941年末，何正卓同志调回哈尔滨伪江上军司令部，1942年3月因1941年"一二．三〇事件"受牵连被捕入狱。王家善不久也离开长春去佳木斯任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于清淮同志

不久离开伪满被我们派到冀东，王家善本人已发觉日本特务方面注意他，所以从此以后“真勇社”总社便没有什么组织活动，但“真勇社”的社员与社员间个人互相往来的活动仍在进行，不过比过去谨慎多了，秘密多了。同时，经过严格考察仍个别地发展社员。关于“真勇社”的问题，1987 年我们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地区情报工作情况”专门有一段提到这个问题的。

5　我们的地下组织，当时虽已在伪满军事机构中建立了一批情报队伍，而且分布在陆、海、空各部门，这是有一定数量和素质很好的情报队伍，共产党员在日本投降前占 50%，他们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或其他日本大学毕业的。军衔均是尉级和校级，因此，在搜集伪满、日军事情报上是有成绩的。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最好能影响或团结一部分军事力量，平时从他们那里套取情报，当我抗日大军打进来时，动员他们里应外合地抗击日军。所以我们从 1935 年在日本时，就对王家善进行反满抗日的政治影响，以致派何正卓同志一直加深与王家善的密友关系。这就是我们推动、促进王家善重新组建“真勇社”的想法。“真勇社”社员民族意识较强，反满抗日思想较深，另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都懂日本军事知识，了解日本侵略情况；二是经伪满选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或选派去伪军事学校学习，可以获得日本信赖容易隐蔽；三是他们与伪满上层军官，大汉奸等人物有的是亲属关系，有的是师生关系或其他关系，在关键时刻，可视机策反。王家善自日本回东北后，多年从事军事教官，所以不少从伪满军事学校毕业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因此王在伪满军队中，尉级和校级军官中，不但有威信，还有号召力。而伪满军队中之实力者，正是中尉至中校级的少壮军人，所以团结王家善和“真勇社”这批骨干力量，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现实意义的。王家善虽然正统思想很重，但对国民党特务则采取拒绝态度，我们知道大约 1941 年秋国民党华北军统

特务派“真勇社”社员林家岳特别来东北拉拢王家善，当即遭到王断然拒绝，并要其他“真勇社”社员对林的行动加以警惕（林家岳是去北平后与军统发生关系，此后，林又回过东北一次，据日本投降后了解：林在日本投降前并没有能发展“真勇社”的人参加军统。）因此，我们认为王家善是个正派军人，所以，才下力量做王家善及“真勇社”人员的工作。

6 尽管我们已在伪满各军事机构中，有一批情报队伍，但通过运用“真勇社”搜集来的情报可以充实我们的情报，同时也能印证我们的情报。因此，当时伪满陆、海、空军一切军事部署，战斗力、装备武器、战略思想、军事设施、军工厂以及军队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基本上都能掌握，所以，我们当时在获取日、伪满在东北的军事情报上是有一定力量的，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7 1945 年日本投降后，王家善因是佳木斯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被苏军扣留，石迪同志奉组织之命，假借日本投降前已参加“真勇社”，在长春恢复“真勇社”组织，经推举为代理社长。同时又取得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罗大愚的信任，参加了东北军事宣抚委员会。以后遂得打入军统特务组织“滨江组”。这是日本投降后，戴笠把他的亲信张勃生少将由重庆派来的，张携带电台，别动队长和在东北搜集情报及破坏暗杀计划。我们除派石迪同志外还另外派伪满军人出身的两名同志打入该组内部。从而掌握“滨江组”全部密码，和阴谋破坏暗杀计划，1946 年 2 月当张勃生亲自携带全组名单和全部工作部署计划，将离哈经长春飞重庆报告时，在我公安部门配合下，通过苏军一举将张等三人逮捕，因系大案被苏军将张解往苏联。国民党经苏军同意派煤炭专家张莘夫博士来辽宁省抚顺市，兼任抚顺煤矿厂长，不久被暗杀。国民党遂大搞反苏反共活动。同时美国也制造舆论大肆宣传此事，一时使苏联陷于被动，后来，苏联将“滨江组”的电台，别动队和在东北搞破坏暗杀阴谋计划公布于世界，并且说这是

"滨江组"搞的，为的是嫁祸于苏联，这时，苏联由被动变成主动，一场国际政治外交事件被压下去了，这是石迪同志的功劳。

王家善在营口率师起义前，当时辽南情报站副部长石迪于1946年秋开始，在五十八师内部即派进情报人员，后又建立情报五人小组，其中刘凤卓（团副）、赵百禄（连长）两人就是日本投降前参加"真勇社"的，这个情报小组在搜集五十八师的情报和王家善的思想变化以及促进与推动王家善起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8 王家善从佳木斯苏军拘留所逃回哈尔滨后，找到了何正卓同志，商研在东北组建一个师的兵力，由王任师长，何任参谋长，遂于1946年2月去北平，往见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如熊批准就能获得建军武器和军费，但王、何他们在北平虽前后两次见到熊，熊口头也表示同意，但并未给予委任状，同时，对王、何态度也不热诚，王甚感失望。此时，何正卓同志曾向王提出：应将王于"七·七"事变前去南京见到何应钦并由何应钦亲自指定组织"真勇社"一事，向熊说明，或者即应去南京见何应钦报告王在伪满工作情况等。王家善听后立即郑重表示：千万不要再提出此事，如被人传出可能会坏事的；我当时是为了号召一批反满抗日的军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说我在日本时偷去了南京，谎说见到了何应钦，并由何应钦指定回东北组织"真勇社"这是假的。这是1946年3月何正卓同志与王家善从北平回来路过沈阳时，亲自向我说的，这时王家善说的何应钦指定他组建"真勇社"的事，才真像大白。但在东北其他许多参加过"真勇社"的人们，可能至今还不清楚这个问题。

另外，何正卓同志还谈到：他和王家善在北平没事时，何在街上买了不少有关国民党的书籍和共产党的书籍。王看后对何说："中国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这是无疑的，但根据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美军装备与支持，以及世界各国支持，中央政府维持20年，

30 年的局面，也是无疑的。"这就是王家善对国、共两党当时的认识。王家善回沈阳后态度有些消极，何正卓同志便向王试探：国民党不要我们，如果共产党同意我们建一个师的兵力，我们投到共产党那边怎样？王立表同意，要何找路子，此事何向我说明后，我立即向正在沈阳领导我们工作的潘汉年同志做了详细汇报，潘汉年同志指示：（1）王家善现在到我们这里，我们绝不会同意他单独建立一个师兵力的，同时根据王现在的思想状态到我们这里既不能满意，也不会长期留在我们这里的。（2）你告诉何正卓同志要他帮助王依靠国民党组建一个师，等到国民党军政大势已去，我军兵临城下时，做好王家善的工作，他到时能毅然率部起义，这样，王家善到我们这里，才能有所作为。虽然后来何正卓同志被国民党委任为辽宁葫芦岛商船学校校长离开了王家善，未和他一起建立一个师。但当 1948 年 2 月 25 日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消息发表后，我当时很快地就回想起潘汉年同志的指示是多么高瞻远瞩，多么正确啊！

9　王家善在营口率部起义①确如潘汉年同志所预料那样，国民党军、政大势已去，我们兵临城下；②由于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③石迪同志勤勤恳恳，遵照党的指示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但我还认为我们从 1939 年在日本就对王家善做工作，一直到日本投降前何正卓、石迪两同志仍不断地向王本人及"真勇社"的社员们做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们还在继续做王家善的工作，因此，对王家善及在五十八师中"真勇社"的社员思想能了如指掌，所以石迪同志才能巧妙地运用有利时机，争取起义一举成功。因此，长期以来，就对王家善及其周围人们做统战工作，也是应该值得提一提的。

我们与老百姓相处

——罗寿三

我们都是平民子弟，深知人民的疾苦。又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没有兵痞习气。同受日本人的奴役，在校内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我们对父老兄弟都有命运与共之感。所以，无论是外出或操练、演习时都能做到不践踏庄稼，不骚扰百姓。

1941年夏在大连湾进行了游泳演习。有一次演习完毕上岸脱下泳裤正在用淡水冲身时，一辆坐有妇女的马车要从我们身边经过，连长张挺命令大家转过身去背向马车，此时有的同学又重新跳入海中，等马车过去后再回到岸上。

1944年秋在吉林市哈达湾进行野营演习。一次我们正在休息，猛听到从松花江上游有溺水者的呼救声，呼声逐渐减小，在临近我们时已听不到呼声了。率领我们演习的是日本人大原教官，此人最爱打人，有时甚至一人有错我们就要集体受罚。我们只能在他指定的时间内作他指定的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教官不在现场，想要救人又无法向他请示。经同学们商量，下定了宁可受罚也要救人的决心，并推选水性好的费恩育同学从急流中把人拖上岸来。此时溺水者已停止了呼吸。经同学们施行人工呼吸，终于把人救活了。次日，我们受到了溺水者家属的感谢。

194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我同富忠阳同学到石碑岭上的野战阵地去参观。到了中午便到山脚下的一家农户请求把我们自带的饭盒给热一热。热后，我们一看，不是我们自带的高粱米饭而是

粘豆包。当时我们很感动。我们付钱时主人一再拒收，并说："我知道你们很苦，自家种的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一再向主人表示感谢。

1943 年冬，我们在进行一次耐寒演习。一天夜里，我们在岔路河小学的操场上，支起了帐蓬露营。我同另外一个同学值步哨勤务。这天，北风很大，风吹到脖子上有如刀割一般，我俩便在一个墙角处背风。过了一会，有位大爷披着棉衣到此墙边来小便，看到我俩一怔。我们连忙解释说："我们是在这儿演习的军校学生，现在在这里站岗"。他说："哎呀！这么冷的天气，不要冻坏了，进屋暖和暖和吧！"我们婉言谢绝。又过了一会儿，这位大爷端来一小锅现煮的精米稀饭，叫我们吃下去暖暖身子。这时，我们又累又冷又饿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当时，中国人吃白米饭是犯法的，这位大爷冒着当"经济犯"的危险给我们做白米饭，可见他对我们是真心实意和信任了。

1944 年冬的耐寒演习，最后一天是夜行军。这天傍晚从奢岭口子出发向学校方向（北向）行进。计划在次日天亮前到达学校附近，再做一次拂晓攻击黎明突入的演习后，就结束这次演习。约在半夜时分，在一个村庄边上小休息。这天北风很大，我就同一些同学在一个猪圈里背风。这时，李风桐同学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区队长叫他退出演习并命我带他去找一个取暖的地方。因风大不敢在外边用火取暖，只好到农户家去。这家农户把我们让在炕头上，拿棉被给我们盖上，还加把火烧炕。次日清晨李风桐的肚子痛好了，准备启程回校，主人留我们吃了早饭。我们在校时除节假日外出可以带钱外，其他时间都不准带钱，因无钱可给就只好在向主人道谢后回校了。

当时我的姨夫是伪满邮政总局的中级职员。我常在星期天到他家去串门。他经常鼓励我学好军事本领，准备将来打鬼子。他把反满抗日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在当时不是很熟的人，是不敢说这种话的。我认为他的这种想法，至少代表了知识界的想法。

“文革”期间，我爱人单位的工宣队是由武汉重型机床厂派来的，指挥长是一位姓孙的，原籍是长春市的老工人，他说：“伪满军校的学生思想进步，在日本投降后的一段真空时间内，他们上街维持秩序，使长春避免了一场大乱”。孙指挥长在伪满时也是工人，由此可见一般市民对我们的看法了。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离休前为武汉中南建筑设计院建筑师）

哈尔滨的黎明

——东北解放初的学生运动

冯光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苏联红军先头部队便进入长春，伪满军官学校学生自动解散。我和同区队的同学白铁山，在长春停留两天后，匆匆返回哈尔滨。10月的一天，在电车上偶遇伪满军校本科连长邓昶。他把我带到中共哈尔滨市委，和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次日，他领我见到市委的张观、王景侠、张罗等同志。他们建议我参加市委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同年11月初，在哈尔滨市保安总队，参加了十天的政治训练班。在训练班见到了军校一期的吕天、毕生、刘光等同志，又得到了三哥冯克武的可靠消息。三哥伪满时进关参加了革命。和三哥同来的老同志向我介绍说，三哥抗战时在一一五师，骁勇善战，被大家誉为“野老虎”，现在是主力部队的老团长，已抵达沈阳，不日将回哈尔滨地区开展工作。训练班结束后，保安总队撤离哈尔滨，吕

天和我们留下，在哈市搞地下情报工作。在此期间吕天和我见到了李兆麟将军、纵队政委张秀山将军和陈云同志，当他们了解到我是革命干部的弟弟时，都鼓励我要向哥哥学习，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

12 月初，三哥托人给我带来信，要我千万不要迷失方向。说我年纪还轻，应继续学习，于是我在 12 月初向四期同学任庆借了文凭（我参加工作后一直用任庆的名字，本文中的任庆就是我），和白铁山一道考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入学不久便在工大党组织负责人王江夫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做学生工作。后由张震、王学勤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在工大学生中，进步与反动的两种力量争夺青年的斗争十分激烈。我和白铁山站在革命一边，当时在工大三青团的势力较大，他们控制着学生会。我在学生会中担任实业（即学习）部长。利用给一些成绩较低的同学补课的机会，宣传进步思想。

1946 年 3 月 9 日，李兆麟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他被杀害，对哈尔滨一些人，尤其是思想最敏感的青年学生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育。人们听到了有关李兆麟斗争历史的介绍，参观了表现他那艰苦生活及身后遗物的展览后，都深受感动。看到抗日英雄李兆麟刀伤累累的遗体，许多人认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凶残面目。

1946 年 4 月 28 日，哈尔滨解放了。为了发动群众，中共哈尔滨市委，在 1946 年 5 月成立了民运工作委员会和民运工作部。动员所有能够参加民运工作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了民运工作队，工大的 4 个党员张震、王学勤、杨树桐和我及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了这一工作，于 5 月 9 日在中苏友好协会集中，我被编在民运工作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队长李松涛，指导员李在民，工作地点是工人和贫民集中的太平桥。主要任务是发动城市贫苦人民开展反对敌伪和国民党时期欺压穷苦百姓的恶霸、地痞的斗争。我们在老干部的带领下工作不久，突然接到“迅速撤离哈尔滨”的命

令，于是，工作队兵分两路，伤病员和女同志到后方去；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向前方挺进。我们分队具体任务是，去阿城县米甸子区开展群众工作，我被任命为班长，5 月末离开哈尔滨向阿城境内进发。

到达米甸子区，开始了解情况还不到一周，又接到上级紧急指示，要求各分队迅速到拉林镇集中，情况是前方大部队正做战略转移，民运工作队的任务是赶在敌军到来之前，利用这一间隙时间发动群众，做好打游击的准备。于是，各分队迎着后撤的大部队向前方快速行进。到了拉林没等坐稳，又接到“迅速返回阿城”的指示，于是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太平桥。没几天，市委调张震、王学勤、张玉琛和我到市委报到，新的任务是搞学运工作。

我们住到市委民运工作部楼下。我们的直接领导人是市委负责青运工作的王江夫同志，上级指示我们先回原校工大和一中团结进步学生发展积极分子。

1946 年 6 月下旬，市委指示，由市委新任宣传部长蒋南翔领导我们开展学运工作。第一次开会听了我们每人汇报之后，他首先传达了 1945 年 9 月任弼时同志和中央青委几位同志谈话中的一段话，大意是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的 14 年，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象关在黑屋子的人，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教育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东北地方很重要，东北革命的胜利，将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南翔同志对当前工作讲了两点意见，一是提高自己；二是团结别人。要团结别人，首先就要自己思想作风比别人强，理论水平比别人高。道理讲得清楚，别人才能信服。其次，团结别人，首先是团结进步同学，和他们交朋友，谈心，讨论问题。蒋南翔在这次会上确定，先组织一个读书会来宣传革命道理。

经过努力，读书会成立了，定名为“青年自学会”。开始有 10 余人参加，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由蒋南翔讲课。不久“自学

会”扩大了，会址迁到中苏友好协会，人数增至50余人，大家同意更名为“青年共学会”，推选我为主席，此时也有少数三青团分子参加。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

中共哈尔滨市委决定，利用7月15日开始的暑假，组织大、中学生夏令营活动，通过活动团结教育青年学生，为建立先进的青年团体做准备。营址设在江北太阳岛的旧别墅。为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决定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出倡议，并在《东北日报》刊出消息。定名为“青年之家”夏令营。参加人有学生200余人。共组成三个队，分别是：哲学（中国问题）队、社会科学队和文学队。我担任社会科学队队长。每日的活动安排是，上午学习，学习内容为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基本知识，更多的是请名人作各种专题报告，丁玲、肖军、蒋南翔、李则蓝等同志都来作过报告，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下午有游泳、划船、唱歌、绘画、写壁报等活动，晚饭后自由活动。最受欢迎的是营火晚会，内容有唱歌跳舞、乐器演奏、扭秧歌、朗诵革命诗篇以及老同志讲革命故事等。

在夏令营中，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孜孜不倦地做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指引青年们去探讨祖国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通过一系列符合青年的多种活动形式，青年们逐渐地接近和了解了共产党，逐步地认清了国民党。

按计划8月10日“青年之家”夏令营结束，根据南翔同志“要为建立进步青年组织做好准备”的意见，在结束前各队分别有准备地举行了营火晚会，由积极分子带头表示建立长久性的青年团体的愿望，这种愿望当即得到大家的积极赞同。8月9日，在“密娘久尔”饭店召开全体营员大会，我代表工大同学正式提出建立民主青年联盟的倡议，倡议立刻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紧接着自愿报名。统计结果全体营员悉数报名。

8月10日上午，租用了四条帆船、若干舢板船，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江上歌咏游行。20多名青年学生坐在舢板和帆船上高唱革

命歌曲。

1946年8月11日上午10时，在哈尔滨兆麟电影院召开了民主青年联盟成立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选出21名执行委员。东北解放区第一个革命青年组织从此诞生了。12日的《东北日报》报道了大会盛况。

8月13日第一次执委会上选出了13名常委和主席王五常、副主席任庆、刘宾雁，并通过任庆、刘宾雁等6名常委为驻总部负责日常工作的脱产人员。

民青成立后第一次的社会活动是，开展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的大型宣传活动，“八·一五”这一天，200多名盟员分别编成了13个队，奔赴道里、道外的繁华市区去做街头宣传。当时的政治口号是：“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独裁”。宣传形式是，高唱革命歌曲、口头讲演和张贴标语，这一活动给哈市人民政治生活上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青成立后，第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是遣送日本侨民归国。

一天上午，市委领导张观同志驱车把我接到市政府大楼的一间办公室，和几位领导见了面。其中一位主要领导是李立三（当时名为李敏然）。给我们的任务是以民青盟员为骨干，动员700至800名大中学生参加遣送日侨工作。

8月18日由1200多人组成的遣侨队伍进入了工作岗位。其中有800名是以民青盟员为骨干的哈市大中学生。民青总部负责人及执委委员分别担任了中队长和小队长职务。

8月18日到9月19日，共遣送了18万多名日侨归国，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在遣侨工作中，民青盟员起了骨干带头作用。经过一个月的工作锻炼，我们发展了近100名盟员。

进入9月，各学校陆续开学，民青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学校阵地，大力发展盟员，争取广大学生站到革命进步一边。经过短时间的筹备工作，在大中学校基本上都建立了民青支部，并开始向

小学教师中发展盟员。

为加强学生工作的领导，市委决定成立了以蒋南翔为书记的学生工作委员会，我被吸收为学委委员负责哈大和五中党支部的领导工作。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民青总部的率领下，从9月到12月间，民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其中有纪念“九·一八”宣传活动，“双十”游行和歌咏比赛以及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等活动。这些活动对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扩大团结范围，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12月，国民党集结兵力企图进犯哈尔滨，其先头部队攻占松花江南岸的陶赖昭。上级指示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撤退，二是争取不撤。一旦撤退，要把已经公开面目的革命青年带走，具体方案是：一、成立寒假补习班，把一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二、组织一支“学生下乡工作队”去郊区农村参加土改运动。条件必须是党员和发展对象。

寒假补习班设在一中，班主任为蒋南翔，学习内容有三：一、国民党和共产党；二、美国和苏联；三、土地改革问题。

几乎与寒假补习班开办同时，按既定计划组织了一支学生下乡工作队。由哈大、一、二、三、四、五中的学生党员、发展对象和民青骨干分子60余人组成，学委任命我为下乡工作队领队、代表学委与香坊区委书记宋新和、分区委书记杨铁宽组成领导小组，并授权我发展、审批新党员。12月18日开始在一中集训，一、学习土改文件和有关政策；二、颁发武装、步枪与子弹。25日傍晚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亲自看望下乡工作队队员，并作了重要讲话。1946年12月26日向香坊区大嘎哈分区进发，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参加下乡工作队的学生，亲眼目睹贫佃农家里炕上没有席子，晚上没有被子，小孩没有裤子，吃的有上顿没下顿的困难境况，一个个掉下泪来，都表示，一定要做贫雇农的好儿子，把群众发动

起来。轰轰烈烈地反奸清算斗争开展起来了。在斗争中一批恶霸地主被镇压了。群众分到了胜利果实，在群众中出现了参军和支前的热情。工作队员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工作胜利的喜悦。

1947年2月，彭真同志亲自到大嘎哈看望参加下乡工作队的学生。

由于东北战场发生了重大转折，原来的撤退计划，变成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演习。在演习中有50余名积极分子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

1947年2月，市委决定蒋南翔同志兼任哈市教育局长，改组学委，由陈模、康平任正、副书记，委员：张震、任庆、王学勤和张玉琛。民青主席王五常擅自离开组织，受到开除党籍处理，由任庆代民青主席，任党组书记。

各校开学以后，至3月末，民青盟员已由1946年8月的200名，发展到十几个支部1500余名，盟员包括小学教师和社会青年等各个方面。由最初仅在哈尔滨市扩展到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和内蒙东部地区。

1947年4月初在民青总部礼堂召开了第二次民青盟员代表大会，总结前一段工作，改选了执委会，经东北局青委批准，民主青年联盟改名为东北民主青年联盟，选出任庆等9人为委员组成常委会。任庆任主席，刘宾雁、郭永泽为副主席。

东北战场，我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收复中小城市20余座。由民青发起组织的哈尔滨学生前线工作团成立了。由哈大、一、二、三、四、五中的120名男同学组成，主要成分是民青盟员，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做骨干，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中间的学生，还有个别倾向国民党的学生。这支队伍6月28日从哈尔滨乘车出发，经牡丹江转道去吉林蛟河，然后徒步行军3天近300华里到达前线。稍事休整后直接参加了宣传、文化及地方群众工作。在工作中表现突出，深受部队领导、干部、战士好评。经过战斗洗礼其中70多人被吸收入党。

根据第一批学生下乡工作队取得的经验，市委决定在 1947 年暑假组织了第二批学生下乡工作队，参加农村的砍挖运动。600 余名学生编成三个工作大队。第一大队 300 多名去香坊区，由陈模、任庆负责；二大队 80 人去顾乡区，由何礼同志负责；三大队 80 多人去江北松浦区，由李清泉同志负责。

深入到农村进行土改工作的学生们，通过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宣传政策等一系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向地富展开了斗争，经过斗争，挖出大量的粮食和财富，分给贫雇农度过了饥荒，有的贫雇农还分到了马匹和农具，提高了生产能力，尤其是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中挖出了枪支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使贫下中农看清了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提高了阶级觉悟，也给参加土改斗争的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经过一个月的下乡工作，又有 50 余名同学入了党。

与下乡工作同时，受市公安局的委托，民青还组织了一支户口清查工作队，任务是通过清查市内户口，掌握基本社情，根据政策界限，定出重点户，以保证社会的良好秩序，共有 5000 多学生参加了户口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较好地完成了任务。通过调查学生亲眼看到，贫民窟的阴暗角落，社会底层的黑暗堕落，豪门富户的奢侈腐化，由贫富的如此悬殊，得出了社会必须改造，穷苦人民必须革命的结论。

1947 年 7、8 月间，由蒋南翔、陈家康带队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各民主青年联合会理事会，正式通过中国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主席任庆为世界民青理事会理事。使我国的青年组织在世界青年理事会上又增加了一个席位。

以民青盟员为骨干的第三批学生下乡工作队，从 1948 年元月初到 3 月末参加了平分土地的土改运动。这次共有 800 余名学生参加了工作。按需要编成三个队，分赴香坊区、顾乡区和松浦区。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有了两次下乡工作经验的学生工作队伍，卓有成效

地完成了土改的任务。

根据形势的发展，青年觉悟的提高，民青的组织已不适应客观发展的要求，从3月末开始酝酿，于5月初，将民青组织转为毛泽东青年团。

由于工作变动，我在转团前夕离开了民青。

（作者为军校五期生，曾任哈尔滨教育学院院长）

侦破暗杀李兆麟将军一案

吕殿元

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我和毕生、李克、刘光、朱飒在哈市委保卫部长毛诚领导下作为一个侦察小组，专门负责侦察敌情和搜捕匪特。

1946年2月29日在道里水道街口，敌特用手枪将哈尔滨日报社李社长暗杀，我从为我工作的敌特谭纯孚口中了解到，这次杀死李社长是打错了人，原来敌特是想暗杀李兆麟同志，因为李社长外表有些像李兆麟，敌特就把他当作李兆麟给害了。我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诚同志，毛立即告诉李兆麟同志要特别警惕！而李却说："我在东北抗日这些年，谁打死我干啥"！李没当一回事。

194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市政府召开庆祝大会，孙格令（中俄混血儿）在给李兆麟倒茶时，告诉李："我大娘（白俄老太太）有病想看看您"。李问："她住在何地？"孙答："住在水道街9号三楼"。李说："明天我抽空去看看老人家"。（过去李在哈市作地下工作时曾在该白俄老太太家住过）。孙格令是军统的女特务，经过调查知道李与老太太的关系，以此为诱饵，骗李去看老太太，乘机害李。

当时哈市国民党警察局长军统特务余秀豪，已布置给特务第一别动队长阎钟璋（伪满江上军一团六连连长）让他一定在最近设法将李兆麟暗杀掉。

1946年3月9日上午，阎钟璋带两名土匪，到水道街9号三楼孙海镜家藏在里屋。李格令在外屋擦桌备茶，茶水里已放人毒

药，特务马连胤在9号楼门外观察动静。

9日上午9时李兆麟从南岗坐汽车回中苏友好协会，走到地段街拐角处汽车坏了，就留下警卫员兼司机李桂林修理车，他自己走回中苏友好协会。到屋后对秘书于凯说："我去水道街9号看一位老同志"。出门就走了，一去再没有回来。于凯、李桂林等去各处寻找，同时也报告了苏军司令部，该部派一个侦察排来水道街9号把楼上下搜查了一遍，未发现甚么便走了，市公安局刑警队马亮同志来9号三楼发现孙海镜家门锁着，借梯子从上边门窗往屋里一看，看到床底下露出一只脚，马上砸开门进屋一看正是李兆麟的尸体。又找来苏军保卫人员在屋内察看一遍，将尸体拉回中苏友好协会筹办丧事。

毛诚同志将这个案子交我们小组，我们就对此案开始了侦察。在我们侦察小组研究案情时，大家一致认为，水道街9号三楼兆麟同志被害那屋原是孙海镜家，他也是军统特务，就把侦察目标缩小在经常与孙来往甚密的几个人身上，如阎钟璋、马建胤、刘希贤等人。重点地区划为道外和江北糖房一带，经过一周的侦察，3月16日下午李克、朱飒在道外小六道街一家小饭馆门前看见马建胤进去了，他俩留一个人看守，一个人去六道街道外公安分局报告，该局马上派两名警察将马建胤捕回。经过两天审讯，他装成一无所知，后又向他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他终于全部坦白了，此案初步告破。

据马建胤交待：3月9日上午特务阎钟璋带两名土匪藏在孙海镜家的里屋，女特务孙格令在外屋等候李兆麟的来临，按特务们事先定下的暗语，待李进屋后，请李坐下倒了一杯下了毒药的茶，当李喝了一口有了感觉时，孙格令马上喊："李会长再喝一杯吧"！这时里屋的特务们就持刀出来对李砍了七、八刀，李倒下后将其尸体推入床底下。特务们把地上的血迹擦净后锁上门而后逃走。阎钟璋当天逃往敌占区长春市。那两个土匪逃回江北，只有马建胤一个人留在道外以观我方动静，马以为："我未动手杀人，仅仅在楼门外观看动静，所以我没有跑。"他估计我方短期内破不了案，没想到把他先逮捕了。马坦白后，我方按政策对他宽大处理。1947年春在第二松花江桥上，美国三人调停小组为国共调停

之际，我方揭发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李兆麟将军的罪行，他们半信半疑，我方叫马建胤当面揭发了军统特务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详细经过，指出这是国民党警察局长余秀豪亲自布置的，特务阎钟璋亲手杀害的等等。美国人听完，无话可说，因此，马立了一功，市公安局决定将马释放。

因已知凶手阎钟璋逃往敌占区长春，我们就派原阎的老部下翟福贵、王天恩去长春跟踪阎，待解放时捕阎。但长春解放前阎又逃去沈阳，侦察员翟福贵等又跟去沈阳。沈阳解放前阎又跑到天津，天津解放后，国民党特务分子将阎甩掉南逃，阎自个逃回沈阳女儿家，我方在沈阳将阎逮捕，解回哈市公安局，经审讯供认不讳，最后判阎死刑。

1949 年 10 月 19 日将曾任四平清剿队长、杀害我方人员数人的阎钟璋和在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任中尉审讯员，参加秘密处死 43 名无辜群众的刘文升押赴沙曼屯刑场执行枪决。

此外，哈市公安局下令对同案犯一一追捕。1948 年底长春解放后先扣住在长春国民党二道河子警察分局当局长的孙海镜；继之捕了自开诊所、卖毒药的南守善；沈阳解放后捕到在沈阳开私人诊所的高喜元；在国民党五十七军当中尉医官的阎力维；北京解放后，捕到混入北京大学学习的刘明辰；1949 年初又捕到躲到沈阳的肖文哲。

1950 年将孙海镜、阎力维、刘明辰、高喜元改判死刑执行枪决，1950 年将南守善、肖文哲也判处死刑；1951 年将毒害李将军后在敌区曾捣卖药品的杜忠忱枪决；1958 年将杀害李将军的特务、潜藏在齐齐哈尔市，改姓孙，混入钢铁厂当统计员的李剑星处决。此案除女特务孙格令、特务何士英逃往香港、台湾未捕到外，其余全部案犯都已捕获。

案犯马建胤、因坦白了罪行，1946 年 6 月判处 5 年徒刑，又因在第二松花桥上向美国三人小组揭发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将军的整个事实，因而获得宽大处理，得到释放。孟庆云、高庆山均于 1946 年判处 5 年徒刑，二犯后病死在狱中。

（作者为军校一期生，离休前为吉林市公安局局长）

东北局城工部向长春的派遣工作

吕殿元

我曾经是城工部二室的派遣干事，我所回忆的仅是一些公开情况和直接经办的派遣工作，虽然这些回忆并不全面，但我们不会忘记，有不少同志，其中有一些同志，是我在伪满军校的同学，他们为解放事业，不顾个人安危，在敌占区进行过艰险的隐蔽斗争，为解放长春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在伪满军校是一期生，参加革命时间在同学中比较早。在"八·一五"光复前又组织过伪满江上军的起义工作。在同学中知道我的人很多，习惯地称呼我为吕大哥。从国统区跑过来投奔共产党的同学，也愿意来找我。

城工部是1947年5月与敌工部合并组成，机关地址在哈尔滨南岗区义州街16号。

城工部是对敌城市工作部的简称。其主要任务是向敌占区派遣地下工作人员，

搜集敌人党、政、军、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发展地工组织，搞工人、学生运动及做上层人物的工作，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中城市和恢复城市建设而努力。

部长李立三、副部长李力果、彭加伦，下设四室、一科、两站、两队。四室是办公室、一室、二室、三室；一科是总务科；两站是五棵树联络站、缸窑联络站；两队是松北武工队、吉北武工队。一室主要向沈阳市及南满各大、中城市派遣地工人员；二室主要是往长春、四平派遣地工人员；三室负责材料研究和档案管理工作。

五棵树前方联络站于九台解放后迁至九台，对外名义是九台民运科；缸窑前方联络站对外名义是吉北联络处。两个站的任务：在驻地周围物色派遣对象，经过短期培训，派往敌区；当地工人员得到重要情报，便及时派人将情报送给前方联络站；有的地工人员需要直接向部里汇报或送重要情报，可经前方站介绍去城工部。

从 1947 年到 1948 年 2 月，城工部派往长春的地工有：

李立三部长发展王宏文（现名王长新）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派回长春工作，进行上层活动。又派马庶民（原名李景泽“军校”五期生）为王的联络员，代王向城工部汇报工作，马再将新任务或部长指示带回交王。

城工部里还派徐慎同志潜伏在长春市。还派郭景兆同志也来长春，并把他的家作为城工部在长春市的秘密据点。

二室派遣干事卢士英，1947 年春从北安军政大学物色到一名派遣对象叫肖斧（原名肖向春“军校”五期生），经过训练，派来长春，肖很快发展了刘树椿（“军校”五期）王飞、赵洪光、柏树声、钱泽球、宁大年、陈萃华、王德潜、毕云昭、李树有（军校七期生）等人。肖不久病故。卢还于 1947 年春派遣过于力一、贾英、徐洪贵等人。

缸窑联络站长陈少中，1947 年春派遣王文达（“军校”五

期）到吉林、长春搞地工工作，他在长春发展了那守田（“军校”五期）、那侃（“军校”六期）、叶文华（“军校”六期）、朱安（“军校”六期），这个组还英勇地爆炸过国民党军在海上大楼地下室的火药库，他们在长大，把组织名单藏在一个米袋子里，这米袋被蒋军的一名勤务兵拿去，发现后交敌特张众达。因此，他们都躲起来。叶文华跑到吉林市，在一家磨坊当会计，直到吉林解放。那守田跑回哈市城工部，住了两周又回辽宁农村老家。

九台联络站站长江含1947年秋，在九台县物色到长大学生刘国棋、刘国奉。经过培训，填了地工人员登记表，分配任务后，派回长春，因二刘是九台县人，每逢寒暑假，他俩回九台时就向江含同志汇报他俩的工作及长春市的情况，开学时再给他们新任务。他们又发展了吴孤樵、卢太辰（二人都是“军校”七期）。

我当时在二室任派遣干事，1946年在哈尔滨市委保卫部工作时，曾向长春派遣过刘志诚，翟福贵，王天恩去长春跟踪侦察暗杀李兆麟同志的主犯阎钟璋。

1946年末在东北局敌工部时，物色六名派遣对象，经过培训后派回敌占区，他们即刘铁文、李风桐、刘华、阎世斌、叶伟、佟炎。他们的任务是去蒋部队，搜集敌军情报，瓦解敌军，必要时率部起义。

东北局敌工部改城工部后，从1947年1月到1948年2月，我曾物色了几名派遣对象，经过训练，给了任务，派回长春。

1947年1月派遣温旭山（“军校”一期）回长春打入蒋军五十六师，搞军事情报，瓦解敌军，必要时起义。温回长春后没有打入敌军内部，组成“新文化行动同盟”。发展了两个组，社会组潘辉（“军校”一期）、喻成志（“军校”一期）、刘兴昆（“军校”一期）；学生组郭锋（“军校”六期）、王健群（“军校”七期）、朱寰（“军校”六期），这三人每人还发展了三到五人的小组。

1947年8月派李天成（“军校”五期）到长春大学，他的主

要任务是宣传党对青年的政策；搞学生运动；通过同学搜集蒋军的情报。他发展了A、B、C、D四个组：A组组长张智（“军校”六期）；B组组长陈贵民（“军校”五期）；C组组长秦宏伦（“军校”七期）；D组组长秦宏伦兼。这个组织称为“李梦星小组”。他们因为在大学过集体生活，在以前又都是“军校”同学，了解同学们的思想表现，所以发展的较多较快。到长春解放时已发展100余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学习进步书籍，在校内秘密传阅毛泽东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东北日报有关社论等；秘密散发和张贴传单、标语、口号，使敌人手忙脚乱，找不到线索；组织学生运动，如组织反美反蒋、反饥饿、反长大南迁、反内战等游行，利用同学关系，从蒋军中搜集军事配备图、蒋军长春防御阵地碉堡构造图、兵力配备图，以及长大内的部分反动党、团、特的名单等，并派人送往解放区交给我，再转发给部队和公安部门。李梦星组的工作收效较大，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地工组织。长春解放后市委组织部将该小组的骨干组员分配到青年团市委工作。

1947年6月马庶民（即李景泽）到达解放区城工部，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工作，正要派回长春时，李立三同志让张存实主任选一名可靠的人到长春跑一次交通，我推荐马庶民同志，接受了立三部长的任务。马经过十几天完成任务后回部向部长汇报了经过，并交给部长一张软纸条。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是李部长叫马给长春王长新送秘密指示，并带回王给部长的报告。这些都是用密码书写的，外人看不懂，后来部长又叫马庶民返回长春，住在王家，并叫王给马庶民找个掩护工作，王怕暴露自己和马庶民，将马庶民介绍到吉林市内兄宋南诚家住。1948年5月马庶民回哈市找城工部，因该部已撤销，又到九台长春工作委员会（对外名叫中长部政治部）找我。我将马庶民介绍到长春学院学习。长春解放后，马庶民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

1947年7月高守维在东北局城工部学习了两个月。因为他哥

哥高守义是吉林市国民党部书记长，我便做高的工作，让他利用这个关系打入吉林市国民党党部，了解国民党党务活动的情况及军警特分子的名单与罪行等，同时在城工部学习的佳木斯市女中学生李兢也要求随高到吉林市工作，给李的任务是打入吉林市女子中学校，搞学生运动或打入吉林市国民党部搜集党务活动情报，两人填写登记表后，领了工作费，于9月经缸窑站回吉林市，高、李二人一进吉林市便被蒋军卡哨逮捕，一直关押到1948年3月吉林市解放，两人才恢复自由，同年4月他们经我介绍到长春学院学习。后来高回吉林，李兢于同年7月参军南下。

1947年6月梁振庭（又名梁亦，"军校"六期）及其未婚妻张箴同志来东北局城工部，学习了两个月，当时他要求去北安军政大学或佳木斯东北大学。经向他俩做思想工作后同意回蒋管区搞地下工作。给梁的任务是打入吉林长白师范学院或长春大学搞学生运动或打入蒋军搞军运工作。给张的任务是打入吉林市女中搞学运工作，并协助梁工作。梁回长春打入长春大学，后来加入李梦星小组。1948年4月梁被敌人注意，遂来九台，我便介绍他到长春学院学习。长春解放后随学校回市内，分配到市政府工作。张箴到市委当会计。梁于1987年病故。

1947年6月崔德森（"军校"四期）在城工部学习两个月，经作思想工作，他同意回长春作地下工作，同年8月填写地工人员登记表，并领取工作费，给崔的任务是打入长春大学搞学运。因他未打入长春大学便于同年12月返回城工部，后经我请示张存实主任又将崔改派沈阳，让其打入沈阳东北大学搞学运工作，1948年2月城工部撤销时，将崔的关系移交沈阳工作委员会。

1947年7月郭群（"军校"三期）从长春到哈城工部。郭谈了一些长春市的近况。经我与张存实主任研究，将郭派回长春。他的任务是打入敌军内部搞军事情报和搞社会情报。郭曾利用同学关系，经常去代号为九三七九武装特务组织于文中、杨光那里了解他们的活动。我要郭将于、杨稳住，以便在长春解放后交公安

机关。但在长春解放前夕于文中逃往沈阳，郭将于在沈阳的地址经过我通报给沈阳市公安局将于逮捕。郭将杨光安排在自己家中，在长春解放后第三天，郭密告市公安局将杨光逮捕，同时郭群和我领导的另一名地工刘群（“军校”三期）都分别作了长春市国民党警察局警卫队长吴守中（“军校”三期）的工作，让吴将警察局的档案、枪支弹药等全部保存下来，解放后交给接管的同志，吴最后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城工部于1948年2月撤销。原一室主任宋黎率该室同志组成沈阳工作委员会前往沈阳外围建立工作基地。原三室杨实人率二室部分同志，前往九台县与江含同志民运科合并而组成长春工作委员会（简称长春工委），对外叫中长部政治部。工委的总任务是为解放长春做准备工作，为组成长春市委，市政府而与东北局组织部联系逐步调入干部。

我在工委组织部虽然是组织干事，仍然作派遣工作。具体任务是与长春市内地工人员接头并搜集情报，接待从长春市内跑出来的大、中学生并介绍他们去长春学院学习。当时这项工作很繁重，每天要接待跑来的学生几十人，还要一一个别审查、核对确系长春某学校的学生后才能介绍参加学习。

1948年5月刘冷月、阎光誉、何正坤三人来九台长春工委。经初步审查，刘是随军中尉记者，阎是教员，何是护士，我将阎和何介绍去长春学院学习，将刘留下进行个别审查，经杨实人主任指示将刘派回，给刘的任务是调查蒋管区长春报界的名单；不定期向九台长春工委送蒋管区的各种报刊；搜集蒋军的军事情报。刘回长组织了一个小组；吸收了刘国恩、何其大、张伦、王丹、王克恭、李秀庸。经过这个组送来过一些蒋管区的报刊杂志，一部份国民党和特务档案名单。并将这些敌特材料转给了薛焰同志。这个组在同年7月被长春军警督察处破坏。刘冷月、刘国恩、何其大逃回九台；张伦、王丹、王克恭、李秀庸被捕。了解该组被捕经过后，刘冷月去珲春亲友家，刘国恩回北满老家，何其大由江

含同志介绍去九台中学当教员，张伦被捕后下落不明，王丹当时比较年轻，敌人未审出结果便释放，王克恭、李秀庸被敌人杀害。

1948 年 7 月游清川同志（“军校”教官）来九台找我，他对长春市的敌军兵力部署、防御阵地的构筑、市内民心动向等情况讲了不少，主动要求为我党工作。我把他安置在附近群众家住，给他一些进步书籍看，每天和他谈谈当前形势，我党的政策和后方建设与土改情况。因当时我军包围圈已紧缩逼近市郊，长春即将解放，已无必要再派人去长春，因此便将其派往沈阳打入敌军。

我党所派的这些地工同志，分布在长春市各个角落：有的打入敌人内部；有的到大、专院校；有的在各行各业。他们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不怕被捕，不怕牺牲，进行隐蔽斗争，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斗争中有的地工同志，被捕后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最后坦然自若地走上绞刑架、跳入埋人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以上是我在城工部和长春工委任派遣干事时的全部派遣工作。因为是秘密工作，对其他派遣干事所派出的地工人员，则不能一一记述。

长春战役打响之前

田　羽

我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期间，于1943年9月参加了我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后改由东北局社会部领导，在长春搞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1945年入冬以来，苏军开始在作撤军回国准备；国民党在加紧组建和调集军队，准备由苏军手里接管长春。东北行营少将高参陈家祯就地收罗敌伪残余组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蒋介石把在华北对我军民进行扫荡、罪行累累的伪满军铁石部队贴上“东北保安第二总队”的标签，由美国飞机空运来长春；一些地痞流氓与东北行营和长官部的大员拉上关系，搞起一些所谓“支队”“警察总队”之类的杂牌队伍；还有战斗力极差的市警察大队、铁路警察等。战斗力最强的是：“东北保安第二总队”，总队长刘德溥原为伪满军上校团长，是个罪恶累累的反共老手。但在日本投降后，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被国民党提拔

为少将总队长，他有伪满军的原套人马，武器装备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又有与我军作战的经验。

此时，我军也早已开始向长春外围集结，形成对长春的围攻态势。

各种迹象表明，在苏军撤出长春后，我军与国民党军将要有一场激战。为配合我军作战，组织决定让我和白山同志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军事情报。

11 月，我和白山同志乘陈家祯招兵买马组建队伍之机，打入了他的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步兵十一团当上了少尉排长。十一团是第四总队的主力，团长乔雨春是原伪禁卫军的上校团长，副团及营级军官多为伪满中、少校军官，连、排级干部基本都是伪满军校毕业的一、二、三期学生，少数是即将毕业的四期生。干部队伍较强，士兵虽是新招募的，但经过训练，很快就可以成为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我俩打入不久，为开展工作，介绍在该团当排长的杨冠甲、蔡颖宝两位军校同学，加入我党外围组织“东北人民解放同盟”。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实践，深感当排长每天局限在训练新兵的操场上、营房里，接触范围很窄，外出活动不便，除本团情况外，连总队其他团的情况也难以及时了解，至于了解掌握全市敌军兵力及其部署等就更难了。为了能及时更好地完成任务，需要有个更适合于开展情报活动的岗位。这时我们把目标指向了空运来长不久，也在收罗敌伪官兵以扩充自己实力的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制造理由脱离现岗位，设法打入二总队是当务之急，佟志杉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先走访在二总队工作的一位军校上期同学，托他向总队长刘德溥疏通，说有四名军校同学，在校学品兼优，身体也好，因上进心强，不安心在四总队当排长训练新兵，羡慕二总队官兵素质好，装备优良，正规整齐，战斗力强，尤其对总队长重视人才，爱护部下的干法深表敬佩，在二总队将来能有个好前途，因此想求见总队长，刘德溥听了以后很高兴，答应过两天就接见，让我

们等侯通知。

过了几天，当我们按通知时间去见刘德溥时，他是以“将军”、“老师”、“长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关心地问我们每人家乡在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在军校是什么兵科，毕业时间，个人爱好和专长，在四总队任什么职以及要来二总队的原因等，其实他所问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看我们对他效忠的决心。我们认真地一一回答，并恭维说二总队是公认的精良部队，总队长爱惜人才、爱护部下，我们早有耳闻，相信追随总队长，定能得到总队长的栽培，提拔，将来会有个好前途……等刘德溥高兴地问到每个人想做什么工作，我们有的说自己是高射炮科，对绘图、计算、通讯等感兴趣；有的说自己在校时喜欢战术课、愿在参谋业务方面多学习，发挥自己所长，总之，都希望能在机关、在总队长左右，为总队长效力，刘德溥听了很高兴，当即决定将我们留在司令部参谋处任少尉处附。

我们到参谋处后，对主任邵炳麟，张参谋，车参谋等老军官，谦逊地称教官，虚心向他们请教，在参谋处我们军衔最小，也最年轻，主动多做工作，无论是绘制防守要图那样重要的工作，还是抄抄写写、填写报表或是了解某一具体情况的小事，我们都主动去干，从不计较，从不畏难，取得了大家的好感、信任。他们很快地就把许多事交由我们来做了。也因为我们在军校系统地学过军事知识，因而受到他们的重视。

我们离四总队来二总队以后不久，我们的同学解德泉因不想再为国民党工作也离开了四总队。他是我的同乡、我中学时的同学，我知道他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动腐朽而不干的，我和白山同志有意识地请他住在我们东天街文庙附近的据点，想吸收他为我们工作。还有一位名叫齐振洲的同学，思想进步未参加四总队，也被我们请来住在据点里，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工作，经佟志杉同志同意并亲自找他们谈话，他们也加入了我党外围组织“东北人民解放同盟”。

苏军要撤走回国的消息在到处传播。佟志杉和田琛同志找我和白山同志去，指示我们加紧搞情报工作，准备打仗。我和白山、杨冠甲、蔡颖宾四人在二总队参谋处的要害部位，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把接触到的防守部署和看到听到的零星军事材料，用摘记、默记，或抄写时故意洒上墨水扔进纸篓，没人时拣回来等各种办法搜集材料。解德泉、齐振洲也利用在二、四总队有许多同学和师生关系，通过接触了解材料，把这些材料集中在东天街据点，经过研究、核对，由解德泉同志执笔绘制了一张《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各部队防守区域划分，火力配备，各指挥所位置及通信中心位置等标到图上，并将各部队素质好坏、战斗力强弱、可资利用的弱点、建议我军选定主攻方向的根据等，写成书面材料附上。对这些情报材料中的重要部分和可能有出入的地方，我们进一步进行核对。第四总队编制是由十一至十六的6个团组成，经核对，其战斗实力，除十一团官佐多为伪军官，军校毕业学生，学过军事基础知识，有管理部队和带兵经验，对士兵训练抓得紧，战斗力较强以外，而十二至十六的五个团，基本上由怀德、敦化、蛟河一带收编来的地富土匪武装。他们为当官，以少报多，严重缺员。十三团的一个营长姓孟，是我认识的伪满第三高射炮队第二连的炊事兵，日本投降后拉起土匪；收编时当了营长，我去串门看他，他看我戴的是少尉军衔，不好意思地说“教官啊，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可是我的弟兄还嫌我要的官小呢？”从谈话中得知他的一个营只有几十个人，都是想通过捧孟当官自己从中捞好处的，也有的是些地痞流氓与“长官部”“行营”拉关系建军，搞起些什么“支队”。最大番号有“第三十一支队”而实际中间的番号是找不到的，能找到的几个也没有几个兵，实际是些骗子搞的“买空卖空”。“吉林警察总队”、“铁路警察”也没有什么战斗力。对所有这些，我们都在情报材料中作了分析说明。

4月初完成了情报任务，按田琛、佟志杉同志前次接头向我和白山同志布置的地点，我穿着国民党军装揣着材料在前边走，齐

振洲同志和我保持一定距离跟在我后边，他主要是观察有无可疑的人跟踪我。我将材料送到上海路派出所路南的“天一商店”交给了田琛同志。

解德泉、齐振洲同志经组织同意回黑龙江省富锦、绥化探亲，我由田琛同志处给他们取来了路费，并向他们传达组织意见：探亲回来继续在敌区工作，可与佟志杉、田羽、白山取联系。如联系不上，可自找掩护职业。回不来时，可在家乡参加革命。

苏军撤出长春的当天深夜，我军解放长春的战役打响了，我军先以部分兵力攻占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的空中联系，攻城部队主力按我们提示的方向，由长春西南防线迅速攻入市区。至4月16日，第四总队及建军支队，警察总队等很快地被我军歼灭，第二总队被迫将司令部由红万字会撤至银行大楼，指挥所属各团继续顽抗，妄想争取时间等待援军解围。我军猛攻，至18日晨逼近银行大楼，并占领了银行广场周围的重要建筑，下午切断了敌司令部与各团的通讯联系，这时银行大楼内，还聚集了一些从被击溃部队逃来的官兵，秩序很乱。午后5点许，二总队司令部派出一个班试探地由银行东便门突围，当即被我军打了回去。晚9时左右，刘德溥向其上级指挥发报，大意是：长春防守战开始以来，受共军强大兵力进攻，各友邻部队均已不支溃散，自己率部奋勇抗击。现司令部固守银行大楼，虽多次击退共军的强力进攻，但终因等援无望，寡不敌众，无法扭转战局，由下午起司令部与各团通讯中断，下属情况不明。事已至此，卑职决心率司令部以“成仁”决心尽军人天职，效忠党国……接着刘德溥的副官等亲信叫喊大家要随总队长突围。晚10时左右，银行广场对面的警察局起火，刘德浦等乘我不备，由银行正门突围，我跟在刘德溥后不远的地方，但当跑到广场时，突然受到一阵密集炮火的射击，敌人一片混乱，刘德溥去向不明，我跑到广场东南民康路前遇到四总队副官景芳泉，19日凌晨我俩为我军俘虏，被送至二道河印刷厂俘虏收容所。为继续隐蔽，田琛同志与看管战俘的我军政委研

究，秘密将我和景芳泉放出，然后在战俘收容所内到处搜查，大造声势，使战俘们知道我和景芳泉逃跑了，这样做，为我继续打入敌人内部创造了条件。

这次战役以我军迅速解放长春而宣告结束，除城防副司令刘德溥带少数亲信化装逃走以外，共俘获城防司令陈家祯，行营少将高参赖秉权、长春市长赵君迈等以下文武官员50多人，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名，俘虏1.1万多名，击溃敌人6000多名，缴获步枪7000多支，各种炮20多门，子弹100余万发。这是我军进军东北以来第一次解放大城市的大胜利，对我军民是极大鼓舞，对敌人是极大震慑。我们的情报工作受到了上级的表扬。田琛同志在向我们传达时说："东北局和部队领导对你们的情报工作很满意，敌人每道防线的工事构造、兵力和火力配备以及二总队司令部在战事紧急时迁往银行大楼的行动，都与所提供情报基本一致，你们干得好！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处在敌区，所以只能这样口头表扬你们。"

一份重要的情报

解德泉

1945年12月初我在长春参加了东北保安总队第四总队的十一团任少尉排长，两个来月的新兵训练生活及对东北行营接收大员们的所见所闻，深感国民党及其所属部队的反动腐朽，1946年2月初毅然脱离了那个反动军队。当时在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参谋处工作的田羽同志是我的同乡同学。他得知我的离队动机，又了解我的家境和为人，便利用这个时机向我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我终于在良友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情报工作。

开始时他把我领到长春市东天街的一个秘密地点，此后我的住址和活动就不准向任何人讲了，而完全转入秘密状态，同在这里参加活动的还有田羽、白山、杨冠甲、齐振洲、蔡颖宾。我们的生活及活动经费完全由地下党负责。领导我们的是一位姓佟的同志，他早期毕业于日本商船学

校，后曾任军校战术教官，我们在秘密地点的活动，开始时主要是学习，如看一些《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入门》等进步书籍，经过一段短暂学习之后便接受了“要侦察长春守敌的兵力及其部署情况”的任务。

田、白、杨、齐、蔡他们大多在保安总队参谋处工作。主要是从敌军指挥部内部，也从他们的熟人那里搜集部队的情报。我从敌军连队退出不久，保安队的连队里又有很多军校同学。为了工作方便，田从参谋处给我弄来一身带有袖标的军大衣，我就利用这些同学关系和这身“合法外衣”顺利地躲过路岗门卫的检查，在保安总队的各个连队里进进出出和走遍了长春市的大街小巷。主要是了解兵员和武器数量和武器类型、士气、训练计划、战斗部署及防御工事等，晚上，我们把白天分头搜集的情报及时汇总、研究、整理。

为进一步弄清守敌的防御情况，并在军事要图上准确地反映出守敌兵力、防御重点薄弱环节等军事要素，急需一份长春市地图。经过研究，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弄到一份长春市地图，把它揣在军大衣里，带回秘密地点。

这时长春已进入半戒严状态。午后早早禁止通行了。白天设在十字路口的岗哨对来往行人进行盘查，稍有可疑立即带走。在主要十字路口已构筑了防御工事，并配有轻重机枪。在主要街道的大楼上，也已用装满土的麻袋筑成了临时防御工事。所有站岗的士兵也全部荷枪实弹，一副戒备森严的景象。

有了长春市地图，我们便分头有目的地去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以获取新的情报或对已获情报进行现场复核侦察。对没有条件打入的军营，就利用“合法外衣”在敌军驻地周围或附近的马路上漫步侦察。从营房的多少、占地面积大小、出入人员的活动情况、工事概貌以及地形地物特征等方面，判断敌军的防御能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的内外侦察活动，基本上弄清了守敌兵力及其防御部署情况：

东北保安第二总队（铁石部队） 这是九三前伪满驻热河一带，企图阻止我八路军解放东北并与八路军进行过顽抗的靖安军。国民党东北行营大员接收长春后不久，这支部队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中央军接收东北的先遣部队，被空运到长春来。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武器配备较全，特别是轻重自动武器较多，战斗力很强。这里有我的一名同学，我也曾去过他们的驻地侦视。

警察大队 主要由伪长春市警察组成，九三后也混进一些地痞流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习惯使用短武器——手枪。也有一些轻机枪。若凭藉大楼工事做掩护的话也能放上几枪。但从大的攻防战斗说是不堪一击的。

东北保安第四总队 其中的第十一团的军官是原军校毕业生和原近卫队部分军官组成。虽说军官素质较好，但班长和士兵则是招募来的散兵游勇和抓来的民夫，其余十二至十六团是由山区刚刚收编来的土匪组成。不仅武器短缺兵员也严重不足，士兵也缺乏起码的军事素质，军官只知吃、喝、嫖、赌、贪污，除十一团的军官素质较好外，就整个四总队来说基本是一盘散沙，一旦打响，那就难免指挥失灵，活象一具四肢麻木不能行动的僵尸。

铁路警察 这是一支专业性武装，对守卫车站、车辆、仓库的积极性较高，对城市的得失不甚关心，因为不管谁来，铁路警察是不能不用的，对解放长春来说，可视为一支可有可无的力量，无关大局。

“四一四”前长春市敌我对峙情况 日寇投降的同时，我八路军就按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指示，从热河直插彰武、新民，又分赴郑家屯、康平、法库、昌图、东丰、西丰。1945 年 10 月份我曾于昌图目睹我军经昌图日夜兼程北上的情景，这样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东北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大小城镇为国民党所控制；就是吉林南鸭绿江北的广大山区已逐步为我军所控制。早在 1945 年 6、7 月份就传闻已有我军在朝阳、磐石、桦甸、特别是通化、浑江一

带出没。1946年1月份二总队曾派出一个连左右兵力乘火车企图去接管九台，与我八路军发生战斗后大败而归。此前不久又有我军多股小分队，夜袭长春市东北边界哨所，打了就跑，搅得守敌昼夜慌恐不安，1946年春节前，曾传说八路军要到长春市里过年，这又使守敌日夜守备不敢稍懈。春节不久，第四总队奉命由伪军事部附近调往长春市西北绿园一带加防。此后我军的夜袭更加频繁，致使守敌防不胜防，但又无重大损失。在长期紧张戒备之余，敌人士气未免有些低落消沉。

对守敌防御部署的分析　据对长春市周几个月来敌我对峙情况，敌军虽在长春四周都投放了力量，但他们的主线却放在东南、东、北三面。因为传说在伊通、双阳一带已有我军活动，而吉林又已成为我军的据点。在九台一带不久前二总队曾吃过我军的铁拳；东北一带，一两个月来，不断发生边界骚扰；北面铁路沿线的德惠、双城、特别是哈尔滨以北业已成为我军的根据地；西北为开阔地，对我军来说依托较少，西南沿线的大城市均为国民党所控制，这对敌军来说可视为他们可靠后方。

这样，敌军就会把防御重点放在保安第二总队——铁石部队吃过我军铁拳的东南方。南起南岭东至南关大桥一带由二总队防卫。由南关至车站以南的市区主要十字路口及路口大楼由警察大队防卫，西北、西、西南则由保安第四总队防卫。西线的防卫重点在西北，西南只有少数象征性防卫力量。

从地形上看，市东有伊通河，可视为敌军阵地前沿的小小天然屏障。虽有南关东的二道河子大桥可通市区，但在这里只要投入少数力量即可阻止我军前进，如果在市内展开巷战的话，从南关至车站一带可能需要付出代价。西、西北较为开阔，敌阵前的活动较为困难，经数次侦察发现：伪经济部一带的西南方，不仅是一片低洼的丘陵地带，且有灌木丛林可做为接近敌人的掩护。况且此处又被敌军视为可靠的后方，因而只投入少量象征性的防卫力量。

经过反复研究，同志们提议由我执笔画图，我则把大家的意见，忠实、扼要、准确地反映在长春守敌防御要图上，我们认为即将展开的解放长春战役方针应该是避实就虚；用部分兵力重点钳制敌军重点防卫的东南方二总队，也相应地钳制东、北、西北的敌军，我军应集中兵力从其虚弱的西南方，一举突破敌军防线，从二总队右翼直插市中心，再展开内线作战。迫使敌军腹背受击，甚至使其主力形成背水（伊通河）一战的形势。

我在划图时田羽同志一再告诫我：在军校学习时，友军在图上用蓝色标志，敌军用红色标志。可是共产党的军事地图，友军用红色标志，敌军用蓝色标志，千万不要弄错。我就按照这个意见，把敌军的兵力、地理位置、防御重点和我军应选择的主攻方向一一明确的标在守敌防御要图上，画完后，记得好像有位同志把它举起来，大家围拢在一起一看。啊！醒目的红色箭头从敌阵的西南方，向着市中心直插进去，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微笑了！

要图由田羽同志带好，振洲同志在后边护送，交给了地下党。这时长春市内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警察命令各居民区所有单身汉一律配带白名签。我们的行动更感困难。我和振洲同志在组织的帮助下于 1946 年 4 月 12 日上午乘火车离开长春北上。

1949 年我见到田羽时，他高兴地告诉我："咱们那份情报太重要了，解放军就是按咱们所指出的方向打进长春的。我们对胜利解放长春做了重要贡献，受到了组织表扬。"

（作者，军校三期生，离休前在富锦市一中工作）

记押解伪满皇帝群臣经过

田　羽

1950 年 2 月，我调到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一处四科工作。7 月组织上派干部及一个排的武装公安战士去绥芬河口岸，接收解送苏联移交的侵华日本战犯去抚顺战犯管理所。

其后，7 月的一天，一处执行科长董玉峰同志对我说："苏联政府又要向我国移交溥仪等一批伪满战犯，同上一次一样，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陆曦处长代表我国政府接收，东北公安部负责解送战犯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汪金祥部长决定，还是由一处负责这次押运任务。一处王鉴处长意见这次由你负责率队去。需要去的其他人员，经与王鉴处长、解衡副处长研究，干部还是由上次接收日本战犯时的石平、李季和杨永祝同志参加，看押武装由公安部队抽调，人员要相应地比上次减少。另外，中国医大附属医院选派医生、护士各一人。出发和到达绥芬河的时间，以及涉外的有关事

项，可与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程远行秘书联系。准备工作就绪后再向处长作汇报。”

我对组织上这样信任自己，让我负责完成这样重要工作，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经与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程远行秘书进行联系，约定好到达绥芬河站的时间，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皆已就绪。当我们向处领导汇报时，董玉峰科长也一同听取汇报，并与王、解二位处长一起，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其主要内容是：一定要充分认识这次押解工作的重要性；要及时向战犯们讲明党的政策，并通过实际工作体现党的政策，使其消除疑虑和恐惧心理；对押送途中安全要考虑得再细些，措施要得当，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工作人员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领导除询问同志们都提出些什么困难外，还讲了他们预想的一些事情。如：长途行车要防止车门外值班同志疲劳瞌睡坠车，要把上车扶手用绳拦上，等等。王鉴处长还说，溥仪养尊处优惯了，对他改造是以后的事，这次途中他要吃什么，可以给他买，对他同其他战犯应区别对待，生活待遇适当好于他人是符合政策的。领导还谈了些其他方面的意见，都是设身处地帮我们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对工作中的难点和困难从不回避。

大约是 7 月 20 日，我们一行十几人同数十名武装警卫战士，由沈阳南站出发，乘由机车和两节硬座车箱连接的专列前往与苏联约定的交换口岸车站绥芬河。列车行经哈尔滨站时，还购买了供战犯们回国三天行程食用的面包和咸菜等食品。哈尔滨市公安局一位孙科长还随车陪我们同行前往绥芬河。

我方接收人员按约定日期到达绥芬河，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紧张、军运繁忙之时。绥芬河这座边境县属小镇，居民不多，饮食、旅店、商业等项设施很有限，全被交接、押运军用物资、武器装备的中、朝、苏三国的军事人员驻在着，颇有人员过满之意。有些人或宿仓库，或住帐篷。我们事先毫无延期交接战犯的准备，

只好临时决定食宿在自己的火车上。

苏方移交专列因受军运影响迟迟不到，我们每天除催请苏方站长（当时的绥芬河火车站，中、苏站 长各有一人）向其国内催促外，只好焦急地等待着。时值酷暑伏天，白天烈日炎炎，车箱里热似烤炉，不能午睡；夜间有蚊子蠓虫袭扰，也难以安眠。时间一长，带来的面包已长毛发霉不能食用，在当地购买食品又很困难，就连稀粥也不能经常喝到，疲乏困倦和饮食不佳的情况可想而知。条件虽然艰苦一些，而同志们的精神却很饱满，每天的食、宿、工作、学习、锻炼身体、自由散步、休息等等，仍尽力作得有秩序、有规律。即或离开车站散步，也都是两三人一组，以保持良好的军风纪。一天晚饭后我们围成一圈打排球，苏军一位班长前来参加，他又胖又笨，扑倒在旁边的铁刺网上，扎破了手，我方随行医生见此情景，立即给他包扎。这位苏军班长，临走时频频点头，表示感谢。这样生活一周以后，7 月 31 日夜里，苏方移交伪满战犯列车才姗姗开来。

8 月 1 日晨，我方代表陆曦处长与苏方代表会晤商定交接办法。随后，双方各出数名武装战士，在中苏双方专列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对面列队，中间形成甬道。接着，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叫名，从苏方车上下来，复诵自己姓名后，始经“甬道”走过，登上我方车厢。换乘交接完毕，双方遂撤回列队警戒武装战士。

然后，又清点和交接了战犯们的财物。其中绝大多数的财物是溥仪一人的，记得装财物的有约半立方米的大木箱，有如同沿街理发师傅盛工具用小手提皮盒似的皮箱各一个，内盛金、银器皿、珠宝首饰、钻石、手表……好多种财物我都没见过。苏方备有俄、汉文字的财物清单，经双方逐件对照核对，又装回原箱，封好。我现在回忆，“清单”之外似有两件物品，其中的一件人称“金盾”，即圆形似盾的金质薄板，上面刻有为纪念什么赠送和赠送人姓名字样，苏方移交时还说明了未列入清单的原因。因此，我

当场作过记录，并与同来的杨永祝、石平两同志共同签字，与实物一起装入财物箱内。

记得在移交过程中，苏方代表还向我们介绍了伪满战犯们的思想表现。他说，在苏联收留期间，曾有少数人要求回中国；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要求回国，所以这次被送回国，思想上有顾虑。但这两部分人问题都不算太大，问题大的是溥仪。他在苏联时就不止一次地要求留居苏联而未被应允，这次回国，他顾虑最大，精神最紧张，一旦照料不到，很容易出事，因此建议多加注意。苏方代表还善意地告诉我们，他们在行进列车上，特意把溥仪安排在军官卧铺车上，并给他准备了不少好吃好喝的食品，又同他随便说说唠唠，讲讲笑话，以便分散他的思想，使他紧张的神经得以松弛下来。

双方交接至此，中苏双方人员始依依不舍地离开。我方专列开动时，尽管我公安干部、战士，对出现在眼前的这些卖国求荣的伪满战犯充满了仇恨，但都能从大局出发，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自觉地遵守纪律，一路上未发生过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就连有的文学作品所虚构的吆喊、推搡上车的现象也未发生。相反，战犯们上车坐好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套碗筷食具，在列车行进途中，我们还随时向战犯们交待党的有关政策，宣布途中应注意的事项。

为了稳定溥仪的情绪，特地把他带到工作人员的车厢，并指定他坐在靠近车尾部一个座位上，其斜前方设值班看视。战犯们回国后，第一次吃到有大米粥、咸菜等乡土风味的早饭都很爱吃，溥仪见我警卫战士把自己桶里的稀粥让给了战犯们吃，深受触动，露出惊奇神色。

9 时许，列车徐徐启动，渐渐远离绥芬河车站，向牡丹江方向驶去。列车行进途中，我去前一节车厢检查时，曾与溥杰作简短交谈。因溥杰曾与我有过师生关系。1941 年 3 月我入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时，溥杰是我所在学生队预科第一连的连长。1942

年他调离后，我们不常见面，尤其1945年3月我毕业离校后再未见到他。这次因公在车厢里见到已有八年未见面的溥杰。当我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的身份，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时，我想他有可能已不认识我了。我想起他当连长时发生的1941年的“12·30”事件，连内有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常吉、孟宪昌被捕判刑，陈东升拒捕自杀。事件虽是特务所为，但溥杰不能不从当时自己所处的地位、职务着想。如此刻他认出我就是他那时的学生，今天又负责押解他们，肯定会给他增加精神压力，甚至产生恐怖心理。所以，我曾想没必要同他谈话使他认识自己。可是，当我走到车厢中间时，发现他见我后像似在想什么，继而像似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我想，他已认出我是他的学生，可能忘记姓名正在追忆，或者想问又不好开口，或不敢开口。既如此，我若采取回避态度，更会使他疑虑不安，对押解工作不利。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我与溥杰之间的简短对话。大意如下：

我问：“认识我吗？”

溥杰答：“怎能不认识。你是兰中玉同学？”（我原名叫兰中玉，溥杰记忆不错。）

又问：“怎么要说话又不说了呢？”

又答：“同学们参加革命了，很好。可我处的地位不同，想说话，又怕影响你的工作呀！”

我说：“不会有影响。我倒想向你提出一个问题。你现在有条件支持我的工作，你愿意给予协助吗？”接着，我又进一步询问：“我方才给大家讲的有关人民政府的政策问题，你听清楚了吗？你认为怎样？”

他说：“都听清了，有帮助。”

再问：“还有什么想法？”

再答：“党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很受感动。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挽救，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一定要认真改造自己。”

……

接着，我又向他着重讲述了应当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从不讲假话；同时，说明共产党所以要把绝大多数犯罪的人改造成为新人，绝不是随便说说，更不是权宜之计，这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还再三让他解除疑虑，到达目的地要安心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新人。

最后，我还嘱咐他，见到我们工作有疏漏的地方，应随时向值勤人员反映。

列车到达牡丹江站，时过中午，天气很炎热。恰好停车站台有冷水管，除熙洽因病，溥仪未经允许外，其他伪满群臣都下车洗脸消暑，并在指定范围内自由走动活动身体。这件事本来很平常，一般看守所也有让犯人放风晒太阳的规定，但这次是在列车旅途中作出的决定，似乎有异乎寻常的良好效果。我发现战犯们脸上的愁云疑雾像似被风吹散，他们进入车厢，身体似乎也显得轻松了。

别人下车洗脸活动时，溥仪在车上面向值班人员说，前面一面坡的啤酒出名，过去他喝过，很好。这次回国，苏联列车上给他啤酒喝了，但味道不好。又说，就着五香花生米喝啤酒才好呢！过去他喜欢这么喝酒。他的意思是想喝啤酒没敢正面要。于是，我派同志买来，满足了他的愿望，并告诉他解放后，市场繁荣，物资丰富，不用“配给”（伪满统治时期物品实行配给），到处都可买到东西了。他边吃边喝说：“味道极好！谢谢。”

列车开出牡丹江站不久，夜幕降临。车外夜色朦胧，车内人们面带倦意，但我值勤人员仍以坚强毅力，警惕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列车经过一面坡到达哈尔滨，又继续在长春区间行驶着。战犯由苏联伯力开始已连续乘车多日，很多人已疲倦不堪，单调的滚滚车轮声更催人欲睡，唯有溥仪与众不同。他睁着两眼，目光滞呆，似在陷入沉思。当列车快要到达长春前，他突然离开座位，在车内甬道来回走动，并面对前节车厢用力喊叫：“你们谁骂斯大林？没良心。斯大林对我们多么好，真是没良心！”我立即前去制

止，叫他回归座位，可他不但不听，反而喊声更大，照旧来回走动，而且表情十分激动，可见是病态反应。经随行医生检查，初步认为是精神错乱，遂尽力让他休息冷静，避免刺激。我为了缓和他的神经，向他说明前节车厢没人骂斯大林，可能是你疲倦睡眠不足发生错觉，只要精神不过分紧张，冷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同时，还派人去前节车厢找来溥杰帮助规劝，要溥仪遵守注意事项，听从指挥，安静地坐下，不然影响工作，对谁都不好。溥仪刚坐下来，我又因势利导叫他倒下睡一会。他这才似睡非睡地躺在座位上了。但当溥杰走后不久，溥仪忽又坐了起来，说要向我反映情况。这时，他煞有介事地说道，他确实听见前节车厢有人骂斯大林，那里有的人思想不好。他说罢，还神秘地向我要去笔记本和钢笔，在纸上写着思想不好人的名字。之后，又突然转变话题，忽而说起他如何信佛教，向来不杀生；忽而又说他如何恨国民党，因国民党曾掘了他的祖坟；忽而又扯到日本关东军如何控制他，使他没有一点自由，以及日本人如何害死了他的前妻等等。他东拉西扯，语无伦次。但从他杂乱的话语中，可看出他自以为已经绝望，因而在竭力表白自己也有好的地方，以求得人们的同情，争得一线生机。根据苏方介绍的经验，我们接收后已安排他单人独座，但当他搭讪说话时，我们却未作理睬，这可能促使他本来已很紧张的神经又增加了压力。见此情景，我们只好分散他的思想，使他过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方法就是给他多说话的机会，让他说个够，吐出心中的郁闷，他说累了自然可以转为安静。于是，我出了个题目，同他攀谈起来。我问："你已经当过三次皇帝而被赶下台来，说明时代已不需要皇帝了，你在天津时期生活又很好，怎么又想来东北当皇帝呢？"

溥仪果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从自己如何被赶出故宫说起，谈到如何去他父亲家，又谈到如何去日本使馆求得庇护，怎样去天津日本租界地当"寓公"，日本军方、政界如何拉拢他，实际上是利用他作为实行殖民统治的傀儡。当时，溥仪也谈到，他是想

借助日本势力复辟满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人去天津催促他速来东北，他的老师郑孝胥等遗老旧臣也想当官，便同日本勾结对他"劝进"。当时，天津如何乱，甚至有人威胁要刺杀他。他还在收到的礼品筐里发现过炸弹。传说中国军队也要抓他。溥仪辩解说，他是在天津住很危险，"九·一八"事变为复辟满清提供了绝好机会的情况下，才赶到东北来的。他还说，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把他藏在运菜用的小汽车后厢里，伪装成货物拉到码头，然后又乘上日本小船来东北的。他说，他到东北后就被日本人控制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日本人不准他恢复满清，而且，任免伪大臣、制定法令政策等，都是日本人说了算。他还说，关东军给他派个日本人吉冈，职称"御用挂"，意思是听候皇帝使唤的，而实际是到宫里监视和管束他。溥仪还振振有辞地说到：日本人对他讲，日本天皇是满洲帝国皇帝的父亲。关东军司令官是日本天皇的代表，也就等于是皇帝的父亲。溥仪东一句、西一句地扯起来没完，他怕我们听不懂（当时杨永祝同志在场，可能石平同志也在场），有时作为说话的辅助手段，还往笔记本上写几个字。直到他讲得精疲力尽困乏无力时，他才交回笔和本子，歪歪斜斜地靠着车窗睡去。

到达长春停车时，站台上传来欢送模范或代表的锣鼓声和人们寒暄话语声，战犯们听到后多表现为沉默深思，因为这毕竟是他们回国后头次听到这样欢快的声音，思想难免不受触动。

次日上午 9 时许，列车到达沈阳站，东北公安部的王鉴处长、解衡副处长、董玉峰科长以及丁非同志等，前来看视执行任务归来的同志，并协助站内警戒工作。王鉴处长简单讯问途中情况后，交给我一个名单，说高岗主席、汪金祥部长叫这些人去，给他们讲讲话，也让他们中途休息一会儿。我按名单通知前节车厢的人下车，回头到后车厢通知溥仪时，见他又紧张起来。溥仪站起身来，大步走向前车门，边走边喊："走，没关系，我是皇帝，你们是大臣，跟我走！"我制止说："你又紧张什么?！不是告诉你下车

休息吗！”他像似没听见，继续说：“没关系，跟我走！”当他发现众臣们都安静地等待上汽车，于是他也就不再喊了。

列人名单的人，除熙洽因病以及溥杰等少数人没去以外，其余众臣同乘一辆有武装戒备的大客车，开往沈阳市内南京街的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

约1小时后，溥仪等人被押送回停车站台，普遍表现减少了恐惧和不安情绪，溥仪似比别人更轻松。他上车后主动讲：“高（岗）主席说了，不杀我们，要把我们改造成为新人。高主席说，新中国有强大的政权，政局稳定，多杀一个人没好处，少杀一个没坏处，叫我们到抚顺安心学习改造，人人都会有前途。”然后，他便安静地坐在原座位上了。

押解溥仪等去东北公安部时，因我留下负责戒备，未能见到高岗接见伪满群臣的情景。后听去的同志讲：是在东北公安部二楼会议室接见的，战犯们进屋依次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两旁，桌上备有水果、点心、烟、茶等。高岗坐在桌子一头讲的话，讲的内容大意是：祖国欢迎他们回来，为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才接回来的，不是为惩办，如果为惩办，没必要把他们由绥芬河接到这里（沈阳），更没必要再送他们到抚顺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既然有办法把犯罪的人改造成新人，就没必要多惩办，而要少惩办，把绝大多数改造为有用的人。高岗一再强调要他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到抚顺后一定要安心学习改造。

据说，战犯们边吃边听，溥仪表现不太正常，见到桌上的食物，便不顾一切地抓起来吃。在接见过程中，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也前来看视。张绍纪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前批从苏联归国，他到达东北公安部对他家里人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父亲张景惠听了，表示要安心改造。

午饭后，卸下苏联方面移交的战犯财物，留东北公安部政保处执行科内保管，列车开往抚顺。约1小时，到达抚顺城车站下车时，站外已有几辆有武装戒备的卡车在等候。抚顺战犯管理所

早已做好准备，伪满群臣下车被引进一间大屋子里稍为等候，即开始检查他们携带的物品，并向他们发放毛巾、肥皂、牙刷等生活用品。随后，他们逐个被送进事先编好的监舍休息。然后，我又向战犯管理所负责同志介绍了伪满战犯在途中的表现。

至此，接收解送溥仪等伪满战犯的工作全部结束。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当时为东北公安部一处四科工作人员，曾任集安云峰发电厂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北辰同学会成立始末

王文萃

抗日战争胜利后，伪满军校于1945年8月末自行解体。在离散之前，各期同学都曾酝酿过，能在长春市区建立一个联系点，为日后争取复学进行准备和联系。事实上就是从这时起，我们广大同学就有了要求建立“同学会”或“校友会”的愿望。

“军校”解体后，部分同学进入长春市区投亲靠友，其中不少同学就住在二道街刘风卓同学家里，他的家也就很自然的成为同学们相互联系的中心地点之一。

同年9月中旬，“国共谈判”开始，这时，从伪满监狱出来的军校一期生崔黎夫，三期生常吉和徐连汉，以及伪满建国大学的佟钧恺等人（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在周保中（当时在苏军任中校，是“抗联”的领导人之一）、赵东黎（中共长春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关怀支持下，在吉林大路“竹中工务店”大楼旧址，成立了“东北青年学会”，其主要目的是争取以

军校学生为主的伪满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参加研讨探索真理的活动，以便对当时的形势有正确的理解，免得误入岐途。最初经佟钧恺介绍军校五期生王文萃、田文魁及工大学生汪汇海三人参加。至10月中旬通过王文萃、田文魁等人联络，先后有王永熙、黄志仁、张林祥、宋传绂、胡庆禄、陈贵民等军校学生和“长春工大”以及“女师大”学生近二十余人参加。通过学会活动，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有了初步认识。虽然我们这些青年人，在以后的政治历史上都不同程度的走过曲折道路，但最终都走向革命是和这一段的影响分不开的。

1945年10月中旬，《双十协定》公布，国民党东北行营长春办事处设立，形势发生了变化。从外地来长春的军校学生（特别是六、七期生）越来越多，先后寄居在“竹中工务店”，迫切要求早日复学复课。因此，“学会”的活动已不能满足要求，在崔黎夫、佟钧恺、常吉等人的同情和理解下，他们先后离去，“学会”自行解体。于同年10月中下旬正式宣布成立了“大学补习班”，外界都称为军校同学补习班，实际上是军校与工业大学同学联合办的。经过50余人（其中军校同学占一多半）的推选，由陈贵民、姜忠贤（“工大”学生）负责教务，由王文萃、刘植田（“工大”学生）负责总务，朱敬文（朱賓）等代表军校六、七期同学协助陈贵民和王文萃工作。

“补习班”请了王琳教授讲高等数学与物理学，王时庸先生讲英语，还请地质专家夏先生作东北地区矿产资源的专题报告。他们与同学艰苦与共，同吃同住，不要任何报酬，给同学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励。对“补习班”，至同年12月中下旬，国民党政府既不接管也无任何经济供给。这期间曾得到原军校的教官关操祚、刘启民、王景发、二期校友吴宗方、刘凤卓等人的个人资助，以及用以长春工大同学为主，参加课余社会劳动（打短工）获得的收入，来维持同学们的最低生活.“大学补习班”的处境十分困难。

“北辰同学会”的成立及第一次代表会议

1945年10月9日，国民党部队和东北行营长春办事处进驻长春。东北善后救济总署也在长春开始工作。这时伪满在长春的各大学的同学先后成立了各自的“同学会”，以便建立“长春大学生联合会”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争取早日接管和恢复大学事宜。在未正式复学之前，要求政府为各大学补习班提供经费，保证同学们的生活。为此军校的同学们开始筹划成立“军校同学会”，这时由王文萃、陈贵民代表“补习班”的同学先后去找关心我们前途的原军校教师和学兄们，向他们征求意见，他们都表示积极支持。吴宗方、刘凤卓等同学则表示除争取筹建“黄埔分校”外，还应根据广大同学特别是六、七期同学的意愿，争取到其它大学读书。为此必须首先争取参加“大学生联合会”取得与其他大学同样的复学资格。因此他们建议“同学会”把已毕业的一、二、三期的校友们包括进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争取光明前途。即后来确定的“北辰同学会”活动的性质是“追求真理、团结互助、寻找出路”。随后经“补习班”同学们讨论表示同意吴宗方、刘凤卓的建议。并委托张林祥、朱敬文等同学分别与“补习班”以外的军校同学秦宏伦、王兆庆、李延森等人联系，广泛征求意见后拟出了同学会章程，定名为“北辰同学会”。为什么不叫“军校同学会”？因在补习班时曾挂过一个“军校补习学校”的牌子，挂出不几天，就遭到夜间开来的几车苏军的盘问（当时长春是苏联红军的军管之下）所以不宜再用军校的名义了。经秦宏伦等同学负责设计并制做了“同学会”的会徽。会徽是一个东北地图，上有七颗北斗星，表示军校的1～7期学生，并象征同学们应当团结奋斗努力学习成为建设祖国、建设东北的栋梁人材。

同年12月中旬，在当时军校同学补习班的一间教室里，由各期生各自推选2～3名代表，在刘凤卓、吴宗方主持下召开了代表会。会上，王文萃汇报了同学会筹建的经过，经讨论一致同意，并正式宣布“北辰同学会”成立。鉴于军校同学分散在东北各地，无法建立理事会，所以只是临时推选一期生高晋贤为会长，二期生

刘凤卓、吴宗方为副会长，事实上以后就是由刘、吴二人负责“北辰同学会”的工作。其他各期同学的代表，既负责与会长又负责与各期同学保持联系，这次代表会又称为“北辰同学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最后刘凤卓发言明确表示，“北辰同学会”既不属于“真勇社”(伪满在军队中的抗日组织)也不属于任何党派，其活动宗旨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团结互助，寻求出路，是一个纯属“同学会”性质的群众团体。吴对4～7期的小同学们争取成立黄埔分校或去大学复学的愿望是热烈支持的，要求1～3期生给予声援和支持。会上通过的章程规定，老师可以成为名誉会员，各期同学是当然会员。章程还规定，凡有工资收人的会员和名誉会员都有从经济上支援同学会的义务。会后长春同学与各地同学联系，凡能联系上的就分发会徽，但不附加任何条件。开始时“同学会”的联系点就设在“竹中工务店”内，随着形势发展变化，于1946年夏，大部分同学去沈阳东北大学和长春大学复学以后，北辰同学会也就分别置于沈阳、长春这两所大学之内，组成分会并由那里的军校同学代表与吴宗方和刘凤卓保持着联系。现在看，直接参预同学会活动的同学约400人，其波及面也不到1/2，半数以上的同学由于交通受阻通讯困难，没有及时参加“同学会”活动。

“同学会”参与的几件事

1946年1月22日宋美龄从南京飞抵长春，并向苏联红军授勋，代表国民党政府慰问驻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我们以军校同学会的名义与长春工大同学会的代表联合写了一份请愿血书（由五期生张林祥执笔），通过女师大兰玉文同学向宋美龄献花之机，亲手递交上去，请愿的中心内容：①表明军校学生是抗日爱国的不应受到岐视，要求成立黄埔军校东北分校；②表明长春大学生目前的困境，要求政府尽快接管各大学，争取早日复学；③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现象表示不满，揭发了以张嘉璈为首的一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污罪行，要求惩办。

这一活动，曾得到吴宗方等人鼓励和支持，尽管在事实上未

能得到任何答复，但却能反映当时同学们的正义要求和心境。

1945 年 12 月上旬，我们以北辰同学会的名义参加了“长春大学生联合会”，陈贵民、张林祥代表军校学生被选入“学联”理事会为理事，经“学联”代表多次与东北行营交涉，终于被应约在大学尚未接管恢复之前，先由东北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向各大学补习班学生发放生活费用，为更多的同学来长春参加大学补习班提供了一定条件。

1946 年 1 月初国民党政府正式接管长春。但大学复学问题，仍未解决，“同学会”曾藉助一位军校六期生同学的哥哥（当时任国民党空军驻长司令）的关系，几经交涉，终于被准予先将学习航空专业的部分军校同学保送去中央高级航校继续学习深造，其中的周梦龙，王永熙、黄志仁、刘清田、李延森、王兆庆等同学，于 1946 年 2 月经北平飞抵成都。由于他们具有反对内战，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思想素质，到校后看到国民党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王永熙、王兆庆、黄志仁等三人于 1947 年春夏之际，毅然逃离条件优越的高级航校。通过我方地下工作者军校同学那守田等人的帮助，同在长春的王文萃一起被送入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周梦龙、李延森等其他几位同学也于 1948 年先后驾机起义参加革命，为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6 年 1 月 16 日在国民党阴谋制造的所谓苏军在抚顺残杀了一批接收矿区的中国技术专家这一骇人听闻具有国际影响的“张莘夫事件”的煽动和影响下，以王文萃、陈贵民等人为首的近百名军校同学参与“长春大学生联合会”组织发起的东北青年赴平请愿团 活动。尽管我们曾提出，要政府尽快安排复学；反对国民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罪行的正义要求。而国民党军政当局却利用了我们提出的严惩杀害张莘夫等人的苏军凶手，强烈要求苏军尽速撤离东北，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等错误主张，极力散布三次大战危机，煽动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几经谈判，最后国民党东北军事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明确表示只有在大家暂时参加青年

军，待苏军全部撤离东北之后，无条件的保证同学们回大学复学，参加青年军后只负责后方守备，不直接参加第一线战斗。在这一许诺下，以军校和工大同学为主及其他各大学部分请愿的大学生，近300多人被骗，3月初于沈阳参加了青年军二〇七师独立营集训。事实证明，反动当局借此为其破坏《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制造舆论，就这样使部分军校同学在政治上走过一段弯路。但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绝大多数同学在这一反动的历史逆流中受到教育，逐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及其卖国求荣，投靠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而后在很多进步的校友和同学们（他们中许多人已是共产党人）的声援下，终于在1946年6、7月间在长春发起反对参加内战，要求退伍复学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从此大部分同学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回到长春大学复学。

1946年7月在国民党被迫准予同学们退伍复学时，曾提出军校学生愿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复学的，作为先决条件，要先去辽源（原名西安）干训班，短期集训后保证推荐入学。经军校同学民主讨论，自愿报名，多数同学愿脱离军队，到长春大学去学习，委托陈贵民同学与长春大学联合会（后称“学联”）联系办理复学事宜。少数同意去中央军校复学的同学则由王德声、王文萃、朱敬文负责，带领他们去辽源干训班，参加集训。这期间由外地来长春打听复学消息、暂时寄居在“独立营”的军校同学李天成，也参加了“干训班”。

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集训，国民党军部下令先将四、五期的军校学生王德声、李天成、王缉绪、王文萃等人调出，直接派任排长。这时大家已看清他们所谓推荐复学是假，阴谋补充军队骨干是真。同学们不愿意在内战中为人火中取栗，只想得到一张书桌，有学习的权利。便采取了借调派任职的机会逃离军队的办法。为了能到大学读书，我们在同学中秘密串连让他们不失良机地采取行动，并与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中的军校同学联系，以取得他

们的支持。得到消息后，长春大学的军校同学便派陈贵民等来辽源，明确表示欢迎同学们脱离军队，同学会保证负责办理复学手续和解决食宿等生活问题。1946 年 8、9 月间，李天成、王文萃等人先行逃离军队后，"集训班"内军校同学的工作便委托给朱敬文，在他的细心工作和引导下，于同年 9 月下旬"干训班"结束之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利用被派去青年军新编第二师任职或外出招兵之机，回到大学复学。从而粉碎了国民党补充军队骨干，扩大内战的阴谋，他们恼羞成怒，曾下令通缉王文萃、徐光军等同学。但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的关怀和掩护下，这些被通缉的同学于 1947 年夏，先后被送往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回到大学的军校同学，在我党的争取和引导下，先后投入反对国民党腐败政府、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1947 年春，在沈阳东北大学的军校同学以温乃武、李天成、王缉绪等人为首，在长春大学军校同学则以那守田、陈贵民等人为首，利用"北辰同学会"的关系，联系广大军校同学与其他大学中的进步同学，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先后参加了 2 月间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和 5 月间的"六·二"爱国学生运动。其中不少军校同学在运动中敢于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正面斗争，起到了先锋作用。李天成同学就是在"六·二"学运中在沈阳被捕的。

中共东北局城工部也曾借助早期参加中共的原军校一期生吕天和"北辰同学会"的校友关系，向这期间在国民党高级军政机关和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的一批军校校友们（主要是一、二、三期生）进行工作，这些同学在秘密斗争中作了大量工作。吴宗方等同志在我党领导下为我军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为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刘凤卓等校友在我党领导下积极参加、组织、领导了 1948 年春营口五十八师的起义工作，为东北的早日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凤卓、吴宗方等人不仅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军事斗争，而且以"北辰同学会"负责人的身份对当时在长春大学、东

北大学以及在长春警校学习的同学的进步活动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1946 年 5 月营救六期生刘树棠同学一事，就是通过吴宗方的关系，出具证明，由王文萃、张鹏二人前往沈阳北关监狱交涉才得到无条件释放的。李天成同学于 1947 年 5 月于沈阳被捕后，也是通过校友的关系，得到营救，得以释放。早在 1947 年 2 月王文萃、黄志仁二人受中共长春大学地下党的委托去北平秘运进步书刊，他们所需的美式军官服装及军用通行证，是由吴宗方提供的，购书和到北平去的活动经费，则是由刘凤卓变卖其夫人的金项链供给的。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地下党的赞扬和广大进步同学的敬佩。以上这些活动事实，充分证明了“北辰同学会”最初确定的“追求真理，团结互助，共同奋进”的宗旨是符合时代发展精神的。

“北辰同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1947 年初夏，东北与全国一样，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及其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却暴露得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在各大学读书的广大军校同学绝大多数人先后接受了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学生运动，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在“北辰同学会”负责人刘凤卓、吴宗方的倡议下，同学会拟召开会议，就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同学们的出路进行研讨。为此于 1947 年 5 月下旬吴宗方、刘凤卓来长春。通过王文萃、陈贵民等人联系，有长春大学和长春警校中的部分军校同学近百人参加，于长春大学工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召开了“北辰同学会”会议。

会上尽管有个别同学表示既然同学会是一个无党派性质的群众组织，就应当既不淡跟国民党干，也不谈跟共产党走，言外之意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但多数同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现实，不同意走第三条道路。认为同学会的宗旨既然是追求真理，团结互助，共同奋进，那就应该允许同学们选择代表真理和进步的道路。在热烈的讨论之后，最后由吴宗方总结发言，明

确指出："北辰同学会"的性质不变，依然是校友会性质的团体，不属于任何党派，但也坚决不走第三条道路。坚持热爱祖国、反对内战、追求真理、为祖国的进步和正义事业，团结互助，共同奋斗，凡是为了进步和正义事业而开展的活动我们就支持，反之，我们就应抵制和反对。关于政治倾向和个人政治前途问题，应由每个人自己去选择和争取，"北辰同学会"既不干预，也不约束。这三条最后被会议接受。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澄清和坚决抵制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危险倾向，鼓励和支持了广大同学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愿望。

由于确定军校同学不再受"北辰同学会"的约束，要各自去找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实质上是宣布了她的结束，从这次会后由于东北政局的变化，"北辰同学会"就再没有什么活动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在我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在早期参加党和参加革命的师生的引导下，大多数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奔赴解放区参加学习和工作，还有不少同学根据需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各种地下斗争，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国解放后，除少数去台湾的同学外，在大陆的同学中绝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 40 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一部分同学成了党和政府以及解放军的高级干部，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成为大专、中学校长、教授、专家、高级教师、高级工程师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忠于党、忠于祖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其中还有一些同学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此稿根据刘凤卓、陈贵民、朱寰、杜仲舒、张智、王向群、刘汉中、汪静岳等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参考刘凤卓的初稿整理而成。作者现名王韬，曾任山东淄博市教育局教研室高级教师）

北辰同学会长大分会

杜仲舒　王向群

1946年7月，北辰同学会在长春大学组建分会，伪满军校五期生陈贵民当选为主席，四期生韩伟被选为副主席，六期生杜仲舒，七期生王鹏飞分别被推选为六、七期生同学代表。

在长大成立北辰同学分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伪满军校同学入长春大学创造条件，使同学们在动乱的年代，都能有个入大学深造的机会。

凡是伪满军校同学不论是哪期的，只要有两位同学证明是军校同学，均可参加北辰同学会。

同学分会在长春大学有200多名会员。

长大北辰同学分会在长春贵阳街设有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从外地来到长春的伪满军校同学，管吃管住。凡有志念大学的，都经同学会介绍到即将成立的长春大学去。

同学会得到了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伪满军校同学刘凤卓等人的支持。他们在军校是上级生，对五、六、七期的小老弟的入学，前途和命运非常关心，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经济上给以资助。

1946 年 8 月，北辰同学会的一部分同学，在长春大学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和其他大学学生一道列队前往国民党吉林省党部请愿，并致电蒋介石，呼吁迅速成立长春大学，使流亡在外的东北大学生有个读书的机会，省党部负责人接见了请愿队伍。

长春大学校长黄如今到长春后，对军校同学入长大有不同看法，认为军校不属教育部接收范围，当时北辰同学会代表陈贵民和其他伪满大学代表找黄校长谈判，要求无条件接纳伪满各大学和军校学生入长春大学，遭到黄校长反对。9 月 18 日，学生列大队到黄如今办事处请愿，在列队回宿舍途中遭到蒋军机枪扫射，引起学生强烈不满。事后，学生举行了多次抗议聚会。

黄如今不承认伪满军校同学为大学生。国民党当局以为这个军校也同黄埔军校学生一样，在入学前文化程度不及高中毕业水平，在校学习期间也短。他们不知道伪满军校同日本陆士一样，要在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中考取，并且比普通大学还难考。而且入学后预科二年，本科二年，加上队附勤务和见习学习时间将近五年。为此，北辰同学会派杜仲舒为代表到沈阳找教育部的臧启芳，向他进行说理斗争。杜将在沈阳搜集到的伪满军校学生使用的整套课本，包括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地质测绘等书，交给臧启芳看，臧启芳终于承认伪满军校为大学，同意接收伪满军校同学入长春大学。杜仲舒当即将这一喜讯亲口告诉在二〇七师的同学，回长后又通知在伪警校的同学叶文华等。

1946 年 10 月，北辰同学会推选王伦、苏云山为代表，为后来的同学办理入学手续，于是从二〇七师、二〇七师干训班和警校退出来的同学，经过同学们的努力都入了学。

1947 年初，北辰同学会进行改选，方锦业当选为主席，朱寰、

王伦当选为副主席。

1947 年 1 月，北辰同学会成立了以陈贵民为首，有杜仲舒、乔靖、王鹏飞参加的墙报委员会，专门负责出《北辰墙报》。不久，经过同学的努力，《北辰》与《建国》、《法窗》等墙报同时出现在长春大学校园内。在《北辰》墙报上，有杜仲舒、叶文华等同学写的文章，也有张雷的引人注目的诗歌，因为它们接触现实，文笔锋利，直接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因而遭到当局的反对，几次被捣毁，捣毁后再出，反映了《北辰》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长春大学生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在大批学生奔赴解放区，不少学生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学校经费困难已不能完全正常上课的情况下，北辰同学会和其他大学的同学会一样，已经没有再开展什么活动的可能和必要了，所以在 1947 年 5 月的一次北辰同学会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了。

（作者杜仲舒，军校六期生，离休前为长春市工业供销公司经理。王向群，军校七期生，离休前为长春市政府办公厅顾问）

在争民主反内战的洪流中

梁 亦

1947年初，长春大学开课之前，我来到了长春大学，住在五舍二〇七室。在这个宿舍里住过的人有杜仲舒、张智、叶文华、董世禄、胡越民、樊钟英、张国良和我，都是法学院政治系和经济系的学生。朱安也在这个宿舍里住过两个多月，他是学工的，因为我们经常辩论，影响他专业学习，因而搬出去了。我们这个宿舍比较活跃，一是因为军校同学来长春要求人长春大学读书，都需要找杜仲舒和朱安同校方联系，帮助办理入学手续，因而人来人往较多。晚上和假日常有些同学到这个宿舍来聚谈和娱乐；二是这个宿舍的人都是学政治和经济的，虽然开初也相约多读书少议论，但是国内外时时发生的事件，不能不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常自发地开起讨论会来；三是同伪建大的学生陈辛、邬文甫、董连山（即健悌）、郎治国、郭雅宽等人住的五舍二〇九室只隔一个门，两校同学历

来关系较好，杜仲舒和郎治国常相互来往，代表两校同学商量一些事情，比如协商学生会理事的人选。在课堂内外两个宿舍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逐渐成为长春大学学生运动中的战友。

辩论会

记得，长春大学开课前后，国内发生这样几件大事：美国兵在北京强奸女大学生，引起全国各大学学生纷纷起来反对美军暴行；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了通商航运条约（简称中美商约或蒋美商约）；国民党政府颁布《戡乱令》，称共产党为"奸匪"，公然扩大内战战火。同学们争读报刊上这方面的报导和评论，自发地进行议论和争辩，杜仲舒平时留心读报，对时事了解较多，常做中心发言。对美军暴行和蒋美商约的看法很快趋于一致，都认为美军暴行是美帝国主义一贯欺压中国人民的本性暴露，有人又补充了见到和听到的事情，如美国大兵搂着中国的吉普女郎驾着车在关内大城市的马路上横冲直撞；美国兵利用开舞会机会奸污国民党军官家属等等。对蒋美商约的看法是，它是以平等互惠的虚词为掩盖，国民党政府把全中国从天上到地下到水里都出卖给美国，这是比袁世凯同日本签订廿一条还彻底大出卖的卖国条约。在谁是发动内战的元凶上，看法曾有不同。以后找些材料来读，知道了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自去重庆和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又召开了有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议决成立联合政府。可是蒋介石在协定和决议的墨迹未干之时，就悍然撕毁协议发动内战，今天又要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代表大会，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坚决反对，他就颁布《戡乱令》扩大战火，因之说国民党是发动内战的元凶，共产党称自己的战斗是爱国保田自卫战，这是有道理的，大家统一了看法。此后，我们经常讨论政治时事，经济理论、哲学观点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唯物论和唯心论谁是符合科学的真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凝聚在商品里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还是它对人们有用性（即效用）的高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怎样能导致

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吗？那时真能消灭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吗？等等。

我们的自发辩论会是热烈活泼的，既要引经据典，又需密切联系实际，读书和辩论相辅相成，读书引起辩论，辩论又推动了读书，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书籍。

我们的辩论通常是心平气和，尽量达到看法一致，也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晚上，讨论起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卖国？谁是救国？美国和苏联谁是侵略我们？谁是帮助我们？这天的讨论，除了我们宿舍的人还有好几位外来的军校同学。大家都列举事实发表意见，看法很不一致。我表示了三个观点：①国民党是卖国，美国是侵略，他们签定的中美商约是最好的说明；②共产党是救国，像国民党这样一个腐朽卖国的政府，只有共产党领着全国人民推翻他，中国才能独立富强；③从理论上讲苏联应该是帮助我们的，不是侵略我们，但在具体事情上我想不通，也讲不清楚。有位外宿舍的同学与我的观点很对立，抓住我的第三个观点猛烈攻击，举出些事情质问我为什么不承认苏联是侵略，他越说越激动，甚至有过火的言语。我立即大动肝火还嘴骂人，被同学们劝止，都批评我太不冷静。

第二天是周日，好些外宿舍的军校同学到我们宿舍来聚谈，谈起昨晚上辩论的不愉快结局，都嘲笑我太孩子气。樊钟英向我介绍一位新来的同学，樊说："这位四期生王家谟（现名王放），在伪军校时就是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专家，小梁，你向这位王四哥多讨教讨教吧！"王家谟问了昨晚辩论的情况以后，立即问我："苏联就是帮助我们的，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我说："它为什么还割据我国旅大地区，保持中长铁路的特殊权益呢？"王说："这个问题就要看你站在哪个立场上来看，既然你认为共产党是救中国的，就该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苏联现在占着旅大地区，

同中国合营中长铁路，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都有帮助，你想，苏联现在把这些都交给了中国，还不是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可以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消灭共产党，这对中国革命发展将有多大损失啊！”我听了他的讲解，从道理上认为是对的，但感情上还不好接受，又问一句：“将来我们中国革命胜利了，苏联能还给我们吗？”王家谟斩钉截铁地说：“我深信能还给我们。”别的同学又向他请教一些政治时势和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问题，他都给了较满意的答复，大家都很敬佩他。从此，王家谟成了我们宿舍的常客，有几位同学是在他的帮助下，政治思想才彻底转变的，他逐渐成为长春大学里思想要求进步的军校同学的灵魂，都愿意接近他，听他讲解问题，我和他成了比较靠近的朋友。

《北辰壁报》

长春大学的进步学生同右翼学生在民主墙上用大字报开展辩论是当时的一种斗争形式。1947 年 3 月上旬，右翼学生写大字报用下流语言谩骂女学生纪念国际妇女节，我们宿舍的同学都很气愤，让我写篇批驳的大字报。我根据同学们的意见，翻阅材料，写出草稿，经大家修改后，叶文华抄成大字报，夜间贴在工学院教学楼正门大厅较明显的墙上，第二天上课前后，围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很多，得到了好评。以后，有人写这方面的大字报引用了我们大字报中的一个观点：“妇女解放的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进步的尺度”，这是我们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听说高守维常以“捉妖社”的名称写揭露国民党党棍们丑闻的大字报，王健群（原名王鹏飞）也常写同右翼学生辩论的大字报。鉴于军校同学有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积极性，我们宿舍有人提议我们军校同学也办一个像建大同学们办的《建国壁报》那样的壁报，全宿舍的人都很赞同，又取得了住在一舍一〇一室的文学院的王家谟、王德声、方锦业、那守田、张雷等军校同学的支持，我们就办起《北辰壁报》。

壁报的总负责人是杜仲舒，他负责供应纸张笔墨，向军校同

学征集稿件。我和张智、叶文华、董世禄、胡越民等人则承担了审稿、修改抄写、粘贴等等具体工作。壁报的报头和彩色勾边由张雷和王健群负责。壁报的经常撰稿人我现在记得的有张雷、张智、叶文华、董世禄、王健群、杜仲舒、王家谟和我。我们研究，为适应广大军校同学当时的思想水平，要尽力多登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多登揭露国统区里黑暗腐朽的文章，对那些政治立场不鲜明的宣传爱国思想的文章，用小资产阶级情调怀恋旧事的文章也给登载，但坚决不登载有明显反共观点和歌颂国民党的文章。《北辰壁报》只出了三期，第一期是 1947 年 3 月中下旬贴出去的，因为是创刊号，在徵集、审阅稿件和壁报的勾画上都下了很大功夫，有论述文、散文和诗歌，内容比较充实，也想一鸣惊人。现在能记得的论述文中有张智写的宣传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争民主自由的文章，有叶文华写的论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我写的谈妇女解放的文章，是在我写的那张大字报的基础上又从多方面论述写成的。这期壁报得到了长春大学校园里广大同学的赞誉，我们这些办壁报的人都很兴奋。第二期壁报是“五·一”节的前几天贴出的，我记得这期壁报的论述文中有我写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有王家谟写的哲学论文。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很生动的事例，尖锐地批驳了长春大学哲学系黄教授在课堂上宣扬的：“大神灵、大虚空，空即是我，我即是空”等等唯心论观点。这篇论文在校园里引起轰动，连续不少天有人围看，那位黄教授闻讯也来观看，看完后气得跺脚骂人，扬言要同作者当面辩论。第三期壁报在 5 月末或 6 月初贴出，登载的文章内容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现在仍记得，每期壁报上都登载两三篇张雷写的政治讽刺诗，诗的具体内容已不能记忆，但留给我的深深印像是，张雷写的诗又快又好，紧密结合时事，讽刺辛辣，词句清丽，读者无不叹服。可惜！这位思想激进，文思敏捷的同学，于 1947 年秋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于督察处的魔窟里，他像一颗灿烂的流星，在争民主的斗争中一闪而逝，他那年轻的勇于斗争的形

象，至今仍使许多老同学不能忘记。

学生运动

1947 年年初，长春大学刚开课时，我们宿舍的同学虽然在政治认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还想多读点社会科学的书以开阔眼界，没有急于参加学生运动的念头。可是，人不能活在真空里，不能离开现实。校内不断发生的斗争，迫使每个人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开学初讨论长春大学学生会章程时，起初我们没有重视这件事，只是照例参加，讨论中逐渐被会场上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当晚从大会回来，我们宿舍里的同学便纷纷议论起来，对那些为争取在章程里多写进保护学生民主自由的条款而慷慨陈词的进步学生表示钦佩，对刘富文等反动学生死皮赖脸地在会上反对广大同学争民主自由的意愿则很厌恶。当年的刘富文，虽然没有 1948 年以后西服革履一派官气，仍是身穿旧棉布大衣，一副穷学生打扮，而初露头角就成为校内知名的反动人物，他生活中的丑闻也随之在学生中扩散，对这样的人我们就公开地示以鄙视目光和反对的态度。我们虽然没在大会上发言，但对进步学生的发言多鼓掌赞同，对其中铿锵有力的讲演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好，学生会章程终于按广大同学的意愿通过了，我们宿舍的同学们都感到是个大胜利。

1947 年 4 月，国民党官方报纸上不断报导外地学生举行所谓反对莫洛托夫干涉中国内政的护权游行的消息，又听说沈阳东北大学和吉林长白师范学院的学生都为此上街游行了，我们估计长春大学也不能平静。晚上我们为此议论一番，有人介绍了这件事发生的原委，大家都认为事件的起因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国民党却要借机搞反苏宣传，以转移人民反对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视线。王家谟参加了议论，他笑着说："他们高喊护权，而护的不是中国的权，是美国的权。"当讨论如何对待这件事时，都表示一定坚决反对。

第二天下午，长春大学学生会受命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讨论要上街搞反苏护权游行。开始，反动学生鼓吹游行的意见占优势，我们宿舍的同学，无人在会上发言表态。正当要投票表决时，忽然有人发表了有理有据的演讲，他历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提出要护权就必须同时反对内战，这个发言得到会场同学的热烈赞同，扭转了会场形势，特务学生大惊失色，进步学生斗志立增。当时我的心里就像火热天吃了一顿冰棒那样痛快，情绪激昂，随着一个个进步学生发表支持反内战游行的意见，我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了，主要内容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召开过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成立联合政府，可是有人撕毁政协决议，下令解散政协，这是内战扩大的起因，因此，我们坚决要求恢复政协！我这个发言，也获得不少赞同之声。这天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是，上街游行要喊两个口号，一是护权，一是反内战，但特务学生耍阴谋，使大会通过了两个口号的游行分两天进行的决议。

由于出现了我们没预想到的结果，回宿舍来同学们都很兴奋，大家都认为这位提出“反内战”口号的人很不一般，是位很有头脑而且做了相当准备的人，都认为“反内战”口号提得很及时，很有策略意义，一下子使特务学生鼓动起来的游行示威改变了性质，使他们骑虎难下，狼狈不堪。樊钟英批评我不该提“恢复政协”的口号，他说：“国民党已明令解散政协，颁布戡乱令，你还要求恢复政协，不是公开给共产党要合法地位吗？特务们要以此给你戴红帽子的。”大家都说还是积极支持反内战吧，这个口号比较妥贴，谁也不能给扣上什么。继而我们研究了如何对待特务学生把游行分两天进行的阴谋，我们估计校内许多人能识破他们这个阴谋，明天游行只要有人喊出反对内战的口号，我们就积极响应，而且尽量影响我们军校同学一同喊出这个口号。

翌日早晨游行之前，学生会又在一个大房子里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去开会的路上，我遇见五舍二〇九室的人，不是董连山就

是郎治国，我用身子撞他一下低声问："咱们能顺从地跟他们去搞护权游行?"他笑了笑指指嘴低声说："这个长在咱们的鼻子下边，只要他们敢把学生拉到街上去，喊什么就不一定由他们了。"我俩会心地笑了，真是人同此心啊!

上一天的决议，可能没得到特务学生的上级同意，他们担心学生们在街上游行时会喊出"反内战"口号，所以大会一开，特务学生首先发难，重唱上一天的老调，说什么"反内战"口号干扰了这次游行的大方向，坚决要求撤销"反内战"口号，要挟大会主持人规定出不许喊出"反内战"口号的禁令。他们倒行逆施，公然破坏上一天大会的决议，不仅压制不住同学们反内战的正义要求，反而激起广大同学的怒火，纷纷对他们进行谴责，有人进而揭露他们上一天提议把游行分两天进行就是个大阴谋。我非常气愤地在大会上发了言，以激烈言词斥责特务学生要阴谋搞破坏，坚决要求两个口号必须在一天里喊出。我的发言惹恼了站在离我不远，经常伴随刘富文出入的法学院学生庞××，他对我发言中说他们按主子意图搞破坏一点很不满意，我发言后他立即厉声质问，威吓我说话要负法律责任。我也不客气地反驳，我俩这样轮番发言两三次，气氛很紧张，有几位军校同学担心我同他武斗暗中向我靠近，我的好友赵德华紧紧地站在庞的身边做好准备，只要一动手他就一拳把庞打倒。有人拉我的衣角，暗示我不要再发言，换个地方站着，我听从了劝告不再发言。

这次斗争激烈曲折，国民党反动派原以为很容易煽动起来的反苏游行，被进步学生提出"反内战"口号所抵制，不得不自行要求取消任何游行，一场反苏丑剧就这样收场了。听董连山说，会后特务们还不甘心，鼓吹学生去校部门前搞反苏签名，去的人稀稀拉拉，他们也没敢发表。

这次学生运动中，我们宿舍的同学都经受了战斗的洗礼，除我之外，张智和董世禄等人也在大会上发言了，董世禄是位嫉恶如仇的人，有一次有人想拉拢军校同学加入青年党，他拍案而起，

大骂："什么他妈的青年党，民社党，说不是尾巴，也是个尾巴！"一言戳穿了那个人的阴谋，那人只好狼狈而去，他在学生运动中的发言也总是很激烈的。没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学，也表现了坚决反对内战，反对搞反苏游行的政治态度，感受了斗争胜利的喜悦，开始从自发到自觉地投入争民主反内战的洪流中。

这次斗争中，特务学生刘富文又是反面队伍中的主力，我们都很痛恨他。大家商议给他写张大字报刺刺他，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用公开信形式给他写张大字报。大致内容是：

致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刘富文先生：

你在讨论学生会章程时初次登台就很卖力气。这次搞护权游行你又表现突出，肯定能得到上级赏识，给你不少赏钱。望你加倍努力多出成绩，即将召开的国大代表会议准能有你一席之位，我们为你能当选上国大代表而举杯祝贺。

落款是吴贰灵启（即五舍二〇七之意）。

晚上把大字报抄好，第二天起大早我和另一位同学将它贴在民主墙上，刚贴完就被一个原来同刘富文在同一学校读书的人看见了。开早饭时我先进食堂吃饭，快吃完了，刘富文气冲冲地拎着那张大字报走进食堂，用眼四处找人，发现我以后，对我瞥了一眼，然后故意笑呵呵地面向群众说："谢谢这位朋友大清早给我送件礼物。"我心里笑，尽力表现为若无其事的样子。下午他用复信形式给我们写张大字报，除辩白他是穷学生无人给赏钱之外，还含沙射影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我们一笑置之没再理他，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同刘富文的小交锋。

1947 年 6 月初，因为训导处的特务职员孙锦庭无理侮辱医学院院长郭松根教授，先是医学院的教职员工罢工罢课以示抗议，继之全校开学生大会，决议搞全校大罢课，坚决要求严惩特务职员孙锦庭和取消训导处。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发展迅速，特务学生猝不及防。

罢课后一周左右，有一天法学院学生会通知要在当天下午在

法学院食堂开全院学生大会。午间，住在五舍二〇九室的邬文甫和杨庭祥同学，到我们宿舍来交谈，据他们掌握的信息，刘富文同他的党羽们秘密策划，准备在下午的大会上以多数压倒少数强行通过法学院学生反对全校大罢课的决议，然后贴出反罢课声明，以带动全校右翼学生反对大罢课。我们商议了在这个会上要互相配合，积极发言，坚持抵制，不使他们的阴谋得逞。

下午法学院的学生大会一开始，刘富文就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赤膊上阵大放厥词，说什么全校大罢课是受坏人利用，他的党羽们也轮番发言，攻击医学院同学和郭松根教授，我们宿舍里的我和杜仲舒等人立即反击，也轮番同刘富文及其党羽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们坚持要少数服从多数进行表决，我们坚决反对召开这个会，要求立即散会。我在发言中有意地以很尖刻的话斥责刘富文，想引他发火，只要他还嘴骂人或给我们扣红帽子，我们就同他动手把这个会议打散。刘富文不愧是个老练的特务，怎样刺激他，他也不生气，他的党羽们则为他帮忙，呼号起哄，要求赶快表决。在他们胡搅蛮缠逼着表决的时候，我和杜仲舒先后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离会场前，我提出警告说："刘富文你胆敢操纵会场，通过反罢课决议，以法学院名义贴出声明，我们就在你的声明旁边贴出揭露你们破坏全校罢课阴谋的大字报！"杜仲舒警告他说："刘富文你总干这种违背人心的勾当，产生一切后果由你个人负责！"随着张智也退出会场。刘富文虽然故作镇静，领头鼓掌欢送，以显示他的胜利，但是我们的抗议和警告对他还是有所震动，有一定威慑力的。

我们退出会场一个多小时后，同宿舍的人散会回来，据他们讲，我们三人退出会场 刘富文原以为可以顺利通过他们的提议，不想钱育才以长春大学学生会章程为论据，无可辩驳地阐述了法学院如果违背全校学生大会决议，单独发表反罢课声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思索，二〇九室的人也发言做了补充。刘富文等人虽强行辩解，但被驳得语无

伦次，不得不宣布散会。

国民党为破坏学生罢课，校方藉口解放军已靠近长春市，长春大学校区不安全，把全校学生疏散到市内一些中、小学校去食宿，由于食宿不方便，我和高守维趁此一同回吉林市家里去了。回家后的十几天，有的同学从长春去吉林，他们说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趁长春大学学生的组织松散之机秘密地逮捕学生，不仅思想激进的钱育才、王承祜被逮捕，属于中间派的盛魁才也被逮捕了，长春大学的学生情绪受到很大压抑。关心我的同学捎来口信，让我不要急于回长春，看看动静再回去。听到这个消息，我胸中怒火燃烧，感到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继续生活已不可耐，对它维护的中国的旧社会制度没有一点恋念之情，我心想经过半年多的探索和追求，既然已明确了应该跟谁走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一个爱国家爱民族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就不能再犹豫不定，需要尽快到解放区去。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干革命，把国民党的统治彻底推翻，建立起富强的新中国，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振兴，我们每个人才能有出路。

（作者为军校六期生，已故，曾任长春市统计局统计处长）

一段弯路

侯中枢

1945年8月后，伪满时期的陆军军官学校，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工科大学，医科大学，畜牧兽医大学，王道书院等各大学，随着日本的投降，祖国的光复而自行解散。学生们大多数都离开长春回家乡去了。10月，国民党以中央政府名义，派东北行营到长春行接收东北大权，地点设在“满炭大楼”（即现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楼）。当时苏联红军仍驻在长春。这时在长春的各大学的学生，都组织了各自的同学会筹备处，推举临时负责人向东北行营联系，要求复学和解决眼前的生活困难问题。同学们普遍认为，祖国光复了，中央政府来接收了，政局会很快稳定下来，开始搞建设，医治东北十四年亡国的创伤，学校会很快的复学，自己可以继续完成学业，将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国民党对待学生的做法一是封官，二是送去学习。送去学习对学生很有吸引力。

我就是被吸引的一个。我是伪满军官学校学生，听到“军校”同学李延森被选去学飞行员（李在“军校”时已被选为飞行员候补生），盲目认为都有机会被选走，所以对“东北行营”则抱有盲目的信赖。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它的政治目的，公开造谣说，苏联红军要赖在东北不走，企图把人们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转到苏联红军身上。

1945 年冬，国民党接收长春的消息陆续传到各地，一些外地学生，感到有复学的可能，纷纷到长春来探听消息；有些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看到家乡解放了，怕共产党，跑到长春来避风；有的家境贫寒，长春又无亲友，来长春看看，挂个号又回家乡了；在长春有亲友，生活上有着落的，就留在长春，等有机会时好上学。这样一来，长春各大学都集中不少人，先后开办了许多补习班，由高年级同学为低年级同学补习课程，在长春的教授、老师也无代价的给学生们补习课程，使同学们不致荒废学业。“工大”和“军校”的同学，联合在一起占用了日本人经营的“竹中工务店”这幢楼（位置在现在的吉林大路树勋小学东侧），分别补习课程，“军校”由王文萃、陈贵民、宋传绂、田文魁负责。各学校的学生会筹备处负责人经常到一起商谈联合起来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复学事宜。当时各校学生办的补习班，办得比较好的有新京工科大学、陆军军官学校、建国大学等，其它几所学校，人数少，活动范围也小。“军校”的补习班比较大，人数也较多，记得当时设有英文、数学等课程。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时间的推进，学生们看到的现实是国民党东北行营利用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把在华北打八路军的伪满部队改编为“铁石部队”，空运到长春；把伪满的军警宪特收罗到身边，作为“东北行营”各系统的打手，欺压老百姓；接收大员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盗运银行的金条，玩女人；造谣惑众，说什么苏联不撤军，八路军、共产党扰乱社会治安，等等。这时长

春市内开始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事实面前，学生们幼稚的思想受到了冲击。有门路的学生，远走高飞了；没有门路的学生，带着满脑子问号观察着形势的发展。

1946 年 1 月开始，长春市的形势急剧变化，东北行营声言要撤退，一时学生大哗，纷纷起来要求东北行营保证学生的读书权利。2 月 20 日，各个大学的学生，联合起来，准备到北京向政府请愿。当时各校的学生负责人，向同学们宣布：我们要到北京请愿，必要时就在北京上学。东北可能变成战场，东北行营答应给每个学生补助费（国民党东北流通券）200 元。这些话是程希翱传达给我的。当时各校在沈阳、锦州都有联络站。各校分别行动，到集合地点集合。"军校"在沈阳的集合地点为站前悦来栈。程希翱为大家买了客车票，我们是 2 月 21 日到沈阳的。到沈后，在沈阳的同学也纷纷加入请愿行列。当时求学心切，一心一意要读书，也就积极地加入了这一行列。沈阳的同学为我们安排食宿，学生会临时负责人宣布，到北京没有客车，只能坐货车，第一站到锦州，不用花钱买票。我们坐的货车，实际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运兵车。学生们有的坐在车厢里有的坐在车厢棚盖上面，历尽了艰险，才到达锦州。到锦州后，当局说火车不通，让学生们等几天，实际是国民党当局在要花招，当时有个国民党的官员曾向学生们说，请愿不用到北京，在锦州也可以解决问题。开始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以关怀学生为名，把学生都安排在城墙根的一所中学教室里住，还有些学生住在市内旅馆、浴池里，还发了部分行李铺盖，并供应了伙食。住下来后，学生代表就开始向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进行交涉。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交涉的消息一天天的恶化，学生们的思想也一天天的起变化。到 3 月底，近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当局，先是说正在同北京联系，找车辆和住宿的地方，以稳定学生们的情绪，随之而来的，是派高级将领对学生们进行说教。有个

姓华的少将，还有原东北大学的教授，甚至把马占山也抬出来，在这所中学的操场上向学生们讲演。与此同时，也有些人向学生们宣传。这些说教和宣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内容："中央政府"关心东北同胞，没有忘记学生们的苦难，可是现在"国难当头"，还是应当先"救国"再读书；应当理解"政府"的难处，经济上有难处；学生们不要上坏人（指共产党、八路军）的当，要听"中央政府"的安排，中央政府不会亏待学生的；不要分散，单独行动。等等。这些说教，未能得到学生们的一致赞同。而国民党当局这时却理直气壮地向学生们提出：一部分学生先当兵，自己管理自己，待长春"接收"后，愿意上学的保送到大学；不愿意当兵的，自己去北京，"政府"不管。这实际是国民党摆设的圈套，让青年往里钻。面对这个圈套，一部分学生认为，当兵也不能立刻就上战场，再有几个月长春"接收"了，那时就去上学。眼下当兵是解决生活问题的好办法，所以同意当兵；部分学生（这部分学生都是身上有钱，或北京有门路的人），坚决主张去北京请愿。我是因为生活无着落而又一心一意想上学，所以决意留下来当兵的。各校的学生负责人，根据同学们的意见，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同意一部分学生留下来当兵，一部分学生去北京清愿，政府给安排车辆送他们去。在去北京和入伍前，全体学生在锦州要搞一次游行。国民党当局答应了这些要求。

游行示威是在3月下旬进行的。口号是：要民主要自由，给学生读书权利，坚决反对欺骗；要求迅速"接收"，迅速开学，不过流亡生活。当时唱的歌，都是抗日时期的歌，什么《桃李劫》、《毕业歌》、《流亡三部曲》，还有些是学生们自己编的。学生们的情绪不断变化，开始时群情高昂，中间是愤怒，后来则是低沉的悲愤，往日的欢快情绪不见了。当时我们搞游行示威，是要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东北的大学生并不像国民党"中央政府"认为的那样，受奴化教育太深，水平太低，是有名无实的大学生，而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经过痛苦的磨炼，怀着民族自豪感，有

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一心想学习知识，准备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一致的，沿途居民、商店、行人见到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在游行进行中，也出现与游行示威总方案不符的事情。队伍中混进了冒充学生的人，他们喊出要求苏联撤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等口号，对这种突然改变口号的行为，学生们很气愤，可是又无法挽回。因为都不是一个学校的，人数又很多，互相间又都不认识，所以也只好各自为之。这次游行示威，虽然出了点问题，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游行示威后，去北京的学生要出发，学生代表经过联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答应用火车送这部分学生去北京。谁想到去北京的学生登上火车，欢送的学生刚刚撤走，军警便登车把学生赶下车，加以驱散。事后才知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根本就没有想把学生送去北京的意思。这批学生中少数人只好自费去北京，相当一部分人，看上学无望，也就回乡了，也有一部分人留下当兵。留下来当兵的被编成一个独立营，下设三个连（后来编为四个连），一个独立排。独立营归青年远征军二〇七师指挥。“军校”学生单编一个连为一连，其它各大学的学生为二连、三连。四连是混编的，还有一些中学生。女学生编为独立排。

1946 年 5 月初，沈阳被国民党攻占。独立营到沈阳后，在沈同学纷纷前来会面，并介绍了他们升学的情况。听沈阳同学们介绍，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在沈阳成立一所大学，已经派来了校长，正在筹备，得到这个消息后，学生代表（这些当兵的学生，虽然有连排长的管制，但实际生活，还是由学生代表在主持）向独立营长提出，在沈阳升学，希望当局能兑现诺言。这时军营中的学生与沈阳市的同学，内外串通，闹得军队不像军队，秩序大乱。独立营长只好允许一部分人在沈阳升学，其他人等长春“接收”后再离队。就这样，在沈阳就有一部分学生退伍上学去了，但是也

有一部分学生因在沈阳生活无着落，也参加了军队。独立营改成独立团。这时独立营好像学生的救济站一样，你来他往的。

长春被国民党攻占后，我们这批当兵的学生，于6月份前后又被运到长春，当时驻在“满炭大楼”对面的院内（即现在的吉林省水利设计院办公楼），也有些住在朝阳桥、西安桥外生物制品所一带。这批当兵的学生，一心想离开军队去上学。他们委托代表一方面与长春各大学新集结的学生所成立的联合会联系，一方面向军队方面提要求，让他们兑现诺言。而学生们则成天逛马路，到处找机会整治“接收”大员。原“军校”的学生，看到新六军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学美国兵那一套，搞“吉普女郎”和“战地夫人”，成天出入酒吧、舞厅，很气愤，他们以有“八路军人员混入舞厅”为名，对舞厅进行了“大搜查”，领头干的是军校六期的王克度、庞士倬、王健众等。这事发生在现在的朝阳音乐厅，当时是个舞厅，还有一次是要武装攻打警备司令部。一天有个同学被长春警备司令部抓去，跑回来报信的同学一说，同学们立即集合起来，登上装甲车，要去警备司令部要人。连长看到了，不让去，同学们一看，机会到了，马上子弹上膛，并且声言，你连长不让去，就找你要人，同学一旦出事，拿你是问。连长当时很害怕，立即表态：“我去要人，两个小时人不回来，你们再去也不晚”。几个同学陪着连长去要人，时间不长，被抓的同学回来了。领头干这件事的是郭维琪等人。六月中旬，我们这批一心一意要上学的人，在走了一段弯路后，终于退出了军队，搬到长春大学学生联合会去了。

（作者为军校七期生，离休前为吉林省农机局处级巡视员）

警官班成立前后

徐树栋

1946 年春夏之交，伪军校在长春的同学共有三四百人之多。后来他们分别走向了“长春大学”、“第四总队”和“警官班”三个集体。有 100 多名同学考入警官班，我是其中的一人。

成立伊始

“警官班”的全称是中央警官学校第五分校（东北分校）第九期警官训练班。是 1946 年夏在长春成立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要员们，在美国的帮助下，纷纷拥向昔日的沦陷区，前来抢夺胜利果实。一时之间群魔乱舞，天昏地暗。大员们的总的目标是抢占地盘，扩充实力，以排挤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46 年 5 月 23 日，以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为首的所谓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沿中长铁路进占了长春。一些国民党的机关也纷纷跟进到位，进行“五子登科”式的掠夺“接收”。这时候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和内政部警察总

署署长唐纵为首的一些警政首脑，考虑到接收东北警政的急需，在沈阳设立了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首先成立的是“警保干部训练班”。学习时间3～6个月。招生对象是伪满时期的军、警、宪、特、地方职员。经过短期培训后就地安排使用。以后发现在长春有许多伪满军校的毕业生和肄业生，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东北青年中的精英，如果不把他们掌握过来，听任他们走向革命，投奔共产党，那将是一个重大损失，而且是一个灾难性的隐患。所以匆忙地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陆军中将刘璠为东北分校主任（因为中央警官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坐镇沈阳。任陆军少将袁家佩为副主任到长春来筹办警官班，主要招收当时的“军校”同学。

袁家佩是安徽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抗战期间曾任重庆宪兵第三团团长，日本投降后做为接收大员飞来东北。因他有吸鸦片的嗜好，处处表现得萎靡不振。经过短期间的筹备，就在原伪满警务总局旧址（现在白求恩医大基础楼南侧的三栋红色二层楼房）成立了中央警官学校第五分校警官班。招生时指名要伪满军校已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因为没有任何证件可凭验证，所以只要有两名同学证实或两名少校以上的军官出具证明函件，即可报名投考警官班。因而考入的人员成份很杂。在10月1日入学时，共有三百人，编成三个中队。一中队主要是由真正的军校各期同学编成。但也有少数非军校同学混入。二、三中队的人员则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也有一部分军校同学被编入，如阮守一、郑德佩等。

三个中队的中队长和区队长由新六军调来的陆军中校、少校或上尉充当。另外每个中队都设有一名训导员，由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来担任，入校当时没设大队长这一职务。后来由于要加强管理，镇压学生中的不稳定分子，才派来一个名叫李家勋的上校担任大队长。他是东北人，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生。该人可能有军统特务的关系，所以一到任便对学生进行恫吓和讽刺。记

得他上任后首次讲话的内容，就是法国如何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战胜德国，光复后，法国对沦陷期间曾经与德国人合作或妥协的法国人一律采取断然的措施等等。以此来威胁敢于向他们反抗的学生。所以同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戴高乐”。大家认为他的讲话狗屁不通。所以背地里都管他叫“李大狗屁”。

教务主任叫高思齐，兼教国际法，是在东北沦陷期间一直在关内流亡了十四年的东北青年。曾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和武汉大学法学院。该人具有学者风度，警官班解体后随袁家佩到长春市警察局任秘书主任，兼人事室主任。训导主任叫韩在英，也是东北人，中央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但特别擅长于拉拢奉迎，是一个十足的国民党党棍。警校解体后曾任长春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后来又到六十军任上校高参。1948 年夏离开长春，后去台湾。总务主任是军统特务、上校张溪，浙江人。是一个阴险毒辣、贪污腐化的特务分子。1947 年春，他贪污学生办学经费问题暴露，同学们把他由家中揪出来，扭到学校后把他囚禁起来，形成一起轩然大波。该事件首先是由三中队同学发起的，以后一、二中队同学也群起响应。最后我被选为处理善后的学生代表之一，由于证据确凿，张溪本人也供认不讳，同学们在取得市参议会的理解和支持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舆论界披露了真象。后来由沈阳校部派来包、周两名少将副主任到长春处理这件事。但由于当时长春外围的微妙形势和学生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所以他们没敢把这场风波说成“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而以袁家佩失职和处理不当，撤销袁家佩的副主任职务，此事便不了了之。大队长李家勋就是在这时到任发表他的“戴高乐”就职演说的。他的高压和恫吓，不但没使同学们屈从，反而更激起了同学们的反抗。以后同学们公开叛逆、自动退学，参加地工等方面表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结局和他们原来办学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

一 年 学 习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饱尝十四年亡国奴生活之苦的东北青年，好像长期囚居于暗室的人，突然见到阳光一样，一时之间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在日本统治时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反满抗日，但是一旦日本被打倒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则一时之间说不清楚。尤其是“军校”同学、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加上苏军进驻东北以后，个别苏联红军的违纪行为刺痛了这些政治比较天真的青年人的心。使这些青年对当时以俄为师的共产党产生了怀疑。“向何处去？”成了那个时期困惑着这些青年的首要话题。我是 1946 年 8 月由哈尔滨徒步走到长春的。当时国共双方以松花江为界，铁路不通。父丧而不奔，有家而不归，却徒步来到长春，目的就是要寻找一个进身强国的出路。但是到长春之后看到的是国民党的种种贪污腐化颓废没落现象，因而感到万分失望。然而对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一事，又因为身上有一个出身历史不好的包袱而感到恐惧和不安。所以这一时期每天都处于徘徊观望、苦闷傍徨之中。而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每天要吃饭，天寒要棉衣。而我所认识的人情况也都和我差不多。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有的，“当兵去！”但是当兵去打谁？我们不想做无谓的牺牲，更不想把子弹射向自己的同胞。这可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思想反映吧！今天可以极客观地讲，这些人当时绝不是因为对共产党怀有什么刻骨仇恨而去参加反动组织。他们后来的行为表现，也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记得考入警官班后我曾作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沦陷受军训，光复把色刷，是非君莫论，宗旨别有他。”以此来抒发我当时的思想感情。

入学了。急需解决的食宿衣着问题有了着落，随之便开始探讨人生的目的和个人的前途。这是一群不甘于没落，勇于进取的群体。当他们发觉“失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时候，他

们是不会安于现状的。所以在1947年春季的一天，一期同学方振仪和二期同学李朝凤利用到南岭进行实弹射击的机会，一起携械投奔了解放区。紧接着一期同学柏成库（柏喜峰）也毅然投奔了解放区。三期同学王文梓和四期同学刘太壮也由学校逃出参加了在长春的地工组织。当时二期同学刘凤卓的爱人李晓君来到学校，在我们一中队的宿舍里公开对同学们讲："吕大哥（就是吕天是一期同学吕殿元）给同学们捎信来说，同学们去解放区可以奔九台走，遇见解放军就说找吕天就可以"。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同学们一个个地觉醒了，在长春大学的原军校同学的进步组织"民青支部"的领导下，由赵鸿光、王飞（王兆铨）、宋国栋（宋楠）、路青祥（路驰）、高锡福（高扬）、刘树椿等人组成了"民青警官班小组"。三期同学刘信礼等也参加了其他系统所领导的地工组织。因为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进行秘密抗敌斗争，所以彼此间没有横的联系，当时参加地工或起义者如张文超（张浩）、吴守忠、韩文增、樊喜英、吴治安、阮守一、郑德佩、张书林（张苍钧）、徐树栋、吴广贵（吴琼）、赵晓天、高喜　等等多得不胜枚举。也就在这个时候，学校当局也觉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为了争夺青年和镇压革命行动，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由训导员动员全体同学集体参加国民党，继而由市党部书记长佟贵廷主持入党宣誓仪式。随后又聘请特务头子，市警察局长乐干兼任政治教官、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来校训话，聘请吉林省高等法院院长魏大同主讲民法、首席检察官孙英武讲授刑事诉讼法、刑事庭庭长刘玉滨讲授刑法。用这些行动来拉拢同学，以求遏止同学们的革命行动。最后在长春外围各据点陆续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在1947年11月15日草草结束学习，宣告毕业。

归　宿

和国民党其他学校出现的"毕业即失业"一样，警官班毕业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本来他们收拢这些青年的目的是为了接

收全东北警政的需用。同时也为防止这些青年被共产党人拉过去。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只剩下孤立无援的几座消费城市。警官班毕业这二百多人他们是无法给予安置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决定由袁家佩任长春市警察局长，在长春市警察局范围内来安置这二百多人。

长春市警察局下属有八个分局、市局直属机关有一个保安大队，一个刑警大队，一个消防大队，按警官班毕业生的待遇是一等巡官，等于今天的正科级。这些单位不可能一下子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便把他们一律安置为实习员，分配到长春市警察局下属的所有各基层单位去实习。实质就是以这种方式分配出去就不管了。因为实习员没有具体职务，没有工资收人，来了没人管，丢了没人找。尤其是 1948 年春国民党六十军由吉林撤到长春以后，长春周围缩小，边缘的五、六、七、八四个分局也各有将近一半的辖区，处于三不管状态。在解放军的炮兵火力能直接射到市中心的情况下，国民党各党政机关，除必要支撑门面的以外纷纷撤销或转移。市内粮食奇缺，米珠薪桂。这时国民党的统治者又想出了新花招，组成一个叫“战时工作队”的组织。把大批还没任职的警官班毕业同学调去充任队员。主要是执行‘杀民养兵’政策，去搜查居民手中的粮食。其结果是使这部分具有正义感的同学，加速觉醒，走向革命，同学们有的奔向了解放区，有的就地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地下工作。

1948 年 10 月 17 日六十军起义，19 日新七军放下武器，长春获得了解放。不久，东北和全国解放。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的同学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刘树椿同学就是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判处了死刑而被同学们设法营救出来的地工人员之一。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经过了多次运动，受过不同的冲击。但是竟都活过来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恩泽，都回到了他们应该站立的位置上，有的是总工，有的是高教，都获得中级以上的职称。虽然个个两

鬓染霜，已是离退休人员。但是普遍感到党给我们的太多了，而我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远远不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顺天则昌，逆天则亡”，什么是天？就是人民的意志。反动派想搬起“军校”同学这块石头去打共产党，反而被这块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作者，军校二期生，离休前为中学教师）

在另一条战线上

李天成

四十年代意气骄，长春城内小试刀；
十万甲兵视如土，百余学生闹虎巢。
为见中华重振奋，何惜青春头颅好；
几多英才成雄鬼，血沃大地发新条。

1 1947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召开城工会议，当时的城工部长李立三在会上提出："把城工工作摆到前线去。"会后由杨实人带部分干部到长春市附近的九台县成立了中共长春工委，这些干部中有一个人是原在东北局敌工部向国统区作派遣工作的吕天，他是伪满军校一期生。

杨实人在一篇回忆录①中说："立三同志在敌工部工作时期，曾由吕天找到过去的同学李天成（当时是个非党同志关系），经过训练派到长春大学，联系长春大学生中一部分进步青年，以交朋友联系感情方式团聚在一起，先是谈学习、谈生活感受，逐渐引导到谈对时局、对政治、对国民党贪污腐败专打内战的看法，把交谈中观点相同的，志同道合的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

作为团结的骨干与核心，很快把一部分同学引导到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压迫的道路上来，并把其中头脑清醒、表现很好的对象吸收为党的地下工作关系的成员。”

吕天曾经是城工部二室的派遣干事。城工部是对敌城市工作部的简称。在1947年5月与敌工部合并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向敌占区派遣地下工作人员。机关地址在哈尔滨南岗区义州街16号。

吕天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8月派李天成到长春大学，他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对青年的政策；搞学生运动；通过同学搜集蒋匪军的情报。他发展了A、B、C、D四个组：A组组长张智；B组组长陈贵民；C组组长秦宏伦；D组组长秦宏伦兼。这个组织称为“李梦星小组”，他们因为在大学过集体生活，了解同学们的思想表现，所以发展的较多较快。到长春解放时已发展100余人。

2

我是在1947年“六·二”学运后，由沈阳东北大学经长春、吉林进入解放区。到了哈尔滨，经吕天安排，住在南岗的一所幽静的俄人住宅，学习了一段时间，以长春大学学生的身份潜回长春。当时在长春大学里有几百名军校学生在那里复学就读。

我原是军校五期生，1944年末预科毕业后，分配为江上兵科，曾经在哈尔滨江上兵第三团的一期毕业生中尉排长毕福林，二期毕业生少尉排长刘子璋所在的连里担任过队附勤务。那时吕天名吕殿元在江上兵第一团以中尉排长的身份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我对于他只闻名未谈过话，同我一起到解放区的高守维，也是五期生江上兵科，队附勤务时，曾在吕天的那个团。通过高，我认识了吕天。

军校的学生在东北沦陷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投考了伪满的军官学校，在身受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型的武士道精神的军国主义教育之际，感受到征服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尚武精神、艰苦顽强、团结奋斗、服从真理的思想作风日益滋长。第二

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祖国光复之后，同学们为了取得与其它大学同样的复学资格，组织了“北辰同学会”，进行了斗争，终于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承认。在军校时的共同经历，又经过战后斗争的锤炼，军校同学之间的团结互助之风，在当时东北知识青年中是引人注目的。只要是军校的同学，跑到当时军校学生比较多的沈阳东北大学、长春大学、国民党二〇七师、长春警官学校、国民党二总队和四总队，则衣、食、住宿，以至入学、工作都能得到同学们的帮助。

在解放区的同学，因为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懂得了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不似在国统区那样友情高于一切，而常常用警惕的眼光观察人的活动。但是同学之间，还是容易敞开心扉的。

我在城工部填写了《地工人员登记表》，经过学习，接受任务，束装就道。我原来在沈阳东北大学有学籍，是文学院历史系二年级。因为办《三人行》壁报，呼吁同学参加全国的“反内战、反饥饿六·二罢课”，而被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以妨害治安为名，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释放之后，又被学校勒令退学。我同时在长春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还有一个学籍。到了长春，找到了在长大就读的军校五期生崔连仲，很快地办完了复学手续，与王鹏飞、褚遇恒住在一个宿舍。

3

1948年的元旦、春节接连过去，严寒的长春，战云迷漫，形势紧张。中长铁路、吉长铁路都已被切断，听不到火车的汽笛声了。长春西郊的大房身飞机场还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中，是长春唯一通向外界的空中走廊。

长春大学的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去了解放区。仍然留在学校的学生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思想向左转。我很快地与长大的军校同学陈贵民、张智、秦宏伦、梁亦、韩伟结识了。

陈贵民是五期，长大工学院电机系学生。当时正筹划去解放区。此人学习成绩优秀，为人侠胆热肠，办事公道正派，在军校和长大学生中素孚众望。

张智，六期生，法学院学生。在 1947 年 12 月曾与汪静岳（六期）、门枢、王哲、黄兵等人一起去解放区。在五棵树遇见了东北局社会部的张季平，劝说他们仍回长春和国民党斗争。张智等人已经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共有 10 余名成员，但感到人少势单，又不能及时地得到上级的具体领导，亟愿加入其他革命组织。张智是一位嫉恶如仇，勇敢正直的学生。

秦宏伦，七期生，医学院学生。于 1947 年秋曾与安邦梁、赵永年（二人原是建大学生，后入长大）一起去解放区，被前沿地区的我方工作人员劝说返长。1947 年冬经刘育新介绍，安邦梁、秦宏伦参加了长春地下党员徐慎所领导的地下工作。李梦星组成立之际，秦曾向他的上级请示，同意他参加这个组织，便于开展学运工作。这是一个豪放热情、纯真聪敏的青年。已于 1991 年在西安故去。

梁亦，六期生，法学院学生，曾在 1947 年秋去哈尔滨。为人细腻认真，追求真理。于 1990 年故去。

韩伟，四期生，工学院学生，与陈贵民同住一个寝室，原来想同陈结伴去解放区，但未走成。学习刻苦，沉着老练。

以上述几个人为核心，组成了“李梦星组”。李梦星这一化名是为了向上级联系而使用的，以后组织成员多了，就沿用下来，作为整个地工组织的名称。在刚起这个名字之时，无法同上级联系，没有取得上级批准。1948 年 3 月，长春工委成立推进到九台，我出城向杨实人、吕天汇报工作，谈及这个名称，他们也就默许以“李梦星”称呼这个地工组织了。

李梦星组的上述几位核心成员组成核心组推选我为核心组长，下面分 A、B、C、D 四个组，各组组长如前面吕天的回忆录中所提及的。每个组的组长发展的成员一般以 5 人为限，在各组

的英文字头后面缀以1—5的一位阿拉伯数字，核心组以下的各级成员也可以发展5名成员，组长下二级发展的第三阶梯的地工成员符号，在英文字头后面有两位阿拉伯数字，如A25。如此层层发展，阿拉伯数字的位数随之增加。为了防止被破坏，每个地工成员只知道自己的直接上级和自己发展的下级的姓名和代号。不发生横的联系，也不用开会的方式布置工作，执行上下级“双向单线联系”的方法。发展下级地工成员，要经过发展人员的周密考查，把真正能够信得过的人吸收进来。还须将拟被发展者的情况，向自己的上级口头汇报，得到同意。

李梦星组成立之后，核心组拟制了一份《李梦星组工作纲要》①。这个纲领曾油印了50份，在地工成员中秘密传阅，作为工作方针。纲要分析了当时长春的形势，认为：长春目前已经从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桥头堡，变成了欲逃无路，欲守无力的孤岛。摆在长春国民党守军面前，只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起义、投降；一条是城破被歼；再有一条是弃城而逃，但是逃后，仍然难以逃脱在南满平原遭受被歼的命运。提出，长春青年要在解放长春的斗争中，按照共产党的部署，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争取在全市有更多的人与进攻长春的解放军部队合作，站在共产党的一边，消灭敌人。通过各种关系、各个渠道把工作深入到国民党的军队中去，瓦解他们的斗志，鼓励、支持他们个别或集体逃亡、投降、起义。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为围城的解放军部队提供物资、情报和其它有利条件。在敌人一旦弃城出逃时，要组织力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安全。

4

李梦星组建立起来之后，在3月份派人向设在九台的

① 《李梦星组工作纲要》现存于长春市档案馆。

"长春工委"汇报工作，从此时起就直接接受了工委的领导。长春工委的政委是杨实人，吕天为工委的工作人员。

为了加强李梦星组与长春工委的联系，及时取得上级的领导，把搜集到的长春市情报迅速向上报告，建立了三条交通线。

一条是由A组的汪静岳发展的阮守一、郑德沛、刘明德建立的"警察局线"。刘明德是潜伏在国民党市警察局骑巡二分队任分队长的地工人员阮守一的部下。刘出身贫苦，本人忠厚老成。他与警察局保安大队第二大队队长夏芳庭（此人曾在哈尔滨参加过对李兆麟的谋杀事件）相熟。夏在任大队长之前，在八里堡警察分局任分局长，刘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士。夏芳庭看到刘明德为人老实，常常让他为自己的家庭办一些私事，刘都是尽心竭力地办好，深得夏的欢心。阮守一发展了刘明德参加地工之后，经过阮的启蒙教育，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认明了是非正邪。阮守一指示刘明德找夏芳庭，谋到一个保安大队临时福利采买员的职务。由夏芳庭手拿到一张夏的名片，上面由夏亲笔写道："仰新七军、六十军、督察处、警察局见片放行"。当时二大队的驻地在二道河子，要采买就要到市内或市外。去市内，南关大桥卡哨是必经之路。刘明德为了掩护同志出入卡哨，准备了两套警服，一套自己穿，一套交同行之人穿用。利用这条交通线，经常派王哲出去和我独六师、独九师及九台联系。有时将一些已经发生危险的同志，护送出城。

另一条交通线是通过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弹压组少尉组员孙继武建立的。——李梦星组里有两名孙继武，一个是长春大学学生，后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一个是督察处的少尉，解放后改名孙连元，曾是北京郊区畜牧场畜牧师，现已离休。孙继武是B组陈贵民领导的地工人员。他利用督察处军官的特殊身份，骑着摩托车经常在几个卡哨口遛达。那些值勤人员也愿意和他拉关系，每逢他带人进来或出去，都给予方便。地工人员方锦业（是那守田系统的）就是在要遭到被捕之前，孙继武受命将他

护送出长的。有一次我要去九台汇报工作，随身带有情报材料，由孙继武穿便衣，带着“特别通行证”，拿出两支短枪，一支他自用，一支交给我，一直送我到了我军岗哨，我把短枪还给他，他才返回长春。

再有一条是利用新七军第五十六师谍报队队员刘少林的特殊身份建立的。刘少林是我D组的地工成员。他的哥哥刘大权、嫂子王素坤都是地工人员。刘少林经常接受任务护送同志出入卡哨。通过刘少林贿赂五十六师谍报队长索超，弄到了一张谍报证，为地工人员使用。

以上三条交通线是经常使用的，此外，还有偶尔用之的渠道。打到敌六十军五十二师的中尉体育教官我地工王桐，他手中有5套军服，可供篮球队员使用。五十二师有一个排担任南关大桥的守桥任务，逢有人要出南关卡哨，换上军装，王桐在前面领着，对哨兵点点头就过去了。到了南关外八道街另一地工关系杨培庸家换上便衣，再由王桐送到“三不管”地带。

长春工委在1948年3月下旬给李梦星组两项紧急任务：一项是调查工作，要火速了解长春大学的特务分子的情况，把他们的姓名、特征、所属系统、罪恶事实都要查清楚，以免他们混入群众中逃走。要查清敌人把持的公共财产情况，防止敌人在逃窜时隐匿、转移和破坏。另一项任务是开展宣传攻势，散发我军的传单，向人民群众和敌人交代我党的政策，争取群众、给敌人以心理威胁。

李梦星组组织全组的成员全力以赴地开展调查工作和宣传工作。

在完成长春工委交给的调查项目的同时，还做军事情报和其它社会情况的调查。长春工委在布置任务时曾说过：“组织上对长春市的任何情况都感兴趣。”李梦星组的100余名地工同志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搜集几百份各方面的材料，由陈贵民和韩伟夜以继日地整理了3天，写出了两份调查材料，一份是《长春大学

国民党党团分子名单》附《东北青年爱国救乡会名单》(由保密局特务头子项乃光、袁晓轩组织的拟在长春解放后长期潜伏的特务组织);另一份是《国民党党政机关的物资清单》。在4月下旬派人送九台长春工委。其它有价值的材料有:地工邵本荣利用监修防御工事之便,拿到了一份精确的长春市城防碉堡图。国民党新七军六十一师中校被服科长牛信的地工代号为A214,他向组织提供了六十一师的兵力、军械、粮食、服装等调查材料。东北局社会部从哈尔滨派刘唯到长春搜集督察处的全部特务人员的照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孙继武,他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在宣传工作方面,李梦星组建立了几个印刷点。其中一个是通化路秘密印刷所。这所房子的主人刘志光是B组成员。在这里工作的有陈贵民、韩伟、崔赓杨、郑怡等同志。在1948年4月上旬所发动一次宣传攻势所用的宣传品,就是在这里制作的。这个印刷所里有打字机、油印机。打字员是郑怡,她是一位不屈服于社会恶势力的女性,摆脱家庭参加革命。她的打字技术精湛超群,既快又好。好多宣传品都是出自她手。在4月宣传攻势前,李梦星组从九台带回来十几种东北解放军长春地区前线指挥所印制的传单样本,如《告长春市民书》、《告长春工人书》、《告国民党军官兵书》、《告国民党警、宪、特人员书》、《告工商业者书》等。还带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任弼时关于土改纠偏的报告》等小册子。还有从《东北日报》上剪下来的一些革命歌曲。用一周的时间,这个印刷所翻印了5000余份各种传单,几百册各种小册子。为了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威慑敌胆,在印刷技术、铅字选用、纸张色彩、宣传品的装订、剪切等方面都力求精美,使看到宣传品的人感到:这样的传单、小册子肯定是一个组织庞大、领导坚强、力量雄厚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制作的,使敌人感到“四面楚歌”。为了迷惑敌人,李梦星组命令地工成员中长大工学院学生(军校五期生)善于雕刻图章的王若光刻了一颗“东北解放军长春地区前线指挥所”的

关防，刀锋古朴苍劲，庄重有力，同志们戏称他是水浒传108将中的玉臂匠金大坚，王若光曾经为地工组制造的假证件刻过不少图章。将关防印在传单的落款处，益发生色。在撒布传单时，由核心组按照市街地图为各个组划分了行动区域，在一个晚上，在统一时间里，同时动手。事后收集反映，效果甚佳。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街头、巷尾到处都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督察处内的地工人员孙继武报告：督察处的头目被共产党的传单弄得心惊胆颤，暴跳如雷，指示爪牙们要限期破案。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

在长大的农学院和医学院也都有李梦星组的印刷点，它们的规模略小些，是手书、刻钢板、油印。曾经翻印过传单、小册子。曾出刊过油印刊物《前夕》和《红旗周报》。《红旗周报》在长大师生中很受欢迎，一份到手，辗转传递，引得敌人又恨又怕。为了与《红旗周报》对抗，敌人出刊了一份铅印的《反红旗周报》，却被人们冷落，没有人理睬他们的谎言。在长春大学的宣传阵地，在1948年3月以后，完全由我们和其它系统的地工占领着。

李梦星组组织一些人做策反工作。在3月份，当六十军弃守吉林，逃奔长春之后，长春市国民党守军军心更为动荡不稳。李梦星组指示陈贵民通过过去的军校同学宋传富做新七军五十六师驻守绿园防地的团长王景发的工作，王曾经是宋在军校学习时的区队长，和宋为师生之谊，宋向他所作的坦率忠告，不致被王怀疑有歹意，也不致被王出卖。可惜由于王景发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未能成事。

已经在国民党部队、警察局中任职的地工人员牛信、孙运礼（六十军秘书处长）、王桐、刘少林（新七军五十六师谍报员）、阮守一（警察局骑巡队二分队长）、郑德沛（警察局一分局警官），除了利用各自的特殊身份，开展组织交给的任务之外，都待机而动。又派张智、邵本荣、张贵实、焦文等打入幼年学兵团。史文超、万素云、冯素森打入新七军宣传队，一方面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

作瓦解敌军的工作。

1948 年 6 月李梦星组派人向警察局驻长春大学派出所所长宣世铎进行工作，吸收他参加了地工小组。这个派出所一共有 20 几名警察，20 几支长、短枪。这个派出所除担负一般的派出所的任务外，还要拿出很大的力量来监视长大的学生、教职员工宿舍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政治情况。这个派出所秘密转向以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失去了一个重要耳目。

5

李梦星组的 A 组成员张智、汪静岳、王哲应围城部队独六师、独九师的要求，经常向他们提供军事情报，推荐干部、医药用品和一些机械、仪器。主持东三马路基督教堂的徐棠清牧师是张智领导下的 A 组成员，他的家和教堂成了我们的地下兵站。有许多物品都是经徐牧师保存在教堂里，再找机会运出城去。先后为独九师购买过柴油发电机、高音喇叭、电线，宣传队用的手风琴，小件物品如学习、文娱用的铅笔、排球等物品。独九师的师报缺少编辑人员，独九师的廖师长、政委钟明向李梦星组提出，希望给他们介绍干部，于是推荐了地工人员长大的学生侯笠夫、门枢到独九师工作。他们参军后，随军入关转战南北，在部队的熔炉里锻炼成长，工作表现突出，以后都参加了共产党。

在 1948 年的 8 月份，长大有 300 余名师生，由于在长春难以继续生活和学习，拟以“迁校”的名义离开长春，李梦星组研究，这一部分长大的师生，是建设新中国的宝贵人才，不能让国民党把他们骗到关内去，再到处流浪，为国民党殉葬。在这批学生出卡哨的前夕，李梦星组派王哲到独六师阵地，与邓师长及政委钟人仿联系，研究如何争取并妥善安置这些知识份子。经钟人仿用电话请示兵团政委肖华。肖十分关心这批学生的命运。他嘱咐，要说服这些人留在解放区，然后全部护送到吉林市的东北大学安置学习（即东北师大的前身)。第二天 300 余名学生在我地工人员刘

志光的带领下，到达我军阵地，受到我前方部队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在取得了这些学生教职员的同意后，被送往吉林。后来这批人都成为革命的干部和教师。

长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在这个城市中所犯下的血腥罪行，在东北蒋管区各大中城市中是最严重的。就在 1948 年 10 月 17 日，长春即将解放之际，督察处将在牢房中监禁的 48 人一齐杀害。仅自 1948 年 4 月至长春解放为止，被督察处秘密处死的就有 200 余名，被滥行逮捕的有 500 余人。

面对这些近似疯狂的特务们，李梦星组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经常从孙继武、阮守一、郑德沛、宣世铎处了解敌人的动向，以安排对策。

1948 年 4 月 24 日下午 3 时，督察处少尉孙继武象往常一样，从外面值勤回来。看见中校督察主任陈寿岚的办公室门开着。陈瞥见孙的身形，招呼他进来，孙继武应声入室。陈示意他把门带上，自己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低头看什么东西。忽地把头抬起来看了看孙继武问道："你吃过了晚饭吗？"孙答道："我刚值勤回来，时间早，还未用饭。""你现在回去吃饭，饭后仍然回来！""有事吗？"陈寿岚冷笑着伸出右手在空中抓了一下说："晚上去长春大学！"孙继武心里一惊。表面上装做漫不为意的样子，低声说："是！"转身出室。孙继武当时急于要把这个重要情报汇报给地工组织。一个办法是用电话找到自己的直接领导人陈贵民，把敌人要去长大抓人的情报告诉他，但是在电话里不能讲，要把陈叫出来，如果用电话找不到人，就得让老婆去跑一趟。自己是不能去的，因为在长大有个伪装成学生的少校督察处特务卢春印认识自己。自己去被他或者他手下的腿子碰见，就要坏事。他向学生宿舍挂了电话，幸而陈贵民在。半小时后陈贵民赶到孙继武家中。陈贵民告诉他："这个情报十分重要，我马上向核心组汇报，你在参加敌人的搜捕活动中，要想方设法多掩护、解救一些人。"

核心组听了汇报后决定：凡是平素有可能被敌人注意的同志，要在晚饭后撤出长大，先在市内隐蔽起来，等待组织去人联系；凡是自信没有暴露的同志要留在宿舍里，不要躲开，以免敌人生疑；所有地工人员要清理身边物品，不要使敌人发现任何证据。对自己比较熟悉的进步同学，虽然不是李梦星组的地工同志，也要秘密警告。

危险的信号，在长大火急传开。有关人员都做好了“应急准备”，一部分同志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长大消失了。

孙继武吃过晚饭后，到督察处待命。到天色全黑了，还没有动静。他捉摸难道情况有变？一直到23点，警备司令部的一辆汽车开进院里，走出两名军官，随后又来了由宪兵队率领的20几名宪兵，警察局刑警队长带来了20几名刑警。又来了一些身穿便衣的保密局北满站和中统的人物。一些负责的人物上楼到处长室密谈，其他人在院里待命。大家都是熟人，相互耳语，打听今天有什么举动。可是都耸耸肩，表示不知道。24点，楼下会议室灯光大亮，头目们到会议室开会，约莫半小时后，会议结束，命令集合。由督察处长张国卿训话：“今天去长春大学搜捕，分7个组。有名单的组要按名单抓人，在册的，一名也不准跑掉。证件与本人不符的，没有证件的，抓。有可疑物品，行动可疑者，抓！”

孙继武被分到教职员宿舍组，为组长，配属一名宪兵，两名警察为组员。

由中校情报科长董顺球分发黑名单，有5个组有名单，孙和另外一个组没有名单。因为这次上了黑名单的都是学生。

4月25日凌晨1点30分，特务们到达长大。这时长大已经由新七军六十一师的一个营团团包围，实行戒严，只准进入，不准出去。

孙继武在搜查过程中，那名宪兵看到一个教师的书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文选》，拿起来向孙报告：“这个人是可疑分子！”孙向那位教师要过证件看了一看，对那个宪兵说：“他们教书的，什

么书都得看，这本书算不了什么。”把这个人放过去了。

拂晓5点左右，搜查、逮捕结束，抓来的人都被推推搡搡带上卡车，约有七八十名（事后核心组核实，共逮捕97名）。孙继武逐个看面孔，判明其中没有他认识的李梦星组的几名同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组中的督察处的人都在发牢骚：“名单上的一名也未见到，真是怪事，都抓些可疑份子管什么用?”孙继武也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6

李梦星组在小学教育界的一支地工队伍，在1948年5月组织了长春市小学教师的罢教运动。

3月9日国民党六十军从吉林撤退到长春，解放军又切断了长春市的交通。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教育局长佟贵廷眼看长春已陷入绝境，没有心思再管小学教育了，萦回在脑子里的只是个人的安危。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给小学教员发工薪，何时发薪，杳无消息。

小学教师中的地工人员郑维翰、李森昌、赵维珍向李梦星组核心组提出：在小学教师中，已欠薪两个月，怨声载道，应当利用这个时机，开展一次罢教活动。核心小组分析各方面情况后，遂同意了郑、李的要求。

从4月中旬开始郑维翰（文庙小学校长）、李森昌（文庙小学教导主任）、钟殿祥（地工、正光小学校长），在各校师生中秘密串连，组织了“小学教师联谊会”，酝酿罢教工作。

长春市南关有一所盲人学校——光明学校，校长周茂林，盲人，是李梦星组地工人员。他过去为了换取一口饭吃，曾经学会“奇门遁甲”、“六爻神课”等卜筮之术。他自己不信这个，也不教给盲生。他说：应当教给这些不幸的失明的孩子们一些对社会有用的真正本领，不能误人子弟。周茂林是一个老长春，在伪满曾经在长春的大旅馆中开房间，设卦室，为伪满的大汉奸军事部大

臣于琛澂等人算过卦，当时皆以神卦誉之。光复之后，虽然不再操旧业，但是仍然声振遐迩，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特别是他们的太太、小姐们常来用车接去问卜，被敬若神明。周茂林在算卦中了解到不少重要情报。在地工组织中郑维翰是周茂林的上级，郑把发动小学教师罢课的计划告诉了周，并交给他一个任务，让周在接近国民党上层人物和他们的家属时，造舆论，争取这些人对小学教师处境的同情。每逢周茂林在给这些人卜卦时，就把话题引到因为当局不给小学教师发薪，他们在饥饿难耐下，不得不罢教的事。有的人听了不表态度，有的唏嘘嗟叹深表同情，尤其是那些官太太们心更软些，也骂当局糊涂。

郑维翰等人，有时就在光明学校的天棚上开会。郑维翰的校长办公室，成为"小学教师联谊会"的会议室。

罢课之前，先提出两个条件：1. 要求提高工资。物价飞涨，工资不能维持温饱，无法枵腹从教，要求与政府机关人员同等待遇；2. 不能拖欠工资，要按时发放。要求条件送到了市政府，得不到答复，遂从5月4日开始宣布罢教。头一天，各校的教师在上最后一课时，向学生们沉痛地说：不是老师要荒废大家的学业，是当局不给老师发工资，教师们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一大家子人，没有工资就断绝了生路，只好停课，另外去想点营生赚钱糊口。一番话，把大一点的孩子都说哭了。

罢课后，教育局长佟贵廷把教师联谊会的10几个委员找到局长室，在他的身旁还坐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二人逼令开课。穿军装的还掏出手枪放在桌子上，摆出一副凶相。大家早有思想准备，并没有屈服，无结果而散。罢教持续了几天，社会上的舆论对市政府很不利。国民党当局怕惹起各界的连锁反应，无奈从军队的给养中拨出一些粮食，分给小学教师，缓和一下矛盾。

李梦星组核心组为了不使罢教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受到伤害，在收到罢教的效果后，指示郑维翰、李森昌等暂时复课。

但是佟贵廷这口气总是难咽的，后来开除了郑维翰、李森昌

等 13 名教员。把永长、东四两校的校长发配到郊区小学。把这些人说成是“灰色分子”，不利于“戡乱”。

到 9 月份，督察处更为疯狂，肆意捕人。郑维翰、李森昌等同志如继续留在长春将有危险。李梦星组将郑维翰等 40 几名罢教的积极分子送往解放区。

7

1948 年 3 月，长春国民党守军为了补充缺额，提出要“松北联中”学生充军。消息传到这些年仅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的耳中，都群情激愤，表示坚决反对，在学校举行各种抗议活动，派人向长春大学提出请求，希望大学的大哥、大姐们伸出援助之手。李梦星组认为反对强迫中学生当炮灰是一场正义的斗争，我们应积极领导。当时定了几条：1. 要求长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大会讨论支援联中学生反对强迫当兵问题；2. 在会上由向群（地工成员，当时名王仑）作主旨发言，揭发和分析这一阴谋的反动实质；3. 广泛宣传，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同学和市民的同情和支持；4. 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长大的一些进步学生与李梦星组的同志一道强烈要求立即召开学生大会，讨论支援松北联中议案。长大学生自治会在 3 月 5 日上午在第三宿舍门前召开了全校学生紧急大会。虽然正是春寒料峭，冷气袭人季节，有上千名同学来参加大会，会上情绪热烈，发言踊跃。一致表示要坚决支持松北联中的弟弟、妹妹们的正义行为。向群同志在会场情绪高涨时，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篇义正辞严，有声有色的鼓动讲话，把全场的义愤气氛推向高潮，博得全场同学的热烈掌声。大会按照向群的发言中建议，立即上街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从自由大路出发沿同志街到桂林路，然后折回学校。为了避免遭到当局的镇压，减少不必要的流血，李梦星组决定，游行路线不必太长，使当局来不及调兵堵截，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在宣传上达到目的，就可以有利有节地收场。游行队伍在途中高呼口号，沿途市民围观如堵，深表同情。

大会游行的第二天，从敌人的内部获悉，长大的特务学生未能阻止住这次集会、游行，在愤怒之余，就向督察处汇报，要求逮捕向群，认定他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煽动者。接着，就发现特务们在长大宿舍附近加紧活动，在那一带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徘徊，夜间有警车奔来驰去。

李梦星组在声援联中学生事件的一开始，就对事件可能发生的趋势作过分析，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并早即拟出在必要时安排向群撤回解放区的计划。在中共长春工委的指示中，一贯要求工作要胆大与心细相结合，不准粗心、盲动，避免可能防止的牺牲。我们先将向群隐藏起来，观察事态的变化。风声越来越紧了，才不得不将向群护送去九台。迫于舆论，国民党当局感到众怒难犯，只好打消了强迫中学生当兵的阴谋。

8

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医院，在国民党占领长春之时是长春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集中了一批在医学上比较有造诣的专家、教授，例如孟宪民、阎国来都在这里工作。这个医院的医疗器械、设备在当时是上等的。国民党军当局对这批优秀人材和精良设备垂涎已久，当解放军合围长春，就宣布把这所医院改做军医院。李梦星组在长大医学院和这所医院的地工同志有C组的秦宏伦、杨世华、李增林、时常仁、刚葆琦和A组的王哲、王悬等。他们为粉碎敌人的如意算盘，与敌人展开了斗争。

地工同志们个别地向这些教授们做工作，向他们宣传革命形势，讲解共产党的政策。经常给他们看一些小册子、传单等宣传材料。和他们交朋友、谈心。不久，这些人都在思想上靠近了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政策，“身在曹营心在汉”了。经过地工同志的介绍、护送，一些人陆续去了解放区。他们有的留在部队里作了军医，以后随军人关南下，有的被介绍到吉林市，先在

医院工作，长春解放以后，有一部分同志回到长春军医大学（白求恩医大的前身）任教。教授出走的情况愈演愈烈，当局大为恼怒，派人监视未走的人，在医院门口设置岗哨。这些愚蠢的作法，是无法看住人们的心的。

这些医务人员出走时，大都是经我地工人员安排，尽可能都能随身携带一些便于拿走的器械。对于当时药品、器材缺少的解放区，无异于雪中送炭。有些体积比较大的器械，则由地工人员帮助偷运出院，先放在市内寄存。

王哲和王悬二同志曾经秘密运出 4 台德国制造的高倍数的显微镜，在当时这是稀有的贵重仪器。将这些仪器分散藏在东三马路基督教堂徐棠清、精一齿科医院高精一等人处。在解放后，李梦星组将其上交给中共长春市委。

9

1948 年 10 月 17 日曾泽生将军率六十军起义，19 日新七军投城，这所多灾多难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我于 1948 年 7 月代表李梦星组去九台汇报工作，暂留解放区。长春的工作由陈贵民、张智负责领导。

1948 年 10 月 20 日我随长春工委工作队入城，与留在长春的陈贵民、张智、汪静岳、王哲、阮守一、韩伟等同志会合。核心组的另外两名成员秦宏伦、梁亦因有危险，已撤离长春。坚持在这座孤城与疯狂的敌特作殊死搏斗的同志有：陈贵民、张智、汪静岳、韩伟、阮守一、郑德沛、苏钧（以上几位都是“军校”同学），邵本荣、刘明德、孙继武、牛信、万赞、万素云（女）、郑怡（女）、史文超（女）等同志。吕天同志也随长春工委入城，他立即去看望这些冒险吃苦、坚守阵地的同志，并送去一些高粱米。吕天请这些同志每人写了一份自传，补填了《地工人员登记表》。对他们表示慰勉。10 月底被任命为中共长春市委组织部长、原长

春工委政委的杨实人找一部分李梦星组地工同志谈话。然后将李天成、陈贵民、张智、汪静岳、王哲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工作团（共青团市委前身）工作。接着又将阮守一、刘明德、万素云、史文超也分配到青年工作团。将邵本荣分配到长春铁路局，牛信派往解放军军需第四局，万赞派往教育部门，郑怡派在科研部门，孙继武回北京。愿意去学习的同志去东北大学就读。

李梦星组中的大多数同志在我军围困长春期间，因工作任务、饥饿所迫等原因经过组织允许，到解放区去参军、工作、学习。整个组织到底曾经发展了多少同志，其中有多少“军校”学生，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准确的统计。由于多种原因，解放后的几年中这一工作也没能系统地去做。改革开放以来，宽松的政治气氛，使我们有机会与老战友们联系。经过几年时间，分头联络，现在掌握李梦星组的人数约在一二百人左右。

根据我、张智、秦宏伦、汪静岳、王哲等几位的工作，可统计出李梦星组的成员有以下 141 位同志。

李天成/陈贵民/张智/秦宏伦/梁　亦/韩　伟/汪静岳/王　哲/胡吉成/金宝良/王树中/张国梁/崔秀玉/邢宏道/杨壬武/刘德明/裴尚义/郭稚（女）/李福田/张少伦/杜明兰（女）/刘健（女）/任鸿琦/李增林/郑维翰/李森昌/钟殿祥/周茂林/车成栋/郭林祥/许为全/刘大全/王素坤（女）/刘少林/孙继武/孙继武（现名孙连元）/于学仁/吴　琛/牛　信/王健众/孙承文/杨兴俊/王　悬/迟焕章/王向群/刘学泽/黄化民/邢　波/黄　兵/徐棠清/李瑞文/王若光/石维奎/吕忠良/毛宪智/刘　颖/陈道生/李长华/苏　钧/唐国英/高　洁/齐庆慈/刘雅祥/张　慧/隋圣哲/战治国/吴庆昶/张庆文/赵维珍（女）/刘中立/郑怡（女）/崔赓扬/宣世铎/于庆新/史文超（女）/徐淑（女）/王　桐/杨世华/曹子明/辛　钧/王仁廷/门　枢/张家骥/赵明申/焦　文/刘绍棠/刘明德/阮守一/郑德沛/王承昌/侯笠夫/邵本荣/张贵实/孙志儒（女）/万　赞/万素云（女）/冯素森（女）/刘志光/韩志诚/曹洪良/孙继本/富润福/李树森/李兴春/孙运礼/张希哲/李天骥/葛玉斌/刘景风/宫树滋/时常仁/刚宝琦/程润田/李吉甫/王兆宇/王唯俭/王唯廉/李　桢/王国政/刘天瑞/李恩淳/程茂林/侯仲枢/黄仲洪/王佐/张炬/铃木小兵卫（日本人，长大农学院教授，曾为日共产党员）/王泽汶/宋健鹏/傅　毅/解　明/谢　斌/吴涵水/王敬远/董桂生/黄世忠/孟昭华/张志超/关明远/夏

国珍/孙汇及①

（作者为军校五期生，离休前为长春市卫生局副局长）

---

① 名单顺序按搜集先后排列。有不准与遗漏请谅解。

最难忘的时刻

张　智

我生长在辽宁省凤城县一个有百多垧地的土地主家庭。1944 年 1 月由丹东的一所中学考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1947 年 12 月踏上革命路，成为活动在敌人心脏中，既危险而又光荣的一名地下工作者，直到长春回到人民手里。在我看来，1947 年 12 月至 1948 年 10 月长春解放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走上革命路

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又受过敌伪教育，正统观念很强的青年是怎样走上革命路的呢？

是严酷的现实生活，是党的雨露阳光，使我走上了革命路。

1946 年 11 月，我进入刚诞生的国立长春大学。入学前，我曾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逗留过。那里的美军卡车在我们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根本不顾及中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危，他们借酒恣意拳砸商店的大灯泡，受害的中国人既不敢言又不敢怒，美军军官臂挟中国女人随意进出商场舞

厅，把中国女人当成他们手中的玩物；国民党、三青团一是拉夫、二是搞裙带关系，贪污腐化互相倾轧……所有种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大学校园里，我认识的一个姓王的学生，身为国民党党员，却公然在大学学生宿舍里与妓女同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此，我心中无比愤怒。一天晚上，我正在四舍后边的二层楼上与同学闲聊，猛听得西边小楼下传出骇人的叫声，第二天早晨，我看到了人们从宿舍地板下拖出了被勒死的同学冯君的尸体，这个同学一方面在大学读书，一方面在铁路任职。他平时有些积蓄，在货币膨胀的情况下，为了保险，他把钱换成金银两种手镯，套在自己的双臂上，以为这样做就万无一失了。想不到，这并没有瞒过他的同窗好友林某，林某图财害命，将他勒死而后逃走。耳闻目睹在国统区最高学府里发生的这些千奇百怪的现状，我心中的正统观念动摇了。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准学生读进步书籍，而进步书籍却在同学们中间秘密传递着，如波涛汹涌，势不可挡。记得，那时候，那守田、胡越民等伪满军校同学就给我不少书看。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范政的《夏红秋》等等。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他们把书藏在宿舍寝室门外镶在墙里的垃圾箱里，用时悄悄取出来，读完再秘密放回去。书使我大开脑筋，认识到有剥削、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而这反抗便是革命，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一边，为推翻万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奋斗是光荣的。

与传播进步书籍同时，在长春大学校园里，还不时地有各种中外进步歌曲在传唱。我们同学中最卖力气传唱这种歌曲的，就是伪满军校同期同学梁亦。这些歌曲真实通俗，边记边唱，发人深思，扣人心弦。如外国歌曲《老黑奴》，我们很爱唱，唱着唱着，便情不自禁地进入老黑奴的遭遇之中。有一首歌，至今我还会哼

唱，它的歌词是："生活象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我们天天被人剥削，这是最后的斗争！"另如《人力车夫之歌》直接了当地喊出："我们也是人呀，也由娘生下呀，并非是猪狗，并非是牛马，我们也要做个人哪，哪能永远给人当牛马！"我们还常唱救亡歌，游击队员之歌……这些歌曲使我们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不平，它们不啻是一颗颗火种，在人们胸中，点燃起斗争的怒火，鼓舞人们向旧社会冲击！

1947 年 10 月的一天，胡越民，朱安找我，向我说，他们的组织暴露了，需要马上离开长春，让我帮助他们收拾一下东西。我根据胡越民的意愿，给他改了学生证的姓名，他们迅速地走了。

后来才知道，以那守田为首的由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吉北联络处领导的地下组织有两个小组，其成员除胡、朱二人外，还有叶文华、那文铎、朱德训、杜仲舒等人都是伪满军校同学。因为他们的地工成员名单被敌人发现了，他们才不得已而出走了。

他们走了，对我是个极大的触动，极大的鞭策，他们的走，说明他们早已参加革命斗争了，他们走在前面了，而我却落后了。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我暗暗下决心，从思想到行动，都要站到革命一边来。

出走的胡越民同学当天在长春站被捕，关进了杀人魔窟督察处。我的同学李君超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买了些吃的东西，邀我和他一起到督察处，去探望被监禁的胡越民。我们来到了督察处收发室向他们说明来意，他们说什么也不允许我们和胡越民见面，但东西，他们却高高兴兴地留下了。现在想来，我们去探监，带有极大的冒险性，说明当时我们的头脑太天真、太简单。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特务怎么可能允许我们和在他们看来是赤色分子的胡越民见上一面呢。

水到渠成，同年 12 月，我、汪静岳、王哲、门积昌（门枢）、刘信潮（黄兵）一行五人，终于离开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区长春，踏上北上的革命的征程。

回到长春来

我们一行五人到了九台，接待我们的是县民运科长江含同志，他三十来岁，待人真诚亲切，我们一见如故。他听我们述说了来意后，立即劝我们回到长春去，要我们就地闹革命，为解放长春奋斗。我们说，既已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他看我们去意坚决，给我们拿了不少东北流通券做路费，让我们继续北上。他亲自送我们到屋外，热情地向我们说："走不通，再回来！"这位年轻、热情的干部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时火车已经不通，我们几个只好步行，遇到狗拉的爬犁，我们雇上一台，几个人坐上去，迎着呼呼的大风雪，向北驰去。天，是冷的，而我们的心却是热的，离开国统区到解放区来，接触的第一个干部便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好的印象，我们的心怎么能平静呢。

12月3日，我们越过松花江来到江北的五棵树镇。刚在旅店住下来，榆树县公安局的干部便前来找我们谈话。以局长身份出现，实际是东北局社会部的张吉平同志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后，反复地向我们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的任务，动员我们回到长春去，为党做地下工作。他说："你们不是要革命吗？对各位来说最好的革命岗位就在长春。你们回去，人地两熟，比我们派人去，要强很多！"我们被说服了，同意回到长春去。他帮助我们制订了纲领：把进步同学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利用读书会等形式，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调查和瓦解敌人的有生力量……他给我们确定了组织名称：《新民主主义研究会》。让我们到长春站稳脚跟之后再回来汇报工作。他还和我们一起照了纪念像。我们每个人都按他的要求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了自传，履行了参加革命手续。

12月8日，我们顺利地潜回了长春，先住在校外，并派人前去长春大学宿舍找熟悉的辽宁同学唐国英，探问此时回校是否安全？派出的人回来说，返校没有问题，我们便先后回到了长春大

学宿舍。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分头发展组织。我先后将苏钧、唐国英、高洁、刘雅祥等可靠的同学或同乡，吸收为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与此同时，汪静岳将向群、刘学泽、王悬、黄化民、侯仲舒、阮守一、郑德沛等发展为会员。随后和汪静岳等研究，在大学里建立了共进读书会，利用课余时间，学俄语、交流读进步书的心得等。我和汪静岳、门枢等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成员，通过这一形式，了解和团结了不少同学。

我们已经在长春大学站稳了脚跟，我们的组织由于吸收了新鲜血液，也已壮大起来。这时候，我们先后派出两名同志，让他们到解放区找张吉平汇报请示工作。他们去了，但没有按时回来。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我们都是有热血、正义感极强的青年。我们强烈希望有人来具体指导我们的工作。但就是苦于与领导联系不上。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情绪虽没有低落，但不能及时找到领导，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

参加李梦星组

1947 年末，东北局城工部将李天成同志派来长春。他是伪满军校五期同学。他在长春大学住下来，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摸清了长春大学的教职员工、特别是学生的思想状况。于 1948 年初，通过伪满军校同期同学梁亦找到我，研究如何组织起来，开展地下斗争，配合解放军，争取早一天解放长春问题。

在我们的成员徐棠清牧师的协助和掩护下，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几位主要成员聚集在教会后院的一所小屋里，共同研究了下一步工作的安排。汪静岳、王哲和我考虑到：一是联合起来力量大，二是便于统一领导，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因而欣然同意与李天成同志联合，在东北局城工部吕天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开展地下工作。这个统一起来的组织便是李梦星组。其核心组由李天成、陈贵民、韩伟、梁亦、秦宏伦和我组成。李天成是总负责人。全都是伪满军校同学。核心组下设 A、B、C、D 四个组。我是 A

组负责人。作为A，我上对核心组负责，下与毛宪智、苏钧、王健众、汪静岳、邵本荣联系。前四人也都是伪满军校同学。

这个组的行动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具体工作分为组织、调查、宣传三项。组织是指把思想进步、敢于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斗争的进步同学和社会人士发展成为我们的成员；宣传是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我党我军政策，教育争取群众，瓦解敌人的有生力量；调查是指利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尽自己所能，调查在长春的敌军、警、宪、特情况，及时上报。

由于纲领明确，领导及时，A组在原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基础上，迅速壮大，健全起来。成员中伪满军校出身的长春大学学生占多数。还有大中小学教员、中学生、牧师、伪军官、伪警察等。在核心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开展宣传攻势

在核心组统一部署的宣传攻势中，我们按规定将《告长春市民书》、《告国民党军官兵书》、《告国民党警宪特人员书》、《告在长日本人书》（日文）等传单散发到机关、学校、军营甚至妓院中去。为了撒传单，经苏钧发展的新七军六十一师中校军需官牛信利用夜半时分，沿着国民党官兵早操经过的大街每走十几米，便哈腰将十几张传单放到路旁人行道上，用随手拾来的砖瓦石块压牢，以便让国民党官兵看得到。一位高级军官能如此认真地对待秘密宣传工作，委实令人为之感动。在市政府公用局工作的吴琛，在接到王泽汶给他的传单后利用下班后大楼无人的机会，将传单一一放进每个办公室门上的投信口，从一楼到四楼几乎每一个办公室都不拉。第二天，市政府大楼热闹了，人们说："共产党进了市府大楼。"头头们未敢张扬此事，但却迅速下令封死了每一个投信口。邵本荣将传单撒到军营后，过一阵再返回来，看看军营里的官兵对传单有什么反映。他的这种负责精神，实在值得学习。穿着警服的阮守一、郑德沛装做夜间巡逻的样子，在自己分担的区

域贴传单，有时他们干脆将传单贴到派出所门前的布告板上。我们这样做，又怎能不使敌人心惊肉跳、如临大敌呢？

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大学里不少人读到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我们办的油印刊物《前夕》、《红旗周报》。在《前夕》上侯笠夫、门枢等化名编写介绍国际国内形势等，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的文章，我为该刊写"前言"。在核心组领导下，侯、门办的《红旗周报》（油印），在师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敌人见大势不妙，于是指派专人办了个铅印的《反红旗周报》，妄图消除《红旗周报》在群众中产生的积极影响。但群众不买他们的帐，《反红旗周报》，装在他们人的皮包里，发不出去，因为真理不在他们手里。我们就是这样变着招儿，一次次地开展着对敌宣传攻势，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

校内斗争

1948 年的"三·八"节即将来临，这是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最好时机。而长春大学校园内却是一片静悄悄，连点要纪念它的迹象都没有。我和苏钧商量，认为应当有所行动，促使学校的女同学自己行动起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共同研究，以男同学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三·八"节前致女同学的信。内容大致是："三·八"妇女节快到了，这是女同胞自己的节日，是个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大好时机。长春大学的女同学应当站在妇女运动的前列，主动纪念这个节日，以提高妇女在全社会的政治地位，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纪念方法很多，可以集会纪念，也可以张贴标语，表明女大学生自己的态度。我们偷偷将信投给有学生会理事刘运珍居住的那个寝室。

"三·八"节当天，女同学果然在校内的砖墙和电杆上贴出了不少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主张男女平等，要求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标语。可恨的是，在她们的标语旁边，同时出现了用"铁血除奸团"名义贴出的"要求妇女解放就是老太婆造反"等诬蔑妇女运动的反动标语。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举

动，只能激起进步同学对以各种名堂出现的特务坏蛋们的仇恨。

1948年6月，由于国民党大打内战，长春大学学生和长春市人民一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饥饿状态之中。端午节当天，传来了学校当局正在会餐的消息，同学们听到后非常气愤。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刘敬天(伪满军官学校四期生)。他根据同学们的要求，要召开学生大会，研究出个对策来。李梦星组事先经过研究定下以群众身份参加，但不许轻举妄动，避免暴露的方针。我把这一方针口头传达下去后，便参加了在自由大路上召开的学生大会。刘敬天站在高台上，向到会的几百名同学说："我们正在挨饿，而学校当局却在搞什么端午节会餐，大伙说应不应该?我们该怎么办?"不少同学高喊："找他们去，和他们说理，让他们给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对！现在我们就找他们去!"于是，刘敬天带领这长长的队伍，经过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了建政路北的黄如今校长公馆，黄校长公馆在一所用砖围起的小院内，是日本式的小平房，门向北开。同学们冲进房屋，先将训导处主任史介民拉到院子来，当众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扯下了他的校徽，没收了他的职员证，限令他立即滚出长春大学校园。史介民吓得一门儿说："我有罪！我有罪!"随后同学们又把学校三青团主任、反动教授谢恕拉了出来，不知是谁，动作迅速地将一只痰盂扣到他的头上，就在他看不清周围都是谁的当口，愤怒的同学们一齐拥上来，有的拳打，有的脚踢，旋即将他打翻在地，打得他头破血流，气息奄奄，活象一条死狗。这时候，有几个反动学生张罗着要往外打电话，找军警前来镇压，可是电话打不通。原来电话线被我们的同志杨兴俊掐断，他一进院就瞅准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掐了电话线，造成了内外隔绝，有利于斗争的良好机会。

最后，由学校的总务长孙亚民出面讲话，答应给同学们解决吃饭问题，一场反饥饿，反学校训导处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斗争中，广大同学出气了，我的同学张绍平乘兴当夜写了一张大字报，题名为：《在民主铁拳下，长大二奸俯首》，大

字报赞扬了同学们对邪恶势力的反抗精神，对这场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写好，便放到了自由大路北侧的人行道上，四角用砖头压起来。第二天早晨，不少同学前来看这张大字报，都说，打谢恕、赶训导长大快人心！

不幸的是，不久，带领同学们胜利地开展了这场斗争的学生会主席刘敬天便被捕了，至今生死不明！

千方百计摸清敌情

按行动纲领的规定，我们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调查，通过调查把军事情报和社会情况拿到手，及时交给上级。我们的成员大多数是学生搞调查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们都根据自身条件，千方百计投到这一斗争中来。邵本荣做为学工的高年级大学生曾参加过长春市内碉堡的设计和监造工作，他巧妙地将一份原设计图留藏下来，交给了组织。1948 年 8 月，我和邵本荣送两位同志去解放区，见到了包围长春的独九师参谋张仁同志，根据部队的需要，邵本荣当场为解放军绘制了一幅长春市伪军碉堡位置示意图，交给了张仁。我们的成员、新七军六十一师中校军需官牛信在接到调查任务后，走访了新七军所属的三十八师、五十六师、辎重营、重炮营……用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绘制了长春守军略图，并将兵力部署、军械粮服等详细情况，一一填写进去，交给了组织。

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春守军的防务，时有变化。牛信感到，让解放军随时掌握敌情，是自己的一项光荣职责。于是，他利用手中李鸿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以巡防为名，常常夜间外出活动，将掌握到的国民党守军防务的变化，包括兵力的调动，弹药的储备，阵地的增设以及口令、信号的变更等重要军事情报，上报给上级。

这时候，在长春外围，我党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长春的接收工作，城工部领导说："凡是长春市的情况，包括工厂方面的材料，不论大小，不论哪方面的，我们都需要，都要尽快弄到手，交上来，以便着手研究接管长春市的工作。……"牛信根据上边的部

署，驱车来到了四道街的长春市商务会。他向收发室的人说：“我是六十一师师部的，让你们会长前来见我！”会长一见是他，忙说：“大驾光临，有何贵干，请吩咐！”他板起面孔，严肃地说：“驻军需要掌握全市工厂的情况，把这方面的材料拿来我看！”会长乖乖地命人将全市有关工厂的统计报表捧来，交给了他。回到家，铺开纸，一字字抄起来。看到上边有工厂名称、厂长姓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工人人数、生产能力、库存储备等项，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他心中高兴极了。心想，这份材料，对人民政府接管长春，肯定是有价值的，真是不虚此行啊！就这样，牛信为获得敌情，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一位同学的哥哥杨荫东，在市政府当小职员，我找到他，说明了我们需要有关长春市的一些材料。他根据我的要求，把他负责保管的长春市民自然情况统计表秘密带回家来，我到他家，将材料仔细抄了一份，交给了组织。汪静岳根据上级指示打进市政府总务科之后，将长春市政府所有人员的名单，抄了一份，交了上来。吴琛提供的长春市政府主要人员花名册，包括市长、各局局长的姓名、年龄以及家庭住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A 组同志的调查材料都是经我手转给上级的。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为完成调查任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遗憾的是，我无法将同志们做出的贡献，都一一记录下来。

急解放军之所急

我们的成员能及时地将部队所需要的军事情报送出城去，这自然是最好的“急解放军之所急”了。但在白色恐怖下，我们所做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我们中的王哲同志早与围城的我独九师等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部队急需什么，我们能及时知道。我们的原则是，部队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只要部队提出来，我们就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它。独九师提出要几名干部，我们就将门枢、侯笠夫、刘雅祥、张慧等先后介绍给他们。门枢、侯笠夫在部队工作了好长时间，才转业到地方来。独九师提出为了做好对敌宣传，需要发动机和万能表，我们便四

处奔走掏弄这两件器械。我们在西五马路买到了发动机，我和汪静岳、王哲在身着警服的阮守一、郑德沛的掩护下，将发动机用手推车运到阮守一家，而后将它藏在行李车里，以几位亲属怕挨饿不得不出卡哨为名，将它随车运出城，送给了独九师。万能表是我们的一位同志贡献出来的。孙继武同志将它放到行李车里，在有着公开警察身份的刘明德同志掩护下，带出城的。我们还给独九师送去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以及手风琴、曼德林、排球、铅笔等文体用品。总之，只要我们的解放军提出来，我们就一定想方设法，突破重重困难去完成它。每当完成一次任务，我们的心里就增加一分愉悦。我们为能在白色恐怖下，为我们的解放军做点事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欣慰。

临近解放前夕，我们又增加了一项保护好国家财产的任务。国民党新七军六十一师所辖工厂、库房有多处：被服鞋袜厂在今天的一商店三楼；被服和粮食仓库在今天的吉林大学礼堂、市医院地下室、二马路原鹿鸣春饭店等处。工厂、库房地址分散，给保管带来许多困难，而我们的成员牛信同志却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一有时间就亲自到工厂、库房去巡视检查。从表面看，牛信对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一派效忠党国的架式。实际上，他是在按李梦星小组的指示，为人民军队保存被服鞋袜、粮食，保护工厂设备。解放后的第三天，牛将库存的被服、鞋袜、粮食，列表交给了我解放军军需第四局。经检查，帐面和实有数字相符，当即受到四局局长张超同志、政委李树彬同志的表扬。

难忘的岁月难忘的人

以伪满军校同学为主组成的地工小组能在敌军警宪特横行、疯狂搜捕、血腥镇压进步人士的国民党统治区存在下来而且按党的要求做出如此之多的贡献，最基本的一条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人心所向，人们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尽快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翻身见光明，因而对地下工作者给以无限的关怀和爱护。那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而那些

舍出身家性命掩护过我们的人则是我们一生中遇到的最难忘的人。当时在长春我们每个人都有几处可以藏身、可以秘密工作的地方。在五马路我的同乡周惠君家，我不仅可以住在那里，吃在她家，而且我们的同志找我研究工作时，周惠君——与我同龄的姑娘，便自动到门口，为我们放哨；我的有些材料，交给她以后，她便把它藏到房盖瓦底下；1948 年初，为反对新七军强迫松北联中学生当兵，我在散发传单后就到了她家。同年 4 月国民党大逮捕的消息传来后，我躲到了她家；在我撒传单的时候，她的两位哥哥几次为我带路；我住在她家，她的老妈妈为我和我的同志做饭，供我们吃却一分钱都不向我们索取……这一家人如此热心地照顾我和我的同志，就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为她们所赞同，所拥护。我的另一个同乡刘雅祥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之一。她是松北联中的学生。她父亲是长春监狱的一个科长。还有母亲、姐姐。这一家人，除父亲我几乎见不到而外，她的母亲、姐姐待我如同家人。她和她的姐姐都是有文化的人，经我了解，她们都竭诚拥护我们的行动纲领，所以经我发展成为我们的成员。我的同乡、长春大学同学门枢的表姐夫王占元，在兴安大路开了个西药房。王占元虽是个商人，但为人忠厚，思想开明，对共产党有好感。因而门枢需要什么，他都能帮助解决。为编印地下刊物《前夕》，门枢提出需要一台油印机，他慨然应允。门枢常在他家住。他特为门枢准备了一间屋，备有床和被褥。这儿是门枢，也是我藏身的最好地方之一。我的伪满军校同学、我们的成员阮守一家，是我的第四个去处。长春解放前夕，我、汪静岳，还有其他同志都在他家吃住。他有个老妈妈、还有妹妹，对我们的工作都是非常热心竭力支持的。我们在他家吃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给她们增添了许多困难，但她们毫无怨言。她妈妈对待我们象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第五处是徐棠清牧师家。徐是基督教徒，同时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徐的教堂在东三马路，教堂后院有一间屋子是我们秘密集会的地方。教堂在兴运路有幢宿

舍，那儿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好场所。我们几次利用教堂后院、教堂宿舍开秘密会。一次，我们在教堂后院开会，徐牧师的小女儿为我们彻夜站岗放哨。非但如此，在徐牧师家停留即使有个头痛脑热、泻肚拉稀等等，都不必害怕。因为徐牧师能为我们治疗。实际上，汪静岳、王哲、王悬有病都是经徐牧师看护，由徐牧师亲手给予治疗而后才全愈的。徐牧师家，就是我和同志们的家。另，通过苏钧同志，我结识了牛信。牛信是我们的成员。牛家也是我安全藏身的极好地方。我们的几位同志在学校被敌人盯上了，经过苏钧，找到了牛信，牛信便让这几位同志穿上了军服成了他手下的“库兵”，躲过了追捕。在他家，我随时都可以换上军服，从而使自己有了一层保护色。还有，伪满军校同期同学杨荫枢的哥哥杨荫东，当时是市政府的小职员。他的家我也去过。到他家避避，也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能在长春坚持斗争，能在长春开展秘密工作，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直到迎来长春全城解放，没有一些同乡、一些同志的精心照料和掩护，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同乡、这些同志在我们极端困难的时候，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给予我的那些热情支持和无私奉献！

（作者为军校六期生，曾任长春市文联《春风》月刊副主编，编审，副厅级待遇）

在白色恐怖下

汪静岳

我是原军校的六期生，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在盲目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为了学点工业知识，建设祖国，于 1946 年经过伪满十四个大学学生的联合斗争，取得了当时新成立的国民党长春大学的入学资格，开始在工学院电机系学习。学习一年左右的时间，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它丧失了信心。在感到国家个人前途渺茫，正在徘徊、徬徨的时候，受到进步同学和秘密传阅的革命或进步书籍的影响，再加上看到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对共产党和革命开始有认识。这时已有一些同学去了解放区，我和张智（也是军校六期生，当时在法学院学习）共同下决心投身革命，我俩又串连了门枢、黄兵、王哲等 3 人于 1947 年 12 月初的一天毅然离开长春投奔了解放区。经九台到达榆树县五棵树后，张吉平同志（他当时公开身份是县公安局长，实际是负责搞派遣工作的）要求我们回国

统区开展秘密工作。就这样在他的反复动员和安排组织下我们5人组成了一个名为“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组织，确定了三项工作任务和联络办法。于是我们便回到长春开始从事秘密工作。

开展一段工作后由于派出联系的人员一直未归，我们这个组织便和李天成同志负责的李梦星组合并，张智参加了核心组（核心组成员都是原军校同学），从此我们便在李梦星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了各种斗争。

我的代号为A4，在张智的具体直接联系下，因为我在长春大学学习时熟悉的多为原军校的学生，其他同学虽在一起学习，因共处时间较短不太熟悉，所以在发展地工成员时也就很自然的发展这些人较多，根据我的回忆，经我发展与我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员中原军校的同学六期生有阮守一、郑德沛，七期生有王向群、侯中枢、刘学泽、王岳辉、吴庆昶、焦文、黄化民、王慧等人，这些人成了地工中的主要成员。所有的地工成员都根据本人的条件，按照核心组部署的工作任务，做了一定的工作。现在我把我所联系的以军校学生为主的地工成员所做的主要工作叙述如下：

反对强迫松北联中学生当炮灰的斗争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撤到长春之后，长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我军重重包围之下，已成为“瓮中之鳖”，他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虽已穷途末路，但仍企图苟延残喘，除了疯狂的推行杀民养军政策，强拆群众房屋，抢夺市民粮食外，为了补充兵员，提出要“松北联中”学生充军，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松北联中，是1946年成立的，虽然大部分是因盲目正统观念，从松花江以北各地跑来上学的中学生，但很多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所见所闻和接触进步思想，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思想倾向进步。当他们听到要他们去充军当炮灰的消息后，许多学生起来表示坚决反对，除在学校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外，并向长春大学学生发出呼吁，希望老大哥声援这一正义斗争。

长春大学的学生，特别是进步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议论纷纷。这时在李天成主持下，张智、我和王向群等（还有其他同志，但记不清还有谁了）同志参加，对此事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松北联中的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应该给予声援；并要彻底揭露和粉碎国民党的这一阴谋，以阻止国民党扩充军事实力的企图；通过开展这一斗争，可以争取更多的同学认清国民党的罪恶目的，受到一次教育。为了搞好声援，光靠我们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广大同学起来进行斗争。为了发动同学，当时提出几条办法：广泛串联进步学生参加；要求学生自治会召开大会专门讨论声援问题；决定在声援大会上，由王向群同志发言，其他同志助威；要广泛宣传这一事件，扩大影响，争取更多同学和市民的同情和支持，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口号，以壮声势，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这时有些进步学生也要求声援松北联中学生，长春大学学生自治会，迫于同学的要求在 3 月 15 日的下午，在自由大路学生宿舍（当时两侧有八栋学生宿舍叫八大宿舍）第三宿舍门前的马路上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讨论声援"松北联中"学生的问题。这天虽然天气仍然比较寒冷，站在自由大路上还有阵阵冷风吹来，但是参加大会的学生还是不少，有千人以上，情绪热烈。在讨论中有一些同学发了言，认为应该声援中学同学，表示抗议国民党的这一反动措施，揭穿国民党不当兵就没饭吃、就失学、就失业的变象强迫学生当兵的阴谋，同学们越议论越气愤，在王向群同志发言时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他单刀直入提出国民党当局要学生从军实际上是迫害青年学生，我们坚决反对，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复学上课，搞好学生的生活。他的发言激烈尖锐，旗帜鲜明，慷慨激昂。他完全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同学们同声赞同。会后从自由大路到同志街、桂林路，进行了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附近群众围拢很多人观看，许多人也深表同情。

这次斗争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国民党反动当局是个沉重打击。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除了有一些不过问政治一心读书的同学没积极参加外，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国民党反动派辩解。这和前一两年的学生运动对比是大不相同的，过去讨论问题往往都是有对立面、有争论的。但这次确是几乎一面倒。这充分说明国民党在学生中已没有多少市场了。但是国民党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国民党的特务学生虽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但还在挖空心思的想进行破坏。大会的第二天，学校里的国民党特务学生就到七马路的国民党督察处去向主子汇报，据我们掌握每次他们向督察处汇报往往是先在督察处对门的"民间日报社"向督察处打电话联系，或是进去，或是特务出来会面，或是就用电话直接谈。这次也是一个特务学生利用"民间日报社"的电话向督察处的主子汇报长大学生的情况，特别汇报了王向群的发言情况，并提出要抓王向群同志。这时我们地工组织里的王哲同志早已打入"民间日报社"搞总务工作，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监视督察处的动静。无巧不成书，正当特务学生向督察处汇报时被王哲同志偷听到了，知道了敌人要抓王向群同志的企图。他迅速到长大宿舍找我，说敌人要抓王向群了，这时学校的空气也比较紧张，学生宿舍一带形迹可疑的人走来走去。夜间还有敌人的警车驶来驰去。我和李天成、张智等迅速作了研究，无论如何要掩护王向群同志，不使他遭到逮捕。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向群同志后，让他快点躲起来，经他和知近的同学研究，先躲到他们一个系（机械系）的比较可靠的同学赵铁华住的小楼宿舍里，这个宿舍比较安全，他在吴庆昶、吴国瑞、张德实三位同学前后保护下到赵的宿舍住了一宿。为了不使敌人发现，第二天又转移到市内。早晨他和赵铁华、吴庆昶一起装作跑步锻炼的样子跑出宿舍区，到市内清明街附近过去认识的一个中学生陈家躲避起来，住了二天后，有消息说国民党要从长春撤退，抓人的风声不太大了，我到小陈家，告诉他这一情况后，我和他便回到学校，把他安排在他原住宿舍内的另一房间居住，这

时不让他出宿舍，都是由我们的同志或知近的同学轮流换人偷着从食堂给他带饭。过了二天国民党又决定不撤退了，这样，王向群继续留在长大还是危险的，这时我们地工组织考虑他的安全，同时也认为他留在长春已失去继续工作和活动的条件，便决定让他到解放区工作。为了安全，经过我们研究决定，由我所联系的地工成员阮守一（他公开合法身份是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骑巡队的分队长）负责送出卡哨。在一天晚间我和黄化民等三、四位同志乘坐一台马车，让王坐在中间，我们在周围掩护他，使路人不易看清王的面貌。到阮守一同志家以后，告诉他出卡哨及到九台的路线，到那找谁。他在阮守一同志家住了一宿后，第二天由阮守一护送从东大桥出了卡哨，一直送到八里堡派出所，在那停留十几分钟，阮守一告诉他怎样走安全后，他便离开了长春。王走到卡伦在一个农民家住一宿，第二天到达龙家堡时遇到我人民解放军，在一个师部里师首长接待了他，询问了长春的情况后派人将他送到九台，安全的到达了目的地。这次斗争由于松北联中和长春大学学生的联合斗争，终于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让学生为其充当炮灰的阴谋完全破产，没有达到目的。

瓦解幼年学兵团

国民党让松北联中学生当内战炮灰的阴谋，遭到长春大学和松北联中学生的坚决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事隔 3 个多月，1948 年 7 月又策划组织“幼年学兵团”，来解决他们兵源不足的问题。这时，长春大学已经解散，除少数学生被骗往北京外，大多数学生不是回家，就是经过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去解放区参加工作或到各类学校学习。因此已无条件组织学生运动进行反对了。松北联中的学生也大为减少，而且粮食严重缺乏，处在饥饿的状态中，国民党便以吃饱饭为诱饵，将一批松北联中学生改编为这个“幼年学兵团”的学兵。在社会上也以能吃饭为条件又招募一批失学的中学生。这样从各方面拉来的学兵将近千人。

“幼年学兵团”是由当时的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长春市城防司

令官郑洞国兼任团长，国民党的上校军官何秉权任副团长。后者是实际上管这个团的真正负责人，郑洞国只是挂名的。这个团设有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区队，每个区队有百人左右，是三、三制。大队队部设有大队长、副官、书记官、文书上士、军需上士、勤务兵等6、7人。区队由区队长、指导员、区队副、文书等人组成。

这个团1948年8月初宣布正式成立，地点在现在的长春市第五中学。成立大会时，郑洞国亲自参加并讲了话。

在筹建"幼年学兵团"时，长春大学即将解散，李梦星组的人员，由于大部分是长春大学的学生，因此上级指示，我们的地工成员要尽可能的打到敌人的机关、部队或其他单位里去，一方面可以解决吃饭问题，有个站脚的地方，另一方面可以力所能及的开展对敌斗争，坚持到长春解放。我地工成员都积极想办法，找门路、找关系、想方设法打到敌人内部去。恰好在这个时候，我们A组的邵本荣（现在是沈阳铁路局局级离休干部，曾担任过长铁分局的总工程师）和张贵实同志（现在苏州广播电视部磁纪录设备厂任厂长）经过关系已打人"幼年学兵团"，担任一大队的副官和书记官。邵担任副官后，表面上积极工作，取得一大队队长文健的信任，为使更多的人打人"幼年学兵团"创造了条件。

一大队有个军需上士王某，家在九台解放区，因为他许多事老办不明白，大队长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经常批评他。王和邵本荣说："老挨批评，怎么办呢？想回家，又不敢，怎么好呢？"邵便同情的说："那你回去么！怕什么？"王说："抓我怎么办？"邵说："我不抓你！"王某听了很高兴，临走时把一个毯子留给邵作纪念，并流着眼泪说："谢谢邵副官！"王某一走，军需上士出缺，经文健同意，邵将张智同志安排当了军需上士。这样A组组长亲自打进了"幼年学兵团"，增加了我们的领导力量。这样在一大队的队部里我们的人就有了3名，占队部人数的一半。有事情，张智和邵一商量就可决定，接触既方便，又合理合法，对开展工作

非常有利。

由于邵的副官身份，使他有条件经常和另二个大队的副官接触，时间一长就混熟了，所以在二、三大队的区队副或大队部人员出缺时，邵和他们一说就可以补上一个。前后经张智同志介绍补充进去我地工人员6名，有焦文、杨兴俊、高维东（高洁）、刘福宽（刘颖）、李吉福、王静远同志，他们都是A组领导下的成员，都是长大的学生。其中前4名是原军校学生，这样在这三个大队里都有了我们的人，而且都是大队和区队的干部，特别是担任区队副的人比较多，在一个区队里，区队长和指导员是单独住一个屋子，区队副是和学兵住在一起的，每天直接和学兵打交道，对开展瓦解工作非常有利。

一批同志打到"幼年学兵团"的中心任务是瓦解它。根据幼年学兵的特点，瓦解的主要办法是鼓动逃跑，我们这批同志进到学兵团后即着手秘密的进行鼓动工作，由于他们直接接触学兵，特别是担任区队副的同志，每天和学兵吃住在一起，加上学兵年龄小，比较单纯，通过闲聊，问长问短，并在生活上对他们给予必要的关心和指导，不打不骂，很快并且比较容易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互相之间可以谈心里话。这些学兵大都没有离开过家，为了吃饭才到这里来。但到这以后还是吃不饱，进来后还得训练，将来还要去打仗当炮灰，学兵普遍的感到没意思，但又没有主意，这时我们就暗中通过个别的方式和他们谈心，鼓励他们走。我们的同志经常到学兵中去闲聊，学兵普遍的感到吃不饱有怨气。还怕当炮灰送命，这时我们同志问他们："愿意当炮灰吗？"普遍的回答是："谁愿意当那个？"又接着问："那怎么办呢？"这时学兵感到不知怎么办好，我们的同志这时便个别的暗示他们"走嘛！"有的怕抓回来，我们的同志则说："谁抓呀！"事实上也是没有人往回抓逃兵，因为学兵少了，大队、中队的军官可以吃空饷，肥自己的腰包。如果上面来点编，可以临时拉些小孩来凑数，给吃顿饭，点完编就让小孩回去。有些小孩还挺高兴，顶一会儿名，吃

顿饭，就没事了。甚至当时都出这样的笑话，来顶名的小孩太小，军服太大，上衣没膝盖，裤子提不上，根本也不象个兵，使人看了啼笑皆非。

由于客观上形势逼迫，人心涣散，不安于当这个学兵，加上我们暗中鼓动，学兵逃跑后无人去抓，特别是看到一大队的书记官、军需上士、勤务兵和有的大队的区队副都跑了，也无人过问，更助长了逃跑风，所以学兵就接二连三的逃跑，越跑越多。从成立到 9 月上旬已从原来近千人的队伍跑的只剩不到三分之二的人员了。虽然何秉权副团长多次大骂各大队长，大队长骂区队长，大吵大嚷："人都哪去了，要严管，作工作，别再逃跑了！"但仍无济于事，学兵还是陆续逃跑，他们妄图再抓一些人来补充，但长春已处于大批居民逃出长春，兵源枯竭，再想抓人已经抓不到几个人了。由于粮食非常紧张，到后来连军官也减少了，被编余的军官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而且是线米加黄豆，学兵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了。到 9 月末，这个学兵团所剩人数已寥寥无几，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更何况这个学兵团除大队长有枪外，其余的连枪都没有。

由于我们工作的目的已基本上达到，有些同志再继续坚持既无必要又有困难，所以除张智和邵本荣同志继续留在长春坚持到解放外，其余都陆续撤出，经组织安排去解放区工作或学习。

巧妙的张贴和散发传单，给敌人以打击

1948 年 3、4 月间根据李梦星组的统一部署，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宣传攻势，这个攻势主要是在国民党的各主要阶层和角落里使群众和敌人都能看到我们的传单，使群众了解我党我军的政策主张，受到教育和鼓舞，使敌人胆战心惊，受到打击。这些传单的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以"东北解放军长春地区前线指挥所"名义印发的《告长春市民书》、《告长春工人书》、《告长春学生书》、《告蒋军官兵书》、《告公教人员书》、《告工商业者书》、《告国民党、警、宪、特人员书》等。我们地工同志都进行

了这项工作，所以声势和影响较大。我仅将我们几个同志的情况加以列举，以说明问题。在 3、4 月间我几次把组织上分给我们的传单，每次只有几十份，偷偷的从长春大学宿舍步行带到阮守一的家，经过和阮守一、郑德沛研究确定，把这些传单重点张贴和散发在大马路、三、四、五、七马路和铁行街、东广场一带，因为这些地方都是长春市人口密集，街路来往行人多的商业区，看到的人多，影响也比较大，特别是这一带都是一分局管辖，郑德沛当时就在警察一分局工作，阮守一的家在长通路，工作起来方便，条件很有利。

阮守一和郑德沛主要是利用夜间十点以后或者清晨进行工作，这时路静人稀，容易工作，特别是夜间更为方便。他们二人多在夜间 10 点后，当家人睡了以后从阮家的窗户跳出，(因从门出来怕惊动阮的母亲和妹妹)两个人都穿上国民党警服披着斗篷，(把传单、浆糊藏在斗篷里，以免被人发现）到大马路上去。他们为了不发生意外，在事前就把当天的口令都弄明白了。每次在当天下午 4 点前，阮守一从骑巡队，郑德沛从一分局都把当天夜间的口令问明白，然后两人再一核对，口令确实一样，这才出动。他们到街上后，一前一后，看前后没人时就张贴，阮守一先刷浆子，然后郑德沛贴。就这样有一次他俩把传单张贴在四马路口益发合的窗户上（益发合即今天的第一百货商店)，三马路大德隆茶庄的墙上，连兴运派出所的附近也给贴上了。他两几次出动，在街上都象上述那样张贴一部分。直到张贴和撒完为止。有一次他们遇到警察一分局的一个人查夜，当时天黑看不清是谁，对方就问口令，郑德沛按当天规定的口令回答后，那人听出是郑德沛的口音，还说了一句:“是郑官啊!”那人以为郑德沛他们也是夜间执行什么任务的便过去了。他们每次完成任务后就按原路回家。为了看看张贴散发的情况，他们二人有时在第二天清晨天刚亮时，还特意到晚上贴传单的地方看看，这些传单都贴的挺好，都有些人在围着看。但没有人敢公开议论，只是看，没人敢往下撕，直到巡

逻队过来发现后才让队员往下撕，但开始时队员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积极上前去撕，好象怕撕了将来会出现什么后果似的，最后队长强令一名队员上前才撕下来。由于传单比较多，看的人不少，看后偷偷的一传两、两传三，越传面越大，造成了轰动。敌人非常害怕，惶惶不安。但又查不出是什么人张贴的。类似的宣传工作我们3人搞了至少三、四次。

郑德沛为了对一分局的警察也进行宣传，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既不致暴露自己，又能达到向警察宣传的目的，这个办法就是有两次郑和阮守一撒完传单之后，郑德沛故意留下几张，在第二天上班时，拿到一分局，声称是自己从大街上捡到的，特别是我们印的《告国民党、警、宪、特人员书》夹杂在其他传单中，拿给分局在场的所有人看，看后并将传单报给上级。虽然当时看了传单的警察不敢公开有所表示，但对其内心是有影响的，他们只能在互相比较知心的人中间偷偷议论，或作些传播。郑用这个办法既掩护了自己又达到了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的目的。

帮助我军独九师解决急需物资

长春外围我军独九师为了开展对敌的宣传工作，需要安装扩声器向敌人喊话，以利瓦解敌军。但关键的器材需要解决1台发电机。完成这个任务要解决购买、起出、伪装和送出卡哨四个问题。

购买发电机，这在当时并不困难，很快在西五马路买到了。为了安全的把发电机从西五马路运到阮守一家，我、张智、郑德沛、阮守一和王哲5人，在一天的夜间一起出动，到西五马路去，阮、郑都身着国民党警服并佩带手枪，张智穿幼年学兵团的军服，从那家用手推车把发电机起出，返回时走不远，突然前面有一个人挡住了去路，问：“干什么的?”这时阮守一随机应变，声称：“是兵团司令部的”。同时严厉的反问对方：“你是干什么的?”那人回答说：“我是中统的”。并且抱歉的说：“彼此，彼此，误会了。”那人便走开了。我们几个人一核计，怕这人跟着，也怕再遇到什么

情况，便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措施。由阮守一在前，我和张智推车，王哲在最后，骑自行车的郑德沛围着手推车前后照应，不准外人介入，如有人介入就由郑德沛干预，必要时由他开枪打。就这样一路比较顺利的把发电机运到阮家院里。

发电机到手后，接着便是如何伪装的问题，因为发电机比较大，公开往外带是不行的，经过大家研究，采取把几家地工人员的家属送往解放区，同时把发电机混在家属行李里带走的办法送出。阮守一动员他的母亲和妹妹到解放区去，他母亲开始不太通，考虑这么大岁数了，快入土的人了，在哪还不是一样，但经阮守一的工作，老太太虽然不大清楚我们的工作，但她也看出点情况，最后还是通情达理，同意到解放区去。这样我们便特制一个能装千斤左右的较大的手推车，把发电机混装在这个行李车里。我的婶母和小孩，掩护过我们的徐牧师的家属，共十余人，把行李装在另二台手推车里同行。

最后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安全出卡哨的问题了。为保证安全由阮守一、郑德沛、刘明德 3 名地工以警察身份护送。由二名去独九师参军的地工人员推车同行。在南关卡哨，阮守一的一个同学是负责警察方面卡哨的，阮守一企图利用同学的关系通过卡哨，大家到卡哨后，阮和他说了母亲和几位亲属怕饿死要出卡哨的意思，他的同学说："今天坏了，哨长来了"，这位哨长叫薛章煌是北京特警班毕业的军统特务，是大队长兼哨长，是统管这个卡哨军、警、宪、特的联合哨长。这时阮守一便随机应变，意图是想用和他搭话的机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以便通过，阮便硬着头皮，主动凑到哨长跟前，假装认识，打招呼说："大队长来这么早！"大队长问阮说："你是哪的？"阮说："是骑巡队的"，又说："大队长还没吃饭吧？"大队长说："没吃呢！"阮说："吃点吧！"大队长说："不吃"。为了讨好大队长，阮守一到附近买十个肉馅火烧（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了）拿过来，他虽然嘴说不吃，但给他也就吃了。阮陪着他边吃，边说话，这时大队长问："你来干啥来啦？"阮说：

“我亲属在市内呆不了想出去”，大队长听了后说：“让他们往前来”，这时阮守一便把家属和手推车叫到前面来，大队长一摆手说：“不用检查啦，过去吧！”就这样所有家属和几台手推车都安全的通过了南关卡哨。阮又和大队长说了一会儿话，然后说：“我得出去看看”，大队长说：“去吧！”这时家属和手推车都走的不远，阮追上后一直顺吉林大路送到圈道外，一直看到独九师按事先的约定，派出部队将他们接走，他才放心的回来。

1948年夏，在市内大经路开远东电料行的迟某，由于没有粮食，带着家属出城，到达我独九师检查站时，检查站的同志发现他是开电料行的，问他城内还有没有器材，他说还有不少器材，所以便让他进城把器材搞出来。这时正赶上王哲同志去独九师联系工作，便让王和他一起回城把这批器材送出去。因为对这个姓迟的政治情况不大了解，为防止发生意外，便将其家属留在部队，让迟和王进城，约定时间，到大经路远东电料行取东西，这时为了保证王哲同志的安全，我们便请阮守一和王哲一起去电料行，王哲同志进去，阮守一穿警官服装在外面接应和放哨，一旦有事阮可随机应变进行处理。幸好这个姓迟的没有别的活动，顺利的把所需器材取了出来。在阮守一、郑德沛、刘明德的掩护下用类似办法通过了南关卡哨，把器材用手推车安全运到独九师。

独九师在解决了许多器材后还缺个万能表，但这个仪器在市内一时不好搞到手，这时地工组织核心组成员陈贵民便决定将自己的万能表拿出来给独九师。但是怎样送出去又成了问题，因为这个东西虽然不太大也不好公开拿着走。这时正好有一位地工同志叫孙继武的，他原是长春大学的学生，在学校解散后为了坚持斗争，他打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一名看护兵，后被人发现是长春大学的学生，就不要他了。这样，不仅立脚点和吃饭成了问题，他当时还得了痢疾，虽经治疗，但身体仍很虚弱，组织上认为他已不适合再坚持斗争，决定让他到解放区去，同时把这个万能表带出去。由刘明德同志负责掩护把万能表装在孙的行李里，把行

李作为刘明德的行李放在自行车后面驮着。孙继武换上了警察服装，在1948年10月12日两人一起从南关大桥卡哨出去，刘明德由于经常出入，和岗哨人员混熟了，便打个招呼指指孙继武说："这是我们一起的"就过去了。他们走到东盛路一带，在一个姓陆的农户家孙把警服换成便装后，便直奔解放区了。这次孙继武同志出去时还把当时长春市内的敌情材料，用薄纸写成两份，藏在裤角里带了出去。一份给了解放军，一份给了在九台的吕天同志。他到九台接上关系后便去吉林的东北大学学习去了。

一次有几名学生和阮守一原来的对象刘某要出卡哨。便委托他们给独九师带去一些文具用品，我按事先约好的办法以化名"周正"的名义给独九师开一个条子，由阮守一护送出南关大桥卡哨后他们顺利的到解放区参加学习，同时也把给独九师的东西安全送到。

为了给独九师解决医疗器械和药品，我方另一地下组织把长春大学附属医院（即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的第二临床学院）的一批医务人员组织去解放区工作时，搞出的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送出，为了能安全运出，这部份器械和药品经李季同志送到阮守一家（其中有注射器、手术用具和注射液、606、消炎粉等各种器械和药品）经阮守一护送，由有关同志送到解放区独九师使用，解决了他们医疗上的一些困难。

多次掩护我方人员安全出卡哨。

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护送我方人员、物资出城外。我们还多次掩护我方人员出入卡哨。

一次，我地工人员黄化民同志（现在是吉林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曾获国家科技奖）和邢绍本同志在长大解散后，由于无条件在长春继续坚持工作，决定送他们到解放区去学习。为了安全出卡哨，这次由阮守一护送从西安桥（当时叫兴安桥）卡哨出去的。当时阮在卡哨出示一个证明便顺利的通过卡哨，这次所以从这个卡哨出去，因邢绍本有个亲戚在途中可以住，所以他们2人

绕经农安去了九台，见到吕天同志后便留在长春学院学习。

1948 年 8 月王哲去解放区联系工作回来走到二道河子时，没有通过卡哨的条件，他便找国民党六十军球队的姜法言和王桐，让他们给市内骑巡队的阮守一打电话，到卡哨外去接王。阮守一便亲自带着警官学校的毕业徽章到二道河子见到王哲后，给他带上，便一起通过卡哨回到了市内。当时带着警校毕业徽章的人卡哨知道是警校毕业的，问不好还要引起麻烦，所以卡哨人员对带这个徽章的一律放行。

为了给经常去解放区联系工作的王哲出入卡哨创造方便条件，郑德沛曾给王哲解决一个警察手牒和一个用白纸写的出入卡哨的证明文件。使王哲同志顺利的出入国民党的卡哨。

为掩护张智同志带一名女青年去解放区，他们在阮守一家会面后，由我安排郑德沛同志进行掩护，他俩这次是以难民身份顺利的出去了，郑当时在后面跟随，如在卡哨遇到阻碍或刁难，郑即去帮助解决。因为郑除了靠认识卡哨的警察外，他还给过南关大桥卡哨不认识的警察银元 5、6 块，并说这钱是给大家买点啥的。他就这样靠认识和金钱来打通敌人的关卡，掩护我方人员出入卡哨的。

还有一次我们是用一种比较巧妙的办法掩护我方人员入城的。在 1948 年的 6 月间，我围城独九师要派一名作战参谋，秘密进入长春，实际看一下长春市内的城防情况。希望我们接应，为了把这位部队的同志顺利的带进来，我便派郑德沛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他是警察分局的刑警队员，有抓人的权力，便利用这个条件，在东大桥外，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按事先定好的接头暗语、穿的服装样式和这位作战参谋接上关系后，郑德沛便把他作为抓到的犯人绑上，经过东大桥卡哨，出示刑警队的证明，并说，这是我抓的犯人，要带回分局去。就这样顺利的把他带到市内，并把这人交给了我。我和这位同志见面后，除安排食宿外，给他们介绍了市内的情况，他亲自看了市内的实际情况。两天后，我给

他作了一个假身份证。他就顺利的出城回到独九师了。这一次行动，为该师解放长春的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积极调查或搜集各种情报

按核心组的统一安排，我们的地工人员根据自己接触各方面的条件，凡对我们有用的情况都要调查和搜集。在长春大学里我们都对周围的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学生进行了调查，并将名单和表现整理成材料上报，我和我所联系的地工人员上报的就有几十名。对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们也进行搜集，如焦文同志就曾将驻在南湖附近的敌军番号、兵力、装备和工事设置及敌军在学校附近每次空投的飞机架次、空投物资的品种和数量等情况及时上报。

长春大学解散后，经过叔父汪国宏的关系我打入国民党市政府总务科当了一名小雇员，我利用这个条件，将市政府发工资的全员名单抄出上报，同时对市政府往来电报中有价值的情况（如粮食的情况）也及时抄报给核心组。

1948 年 4 月，国民党警察局在长春市警察系统组织情报网的时候，他们让郑德沛担任兼职的情报专员职务，对本分局的情报进行搜集、整理、上报。经过我们研究，认为是个好机会，可随时掌握一分局的情报，郑可相机行事，发挥作用。

在情报网刚一组建时，郑便把警察局用铅字打印下发的警察系统的情报网，情报网的任务，搜集上报的方法这一机密文件拿到家里，我在他家看后，就地把文件抄了一份。使上级很快的掌握了敌人的情况。

在同年 5 月间郑多次参加国民党六十军召集的军警情报联席会议，郑在会后都及时把会议内容、有关国民党当时对付共产党的阴谋计划、采取的方法、步骤等全部情况报告给我们。郑同时采取了不向各派出所的情报员传达的措施，因为这是由军方召集的会议，不传达，也不易被发觉，即或发觉也可找借口搪塞过去。

郑根据多次军警联防会议得到的情况，还亲自把在一分局范

围内的军、警联防的军事部署的情况画成防区的兵力配置地图交给我们。

郑对刑警队员和各派出所情报员报来的各种情报，都要认真的进行分析研究。凡是对国民党没有什么价值，对我方也无何妨碍的，别的分局也汇报的一类情报，或者完全是假情报则一律上报。如分局刑警队长（军统特务）为了考查郑，他提交给郑一份情报，说在新民胡同有一个梅某，有共产党嫌疑，对这类情报，郑每次都是先弄清真伪，然后再采取措施。对梅某的案子，郑偷偷的到新民胡同一查并无此人，这时郑考虑可能是队长在考查他，弄个共产党嫌疑的情报，看郑报不报，郑回来后便将此情报上报。市局调查股派两个人前来调查，到现场调查后也没有这个人，回来便问郑是怎么回事，郑当时从容的回答说："是队长提出让报的"，他们 2 人只好去找队长了。这事就是上面责备也没有郑的责任，因为情报的真伪和准确程度，和他无关。郑对于各派出所情报员报来的所谓与"奸匪"（指共产党）有关的嫌疑人名单，能不报的就不报。如当时有一个情报说白菊派出所管内有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郑分析有可能是真的，但因此案地点不在一分局管内也不好去查，便没有上报。凡是涉嫌共产党的案件，又不得不报的，则推迟或拖延上报时间。事先郑都采取查户口或打草惊蛇的办法通知或变象通知被怀疑人使之逃走，这些情报待郑上报后，人早已不在了。

掩护我地工人员免遭危险

李季同志是我党领导下另一系统的地工人员，由于熟人的介绍和阮守一认识了，但由于横向不发生工作关系的原则，互相之间都不问地工的情况。一次，大约在 1948 年 6、7 月间，李季同志家住处（在西三道街 32 号伪满银行 6 宿舍）的姓孟的甲长来李季家，偷偷的告诉说："警察一分局有个人来打听你的情况，共来过 3 次，说你有共产党的嫌疑。"孟甲长除了告诉他这个情况外，还出于好心和李季同志说："是否找人说说或者躲一躲"。李季同

志很快找到阮守一，请他找人打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阮守一便让李季暂留他家躲一躲。同时抓紧找人，当时郑德沛对一分局的人较熟，便让郑抓紧了解，经郑打听，可能是一分局刑警马凤泰管的事。因为马也是警官学校毕业的，阮、郑都和他同过学，郑便以玩麻将的名义，在一天下班时把马请到阮家。他们在玩麻将时，阮守一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问马："你是不是要调查李季，好象说有什么嫌疑?"马凤泰说："是有个李季，要调查调查，涉及共产党嫌疑。"这时李季也在场，阮守一便介绍说："这就是我李季大哥，是我的好朋友，我了解他，没有什么问题，调查啥，请你多关照"。姓马的一听，也觉得既是阮守一的好朋友，有啥可调查的，他脸一红，一笑说："既然都是朋友，好说！好说！"大家便又继续玩麻将。这个事从此也就没事了，马也再没进行什么调查。李季同志也就避免一次危险。

1948 年 5 月的一天，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布置各分局，要在当天夜间到第二天清晨在全市范围内搞一次由军、警、宪、特参加的联合大搜查。这时，郑德沛立即将此消息告诉我后由核心组迅速通知地工人员，使我们没有遭受意外。郑被分配到桃源派出所执行任务。军、警、宪、特人员分成 10 多个小组，分头出动。郑担任一个小组的组长，带领四人进行搜查，当搜查到一个中等人家的时候，郑首先进屋，在推开厨房门以后，看到一个人正在往火炉内投字纸，可能是一些材料之类的东西，不是一般破烂纸或废纸，也不是用纸引火，明显的是想抓紧烧毁。郑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把厨房门关上，回身和正往屋里走的其他搜查人员说："这屋里没有人，到别的屋搜查！"等大伙把别的屋子搜查完，郑又到厨房看时，那人已由窗户逃走了。这个小组在搜查完后，一个人也没有抓到，就完成了任务。

郑德沛在一分局掌握情报时，一旦发现有共产党嫌疑案件时，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掩护。记得当时有一个情报说在永长路五马路附近有一个共产党嫌疑案件，郑便前去以查户口的名义暗示他，这

人便迅速的离开了。还有一起涉及到为我军在市内购买医药用品和布匹的案件，郑德沛便到那家附近，声称要抓经济案犯，并鸣放一枪，使对方迅速转移，逃避了逮捕。

因势利导，将大批长大学生、教工和家属迎入解放区

1948 年 8 月 30 日晚，在长春市东三马路基督教安息日会的教堂后院，牧师徐棠清的家里正在举行一个紧急的秘密会议，牧师和他的小女儿在教堂门外为这次会议放哨，一旦有情况，好临机应变。

这次紧急会议有 3 个人参加，李梦星组的张智、我和王哲，研究的问题是，长春大学有一大批学生、教工及其家属将离开长春，这些人在出卡哨后，有很多人将去解放区，有些将各自回家，特别是有些人将去国统区沈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地下组织应该怎样办？

大批学生、教工和家属要离开长春的情况是这样发生的。

当时长春已被我军紧紧包围，长春守敌已被我军压缩到市区边缘。长春大学已不是安全之地。学校经费困难，粮食无法供应，学生被迫停课，大多数学生感到大势已去，向往解放区。学校当局虽从入夏以后就企图将学校南迁，但为了使这批知识分子能留在长春，在长春解放时能为我们所用，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同时许多学生也不同意离开长春，学生会几次开会讨论，也没有解决。8 月 30 日，学生会负责人在自由大路又召开学生大会讨论迁校问题。会前我地工人员工学院电机系学生刘志光同志（现在是国家某部局长已离休）和当时的李梦星组地工负责人陈贵民同志商量按事先研究的计划，要利用这个机会谈迁校的主张，准备公开同意迁校，因为吃饭都成问题，无法在长春立足，准备利用迁校在大批学生途经解放区时，争取把这一大批知识分子留到解放区，成为革命的一批重要力量。所以在开大会时，刘志光列举各种理由极力主张出走，不能坐以待毙，大会最后形成了迁校的决定，并准备在 9 月 2 日行动。

为了避免国民党对这次行动的阻挠和破坏，在学生大会开过的当晚，刘志光同志又继续研究对策，怕夜长梦多，便确定提前行动，他便找曲忠善（军校同学）等商量，把离长日期改为8月31日拂晓6时，他们连夜通知各学院同学和教职员工及其家属作好准备，以便及时出发。

张智、王哲和我为了把这次行动搞好，把这批大学生争取到解放区去，连夜紧急研究办法，我们确定，把我们所联系的长春大学学生中的地工同志门枢、侯笠夫、张家骥、赵毅、刘学泽、王健众（刘、王是军校学生）和他们一起走，以便配合刘志光的工作，同时决定王哲立即去解放区向我们的领导人吕天同志和外围解放军报告，请他们安排好接待工作。

王哲同志在8月31日清晨，出卡哨到独九师，见到宣传科科长康夫同志，讲明来意后，为了抢时间康夫和王哲同志骑马跑到石碑岭的师部，面见廖师长和钟政委，师长、政委当面打电话向肖华政委进行报告，肖华同志当即指示独九师派一个班战士迅速将王哲送到独六师师部，以便研究如何作好迎接的工作，所以要去独六师防区，因长大学生是准备从红熙街（即现在的红旗街）卡哨出城。这一带是独六师的阵地。当时肖政委还指示独六师把这批学生接待好，并派人将他们送往吉林市。这时独九师首长告诉王说，你不必到九台报告了，我们转告吕天同志。

王哲便同一位排长带领的一个班战士连夜出发，在第二天早晨到达独六师师部，独六师邓师长和钟人仿政委立即把民运科长和前沿阵地的领导都找来研究接待长大学生的办法，当时便决定马上让老乡和战士倒房子，准备好食宿，并研究了保证学生安全的措施，同时准备了欢迎演出的节目。研究完后王哲同志换上军装和前沿的连长一起到红熙街卡哨我方阵地，这时刘志光等同志带领的长大学生队伍已经到达我军阵地前方的“真空地带”。

这个队伍是在31日早六时集合出发的，学生、教职工及家属大约有300多人，比预计的人数多得多。在编队时为了保护女同

学及家属的安全，在四列纵队中把女同学和家属排在中间，两侧都是男同学和教职工。

队伍到达红熙街卡哨时，国民党兵出来阻拦，刘志光同志立即上前进行交涉，讲明是迁校，是前往沈阳的，他们虽然允许放行，但要一一检查行装，并把每人的绿色的三角校徽都收了去。刘志光同志一看，这样检查下去，几百人要耽误很长时间，便和管卡哨的军士进行解释，说同学们怕路上得病带了一些药品和少量路上吃的东西，是否不一定都检查了，这样他们检查一些人后对大部分行装就不再检查了，等到所有的人过去了，一个少尉军官就把校徽都还给刘志光同志了，刘对他表示了友好之意后，也尾随队伍出了卡哨。刘志光同志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当队伍离开卡哨四、五百米时，突然发现有几辆摩托车和吉普车从市内朝卡哨方向开来。刘志光心想这下坏了，敌人追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但不料车队开到卡哨就停下了，没有追出来，大家分析，可能是敌人不敢出卡哨，因为一出来就是三不管地带，怕我军出来打他们。当队伍走出1公里左右时，又从破房子里窜出7～8个土匪，鸣枪阻拦，走在前边的教职工有人给了他们一些银元，土匪就不管了，队伍才得以继续前进。

当天下午黄昏时分，队伍到达了“真空地带”，这时一群人从野地里跑来，象是要抢东西，虽然人数不多，但来势很凶。刘志光同志当即喝令这些人“不许接近学生队伍，如果胡作非为，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这些人听了吆喝，一看队伍人很多，不是好惹的，就都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有的一边往回退一边说：“是学生”！随后他们又横躺竖卧地休息了。快日落了，刘志光让大家选择有利地形休息待命。夜深时，四处响起枪声，子弹乱飞，刘志光提醒大家不要站起来乱走，以免流弹伤人。

一夜过去，9月1日早晨8点钟，解放军的连长和王哲等同志来接长大学生，接头后，刘志光、曲忠善、各学院的学生代表和我们派出的学生中的地工同志一起开会，研究进入解放区的办法。

会后便将学生、教职工、家属召集在一起，刘志光当众宣布说解放军来接我们来了，向大家正式宣布去解放区，不去沈阳了。当时有些同学还想去沈阳，刘志光当即宣布，愿去解放区的站这边，愿去沈阳的站另一边，进行整队。结果是去解放区的占绝大多数，要去沈阳的是少数。中午时，去解放区的教职员和学生便一个学院一个学院，有条不紊的在解放军带领下进入解放区。要去沈阳的学生等了几天后也都陆续到了解放区。

这一批队伍在到达师部驻地后受到师首长的热情接待，战士们主动将炒面和炒熟的黄豆送给大家当晚饭吃。当晚在一个场院里，在大汽灯下由独六师文工团演出了大型歌剧《血泪仇》，在欢迎演出会上独六师的钟政委向大家讲话，表示热烈欢迎，并讲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对大家的希望，在钟政委讲话时国民党的炮声不断传入人们耳谷，钟政委颇有风趣的说："炮打不到这里，是他们在欢送你们哩！"

第二天，王哲带领门枢和侯笠夫同志去独九师，他俩参军了，这是按事前的约定给该师选 2 名同志从事政治部的工作。离开独九师，王哲返回了长春。

长春大学的队伍经过 2 天步行到达九台，乘火车去吉林市，在吉林市火车站有人来接，到东北大学门口，在校生列队夹道热烈欢迎，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这些师生在东北大学进行一段政治学习后，便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和需要，有些人去各类大学或专科学校继续学习深造，有些人参加了工作，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

（作者为军校六期生，离休前为长春市城建局局长，副厅级）

忆长春解放前的一段斗争

崔赓扬

宣传小组的活动

1948 年我正在长春大学电机系三年级学习。3 月 8 日国民党的六十军从吉林撤退到长春，据说六十军和原驻长春的新七军会合后将向沈阳突围。在这种形势下，陈贵民同志向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当蒋军撤退时，为了避免工学院及其实验室遭受劫掠，让我组织长春大学的食堂炊事人员做好保卫工作。因我做过炊事委员，和炊事人员比较熟悉，所以给了我这项任务。随后，我去食堂找了一位熟识的班长谈，他也认为应该尽力保卫好学校，有事可找他。

不久，陈贵民同志通知我，蒋军不突围了，要固守长春，我们要做长期斗争的打算，让我组织一个宣传小组，刻印宣传品。人员有我，再另找一位善于刻蜡版和油印的同志，由两个人组成。我推荐原军校六期生，当时在化工系学习的孙汇及同志，当即得到陈贵民同志的同意。陈贵民同志给我一部分经费，用于购买蜡纸、纸张和油墨，并让我到大经路三马路口的西

南角楼房的一层，找一位同志取油印机，刻印地点就设在我住的房间内。当时，我住在长春大学三宿舍三层的紧西头，比较僻静，人员少也可靠。掩蔽油印机、纸张等用品的地点最后选在居室北墙带有柱门的日式大壁橱屋面板上面。这个壁橱右侧顶端开有个孔，爬上去顺走廊的承重墙往东到居室厕所，这里的屋面板低于周围墙面，把油印机放在这里即或有人爬上去，不走到此处也发现不了存放的东西。为了安全，每次工作都要爬上去取下来，用完再放回去。刻蜡版和油印时都在白天学校上课时间，刚开始时是在里面锁门，后来为了显示本室的学生都上课去了，在门的上角安上明锁，我们可在室内从气窗伸出手来上锁开锁，当然要踏在凳子上向外观察清楚，确实走廊里没有人时才开门、锁门。我们工作的保密和安全得到同室同学的忠诚支持，并且为了不惊扰我们，不是下课时间他们不开锁进屋。

一般都是孙汇及同志用他自备的铁笔刻蜡版，他刻完一张我校对一张，然后油印、装订，所有工作都是我们俩协同完成的。为了使读者读起来方便，我们的印刷品做到了工整、清晰、无差错，为了扩大宣传，每张蜡纸印张都在二百页以上。印过的蜡纸和印废的纸张，由我设法秘密烧掉。所出成品，由陈贵民同志或张智同志取走。长春大学的反动党团一直在想法破获是谁刻的蜡版，曾想用核对笔记的办法找出刻制人，由于孙汇及同志变换了笔体，敌人的阴谋落空。

所印传单或文件的原稿，有的是由核心组同志撰写的，有的是用从解放区带进的材料和东北日报上的文章。经我们刻印的稿件能回忆起来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任弼时同志的《土改中的几个问题》、社论《解放革命圣地延安》，传单有《告长大同学书》、《告长春市民书》、《告蒋军官兵书》等。还印过用打字机打出的《投诚证》。我从东北日报等资料上搜集到一些革命歌曲，汇编成一本《革命歌曲集》，加了编后记，歌集中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工人阶级有力量》等。对我来说，每印一份传单和文件，都是一次学习机会，从中受到许多教育和鼓舞。

发展组织

王桐同志是由梁亦同志发展参加地工工作的。4月下旬，梁亦同志需撤回解放区，安排我接替他和王桐同志联系。一天上午，梁亦领我到二道街王桐家里和王桐接上了关系。后来，他打入蒋军五十二师，对我们地工组织人员出入蒋军哨卡提供了方便。我三次出入南关大桥都是他拿着五十二师的通行证进入市区的，他还提供了五十二师和长春市国民党的一个政工训练班的情报。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在广播电台工作，因我是学电的，曾几次去电台熟悉电气设备，所以和电台的技术人员杨士樾及越肃有了接触，一起谈论过技术和时事，了解到他们在思想上是要求进步的，对国民党的腐败极为不满。一次他们对我表露出希望能为解放事业做点贡献的愿望，我向陈贵民同志汇报后，约定了时间，和陈贵民同志一起到六马路他们的住处当面交谈考察，经陈贵民同志批准同意吸收他俩参加地工活动。他提供了电台的组织机构和名单等资料，散发了由我交给他们的传单，组织他们学习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因为在市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他们不得不离开长春去了解放区。

四·二四之夜

4月24日傍晚，陈贵民同志来告诉我，据可靠消息，今晚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将来长大宿舍大搜捕，嘱咐我将物品收藏好，不要出漏洞。由于我和孙汇及在每次工作后从不马虎，在室内是查不出什么蛛丝马迹的，但是为了万无一失，还是对每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检查，在一个小壁橱里有几张蜡纸，其中有一张刻了字，内容是语文讲义，所以仍放原处。书架也都重新清理过，认为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才安然睡下了。半夜有人敲门，知道是特务们来了，我们大方地开了门，进来两个穿便衣的特务说要检查。他们进了屋就东瞧西找，可能看到室内实在简陋，床、书桌、书架一目了

然，后来他俩把注意力集中到书架上，看了半天从中抽出一本华岗著《帝国主义侵华史》，问这是什么书？关于这本著作我确实看过，不过不是这本而是一本旧的，使我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然而一看特务拿出的这本书是没有人翻过的新书，我机敏地答道：我是学工的不看这类书，放在这里不过是填满书架而已，并且书是以前住在这个屋的人留下的。特务一听一看，再没说什么。他们还登高拉开小壁橱找出那卷蜡纸，以为得了宝，可是打开一看，不是他要找的东西，可还是问我蜡纸是做什么的，我说是留着刻讲义用的。最后，特务们一无所获地走了。清晨，军警才让同学们出入房门。我们站到走廊的平台前看到被捕的同学被押上带蓬的卡车，里面没有我认识的，使我放了心。

三出卡哨两找吕天

7月长春大学解散了，学生各奔东西。和我一起工作的孙汇及同志去了解放区吉林，我奉命将油印机等物用手推车运到市内西二马路我的叔叔家。在这之前，地工组织负责人李天成同志回解放区后再没回来，其余核心组成员为了研究以后的工作如何开展，在我家开过一次会，我负责放哨。会上决定让我到九台找吕天同志汇报我们在市内的情况并请示今后的任务，并给了我一张用薄纸条写好的介绍信，一同研究了出入卡哨的办法。决定出南关大桥，由王桐同志接送，到二道河子后怎样走可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稍作准备，在会后的第三天王桐带我出了南关大桥五十二师的哨卡，先到他的同学杨培庸家。我们三人商量了去前线的路线，杨培庸同志建议，走位于二道河子东西大街南侧的一条小胡同，因为去解放区的人们多是从这条胡同走，来往的人较多，而且没有蒋军官兵巡逻的卡哨，一直向东就可以走到我军前沿阵地，最好上午趁人多时出发，安全可靠，而且时间也充裕。我和王桐同意了他的意见。王桐当即返回市内，当晚我住在杨培庸家，晚餐吃的包米面饼子，包米面是我和他一起磨的。第二天，按杨培庸说

的路线向东走去，一路上没见到蒋军的踪影，出二道河子不远在一条壕沟后面见到趴着的我军战士，说明来意之后有战士把我领到前线接待站。接待站设在一个大院里，工作人员在上房接见了我，因这里是九纵的防区，和九台方面没有直接联系，所以让我在这里住一宿再经二道河子去九台。次日，我顺圈道先向北走，后离开圈道，向东北方向走去，经过的两侧都是破砖乱瓦没有一栋好房子，也见不到一个人影的两不管无人地带。走过好长一段路后才见到我军哨卡和检查站，在这里解放军派了一名战士送我到离东大桥约十五华里的穷汉屯。当晚住在这里，有位王科长主动找我谈心，询问了市内状况，跟我畅谈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土改情况以及城市政策等有关问题，一直到深夜，使我上了一堂深刻的形势和政策教育。第二天，穷汉屯的同志告诉我可到卡伦找吕天同志。中午到达卡伦，在食堂碰到几个认识的同学，然后在一个屋里见到吕天同志。该请示汇报的内容都谈了之后，他问了问我的情况，他说：李天成不回去了，你们要在市内坚持到解放，为了工作也为了生存，可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蒋帮机关、部队中去，瓦解敌人、保护好人民的财产，迎接解放大军进城。为给同志们解决点生活困难，他让我带回一部分经费。第二天吕天同志派一位战士送我到了前沿，我独自回到二道河子杨培庸家，王桐已等了我两天，当即在杨家换上蒋军军服，在南关大桥验照放行回到市内，将找到吕天同志的情况和他的指示及时的向陈贵民作了详细汇报，并将带回的经费通过王桐买了粮食也交给了陈贵民同志。

8月中旬的一天，通知我陪张智同志去解放区向吕天请示汇报工作。这次出卡子带着陈贵民给伪造的中学学生证，和一个书兜，装扮成要出卡哨的样子，同时还要带地工人员的几名家属去解放区，他们已经在二道河子等候。这次仍然由王桐陪我们出南关大桥到杨培庸家，稍稍休息就在东盛路东头的一家饭馆里找到我们要带的人。一行人走过两不管地带之后天黑下来，在一片庄稼地里住了一宿，第二天遇到我军的一个侦察班，把我们带到检

查站，我们将去解放区的家属交待给检查站后，我和张智同志去了穷汉屯，恰 好吕天同志在这里，由张智同志作了汇报。吕天同志认为，解放长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要求我们设法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直到解放。在返回二道河子的途中，正遇蒋军飞机空投，空投的大米袋子飘到两不管地带不少，有的麻袋已摔破流出了大米，我俩装满了一书兜带回去。在圈道附近又碰上来时见到的侦察班，互祝胜利之后才分手。在我们走过东盛路路口蒋军碉堡时，从碉堡出来一个便衣特务把我们叫回，检查了证件，我们说是学生，无法在市内生活只好出卡哨，可是卡哨又出不去只好回来，由于没有露出任何破绽，盘问了一番，放我们走了。当晚在东盛路附近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回到杨培庸家，由王桐用同样的方法把我们带进市内。

黎明前的活动

8 月下旬，为了贯彻吕天同志的指示，我跟陈贵民和韩伟同志商量，想通过陈文镜的关系打入电信局，既可保卫电信局又可拿到作为工资的大米，还可学点技术，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陈文镜毕业于西南联大，有正义感，当时任电信局机务科长。在 1947 年寒假时，我作为长大电机系三年级的年级代表，到电信局找陈文镜联系到该局实习事宜，蒙他大力支持，同意接待，落实了实习计划并请专人讲课，使同学学习了半个多月，收益不少。从这开始，尤其是在我参加地下工作以后与他有了来往。为了解长春电信局的情况，以前我经常去陈文镜的办公室和家中，这次，我到陈文镜家去谈了到电信局找个吃饭的地方的想法，请他帮忙。他慷慨答应说有两个人出了卡哨，可来顶替这两个空缺。陈贵民同志让韩伟和我去电信局，陈文镜分配韩伟到发电机房值班，我到另外一栋楼里的电报中央室值班，每个班工作 24 小时休息 24 小时。在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我正在休班，以大经路为界实行戒严不得通行，没能赶到岗位上。长春解放后，市里招待保卫人民财产有功人员，韩伟同志出席了这个会议。解放之后，我在电信局

工作了几天，11 月调到长春新华广播电台（后改名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作者为军校六期生。离休前为嘉峪关市酒泉钢铁公司高工）

难忘的惊险

温旭山

那是1948年4月下旬，于千（喻成志，是军校一期生）同志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带来一项万分紧急的任务：为了减少我方损失，要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提供一份长春敌军防御情况的报告。我们“新文化行动同盟”社会组接受这个任务，觉得十分光荣。我和于千、刘仑立即研究了分工和具体工作步骤。因为我们是军校学生都学过军事，自然懂得应向我军提供的重点情报是：敌军的防御工事情况，包括周围第一线阵地，市内各据点火力点的情况；重武器即炮兵阵地位置；新七军和六十军的防御地域的划分。

为了搞清第一线的阵地情况，非接近阵地进行观察不可。这个任务就由在国民党警察局任职的刘仑担任，市内据点和火力点由我和于千负责。我想，这样的情报资料，必须位置准确鲜明，在指挥作战上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于是我到正中书局（现重庆路新华书店）买了一张新的长春市市区街路图。每天把调查来的资料标记在

上面，非常清楚明显。当时我家住在四马路，房子临街，每当往地图上标记资料时，都让我老婆在门口了望。大约10天左右的时间，这张市区街路图变成标有密密麻麻的城防工事资料情报图了。第二步，也就是最困难的一步，如何把它送到我军手中。比较安全一些的办法是用软纸把地图画下来，然后再把情报资料填上去。这样携带方便，危险性小些。但是那样繁杂的街路，要想让它像原图那样清晰准确，做起来困难很大，时间也不允许，于是我决定就把这个原图带出去。谁都清楚，身上带着这样一张支楞八翘的东西的份量。在研究如何送出去的时候，我首先提出方案：由警察局长大派出所长宣世铎送出卡哨，在适宜的地点交给我，我带在身上，于千在前面引路，我和他保持100到200米的距离，如发现敌情，我则设法处置。按这个方案出了卡哨。因为我身上带着情报图，精神必然紧张，所以脚步越来越快，和于千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好在一路上没遇见什么麻烦。我们走进一个断垣颓壁的破乱大院里，院内一幢幢平瓦房的周围铺着很厚的马吃过的草料，上面有人行走踩成的小道，看样子这里曾多次住过胡匪（地主武装），今天里边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我俩走到里边，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休息，吸一支烟。我们总结一下情况，认为两人的间距太近了，再走的时候，应该离得远些。

于千在院内绕着房子向东南方向走去。由于房子挡住视线，我看不见他走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究竟离我多远。约莫着我应该出发了，把插在肚子前面的地图重新按一按就走了。走到大院的东南角，发现离东南角不远是这个大院的大门，东南墙角有个墙豁子。没看见于千的踪影，估摸他已走出院外。我应该走墙豁子或是走大门呢？我想走墙豁子抄近，但是容易招人怀疑，还是走大门罢。于是放心大胆地走出门外，可是一出门外，却意外地发现前面不远的路口处，围站着七八个荷枪实弹巡逻队模样的家伙们。我大吃一惊，想退回去吧，觉得不妥；那样反会招致他们的怀疑，不知不觉地向前走了几步。我马上又想，不能这样走下去呀！再

走就走到他们堆里去了，急中生智，我看左面有条小道，我决心向左拐冲过去。小道通往东墙外边南北走向的大道，大道东侧是条壕棱儿，再东就是大田了，那几个家伙就站在这条大道上。我走这段小道直至走过大道这段路程，我想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情况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精神紧张的程度和瞬间极端复杂的心理矛盾斗争情况。既想快快通过这段路程，又不能显出慌张的样子，要控制脚步行态；既想扭过头去看一下敌人的情况，又要装作毫不在乎，不理睬他们的样子，一直向前走去。虽然眼睛不敢看，但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到耳朵上，惟恐发生意外，想知道他们是否注意到我，是否要对我采取什么行动。特别是通过大道的时候，精神紧张到极点了。等我上了壕棱还没有听见叫我站住的声音，一走下壕棱就是洼地了。这时我才敢于回头看看那帮家伙。他们仍然在唠嗑儿，惊恐的心情，随着我加快了的脚步逐渐平稳下来，很快就和分散了的于千同志重新会合，终于在夜间赶到龙家堡将军事情报地图交给组织。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遵照吕天同志的指示，1948 年的 9 月上旬，我用一辆手推车装着东西和孩子，送家属出卡哨，以便在市内坚持斗争。柏树声同志想借我送家属出卡哨的机会，随我一同出去，向组织传送一份情报材料。他把材料绑在腿肚子上。出东大桥不远，一个国民党的谍报人员追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出卡哨的。那个家伙横眉竖眼地说："什么出卡哨的，我看你们不是好东西！快回来！到那边检查站去！"我推着手推车，一面走一面想，这下子可坏了，一检查还不检查出来吗！"想着想着来到了所谓的检查站。原来是一个特务头头模样的人，在那里正检查行人。可是那个人一见到柏树声，就像熟人一样打招呼："是你呀！你出来干啥来啦？"柏树声见状，也像认识他似的说："你在这儿检查，我送一个朋友出卡哨，就是这个手推车这几个人，你看看呀！"那家伙一摆手说："走吧！"就这样，我们安全地出了卡哨。过后柏树声说："我并不认识那小子老大贵姓，可能是我在红熙街卡哨当卡哨长时，他出

入卡哨，那时认识了我，今天真算幸运。”看来，这次是命运之神帮助我们化险为夷。越过我军的警戒线，为了享受一下解放自由的幸福，我们把车子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作者为军校一期生。离休前为长春职工大学教师）

吉长两地的地下工作

王文达

1946年8月初，关巨同志（军校4期生）由解放区舒兰县秘密潜入了敌占区吉林市郊卧虎沟。关巨通过我四弟王文成找到了我（军校五期生）。是受中共吉北地委书记李梦龄的指派秘密潜回吉林市找我的。关巨对我说："党希望你能留在敌占区为党工作。"我接受了党给我的地工任务。从此，开始了在敌占区的地工活动。到1947年2月间，我将搜集到的蒋匪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向解放区输送的青年学生及革命知识份子，都交由交通员王文成直接送到在舒兰县的中共吉北地委会、地委书记李梦龄或吉北地委委员徐国藩同志。徐国藩是1946年5月28日我军撤退吉林以前，我在吉林青年联合会当副会长时的老领导。

1947年2月初，我到解放区汇报工作。在永吉县缸窑镇（当时的永吉县委所在地）遇上了中共永北县委书记徐国藩和他的夫人高景芝同志。我向他们详细的汇报了吉林的地工情况以及我个人的详细情

况。在中共永吉县委机关徐国藩的宿舍里，我住了两天以后，徐国藩同志通知我，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吉北联络科（以后不久改为吉北联络处，对外称吉北贸易局）。徐国藩亲自把我送到了吉北联络科，介绍给陈少中同志。

在吉北联络科，除了填写了一份个人简历表外，又写了一份详细自传。在临回敌区前，陈少中同志对我的工作做了详尽的指示，并给我一笔活动经费。

根据陈少中同志的指示，我和组织联系所用的代号和密码有：$\frac{17}{2}$，二数之和等于 12345，二数之差等于 12345 等等。

在做地工期间，陈少中和方正，布置给我的任务是：建立吉长两地的地工组织；搜集蒋匪军事情报及重要的政治、经济情报；爆炸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从内部瓦解敌军；开展学生运动，向国民党反动派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反内战、反抓丁、反迫害、反饥饿；帮助受特务迫害的我地工人员或与我地工组织有关系的学生及青年知识份子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根据上述指示，我在吉林建立的地工小组和发展的地工人员有：

长白师范学院地工小组。成员有：夏杞，伪满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学生，祖国光复后，于 1946 年春考入我吉林大学，1946 年 5 月我军撤退前，是永吉大学先修班和长白师范学院的学生，参加地工后仍是学生，其胞兄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中共老党员夏伯康。

于泾，长白师范学院学生。

杨呈祥，后改名薛虹。伪满师范大学学生，后入长白师范学院。

长白日报社地工小组。成员有：

金城戈，又名金煜。曾在《今日东北》杂志社做过编辑。后

又在吉林“长白日报社”当总编辑。

王师，“长白日报社”记者。

蒋六十军地下工作据点。成员有：

及鹏飞，参加地工前，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生，伪满江上军少尉，六十军一八二师司令部中尉制图员，参加地工后，仍在六十军一八二师司令部工作。

交通员小组。成员有：

王文学，参加地工前，伪满银行职员。1944年因病退职后无工作，参加地工后做交通员工作。

牟云芳，参加地工前无职业，伪满是吉林市商工公会的职员。跑过两次交通。

邵忠夫，参加地工前，曾在吉林中苏友好协会会堂当过炊事员，参加地工后跑了一次交通后，即在解放区参加工作了。

在长春建立的地工小组和发展的地工人员有：

长春大学文法学院地工小组。成员有：

那守田，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生，长春大学文学院哲学教育系学生。

叶文华，伪满军校第六期航空科学生，长春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生。

那　侃，伪满军校第六期生，长春大学学生。

长春大学理工医学院地工小组。成员有：

王文则，伪满军医学校学生，参加地工前系吉林大学医学院学生，后入长春大学医学院。

林树森，伪满新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系学生。光复后入吉林大学工学院，参加地工前系长春大学工学院学生。

宋久纯，伪满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光复后入吉林大学工学院。参加地工时是长春大学工学院学生。

宋陆纯（女），伪满哈尔滨医科大学学生，参加地工时系长春大学医学院学生。

钱玉玲（女）参加地工前，吉林大学医学院学生，后入长春大学医学院。

蒋新七军地工小组。成员有：

肖斧（原名肖向春），伪满军校第五期生，参加地工后，为了完成爆炸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的任务，经吉北联络处陈少中批准，潜入了新七军海上大楼守卫连，当了二等兵。

钱泽球，在抗日时期系西南联大学生，参加地工前无职业，参加地工后，打入新七军，当了军官（少校）。

上述地工人员都是由我发展或经我同意吸收的。

除了由我发展和同意吸收的地工人员之外，在1947年6、7月以后，各地工小组负责人，差不多都和吉北联络处处长陈少中、副处长方正取得了直接联系。因此以后有些组又吸收和发展了一些地工人员。例如：长白师范学院地工小组吸收了刘玉、韩起林、马颖影、费××等等，长春大学文法学院发展了袁学群（长春通讯社记者）、李之秋（长春工商报记者）以及朱安（长大学生、军校六期生）等等。

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经济情报是我们所有地工组的主要工作任务。很多同志曾做了很大的努力，搜集了吉长两地大量的敌军事情报。其中有些是很有价值的、绝密的军事情报。如1947年7月末，我军对吉林发动的夏季攻势前夕，国民党重炮兵军官会议上，制定的炮兵配备写景图和1947年8月，蒋匪军在我军大反攻半年以来的强大打击下，已无力进行出击，从战略上完全转入防御后，所制定的长春永久性防御工事设计图纸（全套的）原稿，都及时的送到了吉北联络处。另外总司令部急需的吉林、长春两市的市街图四份，也不失时机地送到了领导机关。

1946年5月，国民党军侵占吉林后，关于国民党新十四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新一军三十八师、六十军以及蒋匪吉林省保安司令部所属三个团，蒋匪建军部队的长白军、张平推匪部、梁华盛所组织的地上武装——突击队、还乡团、清剿队等和长春的蒋

匪新一军、五十二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新编独立七师、新七军以及长春蒋匪建军部队、地主武装、地方团队的兵员、编制、装备、兵力布置和动态等情报，我们也都及时地送到了领导机关，这些情报对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一次次发动的攻势作战，起了一定的作用，并得到领导上多次口头表扬。

1947年8月末，吉北联络处陈处长对我讲：

为了配合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秋季攻势，从敌人内部动摇敌人的军心、民心，进一步削弱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总司令部要求我们地工组，在吉林或长春对敌军的军用物资，被服或弹药仓库搞一次爆炸。

陈处长要求我们要尽全力来完成总司令部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我在缸窑吉北联络处向陈处长提出的初步计划是：爆炸目标是长春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因为新七军是一张"王牌"，海上大楼又在长春市的中心区。爆炸这个弹药库对敌人的震动一定很大。而且在新七军中，还有我们的地工人员。爆炸的工作步骤是首先通过我地工人员在新七军中的关系把人打进新一军海上大楼守卫连里面去，然后进一步了解弹药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爆炸计划。

陈处长同意我提出的初步计划。我由缸窑回到吉林后，立即赴长春。在长春先后找到肖斧和钱泽球。向他们交待了领导机关给我们地工组的战斗任务，并向他们做了思想动员。他俩都表示要不惜一切，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我们三人在旅馆里共同的研究了我在缸窑向陈处长提出的关于爆炸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的初步计划。确定由钱泽球同志负责，通过他和他的同乡宁大年（新七军上校）在新七军的关系，把肖斧安插到海上大楼守卫连里去，就是当个兵也可以。打进去当了二等兵的肖斧，进一步摸底，然后向我提出关于执行爆炸工作的具体计划。

在敌区里，由于汽油比炸药容易搞到，所以肖斧提出了用点燃汽油使弹药爆炸的办法。我们共同研究了关于执行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我答应肖斧，把长春大学文法学院那守田地工小组的同志，调给他。在必要时参加这一爆炸工作。因为肖斧同志要求我给他增加几个人，我考虑那守田地工小组清一色是伪军校学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比较有胆量是合适的。事后我到长春大学找了那守田同志，向他交待了爆炸工作的任务。然后让那守田和肖斧接了头。

关于执行爆炸工作的具体时间，需要我向吉北联络处报告后才能定下来。在临离长春前，特别嘱咐了肖斧、钱泽球和那守田几个同志，今后对每一个行动，都要进行仔细的考虑，并且要注意严格的保密。

1947 年 9 月中旬，我到了缸窑向陈处长详细的汇报了关于爆炸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具体计划。陈处长很满意我们的工作，并批准了爆炸计划。关于爆炸的具体时间，陈处长也定不下来，告诉我要等总司令部定下来之后，再通知我。

1947 年 10 月初，交通员王文学捎来了吉北联络处陈处长的密码信。信中指示：要在 10 月上旬找一个有利的时机，进行爆炸。根据领导机关的这一指示，10 月 7 日我给新七军地工小组写了一封密码信。信的内容是：根据上级指示，爆炸要在 10 月 9 日或 10 日这两天找一个有利的时机进行。最好在双十节敌人狂欢之际动手。密码信是由我的外甥牟绍融送到长春大学那守田手中的。

10 月 10 日，正当在长春的国民党庆祝建国三十六周年狂欢之际，由我地工人员肖斧、那守田等同志动手把新七军海上大楼地下室弹药仓库给爆炸了。汽油燃烧后，浓烟四起，接着是弹药的爆炸，使整个长春市震动了。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出动了大批军警，封锁了银行、海上大楼附近地区，调来了全市的消防队进行抢救。由于弹药的爆炸，国民党军警和消防队员都不敢上前抢救，海上大楼守卫连连长叶雷挺急了，用枪逼着消防队上前抢

救，在他的威逼下，上前抢救的消防队员当场被崩死了两名。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当场逮捕了海上大楼守卫连连长叶雷挺和节日当值的军官和士兵十多名。

国民党新七军海上大楼地下室弹药仓库爆炸后，参加这一爆炸的我地工人员全部安全的撤出了海上大楼。

1947 年 2 月，国民党六十军一八四师，在师长潘朔端将军率领下，在海城举行了起义。一八四师起义后，国民党慌慌忙忙把六十军由南满调到了吉林市，整编时，把它的嫡系李嵩所属的特务部队——交警部队编入了六十军，以监视这只云南的地方部队。

为了对六十军进行瓦解工作，我军把组织一八四师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的参谋长马云飞同志调到了吉北军分区。1947 年 6、7 月间，陈少中同志曾两次领我秘密的到吉北军分区司令部见了张司令员和马云飞参谋长，二位领导除了要我向他们汇报一下吉北军分区周边的敌情外，更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我把马云飞参谋长写给六十军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师参谋长的争取他们起义的信带回敌区，邮给他们。两次我共带过九封信。除了致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那封信，是我亲自送到六十军司令部副官处的，以外八封，全是按照六十军地工人员及鹏飞告诉我的六十军各师的军邮号（军队专用信箱）寄给各师师长及各师参谋长的。

1947 年 7 月以后，我曾布置任务给钱泽球，让他对新七军汽车修配厂上校厂长宁大年进行工作，争取他能为我军工作。后来宁大年为我军做了些工作，长春解放后，我们安置了宁大年的工作。

1947 年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后，我和交通员王文学曾先后两次将吉北联络处陈处长交给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印制的关于我军在春季和夏季攻势作战中的辉煌战果，以及争取敌军放下武器等大量传单运进了敌占区吉林，并散发在吉林市的德胜门和西关一带六十军的驻区内。传单散发后，敌人曾在市内举行了有警察和保甲人员参加的大搜查。

1947年2月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三个地工小组建立起来以后，关于白区学运工作，徐国藩和陈少中给我的指示精神和口号是：向国民党反动派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结合当时大学中的具体情况，我给王文则、夏杞、杨呈祥和那守田的任务，最初都是一样的。即：

摸清学校的基本情况；在同学中主动的多交朋友；在可靠的同学中，秘密的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把我们自己的或同情我们的人，打进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里面去；利用各种机会，以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为内容同国民党、三青团展开斗争。

对那守田小组我还特别布置过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我要他们利用伪军校同学关系，与在蒋军中当了军官的同学加强联系，从而搜集军事情报。

1947年夏季以后，领导机关对白区学运工作的指示是以“反内战、反抓丁、反迫害、反饥饿”为内容了。同时吉北联络处陈处长和总联络部部长李立三都曾对白区的学运工作，做过部署。

下面是我们完成学运工作的情况。

王文则和长春大学理工医学院地工小组

1946年7月末、8月初，我接受党给我的地工任务后，就有意识的把王文则、林树森、刘春官、李英旭等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1946年8月间，王文则到吉林市新开门的一所中学里做临时代课教员。9月间正赶上国民党当局两个月没有给中学教职员工发工资，引起了教师的不满，特别是家庭负担重的穷苦教职员工，更是受不了。在中学教职员里，酝酿着向当局请愿的活动，王文则向我反映了这一情况。我的意见是请愿不能解决啥问题，不如干脆来一次罢教。王文则也同意我的意见。我让王文则到各中学里去串连。酝酿成熟之后，来一次全市中学教师的联合罢教。串连时向教职员工说明请愿是没有用的。因为国民党当局不顾教师的死活，把钱都用在打内战和贪污肥己了。经王文则积极活动，一个罢教签名运动开始了。大家决定在女中礼堂召开全市中学教师

大会，通过罢教的决议。但开会那天，国民党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乾闻风赶到会场，在大会上向全体教师做了保证：五天之内，把工资全部发下，因而破坏了这次罢教。但这次罢教运动，对吉林教育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许多教师认识到，只要组织起来，通过斗争，一定能获得胜利。

1947 年 3 月初，王文则由解放区吉北联络处带回来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著作，还有进步书籍《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等，在地工小组内进行了秘密的传阅和学习，并以此为武器，我地工组同志在长大“民主墙”和宿舍的墙报上，同国民党、三青团份子展开了公开的论战，我们不断的揭露了国民党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残酷压榨、剥削人民的反动的内外政策，指出青年人应当往何处去和中国的前途等等。在这场论战激烈的时候，我们把论文贴出去，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学生就偷偷的给撕下来，我们再贴、敌特再撕，当时很是打痛了他们。

夏杞和长白师范学院地工小组

国民党侵占吉林后，夏杞曾被选为永吉大学先修班学生会主席。

1947 年 2 月，长白师范学院正式开学后，夏杞进入了长师，我给他布置了任务。1947 年 3 月，三青团派来的特务学生岳显阳，企图在长白师范学院里，建立三青团组织。经过夏杞联合吉林大学的同学，坚决抵制，一直到长白师范学院解体，三青团也没有能在该校建立起来。

1948 年初，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征兵，但兵员枯竭，于是蒋匪兵役部门展开了疯狂的抓壮丁活动，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内战、反抓丁、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我长白师范学院地工组，也在积极准备。赶巧，长师体育系学生孙德新在吉林市牛马行卖破烂时被抓，送到了吉林德胜联保办事处。孙德新对联保书记李树

勋说，他是大学生，要求放开他。但李树勋向他要“缓征证”。孙德新没有。本来国民党兵役法规定，大学在学学生缓征。也应给“缓征证”。但吉林市参议会却通过一项决议，内容是：对缓征和免役的学生、教师和独生子等，实行所谓的“乐捐”，捐了钱之后发给“缓征证”和“免役证”。孙德新没拿钱，也没有“缓征证”。所以联保书记不放他。他要打电话告诉学校一声也不让。因此孙德新和联保书记打了起来。消息传到了长白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何书绅火了。他坐了学校的自用大马车，去办事处交涉，联保人员不但没听，一看他也是抓丁的对象，因此把他扣留了。幸亏赶马车的是一个老头，急忙回到国民党学校送信。被抓的孙德新和何书绅在押送团管区的途中，押送的军士兵却问孙、何二人认识不认识长师学生×××？何书坤说：不但认识而且在一个宿舍里住。国民党军士兵说：×××是我的表弟，你们既是同学，现在天也黑了，我把你们放了。你们回去千万别说是我放的，就说你们自己跑的。这两个人一直跑回了学校。学校里，全体同学正准备拉大队出去示威和营救他们。学生会主席何书绅当即向全体同学做了报告，被激怒的大学生连饭也不吃了，在我地工人员和左派学生领导下，立即拉了大队向市内进军，一路上高呼口号“反内战、反抓丁、反迫害！”学生大军到了联保办事处，由学生会副主席原英出面进了办事处。原英进去就问：谁叫李树勋？一个保甲人员说：兄弟我就是李树勋。原英没容分说，一手抓住他的前胸，上去“叭”就是一个大耳光子。两个人一交手，在外边的好几百学生，只挤进来几十个，就把整个联保办事处砸个稀巴烂，连窗户带门，都捣得粉碎。这个反动的联保书记，被打得爹一声，妈一声躺在地下直叫喊，学生是越叫越打。打的快要没气了。也不知道是谁用刀子偷偷的把这个家伙的耳朵给割下了大半拉。疼得这个家伙象宰猪似的叫了起来。后边的学生还在拿家伙乱打，把这个家伙打昏在地。夏杞、原英商量了一下。为了争取主动，决定把这个奄奄一息还有点气的家伙，抬到了一辆看热闹

的三轮车上，拉着大队直奔吉林江沿的市长公馆。伪市长张庆泗哆哆嗦嗦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会副主席原英向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说：你的保甲人员，不顾国家兵役法之规定，对缓征的大学生，非法的强行抓丁而且对我们前往交涉的学生会主席，也进行强制扣留殴打，因此激起了全体大学生的义愤。砸了你们的保甲办事处和打了你的联保书记李树勋，同时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要求你保证：你的下属机关和保甲人员，今后不再抓学生充当壮丁，请你向全体同学表态。这个市长，在学生的威力下，向全体同学发表了以下的讲话："庆泗认为，保甲人员干涉役政的行为是错误的。抓丁抓学生是违法的。梁主席（指省主席梁华盛）对昨天团管区抓丁打死人事件，已有训斥。同学们的愤怒以及打了我的保甲人员是应该的、正当的行动。庆泗保证：指示保甲人员今后不准参加抓丁活动。"学生又问他，这个被打的联保书记怎么办？张庆泗说：先让我的警察把他送到市医院治疗一下，然后再议论处。同学们满意了。一部分学生和市长公馆的门警一起，把这个家伙送到了市医院，交给了医生。学生并对医生说：这个家伙可恨极了，是因为抓学生当兵，叫我们打伤的。医生也生气的说：好，给他缝耳朵的时候，不给他打麻药！这次斗争获得了全胜。

为扩大这一运动的成果，第二天早晨召开了学生大会。正当大会要通过决议时，国民党右派学生赵士良，车雅轩跳了出来阻止说：全国正在开展运动支持中央政府（指国民党政府）收复港九，我们不能再搞反抓丁了，应当发起一个请愿运动，到省府找梁主席去表示我们学生支持政府收复香港和九龙。同时呼吁梁主席制止役政部门抓学生当兵的活动。夏杞恐怕他们泼冷水，使运动冷下来。于是抢先对同学们说：反内战、反抓丁、反压迫同反对英帝，收复港九这两件事不矛盾，我同意把反对英帝、收复港九这个内容加进去，来一次游行示威。在绝大多数学生支持下，国民党右派学生赵士良，车雅轩等人，也无法反对，于是通过了决议，立即拉着大队举行了"反内战、反抓丁、反迫害和反对英帝、

收复港九”的学生游行大示威。学生队伍还没走到临江门，当局就派来了穿青棉制服的警察20多名进行保护。学生连理也没有理他们。全体学生仍是在我地工人员和左派学生的控制下，首先，围了永吉团管区司令部，吓得司令官周振声不敢出头，让他的参谋长替他出面应付学生。同学们早已识破了他们的诡计，闯进楼去就把周振声揪了出来。周振声发表的讲话，比市长张庆泗更滑稽。他说：本人奉命主持吉林役政以来，不幸前月我的“高头”（指他的上级）指示我在吉林征集壮丁以补充国军的兵员，兄弟我是军人，只得执行命令，采取了强行抓丁的办法，前天因抓丁误打死了人，已受到梁主席的严厉训斥。振声已电告了我的“高头”停止了抓丁。我今天向全体同学保证：今后决不抓丁、绝不抓学生。如果有人抓了学生，请马上给我打电话。有的学生质问他：对已经抓去了的怎么办？周说：请同学们提出名单来，我马上放！学生获得了胜利，离开了团管区司令部。从此直到1948年3月9日吉林解放，当局在吉林没敢再抓兵。

那守田和长春大学文法学院地工小组

那守田和他领导的这个地工小组，在完成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和爆炸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的任务上，是很有成绩的。1947年春，那守田地工小组及时的搜集到的蒋军在长春建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措施的军事情报和关于建筑钢筋水泥永久性防御工事设计的全套图纸和其他情报，不但使我们军事领导机关清楚的知道，长春蒋匪的防御手段，更重要的是使我军了解到蒋军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军事措施，说明它已无力进行战略和战术出击。二是蒋军并不打算撤退，而是想固守孤城。

那守田同志，在参加爆炸蒋匪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的工作上，表现了革命者对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心和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

新七军地工小组的肖斧和钱泽球同志

为爆炸新七军海上大楼弹药仓库，我原来想亲自打入新七军

海上大楼守卫连里去，但肖斧坚决不同意。他自己倒勇敢的承担了这个十分艰巨而又危险的工作任务。在我看来，像肖斧那样一个很有教养，具有做军官的素质和风格的知识份子混到了国民党士兵里面去当了二等兵，在敌人的心脏里，长时间的潜伏下来，没有被敌人发觉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爆炸的准备活动。最后出色地完成了爆炸任务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他在长春解放前夕，病死在医院中了。钱泽球，是一个对人热情，对工作极其认真的好同志。无论在搜集军事情报、爆炸敌军弹药库和瓦解敌军的各项工作，他都能以极其认真、积极负责的精神，出色的完成任务。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贞不屈的品质，尤为可贵。他被捕后，在严刑拷打之下，一直坚贞不屈，没有向敌特说出任何一点有关我地工的情况。终于在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前夕，被长春督查处用电线勒死，为革命英勇的牺牲了。

蒋匪六十军地下工作据点

及鹏飞，他多次搜集军事情报，特别是六十军各师兵力布置的情报。不仅很准确，也比较有价值。例如：及鹏飞搜集的关于吉长公路和吉梅铁路沿线上的六十军兵力部署情况的情报，对我们很有用。除军事情报外，及鹏飞还主动的将六十军政治部印制的，上面盖有“机密”字样的“吉林社会情况调查”一册，偷了出来，给了我。在1948年3月8日国民党由吉林逃跑的那天夜晚，及鹏飞还曾派人通过蒋匪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的郝所长对我进行保护和营救。

长白日报社地工小组

金城戈，曾搜集了一份关于国民党吉林省市的党、政、军、警各机关，省市参议会和群众团体的重要人物名单。并搜集了几次关于吉林驻军的情报。在1947年8月初前后，由他去吉北联络处，由陈处长直接领导，并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

交通员小组

王文学，是我的胞兄。1947年2月参加地工后，担当跑交通

的任务，地工期间我们搜集到的大部分情报是王文学送到吉北联络处的。每月只少要往缸窑去两次。我和吉北联络处来往的秘密信件，以及往解放区送人，也全都是由王文学负责，当时往解放区去，往返通过蒋军的防线，哨所和关卡是有一定危险的。但整个地工期间，王文学往返数十次，送人送情报，往回带信，带书籍、带宣传品等等，一次都没有出过问题，出色的完成了交通员的任务。

牟云芳，地工期间，我时常住在他的家里。他不但是我过去的同院邻居，他的老婆是我母亲的干女儿。我让牟云芳给我跑过两次交通，往吉北联络处送情报，他都完成了任务。

王文成，是我的四弟，1946 年 8 月至 1946 年 11 月，我一共让他往舒兰，中共吉北地委送情报和送人，跑了三次。第三次，1946 年 11 月，他就在解放区舒兰县参加了土改工作队。

我地工组还不断地将那些受蒋军迫害、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的我地工人员或与我地工有关的人员，送往解放区。

1946 年 8 月下旬，王文成往解放区送情报时，曾带去了他的三个同学（中学生）。一个叫鲁振昌、一个叫郑义祥、一个叫刘××。这三个学生到解放区后，在舒兰参加了土改工作队。1946 年 9 月下旬，由肖斧介绍，军校同学高福庆、王俊生（后改名王隽）前来吉林找我。我让王文成连送情报并把他二人介绍到了舒兰中共吉北地委。政委李梦龄同志，曾设宴欢迎了他们。1947 年末，高福庆、王隽在黑龙江省某县当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和在某区工作。

1947 年 3 月，我让交通员王文学把永吉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关清、吴敏、关维正三人送到了吉北联络处。到缸窑后他们三人就参加了吉北联络处的武装工作队。

1947 年 4 月，我被捕后，永大先修班学生，我地工人员李英旭和交通员王文学同去了吉北联络处，以后也参加了吉北联络处的武装工作队。

1947 年 7、8 月，王文则将长春大学医学院六年级学生张平介

绍给我，我把他带到吉北联络处，参加了武装工作队，兼做医生工作。

1947 年 8、9 月间，我曾给我的同乡、长春大学学生高守维（军校五期生）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到吉北联络处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作者为军校五期生。已故。离休前为长春市铸钢厂干部）

智炸弹药库的独立小组

宋　枬　刘树春

1947 年秋，以那守田（伪满军官学校五期生）为首的东北民主青年同盟长春大学支部在“中央警官学校东北五分校长春警官班”建立了一个小组，负责人是刘树春（化名为刘韫）和赵洪光（化名赵洪）。小组通过传阅进步书刊，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在警校开展反蒋斗争。他们先后将冯潜、毕云昭、王云青、高锡福、宋国栋、王兆铨等同学发展为地下组织成员。从解放区回来的钱泽球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他把在新七军中的宁奋兴（宁大年）、教师陈萃华（陈晓晨）等发展为成员。小组逐渐壮大起来。这时候，从解放区派到国统区来的肖向春（化名肖斧，也是伪满军校五期生）辗转来到长春，找到刘树春，了解了警校小组的活动情况后，决定将警校小组改为由吉北联络处直接领导的第九小组（即独立小组），并重新确定由钱泽球、肖向春和刘树春负责领导这一小组的工作。

1947 年 10 月，在长春市重庆路北金家，由戴铎明向钱泽球、肖向春、刘树春

和那守田等四位同志传达了吉北联络处陈少中关于选择时机、炸掉新七军设在海上大楼（现在市中心医院）地下室的弹药库的指示。当时这个弹药库是由新七军一个留守连把守的，外人不易接近。钱泽球这时虽在新七军汽车队任职，留守连内若无内应，炸毁弹药库将是十分困难的。几经研究，决定由钱泽球介绍，将肖向春打入留守连。之后，钱泽球通过肖向春将汽油偷运进弹药库。那守田等人用爆竹药制造导火索。行动时间选在"双十节"当天下午肖向春值班的时候。1947 年 10 月 10 日下午肖向春接班后，第一件事是派值班卫兵出去买吃的东西，巧妙地将卫兵支走。随后将那守田、刘树春放进弹药库。那守田迅速拔掉部分榴弹的保险栓，刘树春拎起桶往弹药箱上泼汽油，并迅速将导火索点燃。肖、那、刘快速离开现场，坐上在大楼南门专门等候他们的钱泽球的吉普车，安全地撤离了现场。他们刚刚离去，正在楼上大吃二喝的蒋军官兵便听到了地下室弹药库的爆炸声。这时长春全城戒严，开始了大搜捕。可是这时候我方的刘树春、钱泽球等，已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不久便化装出城。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海上大楼地下室弹药库爆炸"的消息。这一消息轰动了全城。

1947 年末，根据上级的部署，钱泽球、肖向春重返长春。独立小组成员除肖向春、王兆铨（王飞）等留在社会上而外，钱泽球、刘树春、高锡福（高扬）、宋国栋（宋桐）分别打入敌新七军干部教导总队军官队、政工队，直插敌人心脏。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地将我军所急需的各种军事情报不断地送往解放区。

1948 年初，长春工委在九台成立。小组改由长春工委领导。在白色恐怖和艰苦的斗争中，肖向春积劳成疾，虽经同学宋传绂（宋传富）精心照料，但终因肺结核不治，于同年夏离开了人间。钱泽球在敌政工队被捕，长春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杀害。刘树春也是同年夏被捕的，直到长春解放才出了狱。独立小组在领导人频频遭到不幸的情况下，仍然在长春工委领导下坚持着对敌斗

争。冯潜、赵洪光还策动敌军二十余人携械起义，为长春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作者宋桐为军校五期生。离休前为长春市宽城区工业职工技校校长。
刘树春为军校五期生，曾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图书馆工作）

“新文化同盟”学生组

郭　锋　朱　寰

“新文化行动同盟”学生组是1947年秋，在伪满军官学校一期生温旭山、潘辉（潘广志）引导和组织下，在长春大学秘密建立起来的。组长是六期生郭锋，核心成员有六期生朱寰（朱敬文）、七期生王健群（王鹏飞）。

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在学生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阅进步书籍，提高同学们的革命觉悟；积极发展和壮大我党地工组织；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根据可能，调查敌军、警、特情况，向上级汇报。

到1948年4月，先后发展六期生陈明（陈国宪）、薛明新（薛云志）、王靖（王彩章）、杨郁良、韩耀文、年文学、苏云山、李克夫、袁树化、曲家骧、古秀季、杨树滋；七期生唐士学、吴乃恭、林树、廖卫（明玉）、程广琳等人，这些同学参加到地工组织中来，给组织增加了新鲜血液。

1948 年元旦，我们把温旭山交给我们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解放军宣言》等文件，由王靖在家刻钢板油印后，以祝贺新年名义，分别投入各宿舍的信箱，使更多的同学看到了党的文件，对党增加了了解。在学生中，传阅《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大众哲学》、《联共党史》等革命书籍。

1947 年末，为反对新七军军长李鸿强迫松北联中学生参军。学生组的同志们在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书写和张贴了“反对李鸿强迫学生参军”“反对内战！”“反对贪官污吏！”“维护学生利益！”等标语。林树等在张贴标语时被捕。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发动学生，利用关系，由长春大学学生会出面与当局交涉，并施加压力，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否则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督察处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学生。1948 年春，配合其他组织，组织学生们积极参加了反迁校的斗争。在长春大学民主墙上，以“长春前线指挥部”名义，书与张贴《评〈中美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的实质》，揭露美国侵华和国民党卖国的行为。“三八”妇女节来了，我们张贴了《中国妇女解放难》的文章，号召女同胞起来参加革命斗争。

1948 年 4 月 24 日国民党对长春大学学生进行大逮捕。因事前得到消息，采取了应急措施，4 月 26 日、27 日，温旭山派人把郭锋、王健群、朱寰、李克夫、曹素月、朱彤等人先后送出国民党卡哨。除年文学被捕外，大多数成员避开了特务的魔爪。剩下的成员由袁树化代组长，仍然在长春坚持对敌斗争。小组成员苏云山千方百计的搜集国民党军队情况，并将伪警察局和各派出所成员名单、枪枝弹药情况写成材料，经组织送到了解放区。长春解放前夕，小组成员参加了保护国家财产和重要设施的斗争，并积极了解掌握敌特潜伏情况。还利用在长春站的友人关系，拿到了长春站总电缆图，以掌握要害，防止敌人破坏。年文学同志在长春解放前夕，在督察处院内，惨遭敌人杀害。长春解放后，郭

锋、朱寰在长春日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深切的怀念将年轻生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年文学烈士。

（作者郭锋为军校六期生，曾任辽宁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朱寰，也是军校六期生，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

民青支部在长春

方 策

1947年8月下旬，伪满军校五期生，当时在长春大学读书的那守田和方锦业，接到王文达同志(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吉北联络处派遣，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来信，通知他俩作为国统区的代表前去哈尔滨参加东北民主青年代表大会。那、方二人经吉林到吉北解放区前沿江蜜蜂区政府，又转至当时城工部吉北联络处所在地缸窑。因当时秋雨大，通往哈尔滨方向的双城附近的铁路被冲，运行中断，处长陈少中临时决定，让那、方二人回长春，组织东北民主青年同盟长春大学支部（以下简称民青支部)。

根据陈少中指示，民青支部的任务有三：一是发展组织，壮大进步力量，使民青支部成为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和组织开展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二是利用可能利用的各种条件和机会，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

三是破坏敌军设在长春的中央银行、税捐局、海上大楼地下室的弹药库。了解敌军情况，配合解放军，争取早日解放长春。陈少中布置任务时指定那守田为民青支部书记，另选 2 人组成支部。并告诉他们，有人直接领导他们的工作。联系、接头的暗号是在三角形卡片上写有两个数码，两数相减，差为 009（9，标志民青支部始建于 9 月）。

8 月 29 日那、方二人顺利地返回长春，组成了以那守田为书记，刘树春为组织委员（伪满军校五期生，当时是中央警官学校东北五分校长春警官班学生）和方锦业为宣传委员的支委会，拟定了组织章程和活动大纲。

发展组织的工作进展得很快。长春大学内建立了两个组，一个组有杜仲舒、叶文华、朱文安、洪福祥、胡越民，一色是伪满军校同学，当时的文、法学院学生。另一个组有那侃、乔靖、庞士倬、朱德训、张绛、鲍庆琛、褚兴文等，也都是伪满军校同学，是当时理、工学院学生。此外，在“今日东北社”发展了记者袁学群及其爱人李若倩和一位姓刘的记者。在市职工会也发展了 2 人，组成今日东北社小组。在警校还建立了一个小组。民青成员多达 30 多人。加入民青支部的人都秘密地履行了宣誓手续。长春大学文法学院小组和今日东北社小组由方锦业做监誓人；其余两个组由那守田做监誓人。

支部成立后，方锦业和那守田做了大框架的分工。学运工作和经常性的宣传活动由方锦业侧重去抓；摸清并准备炸毁敌弹药库的工作主要由那守田负责。敌军当时在长春有 3 个弹药库。因为海上大楼是一座公寓性的大楼，松北几省的流亡党、团部等都设在这里，出入方便，他们决定先搞掉这座大楼的地下弹药库。上级几次派人来，专门研究这项工作，还就民青支部怎样做内应，配合解放长春做了安排。

为了搞清国民党在长春的兵力部署，杜仲舒、胡越民亲自到南岭，挨个察看国民党设立的碉堡，搜集军事情报，通过在国民

党部队里任副连长的同学尹广华，了解国民党在长春的兵力配备情况，绘成图，写成材料。鲍庆琛通过他的柳河同乡搞到了一卷长春敌军防御地图，都一并转交给了上级党组织。

爆破敌海上大楼弹药库是在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3 时进行的。当时是打入警卫连的肖向春（“军校”五期生）值班，他想办法支走了另一名值班卫兵，放那守田、刘树春 2 人进入弹药库。肖在门口放哨，刘、那 2 人进去将弹药引爆后，3 人乘钱泽球事先准备的吉普车迅速地离开了现场。弹药库被炸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出动了全市所有的消防车，国民党军政头目也亲临现场指挥扑救。但于事无补，大火一直燃烧了 4 个多小时。只可惜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爆破器材威力不大，没有将整个弹药库炸毁。

民青支部建立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长春、吉林已经成了遥遥相望的两座孤城。国民党出于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的目的，对民主进步势力采取镇压手段，在长春大学逮捕了盛魁才、王承祜等 6 名学生。这一暴行使许多学生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纷纷投奔解放区。在学校里，民主进步力量相对减弱。国民党长春大学区党部书记刘富文又窃居了学生会主席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学运工作怎样开展？方锦业和那守田分析了形势，认为营救被捕学生是广大同学最关心的问题。虽然由于没有强大的社会舆论或知名人士出面，对国民党长春当局施加压力，营救出被捕学生的希望渺茫，但发动群众起来营救被捕学生，是鼓舞群众斗志，扭转校园民主空气低沉局面的重要手段和步骤。因此决定抓住时机创造条件，努力发动好这场斗争。

一天，得知刘富文为推行在民主墙贴大字报必须署名或写上学号的反动计划，要召开学生大会的消息，方锦业和那守田研究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打乱刘富文的反动计划，借机会逼刘通过营救被捕学生的决议。为此，他们在支部成员及积极分子间进行部署。第二天午饭后，大会果然在食堂与工学院大楼间的空地上、

召开了。方锦业和理学院学生郭锋（军校六期生）在会上发言，揭露刘富文推行反动计划目的在于无休止地逮捕无辜学生，同时要求大会通过营救被捕学生决议。刘一时感到措手不及。正在他支支吾吾妄图阻止同学们的提议的时候，参加大会的同学已经齐刷刷举起手来，一致要求营救被捕同学。他们还就营救被捕同学代表人选、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等问题作了充分考虑。将王孝良（伪满军校五期生、理学院学生）选入营救被捕同学代表团，王孝良的父亲是将级接收大员。王孝良在九三胜利后曾跟随其父在沈阳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少校。因为看清了国民党的面目，弃官人理学院学习。此人正义感很强，能言善辩。根据他本人及其家庭的条件，他们认为他进可攻，退可守。

代表团到督察处要求放人，而督察处却矢口否认抓过学生。刘富文把持的学生会又不支持代表团的活动。营救受挫，终于不了了之。虽然 6 位同学没有被营救出来，但这场斗争对反动当局和学校中的反动势力也是一个打击。

1947 年秋季，由于形势的发展和民青支部做了大量工作，一些同学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要求参加革命，到解放区去。那守田通过各种关系想办法把他们介绍、护送到解放区去。王前（军校四期生）及其爱人王进，王放（军校四期生）及其爱人沈虹等都是经那守田介绍到解放区而后进了北安军政大学学习的。军政大学撤销后，他们都到了佳木斯东北大学四班继续学习。后来，他们都成了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为新中国培养新一代做了大量的工作。

长春大学学生一般都是按伪满时期的同学或同乡自愿结合住在一个房间的。因为是同学或同乡，彼此用不着戒备，所以写大字报、开展民主活动都以宿舍为基地。1947 年秋开学后，学校当局强行按学院、系、班级安排住宿，以便于把国民党、三青团爪牙安插到各宿舍中，监视同学们的活动。为揭露学校当局的阴谋，方锦业起草一张揭露当局阴谋的大字报。那守田认为方的笔体已

为一些人所注目，不宜抄大字报，但他不怕冒风险，亲手抄了大字报，夜里由朱德训贴到民主墙上。这张大字报贴出后，陆续有几张大字报响应，虽声势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反动阴谋却作了一次深刻揭露。

民青支部的大型活动，往往以长大北辰同学会的面目出现。如不定期出墙报，举行营火晚会等。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在战场上的失败，搜罗了一部分旧东北军将领成立了松北绥靖纵队。1947 年 9 月的一天，某少校军官（伪满军校四期生）到宿舍找方锦业（当时是长大北辰同学会主席），希望方能通过北辰同学会动员已经入了长春大学的原军校学生弃学参加松北绥靖纵队。他还带来了东北行辕一个参谋的亲笔信，也希望“鼎力协助”云云。方锦业明白了他的来意后，当场拒绝了他。可他说他无法回去“交旨”，一再要求和同学直接接触。方锦业和那守田、陈贵民、石维奎、王若光等同学研究，认为这是一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极好机会，于是在工学院大教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这天，那位少校穿一身笔挺的将校服，大背头抹得油光锃亮，身上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香水味。他坐在大教室的最前排引人注目的地方，方锦业特意让他站起来在同学们面前亮亮相，他刚要讲话，方锦业马上说：“少校那里缺兵少官，想当官的现在就向少校报名！”方锦业的话音一落，会场上笑声四起。接着许多同学站起来发言，都说要和平不要内战；要读书不要当官，不给国民党当炮灰……这位少校被弄得狼狈不堪，真是兴致勃勃而来，灰溜溜地败兴而归地退出了会场。

为了提高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常虎臣（五期生，九三胜利后入上海交大，1947 年秋转入长大）从上海购买了二十多种进步书刊，其中有《历史唯物论》、《世界史》、《中国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理论书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以及《展望》等进步杂志。方锦业还从市内一个同乡家弄到一本《列宁主义问题》。这些书刊

大都藏在那侃宿舍的地板下，由那侃负责秘密地传给民青支部成员和积极分子阅读。杜仲舒、胡越民利用夜半人静的时候，将宣传品悄悄地放进文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同学的书桌里。冒险传播真理。

在和同学们接触过程中，那守田、方锦业研究认为两个问题影响同学们对当前形势的认识，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一是承认形势有利于东北解放，但看到蒋介石有美国做后台，疑虑共产党能不能彻底胜利夺取政权；二是国民党黑暗腐败失去民心，但对共产党的“流血斗争”也有看法。他们觉得前者是对共产党的信赖问题，后者是如何正确认识土改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他们召开了一次有部分民青成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参加的漫谈会。方锦业根据陈少中向他们布置任务时讲的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着重谈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各个击破，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宣传人民解放军三下江南取得的辉煌战绩。王若光、石维奎（均为伪满军校五期同学）谈了根据社会发展，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这些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武装了同学们的头脑。

土改问题涉及到对民族工商业、浮财处理，对恶霸地主和一般地主区别对待等政策性极强的问题。方锦业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大家有工作热情，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但对这些政策性问题，却缺少说服别人的能力”。他们认为，在土改问题上，对于大多数同学，包括民青成员来说，要解决的是立场问题。当时在校园内有人哼唱《谁养活谁》，这首歌，用通俗的歌词，说明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根本道理。他们在民青成员和积极分子中间，传抄这首歌，引导同学们从立场上来认识土改。这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效果还真的不错。

1947 年 10 月 11 日民青支部在长春大学的两个小组因工作经验不足，重要材料失密，组织暴露。那守田及时通知各组的民青成员紧急撤离长春。但在撤离长春过程中，胡越民不幸在长春车站被捕。之后，袁学群及其爱人李若倩也被捕。长春解放前夕，

胡越民被活埋，李若倩在狱中被国民党军官奸污后惨遭杀害。袁学群虽然于1947年12月中旬在沈阳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自首书，但仍未得幸免于死。曾参加爆破海上大楼弹药库的钱泽球，也不幸被捕牺牲。

（作者为军校五期生。离休前为沈阳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主任）

武装保护长春警察局

汪静岳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时，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所有房屋、设备、档案、武器、弹药、马匹、车辆和通讯设施等无一受到破坏，一些所谓的犯人还得到释放。其原因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敌人内部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武装保护的结果。

1948年5、6月间，当时东北局城工部吕天同志的地工郭群同志和刘群同志（他俩都是军校三期生）虽然都是地工又是同学（他俩横的不发生关系），当时却互不了解，也没有接触。但他俩不谋而合，当时都要开展市警察局的地下工作，都物色了市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兼警卫队长，年仅二十四岁的吴守中（现名吴枫，军校三期生，现在市名特食品商场任副经理）。吴当时感到国民党已腐败透顶，前途无望，想去解放区或找我地工关系投身革命工作。由于吴和郭、刘都是伪满军校同

学，比较熟悉，所以在6月，郭和刘分别都发展吴做地下工作。分别布置给吴守中的任务，都是了解掌握市警察局的动态，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和局调查股特务的动向，控制武装，以便在解放长春时保护好警察局一切房屋设备、武器弹药、通讯器材和敌伪档案。

刘群同志同时还接通了李景泽同志（军校五期生）的地工关系（因李回解放区）韩文增（军校五期生，当时也在市警察局工作），也向他布置了同样任务。

吴、韩接受任务后，多次将警察局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变动和局内的特务活动情况分别向郭群和刘群同志做了汇报。对当时分布在警察局系统的50多名属于敌特警班毕业的特务情况掌握的比较详细。由于局长袁家佩和特警班不是一个派系，便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极力安插长春警校警官班的人，把这些人看成是自己的人，吴守中由于是警官班毕业的，袁任命他当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兼警卫队队长，但他却不知吴已成为我们的人了。吴利用这个关系，极力和人事股王久春、胡振涛两个股长搞好关系，利用他俩积极安插我们的人。经过吴的积极工作，将一批可靠的人拉过来进行安插。如当时在市长尚传道和局长袁家佩家的警卫班中，吴都派了自己的人负责这两处警卫。在司法科管犯人的是我地工樊喜英，管服装的有聂士林，管武器弹药的有尚士英，大队所属三个队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人。在警卫队，由于吴、韩担任正副队长，就直接控制了这个队。车巡队的队长王作礼是松江保卫部侯诺青同志所属的地工人员，虽然不是一个地工系统，横的不发生关系，但工作是不谋而合的。骑巡队代理队长阮守一（原分队长、军校六期生）和局秘书张浩（张文超）也是我们的地工人员。

为了把搜集到的警察局的和其它的有关情报及时送往解放区，韩文增同志几次掩护交通员李勤（十八岁）出入敌人卡哨，完成了情报递送任务。为宣传我党我军政策，韩将复印的《告困守在各城市蒋军官兵书》传单，秘密在市警察局内和人民广场散发，

这些传单除起了宣传和瓦解作用外，由于它出现在敌人的鼻子下面，吓得敌人胆战心惊。

9月，长春解放已经临近，为了抓紧准备迎接解放的工作，在近埠街七号吴守中家里，吴、韩等人专门研究了如何抓紧掌握武装，以保护好警察局的问题。并于10月上旬，又在崔克家进一步共同研究武装保护好警察局的问题，同时确定由各单位的地工同志自行制定标志，包括使用红袖标、红旗、印章等具体问题都做了安排。

准备工作在10月15日前虽大体就绪，但在警察局内有一个100人的敌加强连驻守，这一直是保护工作的障碍。为了在必要时争取或拔除它，吴经常和这个连长打交道、套近乎，多次送酒给他喝。10月16日，我军已进入市区，这个连撤到电信大楼，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吴便迅速接替了他们，把大队的人马重新进行了组织，加强了岗哨和巡逻力量。

10月17日，警察局长袁家佩突然通知，让吴守中到他家去，当时不知何事，因局势比较紧张，为防万一，吴做了两手准备：一、如果袁要抓吴，就和他拼了，所以吴带两支手枪去的；二、如果不抓吴，那就见机行事。吴到袁家门外，便对吴派出的警卫班长宋义民说："我进去后，如果听到枪响，你把他们所有的人全打死！"吴进屋后袁便让座，没有抓人的迹象，当时屋内还有总务科长吴荣和刑警大队长何群在场。袁说："现在情况不得了，突围也突不了啦！"吴便问："那怎么办呢？"袁说："现在正商量"。实际并没有商量，他便写了几张任命的条子，任命督察长张翁石代理局长，吴守中代理警察大队长，张浩（张文超）代理督察长。吴便问："袁局长本身怎么办呢？"袁说："潜伏起来呗！"吴一看袁是要金蝉脱壳，心想如能把袁弄到自己家就好控制他了，便说："那上我家去潜伏吧！"刑警大队长何群说："不行！袁局长是四川口音，容易被人发现，上四道街小李子（是局总机的女交换手）家吧！"吴一听，认为这样也行，因为这个小李家吴也知道，过去小李子因

夜间值班害怕，曾求过吴，吴给她派过站岗的。从此袁便到小李子家去了。

由于吴被任命为代理警察大队长，成了大权在握的人。张翁石也从家里打电话给吴，让把武器保护好，这使吴更有了合法的借口来负责保护警察局了。在当天吴便加强了警卫力量，严密封锁了警察局，并下令，所有的事必须通过吴，否则不准乱动。第二天清晨下令给门岗，就是局内人来也不准进人。当何群大队长来时，岗哨请示吴说："何大队长来了，让不让进?"吴为了控制他，便说："让他进来!"，何群这个人很能看形势，一进屋便说："我是来请罪的!"主动把枪交了出来，把警服也脱了，然后问吴："有啥事没有?"吴一看他已交枪，便说："没啥事了，你回家吧，等待长春解放。"

10月16、17日两天，吴按照原定计划，又进一步将人员组织一下，让他们各负其责，并将七名犯人释放，张浩将各屋贴上封条，吴守中和韩文增将警察大队组成新的公安大队，刻了新的公章，从队长到队员都带上了新制作的红布袖标。吴守中将各屋的钥匙和所有公章全集中在自己手里。

这时唯一的问题是电话总机没有人了，吴便亲自到在局后面宿舍住的蒋凤琴（30来岁，当时尚未结婚）家，找她来担任电话联络工作，开始她因为害怕，说啥也不来，经吴反复动员，并以枪担保，答应给她放一个岗哨保护她，她还是不愿来，最后是她妈说了话："你看吴队长这么说，你就去吧!"这样蒋凤琴才勉强的来了，吴将一支手枪放她家担保（后来她把枪返给了吴），在总机机房吴派个人站岗保护她，这才解决了电话通畅的问题。

18日，除市银行敌军尚在抵抗外，市内已全部解放，有一个连进到警察局，吴的公安大队紧密配合，吴和解放军的连长一起指挥，在警察局的平台上和银行顽抗之敌对射。这最后的战斗直打到半夜才结束。敌新七军投降，长春获得解放。

我公安总队进驻，吴才将岗哨撤出。随后，于方初、薛焰、侯

诺青、李从仆等公安局领导率领二十余名同志到来，正式接收了一个没遭到破坏，一切设施比较完整的“警察局”。

解放后第三天，吴守中同志随同赵鼎科长坐车到小李子家，把袁家佩抓住，带到市公安局。至此我地工人员在敌警察局的任务胜利完成。

策反与保护

汪静岳

伪军校三期生刘群同志在1947年6月经廉荣春介绍参加了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石迪所领导的地下工作。由于开始时有的关系没有打通，没能进入指定地点。在接受策反五十六师任务后，便和组织失掉联系。所以于1947年10月同东北局城工部的吕天和地工马庶民（现名李景泽，伪军校五期生）发生关系，便在长春开展工作，直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

敌营策反，加速机场解放

长春大房身飞机场，1946年被国民党所占据，这是国民党在长春唯一的重要空中通道。因此国民党一开始就派重兵把守，1948年初又派新七军五十六师防守，国民党以为这样就可以确保飞机场的安全。然而恰恰相反，就是这个部队在1948年5月24日我军进攻飞机场时前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全部击溃，飞机场从此被我军完全解放。

这次我军攻打大房身飞机场，所以能迅速解决战斗，除了我军英勇战斗和其他地工组织作了工作外和我地工人员刘群同志等打入敌军内部，策反了驻守在其背部重要阵地的近一个营的敌军有直接关系。因为有了这个缺口，就为出其不意的全部消灭其它敌军，完全攻占飞机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 年 10 月东北局城工部吉北联络处通过李景泽派刘群同志打入敌新七军五十六师搞策反工作。刘群首先找了姜旭（原名姜兴跃，是刘在伪军校时的老师），因姜和该师上校副师长田钟谦（原名田洪图）比较熟，姜便领刘群到师部，经姜介绍，田答应把刘留下来，但说还得和刘德溥师长（五十六师的少将师长）研究一下，田领刘见到刘师长后问刘群过去在那个学校毕业，都干过啥，刘群都一一作了回答。刘师长最后问："有许多地方可去，为啥偏到这来呢?"刘群回答说："听说刘师长指挥有方，爱护部下，所以特来报效"。刘师长一看这个人还行，便把刘群安排到一团输送连当一排排长。但因这个连是搞输送的，没有多少兵，作为地工在这个地方是不好发挥作用的，刘群经团上尉副官唐崇泰（过去伪军校同学）疏通，到副官室当了中尉副官，掌管人事调动。因刘、唐有上下期同学的关系，又都在团部从事副官工作，住一个寝室，经常在一起。经过刘的工作，便 正式发展唐崇泰为我地工人员，给他的任务是争取较好的军官，进行策反。这个团的团部当时在西广场市女子中学驻防，1948 年 1 月，一团被调到大房身飞机场驻防。同年 2 月全师调到飞机场担任防守任务。

到飞机场后，刘群同志感到这个时机很重要，急需直接掌握兵权，便和唐研究如何下到连队，掌握武装的问题。为此刘群利用他和一团中校副团长徐又达都是开原老乡的关系，趁二营五连连长王贤生调走的机会，到该连任代理连长。这是刘答应给徐二个空额（就是吃空饷）才当上的。同时唐崇泰也借团长更换，新团长带来自己副官的时候，主动要求，到二营机关枪连当连长。这样，我们开始就在二营的 4 个连中直接掌握了 2 个连。以后，二

营调到飞机场背后驻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如此处一失守，飞机场则完全陷于孤立。因此把二营的策反工作搞好，对我军进攻或解放飞机场是非常有利的。

当时二营分为两部分驻防。一部分是五连、六连、二机连和四连的 1 个排，驻在李家屯小山上，这是一个制高点；另一部分是二营营部和四连的另 2 个排，驻在小山阵地北部约 1 华里、公路边的一个小屯子里。

刘群同志等针对二营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政治上比较顽固的特点，相应的做了些分化瓦解的工作：

一个办法是对各连一些可以争取的骨干分子进行了争取。五连的崔排长和王排长，二机连的李排长和一位班长，六连的陈排长都经过刘群和唐崇泰的工作，争取了过来。特别是六连暂时代理连长的刘排长经过唐崇泰谈话后也争取了过来。他们都是青年军官，接受新事物较快。

另一个办法是进行掺沙子，调入和吸收一些可以为我们工作的东北籍官兵到这些连里来，刘群把在别的连当事务长的白连芳要来担任五连的事务长，把我方地工负责人李景泽同志安排在五连担任文书工作。在二机连里掺进一个少尉排长沈永奎。另外掺进几名东北籍的班长和士兵到这几个连里来。四连的一个排的排长经过工作也表现得不错，倾向革命。

这样，李家屯小山上这个阵地基本上被我们的地工关系所控制。

为了把策反工作开展得更广泛，刘群和唐崇泰曾在 4、5 月间，先后串连一营营长赵喜禄，一连连长逯勇武、三连连长李俊祯、三营七连连长王大骏、八连连长孟宪常等人，为我们工作（这些人在以后解放飞机场的战斗中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这时离长春解放估计为期不远，刘群同志考虑，要解放长春必先打飞机场。为了加紧工作，松懈敌人的斗志，削弱敌军，经过研究采取了不积极修筑阵地，把步哨放近以及对士兵中的散漫或违反军纪的现象

（如睡觉脱衣服、赌博等）不加制止等措施，以降低敌军战斗力。这种情况被二营代理营长吴宣凯（这个国民党嫡系军官很反动）检查时发现，大发雷霆，说："你们是倾向共产党怎么的？"以后还派排长杨××暗中监视刘群同志。刘当时认为，你们没啥根据，我不怕。刘群同志为了对付和惩罚他们，将在附近活动的国民党谍报队、建军和土匪等说成是解放军，缴了他们的枪，没收了他们的马匹和其它物资，并将此作为清剿解放军的战绩上报营部，使敌人对刘无可奈何。

1948 年 5 月 23 日为了向上级汇报和听候进一步的指示，刘群和李景泽商量，决定让李回解放区汇报。李景泽同志到达解放区后，首先向我军介绍了敌大房身机场的防守情况及二营阵地的内部情况，以便我军进攻时考虑。然后才去九台向上级汇报。

李景泽走后的第二天即 5 月 24 日拂晓，刘群接到前沿步哨报告，说前面有部队活动，刘说："别着急，可能是降大杆子（建军土匪），我去看看！"刘骑马到前面一看是我军第六纵队十六师，便同部队负责人联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后，根据我军要求刘群同志迅速回到阵地，便把驻守在这个阵地的四连（缺二个排）、五连、六连、二机连的官兵紧急集合起来，然后宣布：我们投向解放军！随后解放军也很快赶到。整个队伍便由解放军接管了。前后只用十几分钟的时间便解决了这个决定飞机场命运的制高点。这时天还没有亮。

解放军的刘副司令员、政治部王主任、王团长和侦察科长冯庸同刘群同志见面后，请刘群介绍了飞机场敌军配备情况，部队领导决定由王团长这个团直插敌后背，从正门攻入飞机场。这时敌军三十八师的一个加强营从后方来接应，刘副司令员便命令我军的预备队上去，把这个加强营打了回去，随后敌军二营部和四连的二个排也被我军强行解决了。紧接着我军主力从敌人背后乘虚而入，直接插进飞机场敌军指挥所大楼，使敌军指挥失灵，陷于混乱状态。正面进攻部队将敌军前线阵地切成数块，分割包围，

南面和中间之敌不到一小时便被我军击溃。最后只有西北角占据碉堡群的敌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也被解决了，整个飞机场的战斗前后不到 3 个小时时间就结束了。战斗结束后我军经过大屯山到长春堡吃午饭时，敌人派来 2 架飞机，转一转看一看，扔几个炸弹就逃之夭夭了。从此大房身机场就一直被我军控制，再没被国民党占据。

动员职工保护军工厂

长春解放前，在三马路西南角，蒋军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设有一个军用汽车修理厂，代号 324 厂。这是一个有 200 多名职工，担负长春所有大、中、小军用汽车的修理任务的军工厂。这个厂有 30 多台机床设备，能自行制造零配件。同时还有发电设备，能自行发电，供给附近 7 个电台使用。其中包括国民党省政府、联勤总部和敌军统、中统的特务电台。由于重要，敌人专门配备一个排的兵力，进行严格警戒。

1947 年 7 月刘群通过伪军校同期生赫长龙（当时是自强中学教师）了解到这个工厂的情况后，便决定对该厂进行渗透，开展工作。

当时在这个工厂担任警卫排的排长叫解英超，原名解宝文，也是伪军校的三期生，刘群早就认识他。赫长龙说，他已看透国民党腐败透顶，迟早必然垮台，所以他积极找关系，想投向革命。刘群同志直接和他接触几次后，便将他发展为地工人员。

要想在解放时把工厂保护下来，当时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一些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想出卡哨回老家，如果人都走了，对我们保护工厂恢复生产非常不利。于是刘群同解英超研究无论如何要把人特别是技术人员留下来，他们便找一些比较进步，并在职工中有影响的积极份子向他们作工作，宣传我党对知识份子和职工的政策，动员他们并通过他们向群众宣传，希望他们能留下来护厂，解放后继续搞生产建设。当时首先找到比较有影响的工程师程忠祥（哈工大毕业，当时是该厂重要的制造车间负责人，解

放后被我们选为人民代表，担任材料试验机厂副厂长），到家里和他谈话，开始时他顾虑我们以后能否对其信任和重用，经交待知识份子政策，打消了顾虑。以后他串连好几名技术人员，为我们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在一般职工方面经分别找有影响的技工、职员和财会人员刘俊泰（为我市交通局副局长，已离休）、唐学俭、刘振声等人谈话以后，他们都为我们积极宣传，解除职工思想顾虑，动员职工积极参加护厂。但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方面的厂长赵文厚和一名工程师却积极煽动职工出走，说什么，八路军来了没有好，能走的走，上关内去，或者回家。他们极力阻挠这些人留下来。虽然他们作了反面的工作，但由于我们已经在此之前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反面工作未起作用，全厂职工都留了下来，大部分职工积极参加了护厂工作。

进入 10 月临近解放时，我们对参加护厂的职工发给袖标，通过地工解英超排长和王志远班长等做了警卫排的工作。把原工厂的枪支发给了比较可靠的职工让他们武装护厂。10 月 18 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解放军已开到大经路一线，当时情况比较混乱，警卫排和护厂职工坚持昼夜站岗放哨。这时厂长赵文厚和一名工程师又从中挑拨关系，还让职工离开长春。被刘群等同志发现后，当机立断，将他俩拘留，解放后送去解放团学习改造。同时刘群和解英超还收缴了国民党省政府、联勤总司令部等处的电台，并按政策给每个报务员发 50 斤高粱米遣返回家。解放时协助我军第一兵团司令部供给处又在伪皇宫、忠灵塔、西安大路、西广场等地收集 300 余台军用汽车（包括 12 辆大卡、中卡、炮兵牵引车、指挥车、吉普车等），有些车辆经这个工厂修理后，在部队南下时为我军所用。解放当时刘群同志被我东北军区军工部任命为副厂长。

这个工厂在解放后，改为我军的坦克修理厂，也随军南下，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该厂又迁回长春，成为现在的吉林柴油机厂。

吉林青运回顾

关 巨

“八·一五”光复后，我回到了故乡吉林市。当时苏联红军进驻不久。主要街道由苏联红军执勤，行人稀少。在我家附近电线杆上，贴着中共吉林特别支部的《告市民书》、《告工人书》、《告青年书》等。见到这些，我非常高兴，希望能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斗争。但找不到特支的同志。这时，东北青年同盟的赵钝（赵书纬）来吉林市找建大同学李萤（凌振礼）、关益。关益是我的弟弟。我通过弟弟认识了赵钝。大家都感到在家呆着无所事事，实在可惜。经过商量，成立了“自体研究班”。这是个学习组织。所谓“体”是体会、理解之意。“自体研究”就是在自学基础上，开展学习、研究活动。“大家都是学生，也都是先生”。研究班以赵钝、李萤和我为主，成员有10余人。多是伪满军校四期以下的同学，如蔡显丰、张洪钧、王果夫、郭振东、郑广智、王尚荣、王文达等，还有伪满建大一

些同学。研究班开始在成员家里学习，后来人多了就移到三道码头、巴虎门外的中学课堂里去了。

在苏联红军军管下，国民党公开挂出牌子，扩充势力准备迎接“中央”接收；共产党尚处于地下或半公开状态，斗争十分激烈。在这种形势下，“闭门读书”是不可能的，现实促使我们不能不考虑时局的发展、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前途。因此，自体研究班不仅学习文化，还学习讨论政治。专设“国共研究”一项。赵钝参考过去看过的《中国近代史》、《民族解放运动史》、《边区见闻》（日本朝野文男著）等书，写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一稿给我看。我认为很好，要他在研究班上讲讲。这天来学习的学员比哪天都多。伪满军校四期以上的李养芝、纪鹏飞、王亚江等同学也前来参加听讲。听课人情绪高涨，反映强烈。因为过去长期在日伪统治下，消息闭塞，对共产党不了解。听后对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作用有了一些了解，增添了新鲜知识。多数学员有一定启发。但也有人对此产生抵触情绪，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

这期间，我们在街上，看到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编印的《前进报》。它又一次触动我和赵钝找共产党的念头。共产党没有公开上哪里找呢？赵钝想到，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找到工会就可能找到共产党。10月的一天，赵钝在南大街找到了吉林市工人联合会，见到工会主席关慨，说明了来意。第二天中共特支组织委员郑墉接见了他。谈了许久，要他想办法把吉林市的青年工作开展起来。赵钝详细汇报了办自体研究班的事，并提出急待解决的问题。郑墉听后很高兴，给他以鼓励，并表示若有困难，愿意帮助解决。第二天特支就把一栋楼房腾出来，给我们使用。以后，我持特支白辛写的介绍信，用大车从八百垅原师道大学拉来些桌椅和办公用品。这之前，赵钝回长春一次，见到光复时建大的一些同学组织的东北青年同盟已分裂。以田夫（戴东明）为首的一派倾向共产党，成立了新青年同盟；以王金照为首的一伙倾向国民党与三青团，称为东北青年联盟。赵钝回来，将这些情况

汇报给特支郑墉同志，经研究决定将我们的组织名称定为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经推选，赵钝为主任、蔡显丰为副主任、我负责总务、张洪钧负责组织、郭振东负责宣传、李萤负责学习。伪满军校同学共有 9 人参加，建大同学有 4 人参加。会上讨论通过了章程草案。会议还决定举办文化补习班。李萤和关益到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办了备案手续。至此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正式成立。自体研究班宣告结束。

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挂出牌子后，不少青年来索取盟章，要求参加，也有一些社会人士来询问情况。小学教师安维泰看过盟章后，要求立即参加，还动手帮助油印盟章。11 月 3 日在中共吉林特支办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募集盟员的启事，公布了盟的宗旨、行动纲领、工作任务及新盟员入盟手续等。11 月 7 日又在报上发表了《告男女青年同胞书》。11 月 11 日举行了首批新盟员入盟式，有 200 多名男女盟员参加。王成林代表中共吉林特支讲了话，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为青年指出前进方向。

入盟式后盟员开始了学习。按文化程度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习文化和时事政治。盟干部多数都兼文化课。赵钝教英语、李萤和关益教俄语、我讲几何、郭振东讲三角、张洪钧讲代数、蔡显丰讲化学、郑广智讲物理……时事政治课主要是自学讨论，请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讲课。

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干部和军队于 10 月下旬，已到吉林，军队驻在市外。抗联、八路军中有的干部战士到同盟来。我们请柳连长、陈指导员做报告，讲述他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11 月 8 日中共吉林市委成立，市委派肖丹峰来盟指导工作，公开身份是政治课教员。肖丹峰白天给盟员讲时事政治，晚上以读书会形式组织盟干部学习政治理论。他以鲜明的政治立场讲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他还组织我们学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组织部分人阅读《中国共产党章程》。赵钝是 11 月 1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和李

萤、安维泰是11月中旬经肖丹峰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小组长是赵钝。12月初肖丹峰调桦甸县任县长。市委派民运部长徐国藩（朱济凡）、宣传部长高景芝来领导新青年同盟。

新青盟从成立那天起，就存在矛盾与斗争。盟内有的伪满军校同学，光复后曾到国民党部学习过，看到国民党黑暗反动，对国民党有所认识，但对共产党却认识不清。他们强调新青盟应是所谓真正的群众团体，不涉及党派。他们看到成立后的新青盟，与他们想像的不一样，就质问赵钝："新青盟不是无党无派吗？为什么把共产党请进来！"有的还说赵钝是"挂羊头卖狗肉"。社会上的国民党、三青团份子也来盟捣乱，甚至持枪进行恐吓。还有人散布："新青盟是赤色团体，对青年搞赤化"。所有这些，都影响了盟员的学习情绪。经过斗争，反对的走了，愿意学习和工作的留下来了。伪满军校同学除我一人外，先后都离开了新青盟。

肖丹峰走后，李萤调省公安处，安维泰到部队工作；以后赵钝、徐玉福（徐杰）调市工会工人训练班工作。新青盟主任由我担任。针对学员主要对两党、两军和苏美认识上的分歧，我召集了几次讨论会。经过激烈辩论，提高了学员觉悟。请李玉纯、高景芝来盟，以他们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二·九"运动。

12月，新青盟本部由长春撤到吉林。其中高狄、贾文、田真、龚缔、贾玉芝、马革等同志来我处安排了工作。有的不久又调其他单位工作。

12月22日，国民党派市长"接收"长春，并扬言还要"接收"吉林。根据市委指示，我带领盟干部，不顾敌人反对、威胁和咒骂，在三道码头、河南街、火车站一带用白灰书写标语、画漫画。标语是"要和平，反对内战！""要自由，反对压迫！""反对国民党强制接收，拥护还政于民！""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当我们在火车站写标语时，国民党的铁路警察持枪企图干涉。由于事先我和站前派出所我方警察联系做好准备，敌人瞪眼看着，无可奈何，嘟囔几句，溜走了。

伪满军校同学文尔昌到吉林市串亲戚与我交谈一次。傅润堂（傅大公）来，我给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要他阅读。以后他参加了地工和李应序来吉北看我。伪满军校五期同学王文达经过一段观察了解，认为国民党反动腐朽，又回到新青盟要求参加工作。高狄、贾文、田真等建大同学调出去充实文艺、公安、地方政权机关。我安排王文达担任盟的宣传部长，伪满师道大学同学张书田为组织部长。

长春被“劫收”以后，国民党阴谋煽动吉林青年学生盲目流向长春。我们用各种方式进行思想工作，和国民党争夺青年。我们召开大学生座谈会。请到长春回来的女师大同学侯××、工大同学王文则讲述国民党“接收”大员抢占房子、抢购黄金、欺男霸女等罪行，他们不关心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学校没有开学，说明“接收”是“劫收”，奉劝广大青年和同学们不要轻信一些人的谎言，以免受骗上当。这次座谈会效果较大。

我党在吉林的力量日益强大，成立了吉林市民主政府。1946年2月，各中学陆续复学。新青盟成立5个多月，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团结、争取、教育广大青年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为我党向各条战线输送不少干部。

1946年3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市委决定把新青盟吉林支部改为吉林市青年联合会。我被选为市青联会长。主要干部有张书田、王文达、相鑑（东北艺专同学）等人。伪满军校五期生张真（张志立）以后也参加了青联工作。

党对青年运动和青联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除永吉地委、吉林市委经常过问外，省委副书记张启龙、民主联军首长肖劲光来吉林市视察时都曾把我找去，听取汇报，指示工作。

青联在市内各中学先后都建立了青联分会。这期间，积极协助永吉地委、市委“吉林大学筹备组”招收新生，聘请教师。我和张书田、相鑑等多次去谢中、万金声等老教师家，请他们出来任教。地委宣传部长何锡麟到校任教务长。经过一段筹备工作，吉

林大学于 4 月 24 日正式开学。

4 月中旬，市青联发动各界青年贴标语、写感谢信，欢送苏联红军回国。在车站广场召开了欢送大会。张书田以市青联名义讲了话，关益担任翻译。大会开得隆重、热烈，既宣传了中苏友好，又扩大了市青联的影响。接着又发动各界青年热烈欢迎省政府迁入吉林市。这时我党力量在吉林市已经占了绝对优势。

“五·四”青年节那天，市青联在北山体育场召开了庆祝大会。会上何锡麟、我和各校代表讲了话。会后组织了大游行。队伍从北山脚下到临江门，又沿粮米行街直达市公安局东边的大马路。青年们边走边唱歌、呼口号、撒传单。游行结束，市青联又组织了几个街头演讲点。揭露国民党搞“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和罪行。游行和街头演讲，听引了很多群众，震动了整个吉林城。

第二天，在一个大剧场，我们举办了纪念“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大会。参加的项目有独唱、合唱、话剧、舞蹈等。各校都有节目参加。大会第一个节目是 200 余人的“黄河大合唱”，这是各校集体的节目，歌声雄壮、激昂，博得了热烈掌声。市青联杨镒和部队文工团帮助一中排练的反内战内容的话剧，深受观众欢迎。

市青联还组织学生开展护校活动。二中是一所工科学校。校内实验室机械零件和仪器多次被窃。我和王文达去了三次，帮助学生护校队在夜间抓了三个小偷，并进行了公开处理，师生反映很好。

经市委同意，市青联办了一所中学生综合宿舍。市政府拨款，占用一中一栋房，收容家在外地食宿困难的学生。我们派干部住在那里，一方面帮助学生搞好生活，一方面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读革命书籍活动。

1946 年 5 月中旬，我军开始战略转移，执行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主动撤出四平，22 日撤出长春，5 月 28 日又

撤出吉林。市青联干部多数撤到吉北地区开辟工作。

我参加松江大队撤退到五常待命。敌军主力在新站、拉法受到重创后，停止进攻。6月12日，我到中共吉林省委报到。组织部长白栋才任命我为工作组组长，到舒兰县西部地区筹集军粮和开展群众工作。该地区处于敌我争夺的拉锯状态。工作组和县保安团二营一起行动，途中和匪军发生一次战斗。工作组到白旗屯就抓紧购运军粮工作。在这期间，工作组成员伪满军校五期同学张真（张志立）出事了。一天夜里9时，我和两名同志工作回来，发现白旗屯被敌人占领。我们急速转移，在一个小村中找到工作组。可是不见张真。同志们说撤退时张真不走，要求留下。问他为什么？他说要看看中央军什么样。大家叫他走，说啥也不听，非要看看不可。情况急迫没能把他带走。群众说敌军来了，把他抓走了。以后如何就不知道了。经过几出几进的争夺，该地区基本巩固下来。

7月下旬，我们参加土改训练班。8月4日结业。工作组全员都编入中共舒兰县委所组织的工作队。我被任命为第一工作队队长。工作队政委为赵佩云（原县公安局局长、太行老区来的干部）。

我和赵佩云带第一工作队进驻敌军前沿阵地老爷岭山下的大北村。第三天，县委书记吴殿甲根据上级指示，调我到吉林市做地下工作。毛杰轩为我的助手。吴殿甲说："国民党军队侵占吉林市后，吉林市青年发生很大变化，想念共产党，有的要到解放区来，不知怎么办。'5·28'撤退很仓促，我们没有建立地下组织。还有个别党员没有撤出来。你过去在吉林市做青年工作，在青年中有一定威信。因此，组织决定派你去。你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地下工作点；为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指出方向；把没有撤出来的党员接出来。具体业务到缸窑找陈少中（东北局敌工部吉北联络处处长）商谈。"在座的还有军分区两名负责同志。

当天午后，我和毛杰轩（党员、吉林市青年）随吴殿甲从舒

兰到朝阳区。了解了敌情和交通情况后，在区委帮助下找到了一辆去过吉林市的大车。第二天我和毛杰轩化装成行商混入乘客中就去吉林了。大车到缸窑休息时，我到吉北连络处找陈少中谈了具体工作。

在缸窑上来不少乘客。这时，大车人已坐满。离缸窑不远，下起小雨，沿途无一人。接近乌拉街才见到人。大车没进乌拉街，直奔江北。快到江北时，路旁小树丛中突然出现两名国民党正规军哨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盘查了每个乘客，并搜了身，认为没有问题后才放行。从码头渡江，到哈达湾时已近日落时刻。这时，我们已到了敌人的第二道警戒线。侵占吉林市才两个月的敌人十分紧张。除在乌拉街一带设防外，在哈达湾更布置了严密防线，进行警戒。见一辆大车坐很多人奔驰而来。敌哨兵很远就大声喊叫："停车！""从哪里来的？"车老板说："从舒兰来的。"敌军排长一听就大声喊："北边来的一定有共产党！"几名哨兵围拢上来。蒋军排长喊："别叫他们跑了。快报告值星连长去！"一名班长立即去路西敌军司令部。此时，天已渐黑。敌班长回来报告说："值星连长叫把他们看起来，明天早晨再说！"敌兵就把我们押送到前边旅店住下了。我想第二天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行的。半夜过后，我轻轻地把毛杰轩唤醒，乘敌人不注意时逃跑了。

路上，我和毛杰轩研究了工作。吉林市青年和学校师生都认识我，必须注意隐蔽。进市区我俩就分手了。他潜入市内，我去市郊亲属关庆文家。分手时我俩商定的接头地点在铁路局西望云山下。

关庆文是铁路职工。到他家我换上了铁路工人制服。庆文兄说："每月查户口一次。前几天查过了。你可以安心住下来。"为应变方便，我住在房侧小棚子里。不料第三天晚上刚入睡，我们的住处突然被包围起来。敌连长带一排兵，边敲门边喊"查户口！"随着喊声，敌兵从墙上跳入院中。我没来得及出去。接着敲屋门。大叫"开门！开门！""查户口！""你家有没有外人？""庆文母边

开门边说："没有外人，只是我儿子同事的和老婆打架了。在这住呢！"到屋里，敌军连长就说："把他带来！"接着对我连唬带吓地审问一阵。按庆文母开门时说的，我沉着回答问题。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是在火车上烧火的。敌连长怒视我说："不对！我看你象共产党。"庆文母说："确实是孩子同事的。"问我家住何处，我说："住在梅河口"。"梅河口在哪个方向？"我往西一指，见我穿的是铁路工人服装，指的方向又对，就问我亲属敢保不！亲属说："敢保！"这场审问才结束。敌连长带一排人走了。后来才知道，敌人来搜查，是因我一人出入山岗小道，被人发现，报告了敌军。以后敌人又来抓我一次，可是，那时我已经走了。

通过毛杰轩和亲属，我每日在接头地点和要找的同志、积极份子相见。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向我讲了敌军侵占吉林市后的情况，群众反映，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动态。还给我带来国民党的报纸等材料。我要他们搜集些有价值的重要材料。了解好情况后，我决定让王文达留在吉林市负责地下工作。我向他交待了任务，安排了具体工作。他本想跟我走，经说服他同意了。他让他弟弟王文成当连络员。一切安排就绪，我和毛杰轩带着鲁振昌（党员）、刘玉新（原吉林市青联骨干）、王文成就回解放区了。到缸窑，我向陈少中讲了经过，并向他介绍了王文达负责地下组织和工作的情况。还到舒兰向吴殿甲和军分区负责同志做了汇报。然后我就回大北第一工作队工作去了。王文成接上关系后又回吉林市了。

王文达（伪满军校第五期学生）原是吉林市青年联合会宣传部长。撤退时他正在中学生综合宿舍，"5·28"江桥已炸，他没能出来。我到吉林市交给他任务，让他建立地下组织和负责地下工作。他先后在吉长两市建立了地下组织，在敌人内部进行了艰险复杂的斗争。在地工人员发动组织下，长白师范学院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抓丁的示威大游行，敌吉林市市长不得不出面接见学生，答应学生的要求。按陈少中指示，在长春的地工人员于1947年10月10日爆炸了新七军设在海上大楼地下室

的弹药库，打击和震惊了吉长两市的敌人。王文达负责的地工组织，主要配合我方军事行动，利用伪满军校同学等关系搜集提供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政治情报和资料。为争取国民党六十军起义，他们向军、师级军官投送我军领导写的信。还向解放区输送了20余名革命青年。敌人不断地受到沉重的打击，敌人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王文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吉林市解放时才获得自由。

（作者为军校四期生。离休前为吉林省职业师范学院主任）

解放同盟社

黄希群　于　争
张忠林　于纯仁

解放战争期间，辽北城工部在国民党统治的沈阳，大力开辟“第二战场”。1948年5月，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辽北地委城工部部长倪学源为沈阳市工委委员，辽北系统地工纳入沈阳市工委统一领导，工作更加活跃、扩展。“解放同盟社”是辽北系统地下青运组织之一，在辽北城工部的直接领导下，为解放沈阳作了不懈的斗争。

1　1946年下半年东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经过长期流亡，从四川三台迁回沈阳。同年11月，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结业，部分学生转入东大。当时东大学生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从三台迁来的，二是由临时大学转入的，三是由青年军、新一军、新六军等国民党保送的。1947年5月，京沪平津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东大在进步学生的推动下积极响应，于6月2日宣布罢课并准备上街游行，史称“六·二”学潮。由于国民党派兵封住东大校门，加上特务学生

的破坏，“六·二”游行只好改在校内举行。正值罢课期间，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校，同学们闻讯集拢，把朱家骅围在办公楼门前，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质问为什么要降低东大经费标准，要求东大享受一流大学待遇。朱家骅见事不妙，以让同学派代表商谈为骗局，慌忙乘车逃去。同学们抄捷径直追，扑向校门，跑在前面的政治系学生于清涛（现名于争、“军校”六期生）等人，带头把校门关闭，朱家骅乘的小车急转调头，但立即被同学们围上，朱家骅只得打开车窗，表示他回校长室去与同学代表谈判。然而，这个老家伙，又撒了一个大谎，从未及防备的东门乘车溜走。一些特务学生，为破坏“六·二”学潮，两次在汉卿南楼深更放火，而后反诬是“共匪学生干的”。许多求学型的同学，不明真相，上当受骗。接着，东大当局以煽动学潮为罪名，开除了 7 名同学。

面对上述一系列事件，许多觉悟较早的同学，由于势单力孤而心急如焚。当时，东大有无地下党组织，许多进步同学，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没有党组织关系的播火者便开始到校外去寻找参加革命的途径。文学院张忠林（杨枫、“军校”七期生）和彭亚彬两同学，于暑假期间到关内去找关系，因人已不在国统区，扑空回来。经济系学生黄华盛（现名黄希群、“军校”六期生）和政治系学生于清涛终于找到了北城工部的地工关系。1947年 8 月派黄华盛同志去解放区康平与辽北地委城工部部长丁丹同志接头。而此刻城工部长已由倪学源同志接任。黄华盛同志在康平见到倪学源部长后，提出我们想利用个人社会关系搞军事情报或到解放区学习的要求，倪学源部长指出党很需要在敌区开辟工作，要求我们搞学运，做学生启蒙工作，团结进步同学，发展地工组织。黄华盛同志乃确定以“可鉴”作化名同倪学源同志联系，而后返回沈阳。黄回到东大后，立即找于清涛讲了解放区之行的经过和倪部长的指示，同时研究了开展工作的办法和发展组织的对象。还规定对所发展的成员，只能单线联系，严禁打开横的关系的组织纪律。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黄、于二人便分别发展

了李公绰、张忠林、靖在中、张雷（沙青、“军校”六期生）、李彬（李昌源、“军校”六期生）、虞宪骅（吴江、“军校”六期生）、陈济忠（杜江、“军校”六期生）、林正心（林正欣，“军校”七期生）等同学。同时还扩展到沈阳医学院（以下简称沈医），在那里发展了谭同大（“军校”六期生）、刘德晋、王占一（“军校”六期生）等同学，初步打开了局面。并在活动中逐步形成核心，开始酝酿组建“解放同盟社”。

1948年2月中旬，“解放同盟社”在东大汉卿北楼召集首次核心组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黄华盛、于清涛、李公绰、张忠林、靖在中等5人，另外，还有铁路职工薄云路同志。会上，宣布“解放同盟社”正式组成及核心组成员分工。黄华盛当总负责人，负责与倪学源同志联系；于清涛协助黄抓全面侧重组织工作；李公绰、张忠林负责宣传工作；靖在中负责政工工作；薄云路负责工运工作。（后薄与倪单独建立了联系，退出核心组）。在组织建设方面规定：①核心组下设中心组或直属小组；②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不打开横的关系；③发展组织成员不搞书面手续，一般有核心组成员一人同意即可，政治面貌复杂的须经核心组讨论，必要时请示倪部长决定。这次会议是首次打开核心组成员间的横的关系。会后，将“解放同盟社”正式成立和会议的要求，按联系网络向下作了传达（未传达核心组成员名单）。

2 1948年1月，国民党沈阳反动当局决定在寒假期间举办学生冬令营，分为大学、中学两部。国民党办学生冬令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把学生关起来防止学潮。这一反动措施，遭到大多数学生的反对。东大、沈医和东北大学先修班（以下简称先修班）等校反冬令营的斗争尤为激烈。当时，我们解放同盟社虽尚未正式组建，但其基础力量已经形成。黄华盛同志正好要去解放区汇报建立组织事宜，乃在临行前同于清涛商议，确定串联同学对冬令营坚决抵制。我们的力量在东大文、法学院较强，核心组成员及

骨干十余人都是文、法学院同学，同住文、法学院宿舍圈楼，从而我们先在圈楼里，继而到理、工学院宿舍找熟悉的进步的同学串联，并利用校庭散步、食堂吃饭等各种时机，与其他地工组织达成默契，揭露国民党举办冬令营的阴谋，分析国民党的险恶用心。于是很快就形成了反对冬令营的舆论。学校反动当局见事不妙，搬来沈阳防守司令楚溪春，在红楼前召集学生开大会进行动员。虽说是大会，但到会学生只不过300人左右，楚溪春在台上讲，同学们在台下纷纷议论，有人还质问：冬令营的目的何在？在楚讲话中途学生又走了大半，他只好草草收场。东北反动当局，最后拿出威胁和利诱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宣布凡参加冬令营的发给一个月伙食费，在营里吃饭不要钱；另一方面宣布寒假期间学校停伙、停电，并声言凡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冬令营的开除学籍。有一部分同学家住解放区，考虑到不去冬令营没处吃饭不大好办。也有些同学说：去就去呗，你卖你的膏药，我看我的书，还争得一个月伙食费，何乐而不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新的对策。首先，继续坚持抵制，如果同学们都不去，学校也就停不了伙。其次，假如抵制不成功，就鼓动有家可归的同学回家，能找临时工作的去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参加冬令营的人数。同时，安排我们部分骨干力量参加冬令营，以便在冬令营内继续团结同学和敌人斗争。

抵制冬令营的斗争，在1月末开营前夕达到高潮。文法学院宿舍圈楼208房间，住9名同学，其中于清涛、张忠林、张雷（沙青）、李彬4人是我地工人员，另外孙国重（孙放、"军校"六期生）、崔维麟、（"军校"六期生）、高品卿（"军校"六期生）、康云升（"军校"五期生）、宋殿卿（"军校"六期生）等5人也一致反对冬令营。当防守司令部派车来文、法学院接学生入营时，于清涛和孙国重、崔维麟3人用整幅报纸写了"囚车"二字，在来的4台车上各贴一张，鲜明耀眼。有少数想上车的同学看到车厢上贴着"囚车"二字，也退了回来。围观的同学七言八语，有

人高喊“你们回去吧!”来接学生的车，无可奈何，只好空着回去。第二天，车到工学院宿舍工字楼，国民党已事先做好安排，特务学生带头上车：一些认为去也无所谓的同学也跟着上车了，采取抵制态度的同学只好也跟着走。文、法学院同学顶到最后，直到开营后又二次来车接，大家才不得不去。208 房间 9 人只去了 4 人，坐的是最后一辆车。沈医和先修班也同样进行了抵制斗争。先修班以不同意编入中学部为理由拒不入营，直到同意改编到在大学部才去，时已开营一周。

在冬令营内敌人控制极严，每个区队 30 人左右，设一名指导员，全由特务担任。我们到冬令营坚持继续斗争的地工同志，东大有于清涛、靖在中、虞宪骅、李彬，沈医有谭同大、王占一、邓玉朴（“军校”七期生）等。我们已事先约好，在冬令营内人自为战，见机揭露敌人，宣传群众。我们极力鼓动同学不去上课，不去出操。出操也在里面搅。有一次谭同大同志那个连出操，大家连说带笑。连长训斥说：“不要胡混。”谭说：“我们本来就是混饭吃的么!”引得同学们更哄堂大笑，弄得连长哭笑不得。上大课在励志社礼堂（现市体委篮球室内场地）能容纳两千来人，由于同学们讨厌国民党卖狗皮膏药，加上各个系统地工人员的鼓动，上课人数经常到不了一半，有时甚至只百十来人。就数东大张雁琛教授来主讲那次，听讲的人数最多，座席满了，还有不少人在后面站着。因为张雁琛老师是位进步教授，事先我们就在同学中造出舆论。张教授的讲题是《民主之真谛》，他说过去封建社会是主人打仆人，现在民主社会有个怪现象，却是仆人打主人。他风趣地说：“君不见，自称人民公仆的警察先生，不是常常打人民吗!”同学们哄堂大笑！张老师在冬令营的讲台上讽刺了国民党的假民主，回去便被东大当局解聘了。我们配合各个地工系统的同志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打击敌人的机会。冬令营伙食办的不好，便带头要求改善伙食，这很得人心。他们虽然口头答应改进，但不见实效。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大家骂砂子太多，我们就趁机鼓

动同学们端着饭碗去找事务长。事务长态度蛮横，不讲道理，惹得大家把饭桶给掀翻了。有几名士兵上来帮事务长争辩，大家劝走士兵，说不干你们的事，士兵也就陆续退去，事务长也只好软了下来，溜之乎也。

我们对敌人的揭露，由敌人的行动证实是准确的。在冬令营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周内，国民党一方面拉了一批学生参加了反动党团（80多人）；另一方面，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也是80多人）。这对广大同学又是一次现实的教育，使他们又一次看到国民党的狰狞面目。

3 1948年2月末，冬令营结束，学生返校。国民党继续对学生进行迫害。3月16日，东大当局又以“通匪有据”为由，公布开除80余名学生。我“解放同盟社”核心成员于清涛也在被开除之列。于疾恶如仇，好打不平，常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朽，同特务学生针锋相对，早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有人告诉于，在冬令营里所以没逮捕他，是由于他巧妙地麻痹了监视他的指导员。反动当局为弥补这个疏漏，决定先开除而后逮捕。但并非敌人真正发现他是我地工人员，被开除同学中大多数实与地工无关。同于一起反对冬令营贴“囚车”的孙国重同学也被开除，他就不是我地工人员。可见，所谓“通匪有据”，实乃诡言，不过是欲加之罪罢了。东大当局无端开除大批同学，本应就此向校方提出抗议，保卫同学读书权利。但当时学生自治会为反动势力所把持，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力量还很薄弱，在同学中尚无深厚基础。被开除的同学分散在各院系，一时也联合不起来，少数人讨保回校，多数人悄然离去。反对冬令营的失败和这次对开除同学不能有所做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今后必须更多地团结同学，迅速壮大进步力量，并争取改变学生自治会的颜色。

于清涛被开除后，暂隐蔽于沈医王占一、邓玉朴同志宿舍，不

久转移去辽北一地委城工部。同时我们介绍孙国重同学也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相继，李公绰同志又收到蒋吉斌提供的靖在中同志已被特务盯梢的可靠情报，乃让靖也转移去解放区。蒋吉斌虽系国民党员，但逐渐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决心弃暗投明，表示要把他所知道的特务学生名单和反动组织情况交出，然后请求送他和另两人去解放区。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由于于清涛、靖在中两名核心成员转移去解放区，乃增补张雷同志为核心组成员。

为了汇报建立组织和这段工作发展情况并取得城工部的指示，1948 年 3 月下旬，黄华盛、张忠林同去法库慈恩寺。倪学源同志肯定了我们这段工作，亲自审核了核心组成员名单，并将“中国青年”四字去掉，定名为“解放同盟社”。同时，指出要以进步书刊为武器，进行思想启蒙，壮大进步力量。进步书刊，确象明灯一样照亮青年学生前进的道路，许多青年学生往往先从书本上认识真理，我们本身就是这样。我们大家，一开始就是从共同阅读进步书刊，联系国家前途、社会现象、生活实践，促膝谈心，互相了解的。四青中姚志杰和周桂珍两位同志，为帮助同学进步，除秘密传阅进步书刊外，还通过领导她们的东大学生刘文章同志请董冷石同志给讲解《大众哲学》。通过在一起学习，先后发展 7 名同学参加了“解放同盟社”。当时，我们组织阅读的书刊有两大类：一类是公开出版的进步小说和马列主义著作，包括苏联小说《母亲》、《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政治理论书籍《反杜林论》、《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等等；另一类是解放区出版的小说、歌曲及《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为了避免敌特发现，我们包上或更换书皮，或者夹订在其他书籍中间。那时得到毛主席著作如获至宝。八一五光复后，当时的东北知识青年，一时对国情不甚了解，不少人上了蒋介石的当。毛主席的书，确实是唤醒东北青年的清醒剂。我们“解放同盟社”的同志，走上革命道路，十之八九都是同这些进步书刊分不开的。为了获得进步书刊，黄华盛同志与“三义书店”、刘玉令

同志与"华夏书店"、彭亚彬同志与"上海联合书店"建立了联系，可以从这些书店不断得到新的进步书刊。后来在倪学源同志的帮助下，张忠林同志还在开源（当时是解放区）建立了一个书籍供应点，由当地缝纫工人孙贵负责。对秘密书刊的传递十分严密，只限单线联系的网络传阅，各中心组设有专人联络。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一次毕天龙和王爱民二同志，往沈医送书，就被特务学生盯梢，好不容易才摆脱尾巴。

为了揭露敌人和宣传群众，我们在秘密组织传阅进步书刊的同时，决定秘密出刊油印《黎明报》。主编是李公绰、张忠林、李刚和张雷同志。早在于清涛同志未转移去解放区以前就筹办此事。于清涛同志把两年多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买的一个金戒指，拿出来交给了黄华盛同志，黄知于这个戒指是准备换手表的，就把自己的怀表送给于，然后又向要好同学借些钱，买了油印机、纸张等一应用品。第一期是在李刚同志家刻印的。李刚是黄华盛联系的一位校外同志，张忠林按黄华盛告诉的联络办法，在"三义书店"同李刚接上关系，李把张领到家中。第二期改在马玉珍同志家里。第三期又换了刻印地点。《黎明报》从4月到7月共出三期，换了三个刻印地点，都是在夜间刻印的。散发《黎明报》是"解放同盟社"成员一项严肃任务。头一次大家多半在夜间放到教室书桌里或者从门缝塞进同学的寝室里。同学们拿到后害怕，不敢保存。后来，我们改变了办法，放在或者贴在校园内同学们时常联系和通过的地方，如食堂、图书馆、广场、林阴道旁，一经发现就有很多人围观，特务学生拣到，大家也凑上去看。有时还抢下来读，他们也没有办法。长师王爱民、毕宝珍同志，为散发《黎明报》，在寝室里闭灯等到半夜，才到校园中去贴。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到处围看，校方训导人员发现，十分慌张，急忙叫人"撕掉"，可是此刻同学们早已看完，大笑散去。

从冬令营到4月末，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虽然敌人疯狂地逮捕和开除学生，妄图破坏我学运组织，但我们通过秘密串联

和传阅进步书刊等一系列活动，使“解放同盟社”由开始组建时的30多人，迅速发展到100余人。在“水平社”合并进来以后，增至200人左右。成员分布在东大、沈医、长师、中正大学、辽东学院、先修班、师专、中山中学、一中、三中、坤光女中、第四初中、三青中、三经路小学、西塔小学、铁路小学、陆军总院、中长路一疗所、铁西军工某厂等20多个单位。

“水平社”也是倪学源同志领导下的一个进步学生组织。它的发起人是长师学生毕天龙、中正大学学生张永禄（张强）、先修班学生刘玉令。毕早在1947年5月于先修班读书时，就去解放区康平，接受了丁丹、倪学源同志交给他们在沈搞学运的任务，并约定用化名“洪涛”联系。1948年3月初，毕天龙同志到法库慈恩寺，向倪学源同志汇报工作并请示营救冬令营被捕同学，倪指示他，要把进步同学组织起来。毕回沈后（这时长师经由抚顺迁回沈阳），便同张永禄、刘玉令等同学商议，分别在长师、先修班、沈医、中正大学、中山中学等校，先后秘密建立起“水平社”的基层组织。先修班基层社的成员最多，负责人是刘玉令、周长祺同志，沈医是高俊英，长师是毕天龙、刘忠俊，中正大学是张永禄，中山中学是费恩元、傅云生。“水平社”建立不久，毕天龙身份暴露，不能留沈继续活动。倪学源同志鉴于“水平社”一时无人与他联系，乃让它同“解放同盟社”合并。4月初旬，毕天龙、张忠林、彭亚彬三人，在先修班西北大坑里碰头，初步商讨了合并组织问题。继由“水平社”长师代表刘忠俊、先修班代表周长祺与“解放同盟社”核心成员李公绰、张忠林，在北陵湖边，又进一步做了磋商。议定了两件事：①东大负责编印《黎明报》，各校要组织稿子和负责散发；②各校独立开展反迁校斗争，对需要撤走的同志，仍由原系统送出。5月上旬，在孙中茂同志宿舍召开了合并后第一次会议，有李公绰、张忠林、毕天龙、刘忠俊、刘玉令、周长祺等同志参加，重点讨论了建立宣传站和反迁校斗争问题。合并后，毕天龙、刘忠俊、刘玉令同志参加了核心组。而

在5月下旬毕天龙和周绍先去城工部汇报时，倪学源同志把毕留在城工部。让周回沈负责联系原"水平社"一些同志。

4 1948年4月，沈阳早已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一个孤立据点。蒋介石来沈后，国民党决定把东大、沈医、长师迁往关内。为此，我们特派张忠林同志去城工部请示，并汇报"水平社"与"解放同盟社"合并的情况。4月下旬，我们在东大汉卿北楼召开会议，东大黄华盛、李公绰、张忠林、沈医刘德晋，长师刘忠俊、曹达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装做复习功课的模样，门口设人守望。会上传达了倪学源同学的指示，在利用学生会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并共同认为应该各自为战和互相配合。此后我们在各校的反迁校斗争便逐步展开。

东大校庆前夕，我们散发了第一期《黎明报》，中心内容是劝告同学认真读书，迁校对学习不利。当时，我们意在首先争取中间同学，以便反迁校斗争取得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因而我们对从三台来的一位正直而好学的同进行工作，动员他向同学们介绍颠沛流离之苦。他摇摇头，不肯承诺。可是，两天以后，在校园里却出现了未署名的诉说流离之苦的小字报。正在此刻，东大里发现了《五、四告同学书》，这对进步同学是个很大鼓舞，我们也感到斗争会得到兄弟组织的有力配合，心情很是高兴。但由于这份告同学书，口气太直接，并宣传了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些特务学生却乘机搞反宣传，说反迁校是"共匪的阴谋"。东大的"解放同盟社"同志们经过秘密串联，迫使东大学生会进行了改选，但只换掉了个别负责人，反动势力仍占统治地位。敌人利用有利于他们的力量对比，通过学生自治会的表决机器，做出了拥护迁校的决议。我们反迁校斗争，在东大未获成功。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决定让黄华盛、张忠林、刘文章、彭亚彬、李惠宗、于纯仁、林正欣等留下来坚持斗争，其他成员一律随迁，由李公绰、张雷负

责迁平同学的工作。

先修班里的“解放同盟社”同志（即原“水平社”同志）也积极展开了反迁校斗争。进步力量在学生自治会里也取得一定优势，但先修班是以东大为转移的，东大反迁校不成功，先修班自然要跟着走了。因此，确定将孙中茂、杨岳林、孙标武、常汝鸿、赵元良、杨永芸、刘庆沛等同学送往解放区，于纯仁、刘玉令、林兆洪、王瑞阁等同志留沈坚持斗争，周长棋、邵万增、金文栋、李宝生等随迁。后来，先修班留沈未走的学生不多，刘玉令、王瑞阁、林兆洪也相继去平。

长师争夺学生自治会的斗争很激烈。主席张继永以种种理由使迁校问题议而不决。不久张继永身分暴露，不得不去解放区。长师的反迁校斗争也未成功。刘忠俊、曹达等人留沈坚持工作，其他人随迁入平。东大、长师迁校以后，我们及时调整了核心组，由东大黄华盛、张忠林、于纯仁，沈医刘德晋，长师刘忠俊五人组成。后来刘忠俊自动离开“解放同盟社”，另找到别的关系，继续参加地下斗争。

沈阳医学院人才多、设备好，是全国少有的医科高等学府，敌我双方都很重视。黄华盛同志重点帮助沈医开展反迁校斗争。我们在这里有三个中心组，教职员工方面一个组，组长X光讲师安天佑；高年级学生一个组，组长刘德晋；低年级学生一个组，组长谭同大。三个组长都与黄华盛单线联系。另外，还有与于纯仁单线联系的高俊英。总计骨干20余人，骨干背后还联系着相当一批进步群众。反迁校力量，可谓雄厚。但主迁的反动势力也很猖獗。他们有教育部的明令，徐涌明校长坐平策划，代校长刘耀曦在沈指挥，特务学生王××把持学生自治会上窜下跳。斗争初期主迁势力颇占上风。4月，沈医院长和部分从关里来的师生，在北平成立了“沈医办事处”，并请北医教授给迁平学生上课。以此为诱饵，勾引在沈师生迁校。并派特务学生王占奎回沈竞选了学生自治会主席。此刻，在师生两个方面主迁势力都占据领导地位。因

此，反迁斗争关键一招，就是必须夺取领导权。

在学生方面，王占奎窃据自治会主席后，强奸民意，做出迁校的决议，并派代表赴平，请院长回沈主持迁校。因此，罢免王占奎，把学生自治会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使之成为反迁斗争的合法工具，实属至要。于是，首先展开宣传活动，在同学中揭露王占奎回沈搞迁校的骗局，抓住同学们要读书的心理，说明医学院有附属医院、医疗设备、珍贵图书、实验场地等等，不同于一般大学，不是到任何地方都能学习得了的。并针对东北同学的乡里观念，强调沈 医是东北人民的血汗筑成的，不能任意搬迁破坏。与此同时，利用我们已有阵地，开展罢免王占奎的活动，由麻贵筠、王占一、邓玉璞（皆我地工人员）配合其他地工系统，组织罢免王占奎的签名。“七·五”恶耗传来之后，同学们义愤填膺，时机成熟。麻贵筠、李山、王占一、邓玉璞四人，手持181人签名的《罢免宣言》，找自治会副主席陈希荣（北平学委地下党员），要求召开同学大会，罢免王占奎。在“七·五”追悼大会后的当天，陈希荣主持召开同学大会，罢免了王占奎，她被推举为自治会主席。接着改组了自治会。“解放同盟社”骨 干麻贵筠、王贵新（“军校”六期生）、刘民安、王维常（“军校”三期生）、王占一、王宏彬、（“军校”七期生）、李朝俊（“军校”六期生）等同志都在自治会中担任要职，谭同大同志任《沈医通讯》主编，掌握了合法的宣传工具。至此，学生自治会成为反迁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召开同学大会，否决了前届自治会“迁校”的决议，重新通过“不迁校”的决议，并要求赴平师生返沈。反迁校斗争在学生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敌人在失败之后，百倍疯狂，耍流氓手段，对我“解放同盟社”同志进行恫吓。一封属名《血衣社》的恐吓信写道：“同大君，勿失书生本色，汝再猖狂，当心汝命！”信封内还装有一颗子弹。王占奎把我“解放同盟社”五名同志列进黑名单报给警备司令部，刘民安、李朝俊同志终于被捕，直至沈阳解放才得出狱。

学生方面反迁斗争的节节胜利，一方面有各个系统地工组织，另外也有教职员工的密切配合。5月上旬代院长刘耀曦接到院长立即迁校的指令，召开各科主任紧急会议，下令立即做好迁校的一切准备。我“解放同盟社”组长安天佑同志，顺势提出成立迁校委员会的建议，得到采纳。刘跃曦任迁委会主任，安天佑、卢治平、娄焕明（卢、娄二人也是“解放同盟社”骨干）任迁校委员。我们建议成立迁委会的用意，在于削弱院长的行政领导权，把迁委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拖延院长的迁校指令。在迁委会上，我们总是以客观的态度，提出目前迁去北平的诸多困难。如宿舍怎么办？教室怎么办？实验场地怎么办？家属工作怎么办？毕业生 的职业怎么保证？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谁也不能不考虑，谁也一时无法解决。有一次，眼科大夫王××给我们扣大帽子说：“谁不打算迁，就是要把沈医留给共产党！”安天佑同志立即反驳说：“王大夫这话没根据，卫立煌将军说沈阳固若金汤，难道沈阳会留给共产党吗？你的话有动摇军心之嫌！”迁委会总是争论不休，议而不决，拖到5月末各科也没有搬迁的具体行动，院长又下令来催。校务会决定派三名代表以同学会（毕业生同学会）名义赴平向院长反映沈阳情况并看看那里的条件。这个决定是安天佑、卢治平事先同训导长刘刚商议好了之后提出来的。由刘建议派遣同学会会长卢治平、副会长娄焕明，及安天佑三人去平，同院长洽谈迁校事宜。三个代表都是我们自己人，事情就好办了。到北平先去拜访沈医前辈名流徐政闻等人，取得他们的支持，在北平召开了一次同学会，到会百余人，通过不迁校的决议。接着又去天津，开了同样的会，也取得多数老同学的支持。而后访问了迁平同学的住地孔庙、国子监等处，见到他们的生活惨状不堪入目。最后才去找院长，反映了在沈师生不愿马上迁校的意见。而此刻，徐院长也到处串连亲自去天津，找陆涤寰（沈医前辈、天津卫生局长）支持，回平在欧美同学会宴请徐政闻等，并邀安天佑等三人参加。席间通过徐政闻劝安等三人表态迁校。卢治平代表发言，以

院长送去。信中提出三条理由：①华北当局明令禁止东北难民入关；②中央银行限制东北向关内汇款；③在平东北同学被军警枪杀。院长看信之后，脸色大变，无理反驳，气得直摔扇子。他见迁校无望，7月15日乘机去南京辞职。仍把迁校事交继任校长刘跃曦办理。刘也坐镇在北平，让代校长朱逢春在沈主持迁校。朱是进步学者，我们通过安天佑同志做他的工作，他怕沈阳象长春那样被围，一家老小没办法。为此，我们特派刘德晋同志去解放区找倪学源同志请示，倪同意在必要时把他的家属接来解放区。朱逢春表示坚持不迁校并参加了"解放同盟社"。这时，刘跃曦还想迁校，把朱找到北平，要朱抓紧搬迁。朱说，事情太大，力不胜任，让刘回沈亲自主持。刘不敢回沈，迁校之议，乃彻底告吹。

师专本不属于迁校之列。但在一部分师生的蛊惑下，也闹着要迁校。我们"解放同盟社"在这里有一个中心组，组长李鸿珍同志，受张忠林同志直接领导。这个组有孙好瑜等4名骨干联系50余名进步同学。李鸿珍同志已考取长师，本应随迁去平。因工作需要倪学源同志让她留在师专坚持反迁斗争。她与张忠林同志共同分析了师专敌我双方的力量，认为在学生会中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利用学生会进行合法斗争不成问题。李鸿珍同志本身就是学生会理事，她和其他系统的地工同志们心照不宣，默契配合，一下子就使学生会做出不迁校的决议，并通过各科理事，分别传达到全体学生中去。为使决议能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团结争取有威望的师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能影响大局。美术科老师王盛烈，在同学中素负众望，李鸿珍日常就注意师生之谊，主动靠近王老师，在艺术科传达学生不迁校的决议时，李鸿珍同志主动征求王老师的意见。王盛烈老师说，"我看还是不迁好，到北平食宿都困难，根本不能好好学习。"一语千金，王老师这一说稳住了艺术科的阵脚。有几个闹迁校的同学，当场也不吱声了。师专闹迁最凶是音乐科，他们看迁不成就改为闹迁校。几个闹迁校的学生对大家说，他们保证给买好飞机票，音乐科老师也表示要跟

靠近王老师，在艺术科传达学生不迁校的决议时，李鸿珍同志主动征求王老师的意见。王盛烈老师说，“我看还是不迁好，到北平食宿都困难，根本不能好好学习。”一语千金，王老师这一说稳住了艺术科的阵脚。有几个闹迁校的同学，当场也不吱声了。师专闹迁最凶是音乐科，他们看迁不成就改为闹迁校。几个闹迁校的学生对大家说，他们保证给买好飞机票，音乐科老师也表示要跟着去。李鸿珍同志了解到这个科李春甫同学素有威信，他如不走，会起决定性作用，便找他谈心。李春甫也是一个进步同学，一经劝说，当即表态坚决不走，并参加了“解放同盟社”。他又积极找同学们谈心，结果音乐科也未迁动。师专近 400 名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留了下来。

5 1948 年 7 月 5 日，北平发生一场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国民党反动军队开枪镇压请愿学生，史称“七·五惨案”。我“解放同盟社”随迁在平成员都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

“七·五”后“解放同盟社”随迁同志，又积极参加了“七·九”抗暴游行。此后，张雷同志与北平学委东大支部书记韩光同志打通了关系，介绍我“解放同盟社”在平大部成员，先后参加了“PY”(中国青年进步同盟)，根据北平学委的要求，开展了新的斗争。

“七·五”恶耗传到沈阳，群情震怒。沈阳成立“东北在沈学生抗议‘七·五’惨案联合会”(以下简称“学生抗联”)。我们当即决定全力支持“学生抗联”的活动。东大政治系学生陈大昌(中共沈阳市工委青年文化系统的地工人员)，代表东大参加“学生抗联”并为秘书。为了使其代表身分合法化，我们发起成立东大留沈同学自治会，选举工学院同学肖品山为主席，而各学院理事则分别由我“解放同盟社”成员黄华盛、张忠林、于纯仁、李惠宗、林正欣等同志担任。这样既不是我们清一色，可以麻痹敌

人，我们又能完全掌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会上补选陈大昌同学为东大留沈同学出席“学生抗联”的代表，解决了他代表身分的合法化问题。并推选张忠林同志为联络员，负责同“学生抗联”沟通情况，联系工作，从而保证了我们同“学生抗联”的密切合作。

各院校的“解放同盟社”同志，都积极发动广大同学参加“学生抗联”开展的活动。“学生抗联”7月12日在中山体育场举行追悼大会，各校“解放同盟社”除组织同学参加外，并在校内开展相应的活动。沈医在校内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演出活报剧《许宅闹鬼》，并写追悼文《哭王明忱》（王是沈医去平学生，当时误传王在七·五遇难）。为了防止特务学生撕毁壁报，他们把壁报高高挂在电线杆上，还创造双层壁报，特务学生在夜里撕去一层，第二天一看，下面还有同样的一张。“学生抗联”决定7月27日在市府广场举行控诉“七·五”暴行大会并示威游行。师专为壮大会的声色，李鸿珍同志特请王盛烈老师带领艺术科全体同学，一夜之间画了一幅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揭露国民党“七·五”暴行的巨幅宣传画。画完以后，大家有点饿，王老师用自己家的白面给同学们烙了一顿饼吃。他们第二天把这幅巨画贴在小西门城墙上，极大的鼓舞了游行队伍的士气。

“学生抗联”号召全市各界在8月1日举行五罢（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罢职），遭到敌人破坏，未获成功。群众斗争情绪一时受挫。这时，长春大学部分同学迁来沈阳，住在东大工学院。师专也搬进了东大文法楼。为了鼓舞士气，我们决定8月5日晚上在东大校园举行一次营火晚会。由师专等各个地工系统出面发起。同时通过“解放同盟社”的网络，分别邀请东大周围的一些中学同学参加，并邀请“学生抗联”代表出席。8月5日晚上，东大留沈同学、长大、师专、三青中、五青中同学分别结队进入会场，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子。在火焰冲天、掌声四起中晚会开始。“学生抗联”代表讲话后，东大同学演出活报剧《魂兮归来》，是刘文章、

彭亚彬和张忠林赶编的，大意是受骗遇害同学，纵然不能生还，魂灵也当归来看看同学们的怀念和义愤之情，号召大家在血的昭示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中学同学表演节目后，师专同学唱起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并表演了秧歌舞，晚会达到高潮，灯光摇曳，边歌边舞，群情激昂，人心大振。

8月10日，“学生抗联”又组织一次“抗议非法逮捕大请愿”活动，要求释放齐玉林（学生抗联主席）等五名同学，我“解放同盟社”骨干东大张忠林、刘文章、彭亚彬，医大王贵新等都是交涉代表，带领东大同学参加了斗争。

此后，在敌人的高压下，“学生抗联”停止了公开活动，我们的全力配合也告一段落。

6 抗暴斗争结束以后，东大迁校已近尾声，只剩最后一批班机。我们便着手为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同志安排食宿问题。通过地工关系，黄华盛同志到西塔小学任教，张忠林同志到我地工人员郭梅臣同志开的新时代茶社去住，于纯仁同志与地工关系四中教员纪熙尚同志住在一起，林正欣同志也找到了住处，其他一些同志一时都无法解决。为解决面临的问题和请示工作，又派张忠林同志去辽北城工部，在法库慈恩寺见到倪学源同志。张回来说，倪学源同志对沈医、师专反迁斗争取得胜利，非常高兴。并告诉我们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比原来预计的快，大家要有迎接沈阳解放的思想准备，要保护好人民物资财产。留下来的同志的食宿问题要设法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就随最后一批去平。核心组认真讨论了倪学源同志的指示精神，具体安排了迎接沈阳解放的准备工作，把沈医和市政府大楼列为我们保护的重点，由黄华盛同志、张忠林同志分别同那里的地工同志负责。此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迎接沈阳解放的准备工作上来了，把相当的精力转向社会。

·送军事情报和散发《告蒋军官兵书》·9月下旬，“东北剿

匪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吴宗芳（“军校”二期生），交给黄华盛一份蒋军辽南辽西兵力部署的军事情报。吴是我军事情报人员，与黄互相了解，关系密切，因一时投递受阻，求黄代转。为了便于同倪学源同志联系机密事项，黄华盛同志早就研究出类似音乐简谱形式的通讯密码，这套密码已使用多次，只有倪学源、黄华盛和张忠林三人能够翻译出来。这次吴送来军事情报，同时我们也还有一些机密材料要报送，因此，又安排张忠林去解放区。张深感责任重大，把那张写在软纸上的军事情报，叠成半个火柴盒大小，放在球鞋外踝圆圆的胶皮内缝好，马上出发。倪学源同志收到这份军事情报很高兴，立即给军区转去，并把他的小灶让张忠林吃。第二天倪学源同志又特别叮嘱我们同社会人打交道要十分注意。张忠林同志老家在开原，那一带地理熟，多次往返解放区，总能化险为夷。这次急于回沈来不及把带回来的《告蒋军官兵书》译成密码，就叠成小块，切开一块肥皂放进去，又把切口密封好，觉得这样完全可以混过敌卡。不料，经过两天奔波，肥皂切口处裂了一道小小的纹，幸好敌卡哨兵检查时，只看肥皂正反两面，没看侧面，否则就会出大问题。在敌人翻看肥皂时，张忠林同志确实攥了一把汗。张回到沈阳向老黄汇报后，立即找陆军医院护士李珍同志，把《告蒋军官兵书》连夜刻写出来，在另一秘密地点印刷后，通过“解放同盟社”的网络分发下去。重点发给了民众自卫总队。有些官兵得到后，偷偷地珍藏起来，一直保留到沈阳解放。

·组织“抗命罢工”·10 月下旬，沈阳警备司令部命令沈阳民众自卫总队征集两万民工，加固沈阳城防工事。民众自卫总队部设在市政府内，辖一直属中队，60 人。区大队，各 200 人左右，全市总计 1200 余人。总队有“解放同盟社”一个小组，总队副张世洪、中校参谋佟成功皆是我地工人员，张世洪是组长。总队长王甦是张世洪的知己，各大队长、中队长多属张、王故旧，因此，“解放同盟社”在这里开展工作较有基础。王接到警备司令部的命

令后，就交给了张世洪，张立即找张忠林磋商对策。这项命令如果执行，不仅对我军解放沈阳作战不利，且坑害百姓，一定要坚决抵制。但如果硬是违抗，要遭到军法制裁。经反复研究，采取了假执行、真抵制、敷衍搪塞的两面手法，定名为“抗命罢工”。并为此组成了张世洪、王甦、佟成功三人领导小组。佟成功等到各区去假行催促。对铁西区田广文、和平区胡文玉、小西区高鲁峰、皇姑区刘万良等靠得住的大队长，就直接告诉他们看事做事，表面要积极，行动要拖延。对不太托底的大队长，就对他们说：不好办吧，别的地区也干不起来，暗示不要着急。安排中校参谋程福元，在总队部里专门应付警备司令部的催办。说“命令早已下达，各区正在动员”，“实在困难，正在研究采取强硬措施”、“天天挨户动员，男的一个也见不到”等等。就这样一搪二拖，直到沈阳解放一个民工也未抓。

·保护市、区政府和维护社会治安·即将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官员携眷乘机逃跑，军队频繁调动。

我们预感沈阳即将解放，为此，在新时代茶社楼上召开核心组会议，做出四项决定：①由郭梅臣通知孔宪荣部队营长魏铁山率领队伍保卫沈医，在学校周围布防，不准坏人窜扰，不得干涉师生员工的正常活动；②各区民众自卫队立刻行动起来，维持社会治安；③民众自卫总队部直属中队要妥善保护好市政府大楼，通知政府职员一律回家待命，除地工人员外，任何人不得出入；④各单位的“解放同盟社”成员，要坚守岗位，发动群众，保护好所在单位的物资、财产、档案，协助我军政人员做好接管工作。

10月26日敌沈阳市长董文琦在市政府二楼会议室召开科股以上官员会议，他装腔做势地安抚大家说“南京决不会放弃沈阳”，表示决心死守。当晚他便坐飞机溜之大吉了。佟成功负责监视董的行动，发现之后，即时向张世洪做了报告。张立即决定，调鲁高峰大队武装到市政府，协助总部直属中队，把市政府整个警卫起来。在市府各楼层、各局处、档案室、油库、车库、机关商

店等重要部位昼夜设岗。

28日，在市府二楼会议室，张忠林同志代表我地工负责人，同民众自卫总队部分队长以上人员会面，鼓舞大家积极完成维持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财产的光荣任务，为解放沈阳做出贡献。同时，总队部宣布军管市府，令职员一律回家待命，除我地工人员（各个地工系统），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市府大楼。为维持社会治安，总队部还出动宣传车，打出“维持治安”大旗，向市民公开宣传，以安定人心。大旗是程福元用市政府会议室一块白色大台布做的。上午10时，佟成功带领两台大卡车，一个排的兵力，全副武装，沿北市、小西、南市的主要街道行驶宣传。市民高兴，表现镇静。下午，车行至三经路口汇丰大楼旁，忽遭二〇七师巷战部队拦击，卡车后胎被打中，寡不敌众，佟急命司机开快车，乃安全返回。

29日，张世洪、王甦下令，让各区收缴散兵游勇武器。仅市直属中队29日当天就收缴200多支大枪，1000余发子弹，6台军车。

30日晨，有少数人企图乘乱哄抢市府商店。商店旁是汽车库，有20多台汽车，内有市长专用防弹车一台，还有几十桶汽油，如遭破坏，市府大楼也难保全，损失非小。围人越聚越多，达200人以上，三进三退。我们一方面由王甦总队长登台说服，一方面增加兵力，架机枪，上刺刀，以防万一。围人见无机可乘，逐渐散去。

30日晚，一个自称敌东北行辕主任办公室袁主任的中将级军官，领着十几名校级军官，坐两台汽车，冲进市政府，说周福成让他们来接管市政府。王甦、张世洪、佟成功把他们让进会议室，向他们要公函，他们没有。王甦说没有公函，口说无效。他们各佩短枪，神气十足，气势汹汹，意要动武。这时佟成功火速调来8名警卫，手持冲锋枪，把住门口。来人见势头不对，改变口气说他们车没油了，要借董市长车一用。佟成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市长专车不能外借。果真车没油了，可以给加点油。他们只好加

了一点油，狼狈离去。

11 月 1 日晨 7 时许，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太清宫，直至 10 时未见前进。张世洪等估计我们虽在市府广场驻扎有 400 余名武装，但是，还有二〇七师装甲兵一部，对解放军前进可能产生影响。乃派佟成功乘车前去迎接我军。说明所部是奉辽北地工人员指示保卫市府的。一位张副师长听我们说明情况后，派出一个排的尖兵，随我们进入市政府。张副师长也同车前来。途中缴了二〇七师那部分装甲兵的械。在我军领导进入市政府时，我们及其他系统地工人员和民众自卫队列队相迎，使市府大楼完好无缺地交给我军。

·保护沈医和各自所在单位·沈医是倪学源同志指示我们保护的重点，由黄华盛亲自负责。黄同安天佑、刘德晋、谭同大等同志共同研究，做了周密部署。事先通知张世洪集合民众自卫队和平大队控制沈医周围，保证安全。为此，向孔宪荣部队所属武器库借来 200 支大枪，5000 发子弹，武装了和平大队。10 月 26 日，民众自卫队在沈医周围设岗。相继，调动郭梅臣同志联系的孔宪荣部队一个连进驻沈医西侧。同时，安天佑同志组织可靠人员对贵重科学仪器存放情况，经常进行检查看管防止丢失、破坏。对极珍贵的暂时加以封存。如贵重药品和镭等是安天佑同志亲自封存的。在学生中组织起一支护校队，由谭同大亲自率领，昼夜轮番在校内巡逻。11 月 1 日早，驻沈医西侧的孔宪荣部队营长魏铁山和一名连长率领一连士兵起义。黄华盛同志向起义部队借大枪 17 支，手枪 1 支，交给谭同大发给护校队。张世洪同志又给安天佑和卢治平同志各借手枪 1 支。11 月 1 日夜晚，有伙国民党散兵，闯入医院捣乱。安天佑带领一些同志迎上去，先对空鸣枪示警，而后厉声晓谕歹徒，不要胡作非为，警告他们说周围兵力全听我们指挥。那帮家伙，看到难以得逞，便仓皇逃去。沈医终于完好地归到人民手中，接管沈医的校长说："连一块玻璃也没有碎！"当然保卫沈医也包括其他地工系统。

沈阳解放当时，除东大、长师和先修班早已迁走外，还有沈医、师专等 18 所学校和铁路、工厂、医院、机关等 8 个单位，有我“解放同盟社”地工人员 130 人左右。大家都同兄弟地工组织相配合，为维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财产，做出了贡献。如铁路小学的罗金阶同志与他联系的沈铁技术处、工务段的“解放同盟社”成员，组织了纠察队，保护了沈阳南站。由钱毅夫同志联系的铁西军工某厂的“解放同盟社”成员，把四、五箱重要技术资料，保存完好，避免了蒋军逃走前的破坏。中长路一疗所张瑞秋同志，平素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周围的人，先后发展 4 个同志参加我地下组织。还设法搞到从美国进口的贵重药品五、六磅，送往解放区。国民党逃走前，计划把贵重物资和技术人员带走。在她的努力下，不仅本单位未受损 失，还为外单位一位留下不走的技术人员解决了食宿问题。凡有我“解放同盟社”成员的学校，普遍组织了护校队。四初中校长是国民党顽固分子，他逃走后，我“解放同盟社”成员纪熙尚同志等立即负责领导，照常上课。师专“解放同盟社”的同志们，组织同学在校内张贴革命标语和传单，王盛烈老师用李鸿珍同志交给他的毛主席照片画了毛主席像。

·与周福成谈判·

30 日晚，我“解放同盟社”核心成员于纯仁，在四初中召开高教系统地工骨干会议，布置迎接解放军人城事项。刚刚散会，省一中教员王襄忱（地工人员）来找在这里的纪熙尚同志（解放同盟社成员）。王襄忱的叔叔王立夫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与沈阳城防司令周福成有来往。解放军兵临城下，周福成为了得到较好的出路，打算率众起义。王立夫知道侄子王襄忱思想进步，便让他从中沟通。王襄忱与纪熙尚是老同学，特来找纪帮助解决。纪当即找到于纯仁商议。于纯仁认为周福成所部已成瓮中之鳖，起义已错过时机，但可与之谈判，使之不放一枪一炮，这对我们有利。因此，当即决定由纪熙尚出面与王襄忱一起去谈判。同时，给倪学源同志写了一份报告，派沈医高俊英同志与一三五师代表乘

车出城与解放军联系。见到我四野一纵赵司令员，他说：起义有名无实了，周部一三五师和警备队一队、二队，只能无条件投降。周福成在同我们谈判时，仍在争取承认他所部起义。我们说时至今日，只能投降。谈了一整天，周始终犹豫不决，但未下令抵抗。而此刻，我军先头部队已开始入城，周也只好投诚。

我军入城时只有207师一部进行顽抗，周福成所统率的杂牌军一枪未放，老老实实地放下了武器。这当然主要是慑于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但我们的谈判，也起到了稳住他们手脚的作用。

沈阳解放后，1948年12月市委召开了全市地工人员庆功大会。大会由宋黎同志主持，陶铸同志作报告。领导同志以喜悦的心情，肯定了地工人员的成绩，宣布一切地工组织已完成历史任务。我们“解放同盟社”也同兄弟地工组织一样，宣告解散。市委对我们所有同志分别安排了工作或学习，大家在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作者黄希群为军校六期生，曾任沈阳市沈北煤矿宣传处长。于争为军校六期生，曾任沈阳市总工会副主席。张忠林为军校七期生，离休前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纯仁，离休前为地矿部编辑。）

惊涛骇浪的过去

于　非

反满抗日的思想萌芽

我在伪满小学念书的时候，非常关心我的李老师突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后来知道被敌人严刑拷打后，将他装入麻袋投入鸭绿江中，后被爱国同胞救出来了。李老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奔北大荒逃命去，当他离开安东（现丹东）的前两天，把我找去谆谆教导我，要好好的学习，为了不当亡国奴长大了要和日寇做坚决的斗争。他讲了很多抗日救国的道理。他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的扎下了根。

我怀着复仇的心理在1945年考入了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入七期预科第八连。一入校，便被一种强烈的反满抗日的思想和气氛所感染。从上级生传唱的《满江红》等许多反抗侵略和怀念祖国的歌曲中，从一些爱国教官、教授的话语中，从中国同学对日本军队的愤恨中，处处都可以窥视到人们对侵略者的痛恨。这种反日怒火在心中燃烧。

入校后不久，也许我先天体质不佳，未经受住严格的军训而患胸膜炎浮水即住入伪陆军病院。在住院期间我和六期生于清涛同学住同室。我们可以说思想情绪相投，他耐心地向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介绍了他所接触到的军校教师和上级生的反满抗日活动。从当前到未来说了很多。在病院里还结识了一位台湾的林医生，一个多月的病床生活中，他除了为我看病外，还经常谈到台湾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事迹。我虽身在病中，但心却充满了激情，这两位兄长的话语和思想对我以后的革命活动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决心投奔革命

一个多月后病院令我出院安排为自宅疗养（三个月）。我回到了被日寇逼迫从丹东移民黑龙江一面坡山区的家乡，在这里我结识了姐夫的弟弟刘景生，后来知道他是关里河间泥洞的抗日武装队长，由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失利，他隐蔽在山沟里做秘密的抗日工作。经过暂短的相处，他了解了我的反日思想和向往祖国的意志。于是他介绍我投奔晋察冀解放区。他告诉我要找的接头人和暗号。交给我任务：将日寇侵略军在一面坡、珠河、亚布力一带的布防和兵力情况和我所了解的伪军校的同学反满抗日的思想情况等写成各种中药的药方记号，更多的让我记在脑海中。

我领受了任务，心情极为激动，又高兴又忐忑不安。因为我的身份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军校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长期霸占东北和全中国而苦心经营培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军官的地方，我利用养病之机逃走投向革命，如果顺利过关自然前途光明，万一被敌人发现，过不了关卡，那就结束了一生。我昼思夜想啊！人的生命虽只有一次，为追求光明反对敌寇的侵略，死又何所惧，我毅然决然地化装成小商人，背了烟草和中草药，走向山海关，奔喜峰口。时值初春，但我还穿着父亲自缝的羊皮大衣，走啊走到了一个叫双山的屯子，被日本的守备队扣留了，经过两天的审问，遇上了一个通人性有良心的伪军官，他说：念你年轻无知，打发

你回东北老家。

小心隐蔽 以待时机

在回北满的途中，我去我第一故乡丹东，一看亲友二看老同学。我首先看了中学的同班同学石万选，他把他在伪建大的哥哥石万生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日文的《资本论》等书送给了我，不觉三个月的自宅疗养快到期了，我急忙回到一面坡向刘景生说明了投奔解放区未果的经过。他安慰并嘱我吸取教训，回学校后要“小心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更多地团结进步同学，组织同学会、读书会、同年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抗日活动。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总是有进步师生可以团结的……

已是初夏的6月了，我穿着冬军装回到伪军校。与久别重逢的同学亲热了一番。课程自然拉下很多，但我哪里还有心求学呢?!一天在日本区队长检查内务时把我从丹东带回的《科学的历史观》给搜去了。晚点名后，我的区队长佟泉有把我拉到日本区队长面前，问我从哪儿得到这本书？我说是坐火车时捡到的。他拿起竹剑边用日语训斥我，边打我一剑，日本区队长看我态度强硬，冲上前打我一个耳光，我当即昏倒在地，佟区队长将我送到医务室急救后送到寝室。夜里我久久无法安眠，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我的家被日寇烧掉，父亲被迫并屯到地主的大墙外打起窝棚，大姐夫由于参加抗日救国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三姐夫由于抗日腿部中弹。大姐被日寇迫害致死……国破家碎，何时能见青天？想到日本人搜书的事，如果交到校部去，更凶多吉少。但事隔一个月之后，佟区队长在带我连露营时告诉我那本书在他家中并叫我千万加小心。后来我知道他是地下国民党。他在连队经常利用一些机会向我们讲中国历史和历来反抗外国侵略的故事，讲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讲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等等，他虽留学日本并为上尉军官，但对日寇充满了仇恨。“九·三”胜利后，终因政治立场不同，走向了和共产党相反的道路。

投入党的怀抱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我终于在1946年底投入了党的怀抱，在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早在1945年9月，当我在丹东投向东北大学时，大学的秘书长王平就和我作了长谈，他了解了我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观点，约我定期和他接触。但不久，学校经过通化撤退到佳木斯去了。此间王平总找机会与我联系和通信。1947年5月的一天，他介绍我到哈尔滨南岗马家沟的一幢小楼房，去会见一位革命领导者。我走进这位长者的办公室，他自 我介绍说他叫李敏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唠起了家常，由浅入深，由国际形势，说到国民党打内战的罪恶活动。最后他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利用一切关系回敌占区沈阳、长春和吉林去搞学生运动，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罪恶阴谋。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打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饥饿，反迫害，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他教导我，在敌人心脏搞革命比在解放区要艰难得多，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我向他表示了决心，说我在东大、长大和长白师范学院都有学籍，都可以以学生身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李敏然让我主要做好长白师范学院的地下工作。他告诉我，你不会孤军作战，会有同志找你，共同行动的。辞别了首长，王平小声地告诉我，接见你的是东北局城工部长、老革命家李立三同志。这时我更加意识到，党对我的期望是何等重要啊！我怎能不舍身忘我为革命呢！

团结斗争　壮大力量

实际上在我去哈尔滨见到立三同志前，在东大我已接触了许多军校的进步同学。当时我谎说从共区刚出来，军校五期生温乃武、六期生李世安和七期同区队同学等找校长臧启方为我争取安排学籍，并发动同学为我赞助一部分生活费用。我在长大得到六期杜仲舒等同学的帮助，让我顶替黄松年的学籍先入校学习，当我得到立三同志让我重点做好长白师范学院地下工作的指示后我就直接去吉林八百垄，经过六期张继永等同学的据理力争，经过

甄试，我取得了长师学籍，入了教育系二年级。按着党的指示，在长师我团结了一些进步同学，军校的同学有四期傅润堂，五期文宏启，六期张继永、孟繁武、王运珍、林松，七期徐正斌、常龙传、李树青、丁继盛、李广兴、吉永占、傅鹰、于阴昌、魏继周、朱治儒等。这些同学有正义感，思想要求进步，反对国民党的腐朽黑暗和贪官污吏。

以军校同学为骨干，加上早与我党有联系的师大同学刘忠俊等人，我们策划了几次政治活动：

*抵制学校当局所组织的反苏游行。*1947 年春，国民党发动了所谓反对莫洛托夫干涉中国内政的反苏大游行。游行的前一天我们进步同学张贴了大字报和墙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阴谋，坚决反对反苏游行。在食堂吃晚饭时，进步同学和反动的学生会展开了舌战，张继永和我都作了激烈的发言，我们控诉美军奸污北大学生沈崇的罪行，要求举行反美游行。由于公开的辩论和私下的串连，第二天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减少很多。激怒了学校训导处，训导长刘述先找我谈话，说我们的活动有政治背景，我们说参不参加游行是学生的民主权利，我们不愿意光复后的祖国再陷入打内战的苦难之中。

反对把长师迁到沈阳和抚顺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不得人心，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使吉林敌军形势告急，反动当局为拉拢青年学生，命令学校迁往沈阳。在迁校的辩论大会上，军校同学大多数主张留在吉林念书，反对迁沈。但毕竟大部分同学仍主张南迁，当时组织上决定我们一部分军校同学随学校去沈阳。到沈阳后，借市三中礼堂为住宿地，根本无法上课，同学们天天流落街头。我们利用这个事实出《北斗》板报，控诉国民党的罪行，秘密贴出反内战、反饥饿、反抓丁的标语和传单。一天听说数学系同学黄宝善被国民党打伤，军校同学张继永等立刻串连东大和沈医同学来长师掀起反对国民党驻军暴行的运动，于是一场流血斗争展开了，几个同学被打伤了，终于迫使国

民党反动师长来校赔礼道歉，才算平息了这场斗争。

反陈诚的罢课和静坐示威斗争。 国民党的“东北剿匪司令”多次易人，地下党在陈诚到任的第三天就发动了学生罢课和静坐示威，要求停止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反独裁。我们长师同学在军校同学的带动下在中山公园前静坐了一天，迫使陈诚枪毙了几个贪官污吏。

要求迁回吉林 学校当局一看在沈阳的长师无法维持下去，院长方永蒸又设法把这部分同学迁往抚顺，借住永安小学的校舍。这时我们进步同学直接受东北局城工部派来的华锋和刘忠俊领导。他们直接受命于东北局城工部沈阳工委李正风。这样党的领导加强了，队伍也壮大了。

1947 年 7 月，党组织派我回吉林，到吉林后，和留在吉林的进步军校同学共同商定派代表到抚顺接回在抚的同学，以迎接吉林的解放。首先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我介绍了学生在沈、抚所遭到的迫害和苦难之后，事先布置好的军校同学纷纷发言，要求派学生代表到抚顺接回在抚的师生。选举结果林雨、赫永魁和我三人作为学生代表又到了抚顺。到抚顺后，正赶上中长路被我军切断。于是我就留在抚顺和沈阳从事学生运动。

改选学生会，夺得领导权的斗争 1948 年春，长师经过苦难的历程又从抚顺迁回沈阳，开始住在故宫大院，伙食部设在十五亭，同学们都睡在铺着草垫子的水泥地上，经过事先的商量召开了学生大会，揭露了学生会贪污公款问题，要求学校出面清查并严加处理。会上傅鹰以有力的证据揭发了伙食部长和学生会主席利用职权贪污的问题，激起同学们的愤慨，就连反动的训导长也无法再包庇学生会了。同学们要求罢免他们，重新选举新的学生会。经过酝酿，张继永、于非和傅鹰被选入了学生会。张为主席，于为总务部长，傅为伙食部长。这时，长师学生会的实权已被军校同学掌握，这对以后的对敌斗争极为有利。

成立代号为“ME”的地下革命组织

随着东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的需要，1947年8月底9月初，我南满部队，根据东北军区秋季攻势的作战指示精神，发动了对敌的秋、冬季攻势。我们地下革命同志配合武装斗争，积极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抓丁、反迫害等反蒋的学生民主运动。

经过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流血斗争、反陈诚的游行示威，在抚顺的反训导处的斗争，反捕人的斗争，反克扣学生伙食费的斗争和在吉、沈、抚三地的反迁校斗争等，广大学生和先进分子，受到了考验和锻炼，敌对学生被分化，动摇、观望的学生也有所转变，极端反动分子被彻底暴露，敌我双方的阵线益趋分明。

经请示地下党（主要是李正风和华风）于1948年3月的一天，在沈阳南十条张洪敏的家，召开了地下工作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由刘忠俊宣布成立“ME”，组织万一暴露，对外就说是读书会。大家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参加会，目的是为了研究斗争的策略和方针。经过大家的推选，刘忠俊成为“ME”的负责人兼组织部长，于非是总务部长，傅鹰（军校七期）、曹达是宣传部长；张继永（军校六期）为民运部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多人，都是经过考验的可靠的骨干分子，军校同学约占四分之一。

这次会上，首先由刘忠俊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介绍了地下党对当前工作的指示。接着由我分析了学生民主斗争的形势和学院的敌我状况。之后大家纷纷发言和表决心，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配合解放军的攻势，积极开展反蒋反黑暗统治的斗争，通过合法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二）走向社会，通过各种渠道，团结进步的工人和学生搞必要的联合斗争。（三）进一步团结进步同学，争取中间学生，坚持反迫害、反饥饿、反迁校的斗争。（四）做为革命的隐蔽工作，坚持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对个别的已暴露身份的和坚决要走的，可输送到解放区。

会上我宣布了公约和纪律，最主要的是要保守秘密，万一遭到敌人逮捕，至死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对此大家都表示：为

革命而死，永不叛变。

会议在研究了分工和布置了斗争任务之后，讨论了经费问题。会前地下党组织华峰、刘忠俊都和我说过，在敌人心脏闹革命的同志，虽有党组织的支持和人民的同情，但经费极为困难，如印刷宣传品、张贴标语、购买进步书籍等都需要钱。特别是学院南迁后，留下来的同志的生活费更加困难，如何解决这项费用，组织上让我侧重考虑。

没有钱向敌人要

1947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又发出“戡乱”令，对革命人民和我地下党进行残酷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地下斗争是极为艰难的，老百姓忍饥挨饿，学校常常吃不上饭，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学苦于无经费不能印发宣传品。但是地下党组织指示我们要坚持斗争，要长期隐蔽，要发展力量，打击敌人。我们几个军校的同学甚至把手上仅有的戒子都变卖了用来筹集活动经费。

1948 年春天，反动当局策划老师南迁，反动分子和受蒙蔽的同学纷纷乘包机南飞，我们参加地工的同学势必连饭都吃不上。为此，组织上指示：想办法自己解决。于是我们提出“没有钱向敌人要”的口号。我一连苦思苦想了几天，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地下组织能否坚持斗争，狠狠打击敌人的问题。

我决心要把国民党每月发给学校的平价米款弄出来，交给地下组织。我一度曾想，如果身份暴露了，被敌人捕去，因证据在，钱交给了共产党，必是杀头之罪，但又想，参加地工的初期早已把生命交给党了，为什么遇到具体危险，就想得那么多呢？我下定决心，宁肯被杀头，也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革命就是亿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啊！这时属于东北局吕天系统的地工人员军校四期崔德焱同学来找我，鼓励了我，并答应万一出问题，将尽力帮助我逃出虎口。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控制粮价上涨，每月发给国立院校一定数量的平价米钱，这笔款由学生会领取并发放。按常规每个月中旬

核领一次。但我为了给组织上多筹集点经费，准备把5月份的公款延迟到6月中旬，和6月分应领的公款一并领出。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当时学院总务处多次催我领款，我都以种种理由推迟了5月份的领款，并说服一些同学。

我说你把款领到手就花掉了，等下月一块领取，一次可以得到双倍的款项该多美……

为了取款，我找了打入敌军警督察处的地工人员，又找了崔德森同学，他们乘吉普车陪我去取款，这样银行、粮食局、粮店几道关口一一顺利通过了。我和傅鹰同学拿到支票又去南关粮库办理购粮手续。不巧粮库存粮很少，叫过几天再来取。我们和粮库老板"亲热"一番，送了他点礼物。他让我们第二天上午来取。

第二天，我登记飞往北平的机票到期了（当时我负责办理学生南飞的机票事宜），我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在办理机票登记时尽量往后拖，当时反动学生在监视我，怕我不去北平。为了掩人耳目，我也只好假登记，但我登在最后一批班机上。这天一早学院训导长（军统）找我，我担心公款事暴露了。于是急忙把购粮的支票交给傅鹰和曹达两同志，并和他们一起去粮库接头，以防万一。

训导长找我是为了机票的事，他让我下次班机起飞，把名额让给训导处另一反动分子。我自然喜出望外，这样还可有一天时间，也可看到取公款购粮的事全部落实。

第三天一早，刘忠俊送别了我，崔德森身穿少校军装来见我，告诉我除完成"ME"组织的任务外，还要为他去东北局找吕天同志汇报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工作。这时我已和傅鹰和曹达两同志完成了取粮、存粮和隐藏的任务，他俩自然隐蔽起来，而我是"主犯"，所以组织上命令我立刻撤离敌区去解放区。

与"外甥女"化装同去

那是1948年6月8日，我的女友，在辽宁师范专科学校从事学生活动的浦漫湘，按约来会见我们。我们由于斗争的考验已立

下非我不嫁非她不娶的誓言。按约定，她装成我的外甥女，我是她的舅舅。崔德森同志护送我们出了铁岭的关卡，到开原新城时，敌五十三军的一个营长找我们麻烦，说昨天抓了一对共党分子。崔出面示信，说我们是总部长官的亲属，说我姐姐也就是浦的妈妈病死在长春，要去处理后事，浦真的流了眼泪，敌人又盘问一阵，我们对答如流，敌人找不出什么破绽，也只好放行了。

我们租了一辆马车继续北上，当经过敌我拉锯的三不管地带时，首先遇上了地主的武装，他们盘查我们，当我给他一支派克笔时，他笑着放了我们。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到达了我军前哨阵地时，我军战士查问并扣留了我们。我们要求见他们的上级，第二天把我们交给了连长，当我们确认是自己的队伍时便提出见营、团首长。中午时分，一位团政委接待了我们，我们说要去东北局城工部汇报工作，部队须把我们送到城工部的接待站，当晚东北局城工部沈阳工委组织部长李正风同志接待了我们。我提出了去东北局的暗号和汇报内容等，李正风同志留我们住了 8 天，一方面谈情况，一方面和东北局以及沈阳地工组织了解我的处境。在第 5 天的晚上，他告诉我，我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在搜捕我，让我等候东北局指示。第 8 天上午李部长介绍我们去设在辽北的辽宁公学工作，辽宁公学是东北局设在山城镇的一个培训从敌占区来的进步青年、学生的干部学校。

黎明前的战斗

随着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发展，我们长师的地下组织在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后，坚持转向社会斗争，配合我军的外线作战，尽力做好城市的各方面工作，为迎接沈阳解放做好一切准备。

这时我个人虽然离开这个集体，但这个集体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伪军校的同学还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他们以自身为轴逐步地向外做网状发展，建立了许多地下关系。遍布沈阳城的通讯、新闻、外国使领馆、机关、厂矿、金融、交通、医院、学校等各

行各业。又利用这些关系中有条件的人员去发动伪军、警、宪人员弃暗投明，起义投诚。

沈阳电报大楼是这些网中的一个要害点，地工组织做好了电报电话局的杨景文和郑德勤两位技术员的工作，使他俩投奔革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保卫大楼内的通讯设施和国家财产，他俩又发展了局内要害部位的技术员田垦、陈珊、任传立、邢家相、孙培堂、李景祥和话务员胡春亭等20人左右。不仅在市局而且在各支局也有我们的同志在工作着。当敌人要破坏这座通讯设施的消息传来时，地工人员不畏艰险，搬进了这个局的后院杨景文同志的家里住下，以指挥保卫电报大楼的活动。

1948年10月，我们窥察到敌人有破坏电报大楼的迹象。这时刘忠俊、曹达、田新、田垦、杨景文等同志，分工把口，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并积极策动可利用的敌警力量。这期间曾两次用密信警告两个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对局里财产只能保护，不得拆毁，动员他们为人民立功。地工小组还往局里各部分投我军入城布告（约法八章），教育全体职工。此间，由杨景文、田垦秘密利用无线电讯往北满我民主联军总部呼叫过：这里是沈阳，电报大楼已被我控制。

为了加强保卫大楼的措施，地工组通知即将反正的军、警人员和起义队伍，随时听从我们调用。

10月24、25日得悉敌人逃跑前将派武装炸毁这一通讯枢纽的情报后，地工小组当即决定由赵殿礼通知，准备反正的市警察大队第四中队队长于国杰（于雷）前来磋商保卫电讯大楼紧急事宜。于接通知后立即来到我指挥部。首先为我们地工小组人员带来三支短枪和几套伪警服（均带军衔），以备必要时化装成伪警与敌搏斗。其次让他回去做好起义人员的工作，候令保卫电报大楼，伪中央日报社、美国领事馆新闻处、自来水公司等。并做好战斗准备。

31日清早约有两个排的敌正规军前来占据了这个局以及大

楼内外、通往后院宿舍的通道。并宣布戒严。31 日上午 8 时许敌军向我后院宿舍鸣枪追捕行人。此时我地工人员刘忠俊、张文山和曹达同志除已做好应付敌人闯入外，仍在沉着的指挥市内我地工系统的各项工作，并进一步部署了保卫电报大楼的工作。张文山曾在 207 师任过职。他马上派人电告于国杰所在的警察中队以伪市警察局名义来警戒电报大楼，于闻令于上午 10 时左右带两个分队的警察赶到，随即布岗放哨，与敌军对峙，以护守电报大楼。下午 2 时许，我解放大军已攻至城郊。这时，敌军下令向大楼机械房开枪投弹进行破坏。我地工小组立即下令开枪还击，刘、曹和于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军，敌人有的举手投降，有的负隅顽抗，战斗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和破坏。敌军逃跑了，大楼保住了。

在这次战斗中，技术员郑德勤、起义警察李文科却英勇牺牲了，沈阳解放后不久，沈阳市工委、市电报电话局军管会共同召开追悼大会，向为保卫电报大楼而英勇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致哀。

这就是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沈阳工委直接领导下，以伪军校同学为骨干的国立长白师范学院地工组织的一部分地下斗争的史实。

（作者为军校七期生，曾任辽宁省新闻出版社编辑）

沈阳学运片断

傅 鹰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运动高涨起来了。我们就是在这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在沈阳大专院校间开展了学运活动。

改选学生会，夺得经济权

1948年，雪消冰融，大地回春，长白师范学院经过几次周折之后，从抚顺又迁回沈阳，开始时住在沈阳城的故宫里，后又迁到中正大学，现在的省委机关大楼。住在故宫阶段，伙食部设在十王亭，学生宿舍在故宫对面一个二层楼上。一天，在这个楼上召开了学生大会。大会是在全校学生强烈要求之下召开的。会上，揭露了学生会贪污的问题，要求学校出面，查清帐目，公布于众。我在会上揭露说，学生会不敢公开帐目，说明心中有鬼。也指责了学校领导包庇学生会，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意见很大，学生会已经失去了

同学们的信任，要求重新改选，这为我们能够被选进学生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经过一番酝酿，准备让于非和我打入学生自治会，一方面能够了解到学校上头的情况，另一方面能够掌握经济实权，等待时机成熟，弄出一笔款项，好解决地下活动的经费。通过民主选举，目的果然实现了，于非被选进总务部，我被选进伙食部，都担任了部长职务，夺得了学生会的经济实权。

弄出巨款，转入地下

东北形势胜利发展，国民党摇摇欲坠，于是，他们故技重演，说什么用飞机把学生送往北平，那里有名流教授给你们上课，引诱和欺骗东北大学生进关。这时，东北的大学生，有的乘火车到锦州，步行一段（中间有解放区）再去北平；有的乘飞机直达北平，不断地流向关内。留下来的学生，有的在观望，举棋未定；有的走向解放区，投奔共产党。我们呢？要因势利导，团结进步学生，争取中间学生，孤立顽固势力，把大批学生输送到解放区。在这时局变幻学生动荡的时刻，南京政府中央教育部给学校拨来一笔学生经费，款额达 8700 余万元，学校开出支票交由于非办理。我们认为这是弄到活动经费的有利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过周密研究，决定必要时把于非同志送往解放区，逃出这由于携款潜逃而被追捕的险境，同时，责成我和曹达取出这笔巨款购粮，于是，于非带我和曹达拿着 8700 万元的支票到沈阳城里一家银行取出现金，而后到一家粮栈，用其中大部分款买下几千斤的大米，以免粮价上涨货币贬值受损失，大米装有 8、9 麻袋，雇车送到地下活动的据点——铁西宿舍。从此，我就离开了学校，转入了地下活动。

隐蔽活动，四次搬家

遵照组织上的吩咐，从银行取出巨款以后，我就搬到铁西宿舍，地址是在铁西双空桥往南走有三、四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平房。事过几天之后，刘忠俊、曹达来告诉我，说抚顺抓个姓傅的，他想逃往解放区，让学校派人去认，结果不是我。还说，学校找于非，也在找我，在市内不便于活动，让我离开沈阳，去沙河找建军军官、原军校学生崔四哥，崔是以建军的公开职业进行地下活动的。我买了一身美式卡叽服装，投奔崔四哥，准备以国民党军官的合法身份进行活动。我亲自去过沙河建军处，由于没有找到崔四哥，又回到沈阳。

当时沈阳市内，警戒森严，大肆搜查逮捕，一片恐怖气氛，为了不暴露目标，地下活动的据点，经常在变化。6月中下旬，我第一次搬进铁西宿舍以后，刘忠俊、曹达、赵陆权、赵淑争等，经常来到这里，研究学院情况，分析师生动态，安排学运活动。他们吃在这里，有时也睡在这里。师专学生傅宜繁，通化青中学生曲宝忠、刘淑芹等也来过这里，接头并研究工作。

7月上旬，我由铁西双空桥附近搬到铁西中心区一个热闹市场附近，新居是独门独院，有两间小平房，倒便于活动，在这里同搞工人运动的一些同志接触，研究如何相互配合，扩大宣传和组织活动。我有时去通化青中，同那里的流亡学生接触，有时去难民处，同那里的同乡难民接触，宣传和教育他们返回已经解放的家乡。

7月中旬，我离开铁西中心区这个据点，用两辆马车，将一切用品，如吃的粮食、生活家具、宣传用品等，一并搬到和平区民权街一家的里屋，在这里只住五六天时间，我又搬到南湖一所中学楼上的一个办公室里，当时，学校正在放暑假。这时，我能腾出一点时间，读一些革命书籍，并开始撰写自传，回忆个人生涯，

以及在抚顺、沈阳组织学运的情况。

几天后，来人通知我，让我整理行装，准备离开沈阳，去辽北解放区。第二天早晨，我按约定地点，准时到达沈阳南站，刘忠俊、曹达等早已来到这里，为我送行。我们是在斗争中结下的友谊，眼下就要分开，心情沉重，默默无言，但是根据革命需要只好分开。地下组织委派李广兴同志护送我，搭上去铁岭的火车，奔向那盼望已久的解放区。在铁岭下车后，通过国民党哨所，步行30余里，到达解放区的前沿阵地——中固，由中固介绍到开源接待站。在接待站汇报了沈阳地下活动情况后，李广兴返回沈阳，我被送到辽宁学院学习。

冒险去辽阳，挂上辽南钩

在沈阳铁西中心区活动期间，我们冒着风险去过辽阳，同辽南地区挂钩，扩大活动范围，争取支援力量。6月下旬一个傍晚，刘忠俊、曹达从师院来到铁西中心区的据点，忠俊对我说，咱们要去辽阳，向辽南汇报这里的情况，请求他们支持，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还说，这次去三个人，曹达和你，还有张希林。张是曹达的把兄弟，当过教员，为了地下活动，他参加了蒋匪谍报队，活动在辽阳一带，利用他的合法身份，便于在蒋管区和解放区之间活动。这一次，曹达又从谍报队队长李某那里，弄来两张空白谍报证。晚上，我们仿照谍报证的印迹，用蜡纸刻制印鉴，印制在空白谍报证上，做为通行的证件。一直忙乎到深夜，都睡在这里。第二天早晨，张希林一身普通衣着，戴着一顶苇织草帽来找我们，我们背着一些常用药品，一起到沈阳南站，乘上去辽阳的火车，在辽阳北的一个小站下车，国民党的火车只能通到这里。下车后，我们向东走，通过国民党的哨所，绕过崎岖的山路，闯过“三不管”的险区，步行三、四十里路，同解放军接上头，乘船渡太子河，顺利地到了辽阳接待站。在这里，辽阳城工部部长彭光

华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汇报工作后，他说，国民党煽动学生进关，这是个骗局。他还说，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少的力量，要团结和争取他们走革命的路，有的可以向解放区输送；有的可以转入地下潜伏活动。听到这些话，我们心情豁然开朗，感到革命有了方向，工作有了力量。我们在辽阳休息一整天，又准备返回沈阳。来时，我们带的是解放区急需的常用药品，回去时，我们携带一些纪念"七·一""八·一"的小册子，在辽阳城工部热情帮助下，顺利地从原路返回沈阳，出色地完成了联络任务。

（作者为军校七期生，离休前为海城市委党校书记）

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贾宗智　王常友　钱致光
杨　桦　雷凤桐　沙　青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东北大学于1946年从四川三台迁回沈阳老校址，并于下半年开学，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以下简称军校同学）约200人，从此时起到1949年沈阳解放时止，就读于东北大学。大学生活对青年学子总是美好的，而对我们——军校同学来说更是不寻常的，除了学得科学知识之外，还从朴素的爱祖国、爱民族的情感出发，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为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第二条战线，英勇奋斗，舍身忘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入东大深造

“八·一五”祖国光复后，军校同学碰到各种各样的遭遇，极少数同学参加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行列，大多数同学经历了复杂曲折、痛苦甚至危险的经历。至1946年初，他们开始考虑，我们盼望的祖国究竟是什么样子？她向何处去？而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又该怎么走法？这首先使他们

冷静下来。这时国统区的大学，正逐步筹备开学上课，军校同学特别是四、五、六、七期的同学，抱着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学习科学技术的美好愿望，和为寻求自己出路的打算，大家团结一致，冲破国民党当局对军校同学甄审和不承认军校学历的错误政策，到东北临时大学学习。由军校同学组织的北辰同学会，就在此时成立了，它为军校同学能入“临大”，发挥了作用。1946 年 9 月东北各大学相继开学，有 200 左右的军校同学到东北大学深造。这 200 人中，有三期的 1 人，四期的 12 人，五期的 20 多人，六、七期的各有 80 人左右。就读于文学院的不足 10 人，入理学院的 10 多人，在法商学院和工学院学习的各有 90 人左右，没有人农学院学农的。入学时，七期的从一年级读起，六期以上的插班入二年级学习。其中有少数同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途离开了学校，但绝大多数同学读到 1949 年解放，获得了大学毕业学历。

东北大学创建于 1923 年 4 月 26 日。这所大学在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和 1936 年西安事变中，从张学良校长到广大师生，在伟大的历史转变关头，都作出过突出的重要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同学走向抗日战场，有些人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不少人经过锻炼，成为党、政、学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在四川三台的师生，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军校同学的大多数，正是在这所大学走向人民解放的大革命征程的。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觉醒

1947 年的“五·二0”、“六·二”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了，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当局。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表明共产党在国统区所开辟的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国民党就是在它统治区内，已经没有群众基础了。东大同学从 5 月 20 日到 6 月间，举行过大规模示威游行，校内大字报墙报铺天盖地，军校同学在爱国激情的驱使下，开始觉醒了，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是当时东北大学学生运动中的主要

力量之一。李世安（军校六期生）是学校自治会主席，温乃武（军校五期生）是自治会理事，分管工学院自治会事务，孙放（原名孙国重、军校六期生）自治会理事，联系法商学院自治会，彦奇（原名商国臣、军校七期学生）理学院自治会主席，等等。他们在学生运动中起到左右局势的作用。他们的这种作用，是由于有广大军校同学的坚决支持，这些同学和广大东北大学同学团结一致，组成多种进步社团、读书会，出大字报、墙报，印刷各种宣传品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及其真象，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如王常友（军校七期生）等用展览和大字报形式，揭露国民党特务在学校制造几起爆炸事件，并嫁祸于进步同学的阴谋，雷凤桐（军校六期生）等用在军校学到的制图知识，绘制了内战形势图，揭露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它在战场上的败绩。这只是众多活动中的两例。

经过这场斗争，军校的大多数同学开始走上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征途，他们的爱国之心，得到充实。其中的先进人物，如王常友、卢宗和（军校六期生）此时参加了由中共北方局北平城工部派到东大的地下党。温乃武同辽南地区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黄希群、于争（军校六期生）等多人，同辽北地区中共党组织联系上，并组成了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同盟社，到沈阳解放，这一组织发展到100多人，在东大、沈阳医学院等单位，都建立了基层组织，大部分领导骨干都是军校同学。为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为解放沈阳、保护沈阳这座名城不被敌人破坏，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还有1947年末1948年初的反冬令营斗争，1948年春的反迁校的斗争，都取得一些重大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学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学运处于低潮。大批同学被开除，于清涛、孙国重（军校六期生）被校方开除后，投奔解放区，直接参加了革命，许多同学横遭逮捕，关启泰（关岳、军

校六期生）在反冬令营斗争中被捕。温乃武，是在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和二0七师中工作的军校同学帮助下，才逃脱了敌人的逮捕，投奔到解放区来了。也有的，如杨桦（原名杨恩余，五期生）因不满国民的反动统治于 1948 年 5 月，在阜新直接参加革命。

经过斗争的洗礼和考验，军校同学的政治态度明朗化了，因而也分化了。在反内战、反饥饿斗争中大家讨论对这场斗争应持什么态度，大多数同学主张积极参加，而少数同学却持反对态度，他们多是已参加了国民党或三青团。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张保重（三期生）、沈锡文、陈靖澜、李文烈、赵广志（六期生）、邓文忠（七期生）等。由于立场观点的分歧无法调和，因而不得不分道扬镳了，“北辰同学会”从此终止了活动。

参加国民党和受它影响较重的同学有 10 多人于 1948 年底去了台湾。有的如逯兴龙（逯清宇、六期生）后来又去了美国。沈锡文、陈靖澜、李文烈、赵广志（都是六期的）因在光复初期犯有严重罪行，解放后被我公安部门处决。

1948 年春及初夏，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操纵下，东大被强制迁到北平，大多数军校同学也随校到了北平，东大学运受到挫折，但广大同学并没有因而沉默，军校同学也没有因而沉默。到北平又进行了新的斗争。

“七·五”事件中的先锋和幸存者

1948 年“七·五”惨案爆发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对来北平的东北学生进行军训，逼他们充当国民党打内战的炮灰。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激怒了的广大东北同学，7 月 7 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先到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官邸请愿未果，又到北平参议会论理，但无人理睬，一怒之下，学生闯人参议会找议长，没有找到，最后到东郊民巷许惠东议长公馆请愿，经谈判在他们答应三天之内回复同学要求的条件下，学生队伍撤离。此时机枪大作，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找到姓名的死者有 8 位，伤者 100 多人，这在北平是少见的一场大

血案。但它不表明国民党的强大，只能说明它是在作垂死挣扎，已丧尽了民心。随后在7月9日，东北同学又和北平同学一道组织了规模更大的抗议示威游行，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

在这场生死斗争中，有些军校同学是这场斗争的组织者，如王常友（七期生）等，许多同学走在队伍的前列。闯进参议会找议长的同学中有军校同学，到许公馆找议长谈判的还有军校同学，此时敌人开枪了，军校同学成为自发的指挥者，掩护同学后退、卧倒、掩蔽……（此时未有伤人）。后来整好队伍等待谈判结果，因东大队伍是游行的第一队，正好面对敌人装甲车的机关枪，胸膛紧对敌人枪的同学中，有些就是军校同学。只是由于宣布撤离时，东大队伍先走了，才免遭枪杀。而牺牲的多是长白师院的同学。我们这些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死难的同学，他们永垂不朽！

组织建设中的骨干

为了把已觉悟的同学，最广泛的组织起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东北大学的六大民主社团出现了。它们是"心声歌唱团"、"东大剧社"、"民舞社"、《东大月刊》编辑部、"七五图书室"和"文化服务社"。参加的有600多人，遍布各个学院，基本上能够左右东大的局势。在歌唱团、剧社、民舞社中冯睿（六期生）是骨干成员，文化服务社由杜江（陈济忠、六期生）主管，曹雷（江流、曹振嘉、六期生）是《东大月刊》主编。8月张雷（六期生）被发展为来平后首批党员，李影（李昌源、六期生）、杜江（陈济忠、六期生）为首批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此后不久，江放（刘树棠、六期生）、吴江（虞宪华、六期生）江流（曹雷、六期生）、李昌源、陈济忠等相继入党了，冯睿等参加了联盟（即共青团的前身）。国民党反动当局继8月对北平院校的同学进行大搜捕之后，策划在9月对东北来平同学进行大搜捕。地下党组织决定凡是上了黑名单的都撤回解放区。东大总支书记韩光撤走了，由王常友（七期生）继任总支书记，江流因主编的《东大月刊》被查封，也只好撤走。城工部东城区交通联络员张雷（六期生），因

上了黑名单组织上决定让他撤离，但因当时撤离的党、盟员较多，他申请留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军校同学的支持，也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经慎重考虑，决定将他留下来，并作了周密的部署，如被捕如何进行法庭斗争，如何组织抗议示威和营救等。国民党搜捕时，他藏在王世强（六期生）家，逃过来了。王世强的这个家，是因王的爱人顾灵心正在生孩子，由武成文（六期生）从亲戚那里借的。组织决定张到工学院开展工作，他首先发展了贾宗智（六期生）、刘庆和（原建大同学）为党员，有了三个党员可以组成党支部，工学院的党支部因而得到恢复，贾任支部书记。不久，军校同学钱致光（钱廷富、六期生）、雷凤桐（六期生）、崔阴宇（六期生）、张绍先（七期生）、王恒凯（六期生）、吕松涛（四期生）、万鹏程（六期生）、田稔（七期生）、陈恩海（七期生）等相继入党，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军校同学几乎占工学院党员的一半。由于斗争的需要和组织的发展，东大地下党总支一分为二，文法学院总支书记由王常友（七期生）、理工农学院总支书记由贾宗智（六期生）担任。城工部东城区交通联络员为张雷（六期生）。此时近 60 名地下党员中，军校同学占 20 多人，150 人左右的盟员中，军校同学近半数。在 1948 年 9、10 月，北平城工部指示，发动党、盟员及各社团六、七百名成员，回到各自的班级，团结更广大的同学（全校学生 2000 多人），把他们也组织起来。在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上，通过民主竞选斗争，把各级学生自治会的权利，几乎全部夺了回来，牢固地掌握在地下党领导之下。号称国民党的国立东北大学，实际上已由共产党领导了。这样也就可以更有利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在这些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军校同学已成为重要领导骨干，大多数都走在斗争的前列。

反迁校斗争中帅、将、兵

东大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领导手中，1948 年 10、11 月，辽沈战役正在进行，并取得完全胜利，平津解放也指日可待。

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策划将平津学生南迁。他们估计，迁北大、清华、南开等不那么容易，就采取先从东大打开缺口的办法，企图逐步把平津院校南迁。一场关系到平津高校及学生命运的严重斗争，不可避免地在东大展开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将东大迁到福建浦田，并拨给迁校经费。策划组织了迁校委员会，还同东大迁北平时一样，是以青年军联议会的一些人为骨干，于是在紧张的进行迁校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认为东大有从沈阳迁北平的经验，再次南迁不会有问题，至少可以把东大牌子迁走。但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地下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迁校斗争展开了。地下党研究了形势，并作出重大决定，认为东大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是有觉悟的，对国民党反动本质有认识，已经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只要讲清道理，揭露敌人的阴谋，放手发动群众，就有可能达到不迁校，牌子也不迁走的目的，坚决堵住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从东大打开南迁的缺口，在政治上给他以彻底的打击。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通过刘树棠（六期生）的工作，开展了一场民主辩论，最后全校投票表决迁校或是不迁校。五大民主社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迁校意味着再遭屠杀，为生存，为读书，反对学校南迁。各个社团、许多班级都表态反对迁校，大字报、大标语、墙报等铺天盖地。北平各高校许多同学来校参观、看动静。为避免问题复杂化，地下党统一部署，各校不介人东大反迁校斗争。国民党通过迁校委员会提出为读书、反共到底，学校南迁浦田。他们也以社团名义出了些大字报、大标语。双方对比，不论在声势和内容质量方面，反迁校的舆论都占绝对优势。迁校委员会的负责人急了，急忙拼凑一些人拿着棍子来撕反对迁校的大字报，并摆出打人的架式。当即受到众多同学的制止，其中有不少军校同学。撕大字报的人，见形势不妙只好溜走。投票日期近了，迁委会又号召不参加投票，企图把不关心迁校或因其它原因不能参加投票的人，都拉到主张迁校一边。于是地下党、团及各民主社团成员，组织动员起来做每一个人的工作，对女同学、

对新生、对先修班也都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例如钱廷富（钱致光、六期生）就是负责先修班工作的。参加北平大学联络工作的虞宪华（吴江、六期生）把东大情况及时通报各校。在11月初投票那天，迁委会的一些人，扬言要砸投票会场。于是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地下党组织一大批人带头投票。打头阵的当然又是军校同学。这些措施保证了投票的安全顺利进行。结果是全校的89%的人投了反迁校的票。在取得反迁校斗争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由大学自治会出面，拿着投票结果的资料文件，向校方交涉，要求学校当局尊重广大同学的意见，取消迁校的组织和活动，将迁校经费交给自治会护校应急。经过斗争，校方不得不同意并把迁校经费（实际上是两千袋面粉）也交给了自治会。至此反迁校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平津地区各高校中，再也没有公开的有组织的迁校活动了。

特别值得写上一笔的是在反迁校运动中尽管斗争很激烈，活动、工作很多，竟然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教学秩序，军校同学和广大同学一道，认认真真的读书上课。

保护古城迎接解放的特殊使命

11月中旬，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地下工作也很繁重紧张。这里只记两件事：一是地下党要求东大党组织设法绘制国民党军队的军力部署图，为此，派了两名已是党员的军校同学，设法混到国民党军的前沿阵地详细了解了情况，回来后绘成军事地图，由地下党送交攻城部队。同学们冒着巨大风险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地下党和攻城部队的赞扬；二是要求东大党组织派10个人，携带武器，混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一旦交火，就组织国民党军队火线起义，这10人当然又都已经是党员的军校同学。准备已经就绪，只是和平解放北平，已有希望，这项工作便中途停下来。没有想到在伪满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此时派上了用场。

到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在胜利进行，北平解放在望，地下党的任务是护校、护厂、护城迎接北平的解放。要完成这项保

护古城和名牌大学——东北大学的任务，就要组织一个坚强的队伍。于是在东大地下党领导下，组成了东北大学纠察队。它是既明又暗的队伍，明么，臂挂东大纠察队的臂章，在东大自治会领导下，执行着在历史大变动时期，保障全校人员的安全和生活的任务；暗么，每个纠察队员的怀里都装着“中国人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纠察队”的臂章，必要时行使军管会的任务。大多数军校同学都参加了纠察队，其中不少人又是纠察队的各级指挥员。所承担的任务，除护校外，还要负责北起燕京造纸厂南至西单，西起西四大街东到北海、中南海这一区域的扩城工作。这一区域内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工厂和重点商店的安全、重要单位和设施的安全，都逐一落实加以稳妥的保护，做到万无一失，为保护北京图书馆，文法学院的党总支书记王常友（七期生）亲自上阵，组织开展有军校同学和其他同学参加的护馆工作。先是详细的了解了情况，接着对图书馆的馆员，开展了广泛的团结动员工作，我们知道要依靠这些同志才能卓有成效的保护这座世界驰名的文化宝藏。这项工作，因为非常重要，北平地下党动员了各个渠道的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工作，上至主要负责人下至工友，都动员起来了。一旦出现国民党反动当局要强行搬走图书馆的情况，东大地下党就组织女同学，前去抱着书箱子决不放行。北京图书馆完好地保留下来了，军校同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担风险最大的是保护中南海、特别是保护在中南海被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关押的十几位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不被国民党杀害或转移，这项任务全部落在已是党员的军校同学身上。特刑庭是国民党的法西斯机构，由于时间紧迫，几经研究，决定在国民党动手杀害或转移这些人时劫狱。从此，在 24 小时内都有人去巡视监督着，我们这些已是党员的军校同学已准备好，只要特刑庭一有动静，我们就动手劫狱。并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周密的部署，如不是北平和平解放，完全可以设想，我们将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校内的各项保护工作，也都一件件落实了。在生活上保证 3 个

月内大家有饭吃、有水喝、冬天不能冻着。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军校同学，他把粮食等准备足了，又打了几口井，买足了煤，是用迁校经费办的。剩余的经费用来照顾教职工中的困难户。这样就极大的安定了全校人员的心，胜利地迎来了北平的解放。

告别学友奔赴各个战场

1949年2月1日，我们以极其热烈的场面，宏大的群众队伍，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不久中央和有关方面又召开“地上党”和地下党、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的会师大会。这些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我们这些20多岁大学三、四年级从事地下斗争的学子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人民解放事业，投入到人民大革命洪流中去。当时中央教育部门决定，东北大学迁回东北，理工农和外文专业的学生，分别入有关学校继续学完各自的专业，文法学院的学生尽量动员参加工作。由贾宗智（六期生）带队，把东北大学和理工农外文专业的学生迁回东北，继续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人才。由王常友（七期生）带队的100多名东大同学，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奔赴解放全中国的战场，其中有军校同学江放（六期生）、杜江（六期生）、冯睿（六期生）等20来名。其他同学都参加了工作。分别后，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我们的军校同学同其他同学一样，和同代人一样，以自己一生的实践，走着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应走的光辉的道路，他们的一生，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作者贾宗智为军校六期生，已故，曾任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教育部主任。钱致光，军校六期生，离休前为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党委书记。杨桦，军校五期生，离休前为华晋焦煤公司经理、高工。雷风桐，军校六期生，离休前为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沙青，军校六期生，离休前为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顾问）

我们是地下尖兵

韩希精

1941 年 3 月我考入长春原伪满军官学校，为第三期生，于 1945 年 3 月骑兵科毕业，分配到伪满骑兵四十五团任少尉排长。驻地先是锦州，后移防到勃利县，工作不到 5 个月，日本便投降了。

在军校学习期间当时同学间互相传递有一句话：“养精蓄锐，总有那一天有用武之地。”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就在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红军从东北密山县打进来了，骑兵四十五团当时共有 4 名军校同学，我们和团的老军官团结在一起，于 8 月 10 日晚处死日本军官并宣布全团起义。

我们北辰同学在日本投降后，除一部分在解放军内工作外，在国民党区内多数集中在暂编保安三师驻守在北宁路沿线一带城镇，和暂编保安九师驻守辽南营口一带城市，军官几乎全是原军校的师生担任。1947 年 5 月我由三师八团调到秦葫港口司令部监护一营，任排长，驻在秦皇岛市。由于我喜欢打球，经常和何世礼司令官同

场玩球，因而受到宠爱，很快提升为驻葫芦岛监护二营六连连长。在这个营内，八连长柳中枢是我们三期生同学，同连排长是我们四期生同学，无形中形成一股力量。

1947年底北京二期生同学王明仁（化名为赵宁）结束营口市暂九师的有关起义工作后，来到葫芦岛，在六连部找到了我。因为我与赵宁都是北辰同学，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我们的谈话很快地说到一起了，赵宁即向我说明身份和来意。并向我交待任务和使命：当前战局的发展，葫芦岛已成为战略要地急需有关情报；侧重注视与敌军增援部队有关的情报，弄清指挥官、番号、编制、武器装备；收集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的敌军配备详细情况；立即物色交通员向辽南军区鞍山情报站石迪同志处报告情报。连络口号："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并转石迪"。接受任务后我在葫芦岛积极开展情报点工作，而赵宁同志马上回鞍山向组织报告发展葫芦岛情报点工作情况。回走途中我把赵宁介绍到在锦州驻访的三期生袁景林副营长处。赵宁同志到鞍山情报站向石迪同志汇报工作后于1948年5月又回到葫芦岛，在正守卫着港口码头的六连连部找到了我，说组织上正式承认我参加革命，认为葫芦岛的情报点的建立是及时的。并指示葫芦岛情报点以我为主，我的化名为韩中生；战局已由防御转向反攻 阶段，战况多变，为了不失战机，有情报可直接向第一线的解放军报告；监护二营撤到那就跟随到那；组织给一个一两左右的金元宝作为活动经费。赵宁向我交待组织指示后，即去袁景林同学处接着又转移到二八四师八五二团任连长的王志文（一期生）处，在王志文连长和武作华（一期生）团附的周旋下，经八五二团长王汉昭同意，赵宁同志任该团的情报组长，以此为掩护，开展收集情报和分化敌人、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团内形成了以赵宁为首，有袁景林、武作华、王志文、李德顺（二期生）等同学参加的一股进步力量。

赵宁同志离开我之后，我按组织指示，在葫芦岛开展工作。第一步就将在葫岛北小街住的暂三师的准尉李凤鸣物色为交通员，

将他编入我六连当兵以掩护交通工作，命李凤鸣到锦州至山海关一带，搜集敌军的兵力配备情况，侦察几天后，命李凤鸣去鞍山市向石迪同志报告工作。我们送去的情报得到组织的肯定，并带来组织的指示及有关事项。上级组织再三强调葫芦岛情报的重要性，强调葫芦岛是增援东北部队的唯一交通要道，不能忽视。确切掌握由海路经葫芦岛的军事变动情况。我深深领会到当前的葫芦岛是军事战略重地，同时感到我的责任重大，并将几项工作作了安排。（1）首先抓我六连的士兵；（2）再物色一名交通员；（3）继续派李凤鸣到锦州至山海关间搜集敌军的情报；（4）建立葫芦岛码头各排的岗哨日记，为掌握情报打下基础。这期间，我们通过交通员向解放军第一线部队提供几份情报。1. 葫芦岛北大门有个茨山镇，驻有国民党的五十四军，配有榴弹炮营，武器装备、编制都是一流的。在锦州战役打响之前，蒋介石亲自坐重庆号军舰在葫芦岛靠岸，去茨山召集五十四军高级军官开会并作部署指示，当日乘军舰离去。2. 锦州战役打响后，塔山阻击战开始，重庆号军舰又回到葫芦岛，在岛东湾海面上用重炮向塔山射击，支援陆面战斗。3. 锦州战役打响后，国民党从天津调来两个军的兵力，增援锦州敌军，这两个军从葫芦岛登岸后向锦州进发，在塔山受阻，不能前进一步；敌军在海空火力支援下，用重兵进攻，仍不能前进一步，而伤亡惨重。锦州解放后，由天津调来的敌军，又从葫芦岛登船返回天津。

这时由前方送来30多名我解放军的被俘人员，在葫芦岛由监护五连看管。我曾去临时看守所四五次，暗中关心他们的生活。

上述情报是在我连物色的在锦西有家的兵送给我军第一线的。

锦州战役结束后，辽沈战役在大洼山一带打响了。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节节败退，东北司令部长官不断更换，均挽救不了东北战场的失败。最后一任长官杜聿明来到葫芦岛，坐阵指挥收拾东北的败局，我监护二营接到命令，由葫芦岛乘船撤到塘沽港口暂

驻在塘沽码头大仓库里，待命南撤广州市。

这时已是1948年10月，赵宁所在师团也撤到塘沽港口来，袁景林、武作华、李德顺等北辰同学所在部队也先后撤到塘沽，我找到了赵宁首先研究我的去向和新的任务，再就是由赵宁给袁景林、武作华开个会，确定由景林同学派一个交通员，回鞍山向石迪同志作一次综合汇报。

我监护二营四个连在塘沽港口住了几天接到命令，全营乘“莱锷”船离塘沽去上海港口，在上海市住了几天又乘火车去南京住在距长江较近的一所小学校里。在这中间我知道铁路交警支队也撤到南京市。我用两天时间找到了同在骑兵四十五团起义的三期同学陈忠儒，再三请他跟我一起工作，而陈忠儒因连长对他好情面难却、不能跟我走，我只好发展他为地工成员而后与他挥泪告别。在南京期间，敌总后勤部指示我们监护全营把原来旧骑兵三八枪，都换了新的步兵三八式枪，每位连长发一只加拿大手枪，在南京住有两周时间，又乘江轮到武昌市，住在江边，等火车去广州，1948年11月我们监护二营四个连终于到达广州市，六连住在珠江口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内两个大办公室内。这时我的工作更紧张起来了。到广州后首先抓六连自身的建设，稳定士兵是我开展工作的最好掩护，其次要发展地工成员，为搜集情报创造条件。对我连准尉周从禄给他钱让他以作买卖为名去搜集武汉到广州的敌军兵力配备情况。早在两月前在葫芦岛碰到的东北警官学校的老乡邢海泉，也随校撤到广州市，我去警官学校找到了邢海泉，发展他为地工成员。在监护二营营部有一位中学毕业的王上士，平时与我关系较好，到广州后我也发展了他。

监护八连排长、四期生郝毅，在葫芦岛时就已经发展他为地工成员。八连连长、三期生柳中枢同学，虽未发展他，但一旦有事还是可以站在我们一边的。我初步计划以这五位同事为核心在广州开展工作。

工作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六连有个兴城人唐上士，

到营部告我说我叫准尉经商谋私利；说我给士兵讲的话有可疑的地方。郭营长找我谈话，要我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说这算不了什么。之后经过考虑，我打报告要求辞去连长职务。何世礼司令官在官邸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愿当连长呢？我回答说：排长不听指挥；逃兵较多；我想去日本工作。司令官笑而不答，因我与司令官是球场上的老友，15 分钟后我便走了。

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派我回北京找组织去，广州的工作由王上士担负起来。1949 年 3 月我与邢海泉一起，穿军服持六连捉逃兵的护照，在一天早晨乘火车到汉口住下来。次日徒步，向解放区走去。驻马店是解放军最前沿警备线，我和邢海泉两人被驻马店几名公安战士围上。我和蔼地说，愿与局长谈话。一名战士把我俩带到公安局长办公室门口，让我们进去了。我当时说我们是地工人员由敌占区广州回来，你们可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并转石迪联系我是韩中生，组织就清楚了。局长说，无电报联系，你们往后边走吧！我俩离开驻马店，经许昌到郑州，在豫西军区找到解放军政治部，他们将我俩介绍到开封市中原军区政治部，由王科长安排食宿并让我们提供前方情报材料。几天后，他们给我拿路费，让我们回北京去找组织，就这样我俩经徐州、济南，到天津市，去公安局打听石迪的所在地，没有结果，只好乘车去北京，到公安局打听石迪同志办公地点最后在公安局二处找到石迪办公地点。首先见到了赵宁同志，由他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下。并写了材料。几天后，我将组织给我的小元宝还给了组织，因而受到表扬。根据组织决定我、赵宁和石迪爱人一起经考试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了四个月，又调回中央军委二部，继续进入学习班学习。北辰同学、二期生 吴学文、赵宁和我在同一个学习班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军委联络部工作。

我与赵宁、袁景林、武作华、王志文等几位北辰同学于 1948 年 9 月在塘沽港口分离后，我单独随军撤到广州市，其余几位同学都随军撤到天津市。赵宁同志，在天津解放前夕，为解放天津，

四处奔走侦察敌情，并组织局部起义和罢战向天射击。他经常与袁景林副营长联系，从而使行动一致。赵宁给包围天津的解放军送情报，要从袁景林副营长的防御阵地经过，在袁景林副营长精心安排下将赵宁安全送过去。在解放军攻打袁景林营防御阵地时，袁景林就地罢战，把枪架起来，宣布起义，得到解放军团政委的表扬，将袁景林送到教导团保护起来。

天津战斗打响后，解放军攻到武作华阵地前，武作华组织罢战，主动交枪不打，这一阵前起义的行动，受到组织的表扬，天津解放后他马上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8 年 8 月赵宁发展了王志文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9 月王志文由绥中调到北戴河。在北戴河战斗中王志文率全连士兵罢战，因而受到军部的审讯。在天津赵宁又与王志文取得联系，赵宁委托王志文找个可靠人张宏强向锦州石迪处送有关天津一带的敌军部署情况以及围攻天津作好战斗准备情况的材料。其后赵宁同志指示在王志文到北京之后要收集傅作义军队和十三军的部署情况，让他亲自把情报送给通县连络点的负责人，送到后王志文连夜返回北京与赵宁一起工作。这些同志都是地下尖兵，他们的事迹是令人难忘的。

（作者韩希精，军校三期生，离休前为吉林市一汽轻型车厂科长）

在辽南军区领导下

王永智

1948年3月的一天，伪满军官学校三期同学洪喜元突然来到沈阳我家，向我说："我是从辽阳（解放区）温　武（伪满军校五期生）处来的。温　武让你到辽阳去一趟。"当时我爱人正在坐月子。我把侍候我爱人的任务交给伪满军校五期同学王缉绪，收拾一下，便和刘庆芝（也是伪满军校五期同学）踏上了去辽阳的征途。到了辽阳，见到了温　武，他马上把我们带到了辽南军区联络处高远（米国钧）那里，高远将我俩安排到一位老乡家住下来，嘱咐我们：不要上街，不要和老乡接触；每天都要读报和学习一些文件。高远还抽时间向我们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我们刚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不知不觉间，一周的时间过去了。高远让我俩写自传，给我俩下达任务：回沈阳去，利用大学生的合法身份，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及时将情报送到解放区来。为便于工作，组织上让我和王缉绪、刘庆芝、洪

喜元共4人组成一个地工小组，组长由我担任。从此，我们便参加了革命。回到沈阳后，首先将工作任务传达给王缉绪，而后便分头行动起来。我到抚顺找到五期同学徐景耀，他当时是国民党二0七师一个团的军需官，他通过在师部和其他团的伪满军校同学将二0七师连以上军官名册、全师的兵力部署、驻地、兵力、火力配备、后勤供给、通讯联系等及时提供给地工小组；王缉绪通过伪满军校三期同学李镇了解国民党五十三军的情况，李当时是五十三军的参谋。1948年夏，国民党五十三军决定进犯我辽阳解放区。这是个重要军事情报，李镇将这一情报报告给王缉绪，王当即回解放区将这一情报报告给高远，使我军在敌进犯前已有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段工作中，我们的身份是大学生，但几乎不到学校上课了。我当时住在沈阳警备司令部对门的一幢楼里，为了隐蔽起见，我将家搬到铁西两孔桥南一所化工厂院内的宿舍里。当时我爱人魏新在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工作，她有意识地经常穿着国民党军官服出入家中。国民党几次查户口，都由她出面应付过去，使我们减少了许多麻烦。

我们从事地工工作期间的生活，主要靠我爱人的工资来维持，以徐景耀为主的在二0七师的伪满军校同学也经常给我们一些接济。当时我们的领导人高远同志几次提出要给我们一些生活费，都被我们谢绝了。

这段工作一直坚持到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才告一段落。高远进沈阳后，到我家来看望我们，对我们这段工作给予很高评价。我们每个人的档案中都有记载。因工作需要，我们这些学工的人在沈阳解放后被分配到东北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的沈阳冶炼厂工作，高远随四野进关去了。

（作者为军校五期生，离休前是鞍山市旧堡区建筑监督站工程师）

四十年代的日日夜夜

孙景大

进关

我在1941年2月，考入长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存有每个学生的档案、照片、指纹等资料。为此，逃离伪满的统治是困难的。经过两年的筹划，1944年秋才实现。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1941年，随着日寇对华中、华南的疯狂侵略的升级，对东北伪满的控制也不断的加深。他们以东北做为他们侵略战争的后方，置东北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伪满称日本为“友邦”，1942年却改称为“亲邦”。我所在的学生连长张挺（满清遗老张彪的第十一公子，伪满溥仪的朋友）解答学生质疑时谓亲乃近之意。但校方却公开“订正”：亲，乃父母亲之亲。日本成了父邦显然伪满洲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儿邦了。对此我们十分愤怒。不久我们学生连的朝鲜族同学均改用四个字的姓名变为日本国籍，加入日本学生连去学习。中日两国学生，虽同科学习，但两样伙食、两种待遇，我们备尝了亡国奴的滋味。是

可忍，孰不可忍！

1942 年，我在预科结业了。实习汽车驾驶及修理半年后，升入本科（辎重兵科）。暑假时，我特意去锦州找表兄张国良（他是检查官）办出国证未果。原因是他怕承担风险。我十分无趣悻悻而返。

1943 年深秋，辎重兵科学生去公主岭日本战车联队学习半个月战车的攻击课目，帐篷支在小广场上。为办出国证，我又去找在税捐局做事的朋友赵景林，他答应给办。我喝点酒未按时回营被区队长今林繁（日本人）发现，一贯打人的日本教官，对我却没动一指头，这件事使我忐忑不安。回校按律罚住禁闭 5 天，在此期间今林繁（外号金瞎子）每日必来禁闭室与我对面趺坐（日本话叫正坐），满眼热泪对我说：教官乃父辈，十分爱学生，并对学生行为负有责任。如能把外出真像对我讲，我一定帮助你，并保守秘密。我十分清楚他是个居心叵测的殖民者，便一口咬定，是因贪酒误了事。5 天禁闭期满，我长期深居简出，直到 1944 年秋逃走入关。逃走后，宪兵队多方搜捕，曾到我未婚妻在长春工作过的医院去找她，企图抓到我。当时她已改名换姓离开长春了。不久宪兵队又在一个姓董的教官引导下，去北满我哥哥家搜捕，也扑了空。

1944 年 9 月 16 日拂晓，我钻出学校马厩南的铁丝网，到长春市内换上一套西服，乘火车南下，车经兴城时青壮年乘客被迫下车集合于火车站前广场（是抓劳工）。我乘机逃走，改乘大车去绥中，大车又是贼车，中途勾结警宪堵截，又几乎被捕。到山海关，我企图从一豁口进城，谁料又被华北伪警察抓去，幸而是星期天，他是个中年警察，盘问一阵子，意外地竟放行了。

到北京姑母家住下来，表姐对我十分冷淡。住几天以后，她得知我逃出东北，是为了抗日救国，转而对我敬佩，十几天中相处十分亲热，临行时竟流下眼泪。出京后去河北临城小住，转赴开封，在开封虽然困居半个月，但却混得一个商人证件，径赴商

丘又去亳州。亳州遇雨，投宿“人和店”，找王经理，他已去界首(河南、安徽、山东三省交界处，是东北军驻防地区)，在“人和店”柜伙帮助下，通过了最后一道日伪岗哨，进入东北军占领地区——河南省沈丘县城。时值春节，街上遇见长春伪军校的上一班同学王成美、吴宗方、张文普 3 人。他们从东北逃到沈丘已经半年多了。我们一道去东北老乡家拜年，并由该地驻军的关处长备马送往安徽省临泉县第十战区指挥所，参见了东北军爱国将领何柱国。接见仅 10 分钟，命我留下，其余人员退出。何问我那 3 个同学是否是日本人？我做了说明，何放心了。委派我们几个人去临泉干训团任教育研究员。

我哥哥孙景阳，比我大 14 岁，“九·一八”随东北军进关，曾在何柱国部下当过军医，因此 对我是中国人他深信不疑。何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对我十分关照。

在东北军

西安事变后，部分东北军编入蒋军后又编入远征军，其余部分几经周折在河南、安徽、江苏 三省交界处占据了几个县，以安徽的临泉和河南的沈丘两县为中心，方圆数百里，建立了第十战区，由蒋的亲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领导。汤兼任司令长官，东北宿将何柱国为 副司令。在临泉成立指挥所，执行战区司令部的职能。下边统辖十五集团军、十九集团军和十几个县。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军政府。十五集团军系东北军旧部，十九集团军乃蒋家嫡系，司令陈大庆是蒋家亲信。蒋介石安排十九集团军到十战区，实际上是控制整个战区，监视东北军。何柱国真正能统辖并听他调遣的仅十五集团军和一些杂牌部队而已。

十九集团军驻防在安徽省一侧，中心在临泉县，因系正统，自成体系，盛气凌人。东北军多不愿与之往来。十五集团军驻防在河南省一侧，以沈丘县为中心，也自成体系。东北军远离故土，流亡关内，同舟共济，互相关照。

东北军流亡关内的一些无职官员，多半前来找十五集团军求职，他们大部份担任参议、高参等职务，每月发给八成饷，比如当时上校月薪六千元，参议则只得四千八百元，收入低微，生活较差。

东北军中有实权的人，发财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发了财，在河南买宅置地，娶妻纳妾，忘了东北，忘了祖宗，成了安乐公。我有一次，从十五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的沈丘县（叫做后方）去前方（离鬼子占领区近的地方叫前方），偶然与几个东北军的军需官乘马同行，马行40里到一个叫八里槐的小镇午休，下马后我正欲去饭店吃午饭，几个军需说饭店不干净，拉我去他们的军需主任家吃饭并午休。主任和他的老婆均在前方，八里槐的家仅有一老兵看守。主人不在，我想吃饭必然困难，不料我们刚洗完脸，老兵即端上来水果、香茶和不可多得的粉刀牌香烟，不到一个小时，老兵又摆上一桌丰满的酒菜招待我们。我边吃边估算，这桌酒菜，起码得用去一个军需官半月的饷包。主人不在家，一个看家的老兵能轻而易举地如此招待客人，可见主人平时生活何等阔绰了。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做“穷军医、富军需”是有所指的。当时还有个发大财的办法叫“物资交换”。即用几十辆车子，满载牛皮、小麦等物资，派人押送到日伪占领区“交换物资”。回来则满载食盐等奇缺物资，一本万利。有权势的大官还可以派副官随车前往，弄些海洛英毒品回来，更是一本万利了。战区中有明文禁律，贩卖鸦片及吸毒者要处罚，重者直至枪决。但村村有卖鸦片的。官员中不少人一榻横陈，吐雾喷云，令人触目痛心。去敌区为何能够通行呢？早年“曲线救国”投降日寇的张岚峰脚踏两艘船。既当伪军商丘的司令，又暗中与十战区有来往。十战区派出的官员，到河南可以换上伪军军官服装，持张岚峰司令部发出的护照，往来无阻。

军队的官员愿就任实职，因为当连长比副团长的收入不知多几倍或十几倍。当个司务长也比当连副或排长收入多得多。当时

军队的粮食出自地方，每人 66 斤毛粮。农民就近送粮给驻军，收据可以顶税上缴，但经手收粮便可中饱私囊，便民利民的办法一变而为坑民害民。

东北军经过西安事变，不少人看穿了蒋介石的真面目，痛恨其为人，同情共产党。但是虽有认 识，能够抛弃家业参加革命的人甚少。

日寇投降了。十五集团军的官兵无不欢欣雀跃，人们眼含热泪，奔走相告。“八·一五”后蒋介石派军用飞机将何柱国接往重庆“议事”。同时下令东北军原地驻扎待命。而此时华中、华北的伪军头目，却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的挺进军司令了。他们替蒋介石占领城市和铁路，伙同日寇武装维护铁路交通。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抢占胜利果实，丧尽天良，倒行逆施，引起东北军的切齿痛恨。8 月下旬骑兵三师挥师北上，到达徐州。继而骑二军、步兵十二军等也纷纷北上。离别故乡十四年的东北军，要回到故乡去，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蒋介石却派兵阻截。有一个军特务营在徐州附近被缴械，在鲁南地区又被吃掉几个团，有些校尉官员，丢了队伍，只身逃往北京。1945 年初冬，不少东北军将校云集北京，眼巴巴盼望何柱国飞来。但望穿秋水，不见何的归来。

蒋介石派往东北接收的主要人物，均系嫡系。行营主任熊式辉、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东北将领何柱国只被任用为参谋长，有职无权，他因眼疾未能回东北来，又派董英斌为代参谋长 。随何柱国去重庆议事的关邦杰处长，总算弄一个副处长头衔回到北方来。蒋介石为收买人心，1947 年曾派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实为做个样子。董彦平被任命为副参谋长，率领一个代表团去长春与苏军元帅会谈，扮演傀儡角色。蒋介石全面内战准备完毕，开始在东北大打时，董彦平率代表团从长春狼狈撤出。飞机上装了不少熊式辉等人从长春掠夺的物资珍宝，一些谈判代表不能登机返回，而熊式辉却在锦州军官大会上矢口否认此事，真是无耻之

极，为此遭到了广大军官的谴责。

东北军官兵和家属几十万人，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到处流浪，到处逃亡，除霍守义、徐长熙部进入山东，又一度被卷入内战外，整个军旅回到东北与父老见面者，寥寥无几，东北军完结了。

开展地下工作

1945 年 9 月，日寇投降不久，我赶到北平。时间不长，国民党接收大员即从天而降。一场掠夺劫收的大丑剧开幕，霎时间北京被弄成污乌瘴气，乱成一团糟。素有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民主传统的北京人失望了，悲愤了。教授们发表宣言，学生们远走张家口。有人愤而 喊出“此处不养爷，爷就当八路”的强烈呼声。我经过再三考虑，打算回东北农村去当个教师，但火车不通，无法成行。当时蒋介石正借用美国军舰，从海南、缅甸抢运军队到秦皇岛登陆，然后改乘火车运往东北，为内战做准备。10 月深秋，我青衣小帽，乘车去秦皇岛，试图搭上军车回到东北去。正在码头徘徊，突然被巡逻队逮捕。一个上尉军官，对我严加审问。最后，声言要枪毙我，说我是共产党探子。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突然几个持枪的士兵，簇拥着一个身着美式服装的军官走过来。他看见我讶然叫道：“这不是小老弟吗？”我定神看看他，原来是原东北军暂编十五军副军长王天佑。东北同乡，流落在河南沈丘和安徽临泉时彼此认识，而且同乡情深，关怀亲切。在他营救之下，我得以化险为夷，并登上了返京的火车。那时火车没有定点，时开时停。当晚车到河北的古冶车站，停下不开了。因气候甚冷，便打开行李和对坐的一位老者拉开被子盖在身上，准备过夜。这时巧遇一位同学在车站警卫队当队长，盛情邀我下车到他的队部食住，答应第二天开车送我上车。不料第二天车开时他忘了叫我上车了。为此我的行李全部丢失，孑然一身回到北平。不久奉命到新组建的东北行营报到，吃饭和冬衣才有着落。行营

的处长关邦杰指派我到参谋处第一科上班。参谋处下设三个科，一科主管作战，二科主管情报，三科主管后勤补给。三个科同在玄武门外原来旧中国国会的地方大厅里办公。

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举国振奋，北平尤为反应强烈。我们当时认为和平建国有望，十分高兴。彻夜无眠，举酒相贺。

时间不长，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到北平办公。双方协议：1946年1月13日午夜全线停止冲突，在京东北同乡，额手称庆。但是时隔几小时，1月14日清晨，枪声又起，国民党加快了往东北运兵速度，加大了战斗部署的规模。并从天津等地抽调部队，经玉田、丰润抢占热河，去完成“战略上有力的控制”。东北大打的序幕已经拉开，和谈协议只成一纸空文。1946年2月，熊式辉、杜聿明等人率大批幕僚麇集锦州。我于同年3月到锦洲、4月进沈阳。东北行营与保安司令部相邻，设在沈阳和平区北部高道口两座大楼中。人员食宿全在楼内。我因急欲离去，乃到东北大学临时补习班报名上学。补习班可免费上学。这时候，一个失业同学李永春大口吐血，病卧在床。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失业的，靠我的工薪袋，维持生活。因而抢救李永春生命的担子，只有我来承担了。此时王亚江同学的哥哥王亚伦来沈。他是医生，实则是地下工作者。在李永春病中，他日夜辛劳，悉心医疗看护，令我十分敬佩。半个月来的朝夕相处，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从他那里了解不少关于解放区的形势和许许多多革命道理。解放区的明朗清新，听之新鲜，心向往之。这时候我那颓唐失望的情绪一扫而光。他劝我仍回东北行营上班。他说，如能将国民党进攻东北解放区的作战部署情报，报送哈尔滨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将使共产党在战场上赢得主动，可以大大减少子弟兵的伤亡。我欣然同意并立即返回行营去为党、为革命、为东北解放事业而工作去了。我从此参加了革命。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时间是1946年5月上旬。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耐心日以继夜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果。我一共搜集到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整个分布情况，作战部署、后勤补给计划、武器装备、指挥官姓名出身简历、部队真假番号等重要情报 11 册。这些情报大部份是杜聿明的司令部报送给蒋介石的报告原件，据此可以全面分析了解蒋介石在东北的整个作战部署，使解放区的作战部署处于主动地位。6 月王亚伦同志北上将情报送往哈尔滨，由部长邹大鹏转报林彪、罗荣桓，受到了东北局社会部和林、罗的赞扬。

王亚伦吉林人，父母在吉林开设一个医院，父亲是内科医生，母亲是妇科医生，他本人是牙科医生。他父亲是吉林知名人士，交际甚广。为此亚伦同志从吉林去哈尔滨比较方便些。

民主联军司令部林罗首长对我们送去的情报十分重视并大加嘉许。决定奖给一批巨款。王亚伦同志 9 月返回沈阳来，几天后又带着我搜集的一些情报回解放区。临行，我恳切地转托亚伦向首长谢绝了奖金及提供的工作经费。亚伦来往于两个地区携带金银贵重东西既困难，又危险。我每月收入，节省用度可以供地下工作费用。组织上不必再冒风险送钱来。亚伦临行前我表示愿参加共产党。

王亚伦同志 9 月回来之前，情况有了变化，东北行营改名为东北行辕，熊式辉从他江西旧部中抽调亲信来主持东北行辕新成立的秘书厅。机密文件须移送秘书厅归档。我唯恐暴露，急待转移。8 月初我找到朋友刘光凡利用他的关系转到四平交警第二大队。刘光凡东北人，伪满军需官，1944 年进关，在安徽省临泉县郊外一个训练班学习。有一天偶然在一个球赛场上观球相遇，曾招待他一餐饭。得知他所在的训练班是训练特务的，他急于脱身返回北方去。我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安慰他几句而已，饭后他匆匆而去。十几天后，突然收到他从十战区最边缘地区的水寨县来信。原来他逃出训练班，走到水寨县时被捕要我救他。我经过多方联系，找到了东北骑兵三师，开去证明信件，水寨县才放了他。我

还赠送他一笔路费，日寇投降后，他又在东北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并受到重用被任命为蒙旗特别组组长，公开职务是 四平铁路管理局交警二大队队长。经过他热情奔走，我被任命为该大队的第六中队队长。在四平街站住脚并能继续进行搜集国民党军事运输方面情报工作了。

亚伦同志 9 月匆忙地要去哈尔滨。是因我的工作情况已有变化，急于向邹大鹏请示下一步工作。但不幸的是他此行竟成了烈士。

亚伦临行前把他的襟兄关恒介绍给我。告诉我，如果他发生意外，可由关代替他去哈尔演与首长联系工作。

亚伦走后杳无音信。1946 年 10 月，我率领的六中队奉命调沈阳，担任苏家屯铁路器材场，沈阳皇姑屯机车厂和抚顺大官屯车站的警卫工作。队伍分住三个地方，我的队部先设在皇姑屯，以后又挪到沈阳南八道街。

这次暂调沈阳，时间仅 100 多天；于 1947 年春就调回四平街了。这一段时间，情报工作倒还顺利，与一些顶头上司“应酬”也不感太难，难却难在与一些特务们的周旋上。那些人性非良善，毒如蛇蝎，曾向警务组密告我是“共党”；还以皇姑屯机车厂我的士兵打了接收大员为由，大做文章将矛头指向我。这些事件虽然在几位老乡长（当时称有权势年龄较大的同乡为老乡长）维护之下化险为夷，但却消耗掉我一个多月的宝贵时光。在特务们包围的环境中，不仅生活乏趣，连呼吸也有窒息之感。古人有句：“枕戈待旦”是形容之于事业，而我却“枕枪待旦”寝不安席，一有动静，推被而起，急趋门侧，拔枪而待。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实有度日如年之感。

1947 年 3 月的一天，关恒同志穿青布羊皮上衣，突然出现在我家。他的行色很引人注意。我十分不安。交谈之后，方知他之前来是因他爱人病重急待就医。是为寻求财物上的帮助而来的。当他知道亚伦同志一去不复返，我哥哥景章继亚伦之后去哈亦无消

息时他毅然表示立即去哈尔滨。唯需解决一下养家、治病和路费等开支，因他之来，太引人注意。我不能出外活动筹款，乃将新婚爱人的手饰等物全部赠与他，送他上路，他此行任务除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外，还带去部份情报。并为国民党即将把东北散在的骑兵整编成一个军充当战争之用，我拟请组织派人或由我物色人员打进骑兵军问题向上级请示。

1947 年春，国民党派东北行辕中将参议王景阳率十几名将校乘专用车到东北各地点编骑兵队伍，将散在的骑兵支队合并起来成立骑兵军。他任军长，下设三个旅，用于参加东北内战。专用车厢在四平车站停留时，我宴请了王景阳和他的幕僚。王原来在河南任东北骑兵第二军副军长，日寇投降后，单身一人回到东北，担任参议，在他失意时我多次去看望过他，同乡情深关系较近。他曾保举我去美留学，因我参加地下工作而婉然谢绝。在这次宴会上我向他提出，介绍一批同学和东北知识青年，到骑兵军及各旅去任营连职务，他当即表示欢迎，可惜我 1947 年秋到哈尔滨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后，未能接上地下情报的组织关系，我被按起义人员派往辽北省安广县去参加工作，到地方不久，即停止工作待命，处境如此，骑兵军的工作也根本无法进行了，这是后话。

1947 年 4、5 月，我奉命率部调回四平街。我的九分队派驻西安梅河口车站担任警卫工作，其余七、八两个分队留在四平守卫铁路系统的车站、仓库、机关。在此期间，由于特务们活动猖狂，我的处境十分恶劣。记得曾发生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东北行辕参谋处二科王参谋来四平办理公事。到四平住在一个小洋房里，我去看望他时他席地而坐（日本炕，上边铺草垫子和凉席）在一个方桌上摆些烧鸡和酒类，这个人长我二十来岁，是随张学良进关的东北老军官，中校军阶。他说话甚慢，参谋处的人给他起外号叫王老太太，后来改称王二哥。我在一边坐下陪他喝酒。忽而一个眼戴墨镜，全身美式服装少校军衔的大个子，大踏步跨了进来，此人和主人似很熟悉。谈话中听出，他姓陈，东

北讲武堂毕业。

“二哥”曾在讲武堂毕业后留校给陈当过教官。师生关系十分亲近。他们高谈阔论中也流露出做为东北军的成员对蒋介石的不满。谈了一阵陈才发现我，他十分不礼貌地指着我问“二哥”我是何人。我说是交警队的，下句尚未说出口，“眼镜”大声喊道：“交警！有个孙景大，是共匪”。这时“二哥”在桌下用脚蹬我一下，示意不叫我说话。又喝了一阵子，说道：“孙景大伪满是学生，怎么告他是汉奸！”又说：“景大是我小老弟，当过行辕的参谋，是党国后起之秀”等等。陈眼镜听到我是东北同乡，受特务们的窝囊气时，蓦地站起来，表示一定要帮助同乡人出出气。这时“二哥”才把我介绍给他。“眼镜”是四平街军警督察处长杜长城的秘书。有人向沈阳特务头子文强那里投书密告我，原信批转给杜长城负责办这个案件的。在陈眼镜以及东北行辕派来的情报官“王二哥”的周旋下，共匪特务一案就此了结。事后得知交二大队队长刘光凡也以身家姓命给我担过保。

四平攻坚战是在1947年6月打响的。在攻打四平之前，先解决了四平的外围郑家屯、西安、梅河口等地的敌军。我下属第九分队，驻在西安、梅河口。该队队长秦嵩高到四平向我请示怎么办，我命令他不准伤亡一个人。他年龄较大，思路周密、心领神会。回西安后将部队枪支集中寄存起来，官兵等一律放假了。

进入6月，四平已四面被围。我因与组织联络不上而十分焦虑。此时，我一个老朋友李光时从晋察冀地区来到我家，他分析形势，帮我拿主意。我的主意是：民主联军不进四平街，我继续潜伏下来为党搞情报。如打进四平，就组织交警大队起义，以减少我人民军队的损失与伤亡。我还相机找到民主联军向他们介绍市内军事部署情况，以利于战斗的进行。6月19日清晨，战斗已发展到巷战阶段。我与光时两人，找到民主联军一个营指挥部与高教导员商定，由他们用火力掩护，交警大队通过国民党二六三团范营的封锁线，把队伍拉出来。民主联军夜黑运动进入我的队

部，即插入范营背后，解决范营，从而扩大战果。经过与高教导员议定后，通信员小张带我的亲笔信去见大队长刘光凡。刘正与全体军官坐在一个屋子开会，他眼睛近视，把信摊在桌上，被队长何光从旁边看见了，他立即起身，大骂刘是叛徒。这个老牌特务，大步向房门走去，妄图掌握他的队伍，阻止起义。刘光凡怕他回身反扑，乃掏出手枪从他身后连开两枪，当场击毙了何光，宣布队伍起义。我将起义队伍安置完，立即回到我原来的队部去，向高教导员等同志介绍了四平军事部署情况。几天以后，因民主联军决定撤出四平打国民党援军，我也离开四平，在孤榆树村一带蒙陶铸同志亲切接见。不久就到解放区去了。

到解放区后，我向总政治部有关领导提出，请他们与邹大鹏部长联系，我要求汇报工作。但不知为什么，事情拖延下来，年底竟将我按起义人员分配到辽北省安广县去工作。到县不久土改三查运动开始，我被停下工作在家待命。一直到东北全境解放。1954 年才与邹大鹏部长恢复了联系。但已时过境迁，国民党骑兵军的工作当时未能插上手，实在可惜。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离休前为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为我军提供情报

李英泽

我是伪满军校一期毕业生。光复后在沈阳以一个编外中尉军官的名义，经人介绍到东北行辕四处二科工作。1948 年初，伪满军校同学王宝元介绍我参加了东北局社会部领导的沈阳地下 工作，任务是利用现在的合法身份，专门为我解放军搜集军事、政治情报。我所在的东北行辕四处二科专管国民党军全东北区的人马实力查报。凡是驻东北区的所有各兵种的国民党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后勤机关（包括电台）、兵役机关、军工厂、被服厂等各军事单位和部门的官兵调入调出、伤亡、招募、逃跑等人员增减、驻地变动、部队代号变换（为保密，国民党部队代号经常变换）等，都要按规定如实地向四处二科申报，各部队实际人马数字如不经行辕四处二科核转，后勤部门便不发给粮食、薪饷、被服等等物资。因关系到部队的命脉，所以各部队、各单位都及时地把本部门官兵增减、驻地移动等情况如实地呈报给四处二科。全科除正副科长外有 6 名参谋，每人分管

一片。我当时除分管一片外，还承担了汇总总表的工作。这张总表每月上报南京国防部及行辕主任各一份。因总表归我汇总，我每次都多复写一份，及时交给地工组长周立镐，他派交通员迅速送到后方。这样一来，我解放军总部就和敌国访部一样，每月都能看到关于东北区国民党部队的人马实力分布和统计的报表。我在向组织交总表时，还附上国民党部队的移动、代号的变换等材料。这些材料使我军可随时掌握敌情变化。

当时周立镐同志还交给我这样一项任务：把全东北国民党军队团长以上军官的花名册弄到手，解放区需要这份材料。这份材料归行辕一处掌握。我的一位名叫章全科的老同学恰恰在这个处任上尉参谋，他为人正直、诚实。我以核对各部队报表中长官姓名是否准确为由，向他借来了花名册，下班后我马上把花名册交给了周立镐同志，他用过后，我将原本还给了章全科。

东北行辕二处主管情报工作。主要业务是：每月把他们派到解放区的谍报人员从四面八方搜集来的关于我军的情况，加上他们的分析、研究、判断，形成对我军部署、移动估计的绝密材料，交给上边。我的老同学高振海是二处的上尉参谋和我一样，也是经王宝元介绍参加了地工组织的。当时他就分管这项业务，编制、汇总印制以致装订成册，都是他的事。他每月都拿出一本交给我转给周立镐同志。

在锦州塔山战役最紧张阶段，从葫芦岛来援的国民党部队一登陆就来电报报告官兵人数、部队代号，要求补给。我有时接到电报，顾不上抄写，就将电报原件带出来交给地工组织，待他们抄录后再还给我。

我还到四处办公室偷阅其它文件，将其它科主管的运输、被服械弹补给情况写成材料，交给组织。

蒋介石在1948年东北战局紧张时刻，曾两次来东北行辕开会，我都及时将情况报告给了组织。

我为能在解放军全面大反攻的关键时刻，为人民战争贡献点

力量，做了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而感到光荣和幸福。

（作者为军校一期生，离休前为沈阳市大东区劳改分局干部）

四次冲过封锁线

霍德权

这是在1947～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我的一段亲身经历。

我当时只有20多岁，和一般年轻人一样，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47年初我在同校一期生吕天老大哥的开导下，看了许多进步书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经吕天同志介绍于1947年5月5日在东北局联络部参加了革命，在送别宴席上联络部部长李立三、副部长李力果让我潜入蒋管区去做地下工作。为了做好准备工作，避免暴露身分，领导让我们(另外还有2人)改换了服装，住进了新宾旅馆，不许外出。在这期间领导组织我们学习，告诉我们怎样做敌区工作和一些应注意的事项。

5月下旬我们随领导丁丹及其爱人顾红以及警卫人员等奔向白城街辽北省委所在地。在那里民运部长王放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不几日就把我们介绍给地委城工部。我们和部长倪学源多次出人拉锯区小城街、

康平慈恩寺等地，寻找进入敌区的机会。

6月初前方战局比较稳定，我们分两组由开原，铁岭进入敌占区。我是和交通员刘斌一起从铁岭这条线进入敌区的。刘斌地熟人熟，在解放区这段路途中，他有说、有笑、有唱，时而讲起过去跑交通的趣事、险事，时而到一些农会或交通联络站喝水、歇脚，显得清闲老练。第二天又走了一段路程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因为前面不远的大孤家子，是真空地带也是拉锯地带，敌人经常出没。刘斌把早已准备好了的白色西装给我换上，一再叮咛我要提高警惕，要胆大心细，并订好明早相会时间地点，我俩便不再结伴行走了。他在前面走着，我和他相距有几十步在后面跟着，感到十分紧张。夕阳西下，刘斌向我们的联络点走去，我单身一人走进了大孤家子大车店。

事后才知道，这大孤家街驻有百余人的红眼队（地主武装），是敌人派往我区的谍报人员必经之路。

我的内心是紧张的，但表现出来的却是稳重大方、大模大样。店掌柜的有50来岁，一看就是一个久经世故的人。他点头哈腰地迎了出来。“住店吗，老客?”我故意显示出内兜有钞票的样子，他盯着我的钞票说：“十里八村我这店是最好的了，再说天就黑了您这……”我问：“有啥好吃的吗?”“有！有!”我说“那还行。”表示愿意住下。屋里是南北大炕已经住有20几人，看样子都是赶路的。我问掌柜的都有啥好吃的?他说了一大堆。我说：“好，挑好吃的弄八个菜吧!”掌柜的愣了愣赔笑说：“对对！多来几个挑着吃。”

天眼看黑了，热乎乎的八个菜和一壶酒，很快摆满炕用长方桌。我刚吃上没有5分钟，就听外面传来脚步声，“都坐好，别动!查店来啦!”有4、5名红眼队兵端着大枪进店，又盘问又搜身。我仍在大吃大喝。快查到我这啦，我先发制人地说：“谁喊什么?”几名红眼队听我一喊，愣住了，一个当官的对我说：“我们查店!”我马上改装笑脸：“啊，弟兄们辛苦啦!”我喊：“掌柜的，拿双筷子

来!”说着示意这个队长坐下喝点。这个队长问“您是……?”我反问:“怎么,你不认识我?你没去过铁岭?没去过师部参谋处?”他马上说:“是,没去过。”我说:“噢,那难怪你啦!我姓张,张参谋。”这队长马上赔笑问“啊!张参谋,您这是……”我没等他问完马上反问:“方才有没有几个人过去?”“有。”我说:“那就对了,你给我好好监视他们,谁不玩活计马上来告诉我,别露出我在监视他们。”这红眼队长认为我是师部情报参谋,显示出亲热劲儿,我示意叫他那几名士兵出去,叫他喝上一杯,他说:“不啦”。说完就要走。我问他有多少弟兄、多少支枪?他说有七八十人才25条枪。我说:“那还够打仗用?再去铁岭时到师部找我,把用不着的枪扔给你几捆就够了。”匪队长千恩万谢走了。我长长出了一口气,稳稳当当又吃起来,可哪里还吃得下去。

晚上,掌柜的拿来的是一床很漂亮的新被子。可我哪里睡得下。约在后半夜两点钟左右,又有5、6名匪兵查店来了,有的旅客跪在炕上,有的站在炕沿前,我仍装做大睡,也不知那个匪兵大吵大嚷,我突然质问:“谁在喊?”掌柜的马上点头哈腰过来:“报告长官,他们在查店。”我说:“查什么?我在这还查什么?”掌柜的马上转过身去对那几名匪兵说:“这位是铁岭师部长官,队长昨晚见过,叫多关照……”几名匪兵一听,吐下舌头转身走了。经过这两次硬碰硬地和敌人交锋,我反而感到敌人都是纸老虎,但心里却很不平静。

东方见白,我说出去溜达溜达去,顺手抓出一叠国民党钱,交给店掌柜的说:“多就多点吧!一会回来再说。”他欢天喜地地接了过去。

我出了店房慢慢地向西边大道走去,这时心中总算平静多了,但等待刘斌到来相会的念头又出现了,不能总是在大道上走呀,于是钻进一家小铺,为了拖延时间,我要掌柜的现做小米粥,火升起来了,小米下锅了,但我发现太阳已从地平线升起一半,正是我和刘斌同志订好的时间。这时,从西边他真的来了。等他路过

小铺时，我向他示意，付了饭钱，急忙出了小铺，尾随刘斌而去。出了大孤家子庄。看看后面没有尾巴，我和刘斌手握在一起，提起昨夜发生的两起硬碰硬的可笑事。刘斌说："对啦。对敌人就是要这样，要胆大心细，你不怕他，他就怕你。"又说，"叫那红眼队长去铁岭师部找你取枪，挨蒙去吧！"我俩都笑了。眼见进入敌人防线了，我俩大模大样，边走边说笑。

到铁岭了，铁岭北面新开河，据船家说河南面国民党兵盘查得特别严。为应付敌人，我俩把良民证上的各项背得通熟，愁的是十两大烟土怎么拿过去呢？刘斌笑着说"手拿呗。"只见他把大烟土捺在礼帽顶内，食指中指可以夹着脱帽，点头也不会掉。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盘问搜身的两道关，胜利地第一次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第二次通过敌军封锁线，是在1947年末，腊月廿三过小年前后，当时我们手中掌握了不少重要材料和情报，可刘斌长期未来，去到福利食堂联络点找老侯，他说刘斌很久未朝面。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有些是时间性很强的资料，如明年1月1日敌军东北各部队，全部改换新的代号，还有他们新编制的6种所谓"秘密剿匪手册"，必须提早送回解放区。于是我决定不再等交通员，自己和另一名同志李景田亲自回解放区一趟。这就得再一次通过敌军封锁线了。

出发这天北风吼叫漫天大雪，虽然走的是熟路，但一过河，那大风大雪使人睁不开眼睛。我俩只能顶着风雪，不管高粱楂子地，不管坑沟，躬着身子扑向前，那大风吹起的碎冰块打在脸上比砂子打脸还疼，后来到农会才发现，脸部都是口子有的还在渗血。从铁岭到双榆树仅仅50多里路我们足足走了一天。天黑了我们才赶到双榆树附近的一个农会。这是解放不久、新建立起来的一个农会，当我俩说明来意后，他们非常欢迎，他们把我们俩被汗和风雪浸透的里外衣，铺在热炕上烙，我俩围着棉被，吃着小米饭，白菜冻豆腐，说不出的香甜。特别是那用大酱腌制的芹菜叶儿，是

一生从未尝到的鲜味，这顿饭菜我一生难忘。

天大亮了，农会干部喊我俩起来。饭后，用两只大狗拉的雪爬犁，拉着我们几个人，飞也似的跑在雪地上，我们享受着大自然美景去见领导，心情格外激动。

到了铁法联合县办公地点，县长刘永川和我俩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使我们感到革命阵营里官民一心无拘无束的同志感情。第二天，刘县长把我们带去的材料转给了城工部部长，才知当时正是 1947 年末党内大整风，人员里不出，外不进。刘斌长时间没有跑交道的原因就在这里。

再说说第三次通过敌人封锁线。

我俩任务完成了，该回去了。在解放区内行走，除了碰到几次儿童团查问之外，其他一切顺利。饿了就到农会或武工队去吃饭，走到天黑，前面村庄进不去了，因为敌军已进入该庄，我们只好宿于荒地庄我军的北京师部。这是一支作战部队，也是刚进村不久，都在准备着明天的战事。我俩虽然睡在师部，但那仅仅是一间没有烟火的空房子，地上铺了几捆高粱秸，就算是优厚了。天亮了，我们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滚到了凉地上。这荒村前面叫沙后所，是敌军占领的地方，过不去，我俩就绕道到北头的另一个庄，前面庄仍是敌军占领，只见有人进庄，未见有人出庄。这种情况，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核计一下，最后决定用军统假证明唬过去。我们走进敌人占领的村庄，才发现进庄的人都在街南面墙根下蹲着，我们当即拿出带有特字的九七九六部队假证明，混过值班排长但又碰上另外一个敌军排长。他上下打量我们最终还是放了我们。

第四次冲过敌军封锁线是在 1948 年 5 月 13～16 日这几天。

因为年前第三次通过封锁线时，在我军北京师部睡觉，滚到凉地上，使慢性阑尾炎发作，一天重于一天。为了迎接沈阳解放，必须进行手术，遂入抚顺矿务局医院。

1948 年的 5 月 13 日是开刀过后拆线的时候，有的同志反映

说：有些不相识的人，在打听你的下落和住处，情况可能不妙。我忍着开刀后刚 7 天的病痛出了院。第二天回到沈阳，才知道昨天家被敌特抄了，找到我在抚顺的通信处；今天敌特可能去抚顺。我没敢住在家里，躲到一个学校收发室里去（父亲是看收发室的）。为了不叫抚顺的同志受损失，第二天我又拖着病体潜回抚顺。在联络点听孟繁武同志介绍，就是昨天晚上在抚顺开始对我实行大搜捕、抚顺的敌特九七九六部队与沈阳总部，电话频繁往来，也未摸清我的去向。现在在抚顺，凡是我所去过的地方，不论宿舍、单位，都有敌特在把守，车站各处也有人巡逻。我决定立即回解放区，便把抚顺的工作，安排了一下，乘夜车潜回沈阳，住到一位亲属家中，第二天又从铁岭老路奔向解放区。当我进入双榆树东头时，发现村西头来了许多红眼队匪兵，估计有 100 多人。看准了后，我便绕道进入北面的一个村庄。正好那个庄有我解放军五四七部队，我将敌红眼队进庄的情况告诉部队，指导员大喜，是夜我军出兵全歼敌红眼队 125 人。我因刚手术不久，又加上长途行军过累，刀口发炎，被城工部送往省委民运部。因为都是过去的老首长，他们对我关怀备至，拨给我疗养经费，给我治疗。我休养了一个多月，又走上另一个工作岗位。

我四次冲过敌人封锁线。细想起来，这四次冲过敌人封锁线都各有其特点：如果说第一次是硬碰硬与敌人斗智，那么第二次克服冰雪狂风，踏雪与天斗力，而第三次是利用在对敌斗争中学习到的手段，战胜了敌人，最可笑的是第四次。从沈阳到抚顺，敌人用追捕、用电话、用抄家、用坐守以及后来用公开张贴通缉令等多种方式，妄图抓到我也未找到我的身影。最后是我提供了全歼敌匪 125 人的情报，于是我军一举歼灭了敌人。

（作者为军校五期生，离休前为锦州市电影公司副经理）

血染乡关增国色

李　春

阎凤桐是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生，1945 年冬参加我东北人民自卫军，在吉长部队任参谋。1945 年 12 月在吉林省长岭县同国民党收编的匪军战斗中壮烈牺牲，经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

阎凤桐烈士，黑龙江省林甸县人。1937～1940 年我和烈士同在齐齐哈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学习，是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凤桐烈士在中学学习时，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注意阅读报刊杂志，关心国家大事；因身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亡国奴的屈辱，逐渐提高了民族观念，萌生了反满抗日的思想。

1941 年，我们一同考入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进一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凤桐烈士不断学习探索，虔诚追求真理，反满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同时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抗战救国，终于在 1944 年 9 月参加了中共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党的外围组织，在石迪、佟志杉同志的直接领

导下，作为“军校十师生”的一员，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凤桐烈士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开始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1945 年 2 月凤桐烈士被派往热河伪满军部队，在见习期间，按照毕业前夕党的指示，努力团结士兵，准备对日的大反攻。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伪满军解散，凤桐烈士连家也没回，立即返回长春，积极要求参军，投入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我和凤桐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是参加了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并在长春青年读书会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同年 9、10 月间经组织介绍参加了东北人民自卫军，在吉长部队任参谋。凤桐烈士满腔热情，不怕艰苦牺牲，把在军校学到的军事理论、技术同我军的实际相结合，积极从事发展武装、新兵教育训练等工作，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受到部队首长的器重。凤桐烈士亲自受到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熏陶，经受了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的考验，阶级斗争觉悟和工作能力都提高得很快，革命立场和革命决心更加坚定，成为我军难得的一位好干部。

1945 年 12 月 14 日我部进攻匪军长岭以东据点杨大城子。我奉命担任通讯联络工作，随副司令员郭文献同志从驻地双城堡出发参战。12 月 15 日攻克杨大城子后，部队继续增援被匪军包围的长岭县城。我在当晚带兵到东门侦察，被叛变分子刘才骗进城被俘。部队受到阻击，由于匪众我寡，我部被迫撤走。次日驻守在杨大城子的阎凤桐烈士作为部队政委傅根深同志的助手，带兵再次增援长岭。途中遭地主武装的阻击和长岭匪军的包围。在激战中傅政委和阎凤桐同志壮烈牺牲。12 月 19 日坚守长岭县城的我军官兵受到匪军的突袭，罗荣彪营长英勇牺牲。至此，长岭县城完全被匪军占领。

1946 年 2 月 25 日我军收复长岭，镇压了匪首和叛变分子，为烈士报了仇。1954 年 10 月 1 日长岭县委、县政府在北门外为保卫长岭而光荣牺牲的革命先烈修建了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烈士的英

风永远为长岭人民所敬仰。

阎凤桐烈士为了东北人民的解放，为了他们追求的革命事业，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思想品德、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阎凤桐烈士是我的最要好的同学和最亲密的战友，几十年来，缅怀思念之情，无时或已。谨呈七律一首，聊慰忠魂于万一。

战地诀别半世长，朝朝暮暮念阎郎。
华年校场磨刀剑，永夜寒窗窥曙光。
血染乡关增国色，魂归玉宇荡天香。
故人情洒相思地，泪沃梧桐慰凤凰。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曾任北京市教育工会副主席）

突破荆州城东门

刘 前

1949年6月，我军十三兵团四十九军一四六师进至湖北天门一带，准备渡江作战。当时，我任师山炮营二连长，全营在天门县天门河边，练习山炮快速装卸船和人马泅渡的本领。全连官兵都是东北和华北人，生长在平原，从没见过湖泊稻田水网地带。6月的湖北，晴天气温高达33℃，雨天地面潮湿，蚊蝇极多，除我和指导员领了蚊帐外，排长以下的同志，夜间睡觉，都把夹被用竹竿撑开当蚊帐用，闷得成宿出汗，难以入睡。加上北方人喝惯了生水，虽然卫生部一再宣告，禁喝生水，仍有人不习惯，弄得不少同志发疟疾，泻肚子，使营部的医生和连部卫生员忙个不停。

6月底，军部命令，为适应南方山地水网地带行军作战，炮兵部队要进行改编。将每连原有的四门山炮缩为三门，连部及指挥排不动，炮排与弹药排合并，再分成三个炮兵排，每排一个山炮班即一门炮，加一个弹药班，这样，炮排即可单独行动了。改编时，把我调到第三连，和原指导员张

静波一道带第三连，调给一四五师山炮营为第三连。对于调入一四五师，我是高兴的。因为，四十九军三个师中，一四五师是主力，仗打得多，在平津战役中，一四五师与四野主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一道，参加了天津攻坚战，而一四六师被命去追拦塘沽逃敌，战果极小。当兵干革命，谁不希望当主力打硬仗立功当英雄呢？而当时由于营部的本位主义，竟把其他连队的一些老马、瘦马和个别患疟疾泻肚子尚没治愈的战士，和几名新补入的解放战士，调给了三连。我很不满，全连同志特别是摊到老马、瘦马的驭手，牢骚满腹，影响了全连的情绪。

我憋了一口气，对指导员和排长们说："这算什么对兄弟部队的团结友爱？把我们都当成了孬种，推出来了，我们到了主力师，争取打上漂亮仗，给他们看看，我们是好样的！是英雄！"

7 月 10 日前后某日，山炮三连到达一四五师山炮营驻地不久，接到命令，准备战斗，向沙市荆州前进。我和指导员十分高兴，立即向全连宣传动员，鼓士气，争取打好编入主力师后的第一仗。

山炮营在北方平原行军时，都是用马拉火炮，进入湖北后，路窄又不平，尤其多行进在稻田埂上，全要人牵扶着马，马驮炮，白天拉马，夜间喂马，炮手、驭手十分辛苦。

7 月 16 日，早 7、8 点钟，全营行军到离沙市 10 多里的草市时，营部命令，各连留下炊事班作饭，战士轻装留下背包，卫生人员准备担架，药包，准备打沙市。同时命令，一连先行前进。我心中嘀咕，我连初编入，莫非又被看成孬种了？为争得战斗任务，只能全连迅速行动，紧跟营部前进。

我走在全连前头，连队按营部指定的小路急速前进。忽见营长段道令停在前面岔路口，身旁围着通信班，他命令一个通信员："快去把一连调回来，配属四三四团进攻荆州"！通信员说："一连向沙市前进了，离这里两里多路"。我听后忙跑到营长面前，敬过礼说："段营长，三连才编入一四五师，还没参加过战斗，请把这

个任务交给我们三连吧。"段道令看了看我，又向沙市方向望了望，已望不见一连了，就说："好！就由你们三连配属四三四团打荆州，刘连长，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我高兴地敬礼道："营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从步兵四三四团来的通信员马上对我说："刘连队跟我来，我领你去见我们于团长。"

这时，指导员张静波已跑到连队前头，我和他打过招呼，就跟着步兵通信员跑向四三四团指挥所。连队由指导员带领，转向荆州方向急进。从这岔路口，西望荆州古城的长长东城墙，约距2000多米，一口气跑到荆州城东护城河外的村庄东面四三四团指挥所，见团长于搏，正给突击连的干部下达任务。我上前敬了礼，通信员将我介绍给团长。于搏团长1946年在哈尔滨任过松江军区卫戍司令部作战科长，那时我在哈南分区（即一四六师前身）警卫营当机炮连长，警卫营有一段时间归卫戍司令部指挥，具体事情由于科长管理，因此我见过于科长几面。当时他问我连，有几门山炮，每门炮带多少发炮弹，我回答后，他命令道："刘前，荆州城东门城楼上，有敌人碉堡，内有重机枪，城楼以南直到城东南角，还有两个碉堡，内有轻重机枪，封锁着我们阻挡我们前进。城外有护城河，河两岸开阔，斜对东城门，只有一座木桥可以通过。我已命令一个加强连，带炸药包，在炮兵和机枪掩护下，从桥上冲过去，炸开城门以后，全团再跟进。你连的任务，就是用你们的三门山炮，每门炮打五发炮弹，消灭敌人城门楼上的大碉堡，及其以南两个碉堡火力点，掩护突击连过桥，炸开东城门。"并带我拨开树荆，亲自用望远镜具体的指示了我连的三个射击目标，命我迅速选好火炮阵地，放列完后，向他报告。

我说："请于团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时，张静波带着全连也接近村庄一带了，由于几十匹驮马行军，已被敌人发现，荆州城上敌人几架重机枪，同时向我连扫射过来，于团长喊我们："选低处走，注意隐蔽，迅速进入阵地！"

我把指挥排长、三个炮排长喊到前面，带他们用望远镜认清

了于团长指定的三个射击目标，就迅速沿着护城河东岸的树丛后面，每炮间隔 60 多米，从左向右按一、二、三排顺序，各选硬土地，挖驻锄沟放列火炮。我命令道："这三个目标，也从左至右，编为一、二、三号，你们一、二、三排，保证各自消灭自己面前的目标。但决不允许只顾自己，各排都要认清三个目标，谁的目标先消灭了，就转移射向，支援其他排。"排长们都表示，要用行动表明三连不是孬种。由于同志们路上憋着气，受领任务后，指导员边走边鼓动，士气都很高，十几分钟内，三门火炮就放列好了，电话班也把我和于团长之间的电话线架通了，观测班也架好了炮队镜，报告说："目标直射距离为 700 至 750 米。"还报告说，敌城门楼上发现几个敌人活动，重机枪不停向我射击，我步兵突击连已隐蔽运动到河岸附近林丛。我立即用电话向于团长报告："山炮三连射击准备完毕！"

于团长命令我再检查一下火炮，一定要瞄准好，打得准，不要浪费炮弹。我和各炮排长就到各门炮上，用瞄准镜看过目标，检查过标尺后，又报告了于团长。于团长下令："打！"

我喊了一声："放"！三门四一式山炮同时放射，步兵四三四团的多挺轻重机枪也同时开火。我连的炮弹射向敌城墙上三座碉堡，第二排只打了两发，2 号目标就不再向我射击了，我命令："第二排，向右转移射向，消灭城楼上的碉堡"！两炮夹击，打得城楼上升起黑烟，只见一个敌兵，被炸升空中，旋即落进城内。这时，我步兵突击连十多人，已跑步冲过木桥，到达荆州城东门的门洞内，正堆架炸药包，城上敌人向下丢手榴弹，我四三四团的几挺轻重机枪，正集中向城楼上的敌人猛烈射击。在枪炮声中，只见我突击连的勇士，迅速退出城门洞，就地卧倒，同时，火光起，轰隆巨响，城门被炸开了，四三四团的同志在冲锋号声中，陆续突进荆州城内。

这时，于团长从电话中命令我："步兵已进城了，山炮停止射击，等待命令。"我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抬头望望布满白云的天空，

还不到吃午饭时间。

过了一个多小时，于团长让我到他的指挥所。我到达后，他说，你连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得很好，没超过规定的炮弹，全部消灭了目标，支援突击连过了河，炸开了城门，是有功的，现在可以撤出阵地归还建制了，并要我向段营长转达谢意。还告诉我，荆州守敌是湖北保安旅，在我师进攻东门、北门（另一个团进攻西门）时，乘我军其他部队尚未包围南门之际，留少数敌人掩护，大部份打开南门下长江，乘船逃走了。四三四团攻进城内后，遇敌不多，战斗顺利，有些缴获。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本有一支长管半新的驳壳枪，但总嫌它重，当炮兵连长，又不带战士冲锋，平津战役，有人弄到了美国左轮手枪，小而轻便，我真羡慕，就说："如果步兵老大哥缴获了美国左轮枪，请于团长给我换一支，这驳壳枪我用不上"。于搏说："这个要求不高，可以答应。"果然，当晚他就派通信员给我送来一支半新的通称"七星子"打七颗子弹的小左轮手枪，还有 20 多发子弹。几天后，上级还给我记了一小功。

当晚，我们全连都高兴，有的同志说，咱连从一四六调到主力师才几天，就打了一次胜仗，完成了任务，无一人伤亡，咱们连才不是孬种，咱们是英雄！司务长还买了猪肉，给全连改善生活。只有指导员提醒我："这种骄傲情绪可要不得，对团结兄弟部队不利，你连长同志更要注意。"

次日，营部通知，荆州、沙市全部解放，敌宋希濂所部，已渡江南逃，山炮营随师部于明日，在沙市渡江南进，向公安进击敌人。要各连作好炮、马上下船的准备。

从此，山炮营第三连，就在一四五师炮兵部队编制内，继续战斗成长了。

作者为军校二期生，曾任广西司法厅劳教局副局长）

文艺生活六十年

汪 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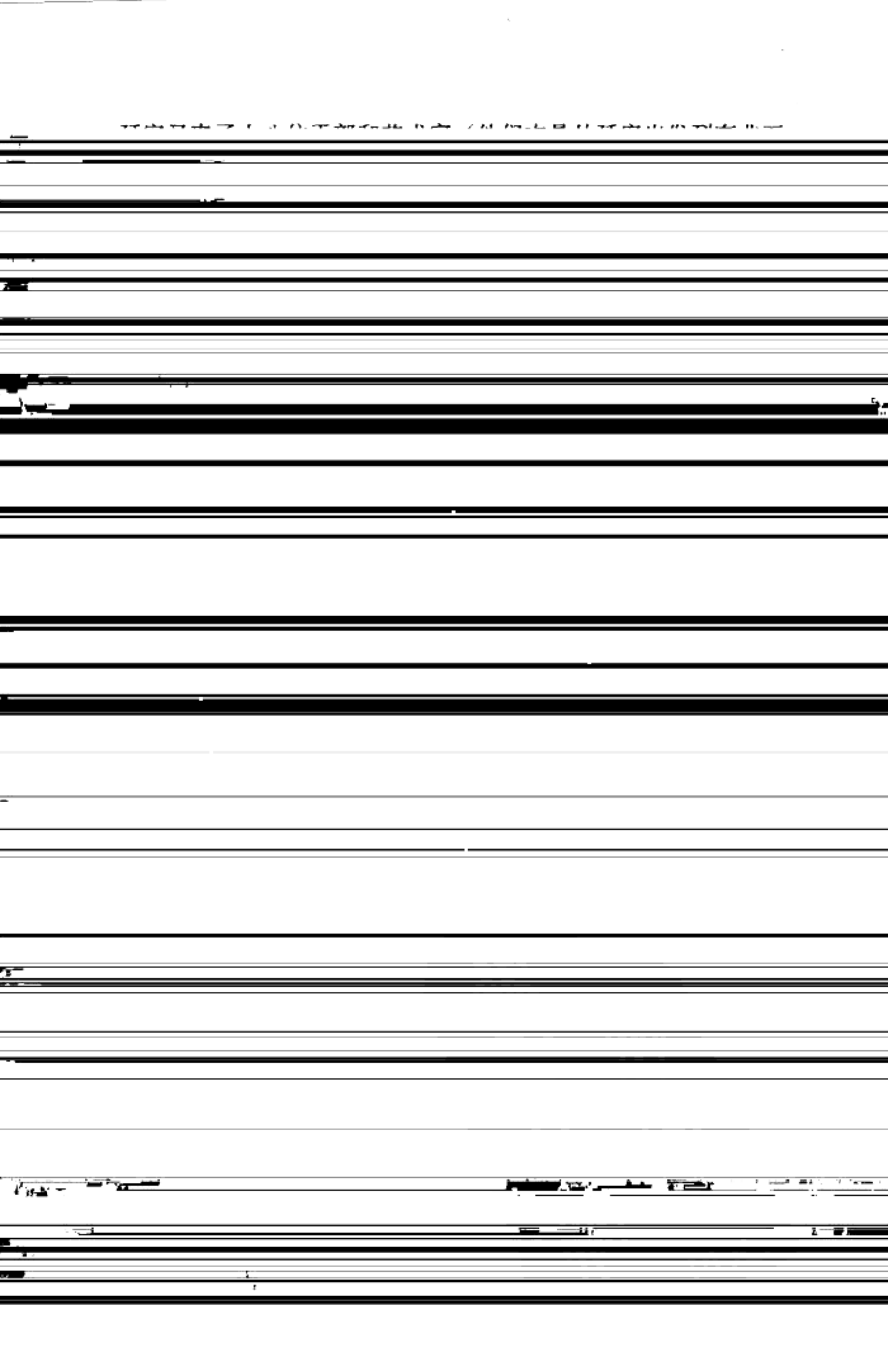
我原籍河北省昌黎县，3 岁时随父亲离开由于直奉军阀混战而破产的农村，“闯关东”来到东北长春落户，住在长春市西四马路新市场新民戏院（当时叫爱国茶园）附近。父亲给新市场的一家杂货店当杂工。我 5 岁时父亲常带我到戏园子看戏，梆子、京戏对我影响最深。8 岁时随京剧团的小学徒们一块学京戏。后来父亲看到学京戏总挨打，就叫我上学去了。我曾在长春西三马路小学、大经路高小跟美术老师姚维华、著名音乐家董笑天学水彩画、声乐、器乐，跟国文老师吕介眉学古代诗词、书法等，使我在文化艺术方面有了点基础。13 岁时我即参加过长春市小学生的书法、图画、二胡独奏等文艺比赛，均名列前茅。因此，高小毕业后免费升入长春第二中学（后改为“二高”）。在这个中学又跟美术老师李光宇先生学水粉画，与同学辛乃友、姚怡远、高俊达等音乐爱好者组织“民乐社”经常演出或在电台广播广东音乐等民乐节目，颇受广大师生和听众的欢迎。以

后正式参加了恩师、音乐家董笑天先生组织的“新声音乐团”、“和光乐”，主要是以电台广播雅乐（即以古曲与民乐为主，也演奏广东乐曲）为主。我是乐团的高胡主奏员，略有收入稍可贴补一点学杂费等负担。1938年我因父亲多病、妹妹年幼、家境贫困，不能再在中学继续读书了，必须谋一职业赚点钱以维持家用。当年秋天伪满军事部一位名叫王家善的军事科长到二中动员学生报考在长春新成立的“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王家善当时正在壮年，他说这个学校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样预科毕业后可送日本陆士本科，一切官费，吃穿住都管。他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要学军事、学科学、提高报国本领，将来会有大用的。”等等。我们感到这个军官的话里，隐隐地有号召中国青年学本领，将来报效祖国的意思，对他那慷慨激昂的讲话很感兴趣。（这位王家善上校后来成了“军校”的少将教授部长，他是日本陆大毕业，精通战术学、战史学，是一位爱国的军人，1948年率国民党五十八师在营口起义，改编后参加抗美援朝）。我因家贫无力升学，就报考了“军校”第一期，不料竟考中了第二名。1939年4月1日入校编入预科一连二区队。连长是日本人增子三郎少校（外号：内务班长）。此人文化不高，每天专叽咕小事。一次星期日外出，回校时天降大雨，我换了一双胶鞋、打了一把伞，不料被他暗中看到。第二天他叫我打着伞、穿着胶鞋，在讲堂上示众半小时，引得同学们大笑不止。伪军校是一所训练法西斯军人——战争工具的集中营；预科学生平均每天要挨几次“嘴吧”，打人方法多样化，日常生活中不许说中国话、只能讲日语。这种法西斯教育，也挡不住爱国反满抗日的秘密活动。饱受亡国之苦的朝鲜人同学，也有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思想。预科时我的同宿舍中有两位叫方圆哲、姜载淳的朝鲜人同学跟我很要好，他们有时偷偷地告诉我一些消息，说金日成在东边道山里如何打击日本鬼子。朝鲜人抗日部队中有女战士，有的背着孩子当机枪射手，勇敢极了……。有一天他们又偷偷告诉我：日本人要我们朝鲜人改日本名字了，不

改就要杀头，我们要当“准日本人”了!! 过了几天，他们都改了名字，方圆哲改为“方山圆哲”、姜载淳改为“神农白统”。老方的名字等于没改，只多了个“山”字，而小姜的改名却令人费解，后来才弄明白，原来相传古代神农氏本姓姜，“白统”者，纯洁的传统也，这就是改名过程中朝鲜人同学抵制日寇的一例。再如我们有二位同期生，一是谢宗翘，一是张友松。张是军士出身，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八路军游击队在热河的故事和军事常识等等，谢宗翘（岫岩人），烟瘾特大，时常在晚自习时，偷着到厕所吸烟，我们为他保密，他每晚熄灯后，都从宿舍后窗跳出到农村偷大萝卜，回来分给我们在被窝里大嚼。他还小声说：“吃水果，去火气!”我在预科一年后期与赵焕相很要好，他是音乐爱好者，会拉胡琴，他暑假时从家里弄了一把胡琴藏到一间空教室的讲台下头，每到晚餐后或假日，他就带我偷偷地取出胡琴大拉一阵，我俩共同研究广东音乐的演奏技巧。我从预科一年起，经常在队列行进时教唱“军歌”，因我识简谱，教唱较快，最突出的是教《满江红》：“怒发冲冠……”此歌有两种曲谱，都教会了。还有一歌名为《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这首歌成了经常的队列歌曲。二年级时我担任了第一期“同学录照像集”的设计、主编工作，从每日生活、教练、出操、各种科目演习到每个同学的照片，由东京制版社的一个摄影专家到校拍摄半年、带回东京印制成大册，到本科时每人发给一册作为纪念。同时我还为一期生设计了一个“一期生毕业纪念徽章”，铜制，毕业时每人带去一个。预科二年时，一连全连举行“中秋娱乐晚会”，我们几个业余文艺爱好者组成“文艺演出小组”排练节目，成员有：京剧组：吴绍桢（会京剧老生，本科时入军需科）、王永奎（会京剧丑角，本科时入军需科）、李有（会京剧彩旦，本科时入骑兵科）、王玺（会京剧花脸，本科时入辎重兵）等人。器乐有王玺和赵焕相等，当晚演出了京剧《法门寺》，吴绍桢扮演县官赵廉、王玺扮演刘瑾、王永奎扮演贾桂、李有扮演刘媒婆。还有《相声》、《广东

音乐》、《独唱》、《小合唱》等，演出效果挺好。当时区队长们都很高兴，让大家为我们的“文艺晚会”鼓掌三分钟。从那以后，对我们这几个搞业余文艺的同学稍有“优待”——可以公开地编一些文艺节目了，挨打也减一点。到了本科，我们十四个都被分到辎重兵科，大家一听都傻了眼，因为当时流行一句话：“辎重兵马车队，不能打仗难自卫！”到本科后，我仍未断搞文艺活动，有时与赵焕相等同科生搞器乐练习。当时有两个日本教官特别坏；一个是炮兵科教官兼区队长的日本人中尉，这小子凶狠残暴，是日本下士出身。经常借故体罚学生，冬夜零下30°，叫全连学生集合站在室外，只穿衬衣裤，冻上一个多小时才允许回去睡觉。另一个是我们辎重兵科的教官叫大原的中尉，这个人也是日本下士出身，更凶残粗暴，他对辎重兵专业一无所知，却装腔作势，像是什么都懂。每当出操，他必大吼一阵，因他脸瘦耳大，我们都叫他“洋狗”。有一次驾车长途行军演习，从校部到吉林市，共开出四辆卡车，这种车叫“短脖子日产”，质量低劣，经常出故障，同学们称这种教练车为：“你——丧”（日产的日语音），不料车没开到岔路河，前边车熄火，我的车上气化器的净化瓶颠掉下来，甩到水箱后的风扇上，将扇翅打弯，把水箱划了个大圆窟窿，车子马上“爬窝”，前头一辆又着了火，我们用消火器扑灭火后，满身白药末，大原急得连吼带骂一直到天黑车子连牵带推才过了岔路河；我们都饥寒交迫倒在河边，大原也躺在地上喘气，以后打电话给学校，才派人和车，把我们收容回来。大原以后再不敢搞“行军演习”了，但我们在驾驶教练中，经常唱《满江红》、《黄族歌》等歌曲，大原还跟着学唱，他还说过：“曲子雄壮，好听！好听！”我们说：“洋狗通人性！”本科毕业后，我和郭元受、孟希祥分配到齐齐哈尔郊区的昂昂溪小镇伪满军第三汽车队见习，镇上有个业余京剧社，社长是昂昂溪小学校长陶孔庚先生，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为人正直热情，他会唱京剧老生，我参加了剧社，经常跟他们在镇上和朱家坎等地与铁路京剧俱乐部联合演出，剧目

有《战长沙》、《法门寺》等。不久由陶校长介绍，我与昂昂溪小学教师吴凤兰结婚。吴凤兰毕业于齐齐哈尔女师，与我国著名电影演员金焰的胞妹金孝奉同班，孝奉后来到延安鲁艺改名野雁，日本投降时回朝鲜任文化部领导干部。吴凤兰1945年参加革命时改名丹地，曾任冀察热辽联大鲁艺学院少年艺术班副主任、武汉歌舞剧院歌舞团团长、武汉市文化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武汉市江汉区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是全市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离休后任武汉市江汉区永康居委会顾问，因积劳成疾，于1991年6月19日逝世，她和我同甘共苦五十年，她是党的好政工干部、艺术教育家。1944年我们从昂昂溪调承德市伪满军第七汽车队，同事中有同期生赵春江、孙景寅，我当时参加了以军需上尉任尊卿同志为首的业余音乐社，任是进步人士，经常与我们说："小日本在太平洋一败涂地，马上要完蛋了！"后来，我参加了承德业余京剧团，经常到郊区农村演出京剧。任尊卿是锦州人，拉手风琴是他的拿手活，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尊卿事先告诉我，他已与承德、兴隆等地的八路军接上了关系，9月初他领我到承德郊区八路军热河军区政治部见了政委黄文同志和在兴隆起义的原伪满军二十四团团长黄方刚少将（他起义后任冀东八路军热河军区第四旅长，全国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民政厅长）等。黄文政委给我们讲了话，并安排我到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工作。由民运科长韩济民同志带我到胜利剧社报到，社长是韩大伟同志，戏剧队长是孙式礼同志（现湖北省武昌图书馆馆长、已离休）。我穿上八路军的布军装，感到自己真正是个中国人了，想起在东北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受尽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者的压迫与欺侮，不禁滚滚落泪。祖国光复了，我应当拚命地以我的一技之长——文艺知识为祖国报效，正赶上我们胜利剧社的演出、宣传等任务繁多，我原担任乐队演奏员（二胡主奏），又兼任美工，写标语、画漫画，慰问进入承德的苏联红军和我们的子弟兵八路军。我还兼任编剧、演员等工作。不久从



计兼演员，起义军方面的服饰等均由我手绘（根据《甲申纪》的史料绘制）。李自成由承德市人民政府史立德扮演（他是北京师大出身，花脸）、李劫夫扮演多尔衮、我扮演杞县宋县令赶武打时的多铎王爷。吕西凡扮演前崇祯后吴三桂，阵容强大，排练紧张。公演时，大军区程子华司令员号召营级（地方科级）以上干部要看戏、学习、讨论。这个戏要演5个小时，演一半时休息，干部们自带干粮吃一餐饭再接着看下半场。那时的高、中级干部廉洁奉公，一尘不染。我认为当前在党中央"反腐倡廉"重要决策下，文艺工作者应大学、大演《甲申三百年祭》的有关戏剧作品，重温当年党的崇高威信。我以后又参加了平泉前线慰问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演出活动，我编演的街头剧《我认识了八路军》、主演的大型眉户剧《大家喜欢》（即《二流子转变》）等常演不衰。又在承德演出了解放区的名剧《粮食》（海默编导）《马司令》（黄钢、石影编剧）等大戏。在赴热河前线演出时，自背服装、道具、乐器，常遇国民党的飞机向下扫射，我们隐蔽在树林中，等飞机过后，再唱着歌行军到平泉、叶柏寿等前线为子弟兵们慰问演出。大家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社长安波同志教我用报纸卷纸烟，叫"吸高射炮"。他日文很好，经常称我为"王桑（即：王先生）、我也叫他："亚斯那米"（日语的"安波"）。我妻丹地带着两岁的女儿昂生也参加了胜利剧社的工作。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十三军、九十三军、五十三军已占领了沈阳、锦州等东北的一些大城市，还向承德逼近，我们真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进行演出活动。1946年我们又分队到赤峰、围场县搞土地改革（减租息），一面宣传，一面演出，经常与当地土匪遭遇，他们看见我们身背小提琴（带黑琴盒子）和手风琴箱等乐器时就说："这些八路，有'牛腿炮'和'箱子雷'，别惹他们，快跑吧！"1946年冬我们回承德编演了大型歌剧《自卫队杀贼》深受广大官兵、干部的欢迎。因国民党十三军等部进攻承德（他们违反"停战协定"，大打内战，抢占我解放的城市），我们剧社根据毛主席"先让出城市，转到农村再反攻包

围城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随军转入热河南部山区兴隆县和热西围场县。我们化整为零，以安彼，骆文、韩大伟、乔振民为首的“游击队”在兴隆附近打游击，边宣传边演出《如此中央军》、《拥军碗》等露天剧，那是钻敌人的空子的飞行演出，我当时和妻丹地“坚壁”在兴隆小黄岩山东偏道的一个山里头，化装成老百姓，因我妻怀孕，后生了第二个女儿——山生。当大队要演出《大家喜欢》等剧目时，就从山下派民兵送鸡毛信上山（来回四十里山路）给我，叫我下山会合演出，上山时剧社领导总是派人送来火柴、小麻油、挂面等必需品，令人感动不忘。我在山下演完了戏，又背着背篓买点柿子、山楂之类等土产，走20里的山路回“堡垒村”。冬天，冀察热辽大军区（当时在内蒙的林西县）来电报，命令我们剧社改为大军区文工团，马上出发经热南、热东，赶到林西会合。剧社派胡九顺同志带驴子接我和妻子、两个女儿（驴上驮两个筐子，女儿一筐里睡一个）下山与大队会合。安波团长、乔振民政委都来慰问。我们在热河在零下20°、30°的山沟小路连人带马、乐器、服装、道具，经过千辛万苦、从兴隆经喜峰口、青龙、建昌、凌源、平泉等地的边沿地带，向目的地进发。有时夜行军，白天还要为部队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就是在行军途中排出来的，给攻打锦州附近杨杖子国民党保安团的我热东纵队演出时，部队首长命令搭台，台四周布置了高射机枪，用门板写了大标语：“为喜儿（白毛女）报仇！消灭蒋匪军!”我们在露天零下20°演出的《白毛女》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有的战士看到喜儿一家被地主恶霸黄世仁等害死时，哭昏在地上，“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部队首长上台接见演员，亲手取下他自己的小号手枪送给了扮演喜儿的莎莱同志。部队当晚即用“喜儿”，“报仇”二句口令夜袭杨杖子，消灭了蒋匪保安团1000多人，为解放锦州开辟了道路。在一个严寒的冬夜，我们文工团为了突过平泉、凌源之间的封锁线又随掩护我们的部队夜行军了，行至平泉铁道口水泉村附近，我军与守敌交火，火

光冲天，我们大队急速冲过封锁线，我妻骑在驴驮子上，怕两个女儿哭，影响我们通过封锁线，引来敌人的火炮，因此，将驴子身上驮的两个女儿身上加盖了毛毯和棉大衣，跑了半夜冲出封锁线，到了一个荒村休息时，二女儿山生因长时间未喂奶，又冷又饥而窒息死了。因行军急迫，埋在当地（水泉村），安波团长、乔政委及全体团员在葬埋地开了追悼会，团长说："山生与我们共患难，她虽牺牲了，是敌军叫她连社会主义都没能见到！她是为革命而牺牲的，为了纪念她，从今天起，我的马让给体弱的同志骑，我走路行军，还望丹地同志节哀！"我们听了深受感动，又驮着大女儿昂生，经乌丹到了内蒙林西——大军区所在地，见了军区首长程子华、黄火青、赵毅敏等，他们也来看望我和丹地同志，我们在军区的领导下，排演了大型歌剧《兵》（写内战中一个被我军解放过来的受苦农民出身的蒋军士兵，亲眼看到我解放军的生活，与蒋军的黑暗对比，挺身参加了解放军，在战斗中立功多次，解放了他的家乡又成为战斗英雄的故事）。这个戏曾起了很大的作用。蒋军云南部队九十三军某部的起义和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勇敢表现，都和这个戏有关。这个戏我们是用最强的阵容排演的：编剧：安波、严正、程云、海默等，主演有海默、杜印、严正等，我担任乐队主奏高胡兼演国民党军政工处长，导演是杜印、海默、严正。1947 年秋我们又进入第二次解放的北方重镇赤峰市，正式改名为：冀察热辽军区总文工团。我被派到赤峰市京剧团任辅导员，这个剧团的演员有不少是从北京来的名角，如裴云亭（银娃娃）、裴世亭、董达子等，青年演员有李师斌（十龄童）、董春柏（九龄童）等。但这个团的不少演员都吸鸦片、海洛因（又叫"黑白双料"）。我先给他们戒毒，费了很多心血才戒除。又为他们改善生活、给他们排演了延安平剧院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及《新陆文龙》等。公演时，军区参谋长王智涛将军组织了驻军包场看戏，观众也多了，演员们分了不少钱，换上了新衣服，都感谢共产党、解放军。在解放区开始反攻时，他们主动请

战，到前线为子弟兵演出《逼上梁山》等戏，受到广大指战员们的欢迎，战士在拂晓出发前还把肉、大馒头盛在盆里，送给他们吃。我在这段工作中，受到大军区政治部的奖励，立了乙等功，《群众日报》刊登文章表扬过几次。

冀察热辽分局为了培养更多的文艺干部，把我们文工团改建为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文艺学院，校址从赤峰移到内蒙宁城县的"那拉比流"（蒙语村庄）的天主堂。赵毅敏部长任第一任院长，安波是第二任院长，乔振民任党委书记，骆文任教育长。美术部主任是从北京到解放区来的高庆教授（后来是我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副主任华夏（现北京《美术》杂志主编），戏音乐主任为莎莱、杜印、程云，文学系主任由骆文兼，副主任海默、莎蕻，短训班主任为严正、汪洗，少年艺术班主任为延安的舞蹈家陈星和丹地（文化教员兼行政管理），这个学校按延安鲁艺学院的传统办学，当时条件差，真是"宿舍兼教室，膝盖当桌子"，但还是办了三期，学员毕业后，都成了我军及全国各地的文艺骨干。在我任教的短训班的学员中有蒙族班和大部分部队文艺干部，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东北有马龙霞、代文玉（沈阳歌舞团和前进歌舞团的舞蹈家、编导教师），西北有曹启志（新疆话剧团著名导演、现新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南有哈珊（蒙族、女，武汉儿童艺术剧院编导、名演员），内蒙有敖德斯尔（蒙族，名作家、内蒙作协主席）、朝鲁、达林太（他二位都是内蒙电影制片厂的名演员）、刘有宽（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广东、海南都有我的学生。1948 年冬我们奉命将学院移到刚解放的锦州北大营，招收了第三期学员。同年底我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不久因形势发展需要，又将学院师生分为五个团：一部分师生由安彼带队分到辽宁即现在的辽宁人艺；一部分分到承德，即现在有名的承德话剧团；一部分到广州战士文工团；大部分南下到天津成立了天津市文工团，又南下改名为中南文工团，即现在的武汉歌舞剧院、话剧院。我于 1949 年 6 月随军进人武汉市历任中南人艺戏剧部副主任、中南人艺歌

剧团团长、导演，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历任院长是骆文、程云、莎莱、吕西凡、姚汉光（民乐专家、高胡、扬琴演奏家）。我曾招生招来学员谢芳（现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刘凤（现武汉市艺术学校校长）等，她们也都算是我的学生。我在这阶段编导了歌舞《打渔船》曾赴北京在中南海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汇报演出并出了唱片。为中南戏曲代表团排演了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桂剧《拾玉镯》（拍了电影）等，这些戏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我是代表团团长、著名导演崔嵬的秘书兼助导。1953 年我排演了《花木兰》（豫剧，刘平、谢芳主演）、《借靴》、《船舞》等剧目，参加了为武汉特大洪水的防汛大军的演出，受过表扬。又带歌舞剧团赴朝鲜的开城、平壤等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停战监督军事代表团演出。1955 年～1958 年，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在苏联列宁格勒歌剧院导演、副博士古里也夫教授主办的“导演师资进修班”师从欧阳予倩老师学习了三年。当时我与严正、苏民、苏非（女、北影导演）、何之安教授等同班，除学习导演教师专业外，排演（也参加导演）了俄国名剧《远方》、意大利名剧《女店主》、法国莫里哀名剧《伪君子》等，我担任了重要角色。1958 年毕业后回武汉歌舞剧院任副院长、导演教师，导演了大型歌剧《向秀丽》、《夺印》、《太阳初升》、《红旗战歌》、《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邱才康》、《小康人家》及戏曲《佘太君挂帅》、《冬去春来》、《乔老爷上轿》、《节振国》、《柯山红日》等 50 多个剧目。1964 年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我参加排演的《柯山红日》赴京汇报演出。1965 年又参加革命历史史诗大歌舞《东方红》武汉演出团的导演团工作，公演一年之久。“文革”中我被打成“推行文艺黑线的走资派”，加上伪满军校的经历，新帐老帐一起算，被斗得死去活来，老母惊恐死去，妻子儿女受牵连，住“牛棚”达四年之久。1970～1973 年下放到湖北省阳新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不久我被调到阳新县采茶剧团当导演教师，帮

助导演省戏剧调演剧目采茶剧《石头岭》。与我一起担任导演的有北京的著名戏剧家吴雪。我在“干校文工团”又搞了一年的导演工作，共排演了《新起点》、《拉车》、《茶山晨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断）等，受到表扬。1973年落实干部政策。我被调回武汉，先在武汉市豫剧团导演了《杜鹃山》、《平原作战》、《红嫂》等剧目，后又调武汉市京剧团，任总导演、艺委会副主任。导演了现代京剧《水上交通站》、《狂飚曲》、、《送焊条》以及移植排演了《清宫外史》等，与著名京剧演员高盛麟、郭玉昆、关正明、王婉华等同志共事七、八年。1980年1月落实干部归口政策，我又被调回我的革命摇篮、原单位——武汉歌舞剧院任副院长、歌剧导演。为感激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夜以继日地导演复排了《刘三姐》、《见面》（获省、市一等奖并拍了电视片）、《无情的情人》以及 日本大歌剧《吉四六升天》等。此间又与武汉汉剧院一起导演了程云、莎莱编的汉剧《闯王旗》。此剧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艺术片发行全国。我担任长影导演林农同志的艺术顾问，在长影住了半年。我又先后在湖北省文化局主办的导演进修班、湖北宜昌地区导演进修班、武汉老年大学京剧班担任主讲教师、教授等，发挥我晚年的余热。现在我仍担任湖北、武汉戏剧家协会顾问、武汉名老艺术家联谊会理事、北京日本艺术研究会顾问、湖北曲协相声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我已七十有三。我的一生是与文艺同甘共苦的60年，1985年离休。现仍为《戏剧电影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写专栏稿，决心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党的宣传员。我一直缅怀我的恩师、战友董笑天（我的少年时代的音乐老师）、吕介眉（文学老师）、安波（音乐家、剧作家、我的入党介绍人）、欧阳予倩、格·尼·古里也夫教授、海默、柯夫、劫夫、高盛麟等良师益友，他们为革命文艺事业贡献了一生，他们虽然作古了，但他们的崇高形象和艺德双馨的高贵品格，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尤其是与我同战斗共患难的贤妻丹地同志，她为党工作真是鞠躬尽瘁。她是我们湖北省、武汉市的优

秀党员、先进工作者、武汉市江汉区的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区委党校优秀教员、永康居委会党支委，常年带病工作积劳成疾，不治而逝去，她在居委会工作了十六年，分文不取，从而减轻国家负担一万多元。她临终前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不要向遗体告别，火化后将骨灰洒到长江之中，一切从简。"（那时国务院《关于干部办理丧事应从简》的精神还没有发表。）她的存折上只有一元，所有存款一万多元，都捐献给儿童福利基金了。《长江日报》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标题为《她走得静悄悄》，她给我党干部反腐倡廉作出了好榜样。她的一生是"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她是革命文艺摇篮——鲁艺学院培育出来的好干部。是1991年武汉市文化系统的优秀党员、五好干部。我虽年逾古稀，但精神面貌年轻。愿为祖国为党为人民再努力奋斗，作一个始终洁白的共产党的文艺宣传员。

（作者原名王玺，是军校一期生，辎重兵科毕业，高知，曾任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局级待遇）

在部队这十一年间

裴辅忠

我是军校第三期高炮科学生，于1945年2月毕业后，分配到抚顺第五高射炮队，任见习军官4个月、少尉排长1个半月。“八·一五”光复，部队自行解散，各连剩下的少数官兵，将武器全部送交苏军司令部后，9月初我即返回老家宁安县，静观时局的变化。

1946年初，经表兄（原抗联人员）介绍参加了牡丹江市公安局，后入军政干校学习，同年6月被分配到朱瑞炮校任军事教员，9月转入新组建的高射炮大队。从此，在伪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军高射炮兵建军初期却发挥了作用。

创业维艰

这个高射炮大队，是在人民解放军中组建最早的。开始时大队部仅有大队长、政委以及工作人员不到20人。设二个中队，一中队副队长张殿巨（五期生，原名陶传珙），二中队副队长就是我。两个中队全无正队长。大队有军事教员有川茂男（日本

人，一期生），还有三名伪满高射炮兵军士，负责后勤装备工作，实际传授高射炮知识的，基本就是我们三名军校生。

武器是从沈阳一带转运过来的十几门炮，以后又从外地运回来 30 多门。连队使用的火炮、观测和通信器材、高射机枪，都是从中挑选和拼凑起来的。所需工具都到市场上去选购。所需液体油和压缩空气，都到工厂去找。没有汽油牵引车，就用仅有的一台木炭车代替。就这样一边进行整修，一边进行训练。

在训练上，一个队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懂高射炮技术的。只有采取交叉训练、官教兵、兵教兵的训练方法。教完火炮一个科目，由班、排长组织练习，再教观测、通信、高射机枪。按单个教练、班、排、连教练的顺序，经过半年寒冬摸索实践，到 1947 年 3 月，从两个连中抽调出班、排、连干部，组建第三连。高射炮大队此时已改为高炮一团，我任二连连长。二连这时补充一批土改后的新战士，经过以老手带新手、老新结合演练，到 7 月份进行第一次实弹射击，目标是爆烟（先打出一发炮弹），结果实弹都在目标附近爆炸，当场受到了炮兵副司令员贾陶的表扬。至此，连队已具备了应战的条件。

至于战士文化过低，思想情绪不够稳定，生活条件艰苦，御寒服装不佳，给开创带来的困难，更可想而知。

独撑一面

1947 年上半年，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我们三个连分成三处执行不同的任务。我二连于 7 月调到佳木斯，一方面保卫松花江大桥，另一方面负责大本营的安全。因为东北总部一旦撤出哈尔滨，佳木斯便成为指挥中心。

一个连担负这样的任务，显然制空能力是薄弱的。但在那个时候，国民党空军实力有限，因而对一个连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1947 年 10 月，我连配合大兵团攻打吉林。连队乘火车经牡丹江、图们，到吉林市老爷岭站下车。这时才用苏式牵引车和运输

车装备起来，汽车行军到吉林市北乌拉街进入阵地。11 月初的一个早晨，守侯在阵地上的战士，突然发现吉林方向有两个黑点，由远而近，用测高机一测，距离有二万公尺。我们死死地跟踪这两架敌机，它们低空飞行，正通过阵地上空。我们随即突然开炮，由于角速度快，每门炮只发一发炮弹，虽然没有击中，但敌机一直没敢再来骚扰。不久，被困在市内的敌军，不得不向九台方面逃跑。

边训练　边战斗

1948 年 5 月组建干训队，又任命我为队长。学员 60 多名都是从步兵调来的连排干部。武器按一个连配备。区队长、班长由学员充当。训练方法仍采用官教兵、兵教兵的办法。和连队战士所不同的是：这些干部政治素质好；有步兵训练的基础；有一定文化基础；各方面的接受能力都较快。对他们不仅传授高炮知识，还要传授连、排长战斗指挥技能。为了帮助他们学习，将伪满军高射炮日文本射击教范，翻译改编为射击教材，人手一册，它不仅在干训队中，而且在全团都起到了辅助作用。

干训队边抓紧学习，边执行保卫任务。开始驻地在牡丹江市铁岭河南山，保卫附近的军用仓库。这个仓库是日军在东部地区最大的仓库，里边装有很多各样的弹药，日军撤退时来不及破坏，被我军接管。保卫这些弹药不遭到敌机空袭，对支援东北解放战争至关重要。为此，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还负有对空警戒任务。10 月份又令干训队接防吉林小丰满水电站的对空防御任务。恰恰在 11 月的一天上午，从沈阳方向飞来两架敌机，它们低空飞行，被我及时发现。敌机一进入电站区，我们便立即开炮，敌机发现爆烟，狼狈逃跑，保证了电站安全无恙。

12 月沈阳解放，干训队随之进驻了沈阳。学员经过半年学习和实战接触，已初步掌握了高射炮技术和有了连排长战斗指挥技能。因此，经上级决定以这 60 多名学员为基础，组建高三团。该团的营、连、排三级指挥干部全部由他们充当，后来进驻广州。至

此，干训队结束全部任务。

入　关

东北全境解放，全团才得到集中，我也结束了离团单独活动的局面。12 月下旬全团随四野大军入关。这时我被任为团作教参谋，不久又任作教副股长，在团首长领导下，做全团的作战和训练的组织工作，还要负责参谋处的生活管理工作，因而，担子更加重了（这时才和有川茂男朝夕相处）。

入关后，全团直插天津市西杨柳青，准备参加 1 月中旬天津战役，部署一营担任战役主攻方向天津西侧地面炮群和前沿部队的对空掩护任务。我做为团代表参加了一营活动，协助营首长做好战前准备和战斗指挥工作。战役打响后，战局进展迅猛，敌机根本没有出动，全营顺利完成这项任务。

团随即开到北平市南苑机场附近。根据上级指示改编了国民党高三团。参加了 2 月初北平人城式。之后部队休整，5 月初全团乘火车南下，到河南省漯河县，因大桥被炸，火车不通，经一段调整，改用汽车行军前往武汉。路程长达 500 公里，全团排成一条长蛇阵，我乘坐最后的收容车，边跑边收容，边抢修边追赶，终于用三天时间，于 6 月上旬全部进驻武汉。

在武汉，部队一边体整，一边警戒，防止敌机偷袭。10 月下旬全团又乘火车前往广州，因中途韶关大桥遭破坏，部队又在韶关换乘火车，我又在韶关负责中转和收容任务。12 月末全团终于到达了广州。

1950 年刚过元旦，我团又接到解放海南岛的任务。部队乘汽车行军 300 多公里，到达雷州半岛徐闻县，与海南岛海口市隔海相望。我团负责步兵海上练兵备战的对空掩护任务。3 个多月里敌机虽然数次骚扰，但步兵和船只均未受到损失。5 月初海南岛解放后，我随团长和 10 多名连排干部，去海口接收敌军遗弃的一个营的海岸高射炮，经过半个月清点，如数移交给守岛部队而后又回防广州。

抗 美 援 朝

7 月团部接到北上命令，经过长途火车运载到达安东（现丹东市）待命。准备秘密入朝。经过休整，于 10 月 19 日我和团长乘指挥车，从宽甸具境内公路大桥跨过鸭绿江，比公开过江的 10 月 25 日提前了 6 天。我们是从这里过境的志愿军第一台车，全团过境后，即进入阵地，负责掩护大军入朝。

11 月份的第一次战役全团参加了，在云山附近摆开战场。当时，我空军还没有参战，入朝高炮部队只有我一个团，因而敌机非常猖狂，它们超低空飞行向我们扫射、投弹。这次战斗，我们没有对空射击，而是在山包上进行平射。12 月第二次战役，我团还没有来得及进入阵地，敌军就遭到了我军夹击，全军溃退，在龟山一带丢下了很多武器和车辆。由我组成拣车小 组，还从战场上亲手开回一台崭新的中卡车。

1951 年 1 月全团回国在锦州改装苏式武器。这时我团扩编为师，这个师又是我军第一个高射炮师——六十一师。部队经过二个月扩编和改装训练，于 3 月初第二次入朝，扩编后，我被任命为师军务科副科长。没有到职，就委派到六 0 二团代行副参谋长职务协助参谋长工作（由团变师，该团正副团长、政委全缺，由参谋长主持工作，因此，缺乏领导力量，故派我协助）。这次入朝，我空军已经参战，我军有了一定的制空权，敌机白天不再那样疯狂了，但有时也对我地面部队搞突然袭击。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地变换阵地，对敌机进行截击。4 月一天上午，全团在铁原群附近摆开阵势，恰巧有四架敌机对我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全团立即进行猛烈的还击，其中一架敌机在俯冲中中弹，顺俯冲方向坠落在离阵地几十米的地上，机毁人亡，其余三架见势不妙，仓皇逃跑。我团无一伤亡，全团无比欢快。

继续发挥所长

1951 年 7 月师领导决定再次叫我负责在安东市组建干训队。我虽然没有专门学过苏式武器，可是有掌握日式武器和在伪军校

受过正规训练的基础，学起来总比绝大多数干部接受得快。

开始时设两个队：一个队是干部队，轮训在职连排干部；一个队是司机队，培训老战士掌握驾驶技术。这个时期好在有两名高射炮校毕业学员在队里当军事教员，我只负责组织领导工作。不久，将干训队扩为干训大队，任我为副大队长兼教育长，随之增加一个政治干部队，侧重学习高炮技术。1952 年春将大队迁到前方，第一批学员结业，第二批学员轮训开始。

1953 年春，全师参加了在平壤附近西海岸大备战，以防美军再次从西海岸登陆。备战任务，异常紧张繁重，要在平地 8 公尺以下打地道。因此，急需运输大量的地道材料和备战物资，而且必须在夜间运行。为了保障这一艰巨的任务，又任我为车务科长。我在军校“队附勤务”期间，集中一周时间粗浅地学习了一些汽车原理和驾驶技术；之后，部队有了汽车，不断地驾驶锻练，对汽车知识有了全面了解和提高，可以说是全师靠前的一位车管干部。到任半年来，经过多方努力，保障了全师汽车部件和油料供应工作，完成了运输和战地车辆大中修的任务，从而在西海岸备战中未辜负师首长的期望。

参与办军校

1953 年 8 月朝鲜停战后，我被指名调到北京军委炮兵司令部军校部（处）任参谋、一级参谋。这个单位 20 多人，只有我一人懂得高射炮，其余多数是搞地面炮的。因此，由我一人分管高射炮校和高级炮校高炮班的管理工作。组织上为了让我进一步熟悉苏式武器，让我在 1953 年冬参加一期短训班。

分管中，对学校训练对象的来源、训练大纲的审核、教材的修改、教员的培训、学员的考试、教学规章制度的制定等重大事项，都要根据高射炮的特点，由我提出意见，使领导决策。后来从高射炮校调来一名射击教员当参谋，这时我才有了帮手。另外，还有和苏联高炮顾问商讨工作和陪他活动的任务。

每年要多次深入到学校检查和商定工作，以改进教学。对发

现高射炮特性中的问题，及时向领导汇报，以保证和地面炮教学同步进展。在分管的四年半中，不知送走了多少高炮学员。

从1946年9月到1957年夏近11年间，我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引下，在党的谆谆教导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把在伪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全部贡献给我军高射炮建设事业上。特别是从1946年9月到1950年3月期间，我还是一名非党干部，党信任我，有时让我远离领导独立工作，使我非常受感动。经过三年来战争的考验，终于1950年4月1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当我为党的事业继续做贡献时，由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我受到错误处理，于1958年3月转业下放到北大荒，从此，离开了部队。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曾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建材公司党委书记）

四年多的战斗生活

张善友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三十团是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接收国民党军炮十一团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个炮团是国民党军的精锐是一支机械化部队，火炮是美制的一五五榴弹炮，射程1.1万米，是当代新式的野战重炮。早在辽阳解放时即参加了革命的伪满军校第二期炮兵科同学孙须正（原名孙绍贤）被调到这个团。团长王若石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他是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将军的女婿，对伪满军官学校有所了解，于是在沈阳经孙须正同学联系，吸收了章全科、孙宪治、高联芳、毛世刚、袁中一、沙福恒等同学参加了该部队。平津解放后，在北京、天津经章全科逐家奔走动员，我和孙贵卿（伪满军校三期炮兵教官）、李联藩、杨邦铎、李风桐（现名李锦涛）、薛万山、品振权等也参加了这支部队。以上这些人是我记起的，另外还有多人，我记得驻天津北仓时，我们同学前后参加这支部队的已达二十多人，是该团的技术骨干力量，团党委给我们的待遇也很

优厚，孙贵卿是副营级待遇，其他人也都是连级或副连级待遇，并允许带家属，家属中有工作能力的还安排当文化教员等。当时在沈阳参加的人员，都已经安置了职位，大都是参谋和汽车管理人员。在平津参加的大部编在教导队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孙贵卿为教学组长，兼教射击，杨邦铎教观测，我教操炮，此外章全科还负责在平津动员一批男女学生参军，给团里成立了宣传队。同学们在这里真是如鱼得水，有了发挥才能、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那时人人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地从事工作。

我是在 1949 年 3 月，在天津北仓参加解放军的。到解放军里来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温暖，上级和同志们的热诚照顾和关怀，使我感到像到家一样，部队里纪律严明，官兵关系融洽，干部作风朴素，使我深受感动，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也明白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当然还只是感性认识，是和国民党相对比所感受到的。当时在干部教导队，我担任操炮教练，这是很简单的科目，且有原操典为依据，只是团里给教导队一本，学员很想得到一本操典以便回去用于训练连队，但却没有。于是我便利用课余之暇，划钢板、印操典，忙了整个夜晚，便给学员每人发一本油印教材，仅此一点，就受到学员们的称赞、上级的表扬。后来部队移驻到北戴河。看到学员的文化水平低，我便在夜里到他们宿舍去帮他们补习文化。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也鼓舞了我的教学热情。完成了教练之后，团里又命我撰写连教练教材。接到任务，我下到连队观察体验一段时间之后，以日本炮兵操典为蓝本写出了《连教练参考教材》，经团里付印下到各营遵照执行。当年秋季我是第一个由教导队抽调出来到第二营任参谋工作的，这时我团已受命担任由秦皇岛至塘沽一线的海上守备任务，第二营驻新港。海上一向平安无事，部队在练兵，到 9 月初奉命去北京，准备参加建国大典。

一天朱总司令亲自到北京来检查我们的训练情况，我们二营副营长朱麟是朱总司令的侄子，总司令要在午休时间到我们营来

看望。接到电话通知时，我问营长要不要集合队伍迎接，朱副营长却说用不着，通知各连该干啥干啥。接着他对我们说："总司令一向不喜欢官场那一套的，和他会见是越随便越好。"他的车开来了，是一辆蓝吉普车，车通过一处泥潭地时灭火了，马达打不着，司机下车来摇，我们立即跑上去将车推了出来，这种情形使我十分感动。第二天是礼拜天，总司令让朱麟回去吃午饭，也邀请营长、教导员同去，我以为一定会有很多好吃的，谁知第二天他们回来说：两菜一汤。朱麟说：这还是给我们加了一个菜，平常朱总是一菜一汤。这就是我们总管三军的总司令。解放军之所以强大根源就在这。我从中也受到了教育。

1949 年10月1日，我们早就守候在受检阅的指定位置。上午9 时毛主席率领中央首长各界代表人士登上了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宏亮声音，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轰鸣的礼炮，悦耳的国歌这一切都使我全身血液沸腾起来，多年来所盼望着的祖国，今天才有了新的生命，多年来被宰割的中华民族今天总算抬起头来了！检阅开始了，朱总司令的车过来了，注目着这位英雄老人，想起在北苑会见的情形，我在心中宣誓，在您的指挥下为祖国的强盛，虽万死不辞！阅兵式开始，军乐高奏，步兵骑兵整齐威武的行列走过之后，我们炮兵团的车队双行徐徐前进。我和营长、副营长、教导员立在指挥车上，通过主席台时是我发的行注目礼的口令。这是事先由营长安排的，因为在指挥车的 4 名营里干部中就属我的口令好，所以接受了这个光荣使命，当天受检阅的队伍陆军海军空军都有。海军的行列整齐精干，身高几乎都一样；空军的飞行编队由广场上空飞过；陆军里我们的大炮和坦克编队给陆军增添了光采。回到驻地安静下来后，才想到：自己是个仅仅参军半年的新兵，今天在天安门如此神气，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950 年秋，朝鲜战争爆发了，我团开到本溪待命。我团是在美帝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后，又企图在东海元山登陆的紧要关

头，跨过鸭绿江的，在奔赴元山途中，因情况有变化，又转头南下。朝鲜多山路，为躲避敌机，我们白天隐蔽休息，夜间行动。当时敌人仗着空中优势，在后方狂轰乱炸，不要说市镇，就连村庄都不放过，因而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残垣废墟，目不忍睹。我们路过一座叫温井岭的高山，为了躲避敌机的袭击，车辆是闭灯行驶。当我营行进到山下时，我向营长提出建议：暂时停止前进，不能尾随上山。因为以现在的行军速度通过难行的盘山道，速度更会减慢，如果当夜过不去山，第二天停止在山路上，很难隐蔽，必定遭受空袭。我们应当开大灯快速通过，由于是在夜间即使遭到袭击也不会有大的损失。营长同意我的判断，将队伍停止在山下命我上山看看前边情况，并向他们提出我的建议。我乘吉普车打开大灯很快就追上前面山上的队伍。前面是三营。我的车开着大灯上来，还未等停车，就听他们齐声大喊："闭灯，闭灯！"接着听三营郭教导员斥问，"谁在开灯？"我下车上前向郭教导员说明情况，并提出我的建议，希望他能转达团部。我便返回山下，将山上情况汇报给营长，并提出就地宿营，如山上不开灯行进，我们绝不上山。前面队伍终于未能开灯前进，我营终于未上山。第二天起来看见山上公路上贴着山壁零星的黑点，就知道前面队伍到底没能下去山，那些黑点就是伪装起来的车炮，果然上午就被敌机发现了，敌机轮番轰炸，除掉团直属单位和机关到了山下之外，一、三营都遭袭击，第二天我们接到"回国整训"命令。独有我营完整地回到凤城县夹皮沟。回国即开展战评，首先解决"三怕"即：怕飞机、怕翻车、怕特务思想，团领导就温井岭事件，作了检查，有的受到记过处分，独有二营受到表扬，还给我记了一小功。由此我这个营参谋在团里有了点小名声。

我团原来是奉命参加云山战役的，因在温井岭受挫未能参加上。云山战役大捷，我军缴获了敌人的大量武器、车辆，打扫战场时上级命我团出车运送火炮车辆，崭新的和我们同样的一五五榴炮，还有两门二四0口径的特重榴炮，好不容易用两台达母厅

车牵引才装上火车。看到这些崭新的大炮，我们多么希望由它们换下我拉的旧炮，但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只好割爱。年末，我营奉命脱离建制归炮一师指挥，单独开赴朝鲜战场。这回再到朝鲜，没有上级的约束，一个营行动起来也灵活轻便，团里虽也派出副参谋长随行，但他是我营前任营长，对我早有了解于是营里采用了我提出的建议：行军时开大灯全速行驶，每辆车上设对空监视哨，发现敌机时鸣枪报警各车闭灯，飞机过后，继续开灯前进。因此，我们的速度超出前次入朝时的速度起码有五至六倍。到达指定驻地平康郡黄龙洞时天已黎明，尚有两个连没有找好驻地，黄龙洞山后便于隐蔽。为找驻地，我乘参谋长的吉普车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翻越后山去侦察，下山时是从松林中穿过，山坡斜度足在二十度以上，且有很多树桩、车绕着树及树桩，我带的朝族连络员（翻译）小林吓得要跳车，是我强抓住他才到了山下（后来林终因翻车牺牲了），找好宿营地，在天亮前将两个连安置好啦，黄龙洞只有三户人家，因为地处幽僻，夜里能睡在房子里。黄龙洞是一个天然山洞，山洞很深，是一所极好的大防空洞，洞里存着大量大米，是郡的军粮库，我以为守着这么多的粮食，不怕供给上不来了，谁知不久果真因敌机封锁公路，我们的给养送不上来，营里只剩一点作副食用的黄豆，既没菜也没油，官兵大多患夜盲症，这时只有向地方政府借粮的一条路可走。我以为地方有那么多大米，定能借给我们，谁知地方政府说那是军粮，他们无权动用，只借给我们一些油麦，我们向老乡借小拐子磨自己磨面。我们坐在黄龙洞里的大米袋子上摩油麦吃。磨少人多，磨一天出的面，只能够吃一顿。眼睁睁看着屁股底下坐着的大米谁也不去动。这样的军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次上级转来一项任务，要我们到一处很难找的地方，去运回敌人丢下的十二门一〇五榴弹炮。接到任务营长很为难，拿起地图一面看一面说，这能找得着吗？我在一旁却说只要地图上有我们就能找到。他说没有明确地名呀！我拿过指令一看上面写着

地址在某张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纵横座标的数字，我当即说有了，有了，于是拿起尺一量找出纵横的交叉点，立即指向他说：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名，所以才用座标指示的，当天夜里我们就将十一门炮送到了指定地点（另一门炮没有轮胎不能牵引），营长受到上级的表扬，我也沾了光。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五次战役开始前二天我营接到命令，配属四十九军第八十师参战，当晚到八十师报到。天将薄暮带领各连连长出发，到八十师前沿指挥所。接受了于后天中午12时开始支援步兵渡河进攻的任务，与他们规定了步炮协同事项之后，第八十师长还说你们距离这里很远，明天夜里如能赶到更好，如果赶不到也就算啦。出来后营长和我立即分工：由我和各连长，侦察、确定、构筑炮阵地及观测所，构筑阵地由八十师派出一个工兵连担任，营长负责回去带队伍，务于当天拂晓前，进入阵地。按我们过去的行军速度和到这里的距离，估计一定会赶到。这时已过午夜，在今明两夜内必须完成阵地工事和伪装，这三位连长，只有六连长是位由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老炮兵出身，用不着我帮忙，四、五连都需要协助，所以这两天我是紧忙，第二天天才拂晓营长将十二门大炮一门不缺地带进了阵地。并布置了指挥所派出了观测哨。这阶段营里只有营长和副教导员，团参谋长也走了，副教导员专管后勤，所以我的事情就多了。我本打算带指挥排去观测所，在那里指挥射击，（营长不会指挥间接射击），但我对阵地上的事又不放心，只好等阵地上一切就绪之后再上去。当一切射击前的工作都准备完毕时，团里的参谋长赶到阵地来了，他立即宣布射击由他指挥，这回我可轻松啦，也觉得肚子饿了，吃了点炒面想睡一会儿，可十二点到了，第一发炮弹打出去，落到河里了，虽然是颗近弹，但还差不多，再几发炮弹即可寻到敌人前沿，这时我心才落了底，我的任务完成了！指挥射击有团参谋长，报告弹着有观测所，我无事可以睡觉了，但是仗打起来了，能睡着吗？应当承

认，我还是个新兵，是不能睡的。支援冲锋射击很快就完了，延伸射击打了两天齐放就停止下来。参谋长问营长，怎么样？可以吧！我们还要节约炮弹呦。这时副教导员也来了，还送来了热饭热菜，我真佩服他的能力，像变魔术一样，弄来了饭菜。看他们作事是那么从容不迫，而我这两天来是如此地紧张，心想在战场上我还缺乏沉着性！

五次战役后不久，敌人发动了秋季攻势，我营原营长调到团里任参谋长，新来的营长是步兵出身，新来的副营长又没在营里，营长到团里接受任务回来，说：要在三十分钟内作好射击准备，协同友军步兵阻止某高地（中线伊川境内）进犯之敌。营长问我时间紧迫，能来得及吗？我考虑了一下也觉得没把握，但一转念团里将这项任务交给我们，是看重了我们，如完不成任务，将是我营的奇耻大辱。眼下营里舍我没有能指挥作战之人，于是我鼓起勇气说：能完成！条件是营长放权，由现在开始，一切行动听我调度，营长满口答应，命令马上行动。通知各连进入阵地，准备射击，调转射向，配备了指挥所人员，与友军步兵构成无线通信（报活机），要求前沿步兵设一名步炮连络员，和我联系。我告诉他我们没有时间设立观测所，请他代我们作观测员，只向我报告炮弹落着情况，报告方法是报告炮弹平均落着点的图上位置，并向他说明利用座标法指明图上位置。当各连及指挥所报告准备完毕时，我和友军步兵的协同规定也定好了，时间只用去28分钟。这时我满怀信心的向营长报告“战斗准备完毕”，这时副营长也回来了，在指挥所外边就向我喊“老张，看你的啦，放胆干，不要有顾虑！”（他原在三营和我早已相识）我们用四连基准炮打出一发炮弹，经友军连络员报告了我弹着点，将各炮修正后，又命五、六连基准炮放一发，然后按各步兵阵地前沿宽度构成射向，专等着敌人进攻，时间不大报话机报来情况，说敌人坦克向阵地正面冲来，我立即按坦克群距前沿阵地的距离延长了射程，全营各放三发。战斗开始了，炮弹的轰鸣，大大鼓舞友军的士气，连络员

一再在报话机里喊："打得好"！敌人的坦克越上越少了，敌人步兵轮番进攻，敌人的炮火不断在步兵阵地上爆炸，我们没有制压敌炮的任务，也不明敌炮的位置，干着急。友军连络员不断报告敌人距阵地的距离，我们的炮弹不断地在敌人群中开花，以后时间长了，步兵和我们阵地上都要有修整时间，我站在指挥所中间，一再告诫自己，要沉着，这时我的口令语气也放缓和了，以安定阵地气氛，同时也告诫各连，要沉着，准确地应战，并要求各连检查炮弹现有数目，这时我知道炮弹不够用，要求营长向团里要炮弹，前方阵地上敌人的攻势由猛渐缓，步炮紧密配合下彼此都有修整时间。过不久团后勤全员出动往阵地送炮弹，肩扛、手车推，阵地上的士气又高昂起来，这样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敌人终于因未能踏进阵地一步而不得不退走了。我们三十团的大炮也在志愿军中有了威信。这是我在朝鲜第一次指挥打仗，同时还是使用十二门大炮，打垮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美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在时间紧张没有观测所的情况下，友军步兵紧密配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战后，我得到团里的书面表扬。

后来，营里撤销了营参谋建制增设营参谋长。营参谋长是营首长之一，要由营级或连级干部充当，我是个副连级干部又不是党员，于是命我到五连去当副连长，五连长在干部教导队时是我的学生，上级想到这样安排不太合适，于是很快就将他调出去了，以后这个连只有我一名副连长。朝鲜战争这时已成胶着状态，我们团在中线一带设防，只有些小规模的阵地争夺战。就在五连长调走的第二天，我连接受夺取石砚洞北山 101 高地的任务，这个高地上有敌人一个加强连在驻守，筑有永久性钢管水泥碉堡，这次战斗，我方炮兵的火力配备很强，我们连出两门炮负责摧毁敌人工事。步兵参加的是一个营。我连白天用烟幕飞行试射，夜间发起进攻。我对射距、方向，拨风向气温、炮弹重量等不同，一一作出修正。因为有火箭炮参加，我怕它的爆炸火光遮没视线，看不见我的炮弹，要求指挥所允许我提前十五秒发射。我们首发炮

弹命中敌人碉堡，接着第二发又命中敌碉堡。火箭炮、一〇五炮的炮弹相继落到敌人阵地上，敌阵地成了一片火海。跟随步兵一起行动的团连络参谋兰齐在报话机里高兴得说话声都变了，“命中碉堡！又命中啦！碉堡炸开啦！”报话机接着传来：“友军步兵不等支援冲锋射击打完，他们已经起来向前冲上去啦！”听到兰参谋的喊声，我立即延伸了射击，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兰参谋回来说，步兵冲上去一枪没放，只是捉俘虏，打扫战场，在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 义面前，又一次显示出我们的威力！我又一次获得友军和团里的书面表扬。

敌人的秋季攻势失败之后，再也没敢大举进犯，我们的前沿阵地开始构筑永久性工事，我们并没有那么多钢管水泥，但我们山头阵地却是原子弹也难摧毁的钢铁长城，原来第一线的步兵在最初环 山的交通壕基础上，不停地向山内掏直到穿通为止，每座山的中心，都成了守军的地下宫殿，任你美帝有多少铁往山上倾销都不能越雷池一步，这阶段我们炮兵也在构筑半永久性的工事，炮阵地也加上了掩盖，四层大圆木上面再加一米多厚的土，土上铺上草坪，不走到炮前，都难认出是阵地，在我们阵地前面的小梁上时常出现坦克式的自走炮向我方射击，虽然它起不到什么作用，却很恼人，我决心拔掉它，经过请示，得到许可，我用一门炮打直接瞄准射击，几发炮弹就把它打下去了，有时上来两个，我就用两个炮打，经友军侦察员们说山那面有几辆坏坦克躺在那里，是否被我们打坏的不敢确定，但以后敌人的坦克，敌人的自走炮再也不上来了。

1952 年 10 月，我从朝鲜战场回到了祖国。如今，30 多年过去了。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那 4 年多的战斗生活，却历历在目，是我永生难以忘怀的。

（作者为军校二期生。沈阳市桃仙乡农民）

革命后来人

孙宪治

1939 年春，我考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一期，那年正值军校草创伊始，全校只有我们预科第一连，我被编在三区队。当时我刚满 15 周岁，各方面都很幼稚，每天经受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1940 年 12 月，“一二·三 0”事件发生。一期生崔立福、三期生常吉、孟宪昌等被捕，三期生陈东升被捕后自撞火车壮烈牺牲。紧接着一期生周立镐、王绍周、高殿武三人受到牵连也被逮捕。

1941 年 4 月 17 日，我们刚从预科毕业正接受各自的兵种教育训练时，日本人区队长下村上尉按名单点名，命令吕殿元、孙景寅、章全科、李德明、赵焕相、王韶章、孟繁瑛、傅文远、陈崇德、刘兴昆、张运昌等 11 名同学换上外出服，不带刺刀，随后将他们送到校本部。事后得知，这些同学已被伪首都宪兵团拘留传讯。虽然敌人如此猖狂，但

是绝大多数同学并没有被敌伪当局的残酷镇压所吓倒，军校中的反帝组织反而发展更快，斗争方式更趋隐蔽、成熟。我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受到反满抗日的教育和影响。决心为光复祖国做出贡献。

1945 年春，我在伪满第三高射炮队当中尉排长，不久，便被调回军校任本科五期生区队长兼教练班长。为了加强和同学的联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反满抗日的教育，我利用我独身居住校内的条件，与学生同餐共宿，早晚均同学生一起吃十分粗糙的高粱米饭和稍带点油星的胡萝卜、牛蒡汤菜。每桌饭桶所装的饭有限，即使学生抢着快吃，也只能吃个半饱。这种和日本学生的不同待遇引起同学的强烈不满，学生反满抗日的思想日益强烈。

那时候，校内反帝秘密组织较多，但基本上不强调党派上的分歧，能够团结对敌。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参加了反满抗日的真勇社组织。

我们本科五期生的连长邓昶少校，是深受学生敬仰的革命者——共产党人，在他担当的“精神训话”课中，常常可以听到有关马列主义、共产党革命的道理以及国共两党斗争的真相，这对我和同学投身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这时，第一区队长日本人北村上尉经常敦促我对学生要严管，强调对学生施以体罚。然而，在预科时已经饱受体罚之苦的我，决心不体罚学生。我不仅不体罚学生，反而在暗地里教导学生不甘当亡国奴，要以光复东北为己任，刻苦学习训练，努力学好杀敌本领。连里另一区队长日本人松井竣平，有一天私下检查自习室时发现，学生温乃武有一本用中文写的反帝日记。在日记中，尽管用“敌人”这个词来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松井还是看穿了“敌人”这个词的含义。他背地里找我研究办法，由于跟松井是同期生，私人关系不错，所以我敢于劝他不要向上级报告或向任何人谈及此事，我担保在学生方面不发生问题，就这样，此事淡化了，掩护学生免遭危险。

日本投降，直至学校被迫解散，我始终是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行动，学校解散后不久便同二期同学张作宪一道回到沈阳家中。

1945 年底，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接收大员们飞抵长春，一些同学先后参加了国民党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我也去当了连长，但不久即因故离去。1948 年初，我到了北平，并以国民党陆军第六训练处上尉军官队员的身份为掩护，投身于地下工作。

当时，七期生蓝景轩和邢树年均在平，分别在国民党的十三兵团司令部当上尉参谋和热河省政府特务连当上尉连长。我们志同道合，经常把一些有关国民党军事、政治情报，包括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详图等军事绝密材料转送给解放军有关部门。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一期生章全科便奉部队首长王岳石之命，为动员同学参军，来到北平。章全科于辽沈战役后便参加了四野炮二师第三十团，这个团是一支装备着刚自辽西缴获的美式 155mm 榴弹炮的摩托化部队，急需一批懂炮兵间接射击和摩托管理技术的专业人材。于是一期生李联藩、高联方和我，二期生毛士刚、宁广义、袁中一、富士贵、张善友、薛万策，三期生李锦涛、吕振泉、高景升、周景荣等经过动员，先后于沈阳和北平等地参加了该团工作。此外，早在 1945 年参加革命的三期生孙世刚和 1949 年参军的二期生孙须正，此时已分别担任该团的摩托股长和七连连长。

革命形势飞跃发展，进军江南前夕参军的上述同学，作为革命后来人都积极要求进步，发挥各自专长，工作勤奋，深受组织和首长的器重和信任。章全科、高联方、毛士刚、张善友等分别被安排在团、营部当参谋；宁广义被任命为修械连长；吕振泉在供给处工作不久，便被提为股长；李联藩、李锦涛等在教导队主持军事技术教育工作；我在高炮连任军事教员还不到两个月便被任命该连连长，半年后调团部任教育参谋。

这些同学的工作都十分出色，如由章全科、李联藩等负责进

行的155mm榴弹炮实弹射击，竟然以间接射击方式创造了第一发炮弹便命中目标的振奋人心的记录，使全团指战员赞叹不已；我所在的高射机关炮连，在一次为四野首长举行的实弹射击表演中，以迅速熟练的操作，一下子便击落了空中移动目标，受到四野首长嘉勉；另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中，炮三十团作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摩托化重炮兵部队，团里的一些同学无论在准备上，还是在受检当时都出色地完成了所赋予的光荣任务。

1949年秋，炮三十团团长王岳石被调到炮五师任师长，章全科被王岳石师长带到炮五师教导队工作。由于他又出色地主持了全师军事干部的军事技术培训工作，使一大批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好地掌握了炮兵射击技术，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1950年春，孙世刚、章全科和我被指名调到四野特种兵司令部参谋处工作。同年10月，我和章全科被特司党委特殊批准，同特司一道首批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云山战役刚一结束，我和章全科等曾奉命率领我部数10名汽车司机，赶赴云山打扫战场。我们全体人员在不断遭到敌机疯狂射击和轰炸的情况下，利用夜暗抢运出美军仓皇逃窜时遗弃的各型军用卡车近80辆，许多司机开一台，车后还要拖一台车。另外，我们单位的汽车，在我负责特司机关车辆防空期间，无一因伪装隐蔽不好而遭受空袭损失。

1951年春，特司机关为部队改换苏式装备，奉调回国，刚刚返抵哈尔滨，行装甫卸，我便被派赴铁岭基地帮助高炮部队开展军训工作。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日以继夜地承担并完成了从制定教育训练计划到付诸实施、最后进行总结的大量工作。基地教育结束前，我被调到高六十四师任作战参谋。之后，又有基地军训科向特政保卫部送交一份检举我在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材料。莫须有的说我暗藏刺刀，企图暗杀首长；盗窃军事机密文件；抄绘解放军炮兵部署，伺机逃往台湾……因此，我被作为混入解放军，伪装进步，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被关

进监狱劳动改造。

1955 年，在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光辉照耀下，我的申诉被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所受理。经过重新审理和认真调查取证，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终于被否定，但却以历史反革命罪改判有期徒刑 10 年。

1961 年 4 月 4 月刑满释放，被下放到农村监督生产，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平反纠正，被宣判无罪，恢复军籍，按转业军人安置在东北工学院工作。两年后评上高级职称，直到 1986 年离休。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同学们忆及当年热血沸腾、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的种种往事，均不胜感慨。谨以此片断的回忆，聊以寄慰当年作为革命后来人参加炮三十团的同学们。

（作者为军校一期生，离休前为东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争取王家善起义概况

国家安全部办公厅
情报史研究处

1948年2月25日晚7时，久攻不克的营口市华灯初照，霎时间，三颗耀眼的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向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报告营口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开始率部起义，这是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战斗中的一次大规模起义。负责策反王家善起义的正是石迪同志。

营口位居海陆要冲，是重要战略据点，当时正值东北战场大决战的前夜，敌我双方都在部署力量。从敌方看，营口是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港口，又是一旦战败而逃的必经之路；从我方看，我军若要封闭东北蒋军后撤之路，必先突破营口。1947年，我辽南军区曾以一个独立师攻打营口，苦战一天两夜，但因营口戒备森严、武器精锐，又有三艘军舰打炮，我方伤亡严重，最后只得后撤。此后，强攻不成，改为智取。1947年7月、8月间，我东北局社会部先后

委派米国钧、石迪二同志到辽南情报站工作，由石迪专门负责策反营口守军王家善率暂编五十八师起义。

早在1936年，我党即着手对王施加政治影响，当王在日本陆军大学读书时，身边已有我党的何正卓同志做其政治密友。王自日本归国后于伪满军事部任作战科科长时，又有何正卓、石迪施以影响。时至1941年王家善组织反满抗日的“真勇社”时，我晋察冀情工人员即秘密打入“真勇社”工作，其纲领、开幕词、形势分析均出自我方之手。日本投降后，王辗转担任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师长，而石迪真实身份又毫无暴露，当时王家善与他之间确实建立了一定友情。至于王领导的五十八师也存在起义的可能，五十八师内部的中、下级军官绝大多数是伪军校毕业生，他们与王家善早有师生关系，上下团结较好；五十八师并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在国民党内部备受歧视，官兵对此极为不满；国民党屡派嫡系政工人员至五十八师任职，均被王家善婉言谢绝；五十八师又与交警总队间矛盾尖锐。日本投降后，王家善目睹国民党所作所为，极感失望。他任师长后，更感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加之国民党对他本人的歧视，愈发加深他对国民党的不满和离心倾向。

石迪抵辽南情报站后，稳步发动策反攻势，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展开活动。首先组织上派廉政打入五十八师并根据条件发展情报关系，不久，在五十八师内部建立了以廉政为组长的“情报小组”。

廉政原系国民党东北保安第四总队（1947年9月改编为暂编五十八师）少校参谋，1946年4月，在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时被俘，此人一直要求进步，和石迪又是同学，当时适逢东北局社会部工作需要，经石迪介绍于1946年冬在哈尔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廉政在东北局社会部学习三四个月，后由邹大鹏同志亲自派往敌区做情报工作。1947年初，返回保安第四总队任少校参谋，在五十八师内先后发展了刘凤卓（五十八师团副，我情报小组副组长）、王明仁（东北行辕驻营口情报参谋）、张海涛（团部副官）、

赵百禄（连长）等关系，组成情报小组。其中王明仁有往来于沈阳与营口之间的有利条件，主要负责搜集东北行辕方面的情报；而刘凤卓是伪军校“北辰同学会”在五十八师内的负责人，在同学中颇有影响，是王家善的学生并被王视为心腹，因此石迪委派刘凤卓担任策反王家善的任务，刘以“同学会”为阵地，在不暴露政治身份的情况下，以反内战、反歧视为内容，争取并团结了一大批“同情分子”，为五十八师全师起义打下了基础，石迪通过这些关系为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正当策反营口起义工作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又出现了一场风波，在五十八师内部突然爆发了打草惊蛇的“第一次起义”。1947年11月间，我方派原五十八师退职团长乔遇春至营口了解情况，但并未令其策反，这位绰号乔大炮的冒失鬼，到营口后竟擅自对其旧部下谎称：“解放军就要打营口了，营口一定解放，你们别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此话不慎传至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处，郑打电话给王家善，要王追查，王当晚把乔遇春秘密找到他家，把郑来电话的内容向其透露，并表示：“我不会出卖你，不过事关重大，你必须于12点以前离开营口，我马上派人送你出岗哨。”次日清晨王家善下令全市通缉乔遇春，并把通缉事报告郑明新，这时乔遇春早已安全离开了营口。在此期间，廉政也得悉乔遇春来营口，误认为我军即将进攻营口，因来不及派交通员与石迪联络，于是立即召集刘凤卓、张海涛等人秘密开会，研究如何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此事又被营长林春武知晓，林便向王家善告密，形势转告危急。经情报小组研究，决定廉政、张海涛等人立即撤离营口返回辽南解放区，只留“王家善的心腹”刘凤卓坚守岗位，继续领导情报小组工作。此后王家善并未追究，而且严禁知情人向外声张，这场意外风波才告平息。

盲动的“第一次起义”虽告失败，但却使石迪从王家善暗中放走乔遇春以及王极力为廉政等人的行动遮掩的两个表现，更加看准王家善确有率部起义的可能。石迪还从中意识到廉政等人虽

已秘密撤离营口，却难以长期掩人耳目，我们必须加紧工作以防策反的前功尽弃。

石迪同志进一步向我情工人员分析形势，使大家看清策反工作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我解放大军在冬季攻势中解放了鞍山、海城等城市，营口已是危在旦夕的孤城；不利条件，首先是还未形成“兵临城下”便于里应外合的局面，二是营口还有交警总队等国民党嫡系部队，三是国民党海上舰队可随时来营口增援。他更有鉴于“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断然决定必须尽快直接对王家善本人做争取工作。

在此之前，他早已为直接策反王家善物色了可靠的桥梁——王家善下属三团团长戴逢源。戴一方面思想进步，一方面又与王是“生死之交”，“九·一八”日寇入侵东北时，对王家善有救命之恩，所以对王能推心置腹施以影响。1948 年 2 月中旬，石迪亲自写信给戴逢源，请戴转告王家善，敦促王认清形势、率部起义，王未拒绝；次日，石迪又亲自写信给王阐明形势、指明前途，表示欢迎王师长起义，要求他派代表前来谈判。石在信中还针对王的疑问，表明自己是东北总部所派，有电台与总部直接联络，使王确信石有可靠后台，从而对石迪更加信赖。石收到戴逢源报告后又复信给戴，要求：一要对王的部下抓紧做思想工作，二是趁国民党军舰不在营口时起义；同时提出要王家善派他信得过的代表来老边与石迪联系。

至此，王家善决定弃暗投明，派其亲侄王文祥携谈判条件来与我方会谈。

这时，东北局已确定我方在谈判中应采取的方针政策：“欢迎王家善率领全师起义，但需提高警惕，防止对方缓兵待援；起义时，争取起义部队协助，全歼交警总队等营口守敌，严防其漏网，并注意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城市遭到破坏。”我方还强调起义时间必须抓紧，即使王家善诚心起义，如拖延时间也难免发生意外。此外，东北局还确定了我方可让步的条件。

第一次谈判于1948年2月23日在大石桥镇举行，求同存异、互作让步，进展很大。我方代表是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军区参谋长金振钟，大连情报工作领导人马次青。五十八师代表为王家善之侄王文祥及刘凤卓。谈判中，王文祥提出五十八师按原建制不拆散而编为解放军、不咎既往等五项条件。另外还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起义时间要延缓几天以便做好准备工作；二是起义时，由五十八师担任消灭交警总队任务，然后再装备一个师。谈判期间，石迪通过刘凤卓摸清了王家善的真实考虑：一、王确有诚意起义，因其早与团以上军官酝酿起义并进展顺利；二、王要求拖延时间，并非缓兵之计，而是王家善对长春沈阳的家属不放心，需要时间安置亲眷。

我方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决定接受前五项条件，对后两项要求则坚持：一、消灭交警总队应由我军负责，由起义部队协助，同时起义部队负责逮捕营口反动头目；二、起义时间不能延缓，限于三天之内起义。

2月24日晚举行第二次谈判，我方代表未变，五十八师代表改为一位处长梁启章与刘凤卓。由于此次谈判前，王家善事先已被戴逢源及刘凤卓所说服，消除了与我方的两点分歧，他同意：一、不由五十八师消灭交警，以免节外生枝；二、起义已是刻不容缓，必须尽快举行。因此谈判顺利，决定次日起义。

自2月25日清晨起不到一天时间，王家善即以召开城防会议为名，按照事先的布置，在会上逮捕了五十二军少将副军长郑明新、营口市少将市长袁鸿奎、交警第三总队队长及反动特务分子多人，于2月25日晚7时率部队八千余人起义。起义后，王家善又协助我入城部队消灭敌城防司令部及交警总队三千余人。当晚，他率领五十八师官兵秩序井然地撤离营口，开赴解放区。1948年2月26日营口获得解放。

营口起义是对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一个沉重打击，它不仅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而且大大削弱了敌人的士气和斗志。

石迪同志在领导这次策反工作中成绩显著，被记大功一次，并受到党内通报嘉奖。

不忘廉中辉同志

尹　辛

廉中辉同志，原名廉生，哈尔滨市人，1928 年正月初九生。1944 年考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光复后，于 1946 年入长春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校参加进步学生活动。1947 年 12 月到解放区九台参加革命工作，1948 年 4 月 30 日在长春外围前线——卡伦魏家窝棚一次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 20 岁。

1944 年 11 月廉中辉在哈尔滨市第二国民高等学校毕业，考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被编入九连四区队。在校期间受到秘密的爱国进步组织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他阅读进步书刊，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军事技术，等待时机成熟，以便参加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在那做亡国奴的黑暗时代里，他经常唱起岳飞的《满江红》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日本投降后，他回到哈尔滨家中，想重新求学，将来为国效力，但由于一时

上不了学，便在当地的小学临时当了一名教员。当听说，在伪满大学生请愿斗争下，国民党答应在长春成立一所大学时，他便同伪满军校七期同学黄化民等来到长春，于 1946 年 8 月入长春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学习。

国民党社会的黑暗腐败，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使廉中辉学习技术、工业报国思想受到严重打击，非常苦恼。他为了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从 1947 年下半年起，他如饥似渴的阅读革命和进步的书籍，边阅读边思考到只有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他决心要做一名向黑暗势力、向反动的国民党做斗争的革命者。1947 年 11 月 29 日，他脱下学生装，改为商人打扮，与同学潘德一家三口，在一位换上国民党军装的同学护送下，从南关大桥出卡哨，奔向解放区。经过雪地跋涉，到了九台，见到了民运科长江含，把他送到“学生大队”去学习。

当潘德一家三口与他分手时，他委托潘德把一个笔记本带回哈尔滨。在这个本上记满了阅读进步书籍的感想和对共产党、人民革命战争的认识与自己对革命的态度和誓言。他写道：“今天的无产阶级已经健壮的站起来，深刻的觉醒了，认识了自己肩上所负责任的重大，早已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给苟延残喘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以致命的打击，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摆在目前了。”他还说：“我是极渺小的人物，当然我有我的责任和使命，我知道革命工作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我要担起来它，尽最大力量……我确有一颗顽强的革命决心。”“我要走群众路线，尽所有的力量，为被三重压榨的中国老百姓，为纯粹的第四阶级（无产阶级）创造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制度，使这个封建腐败的、趋于灭亡的祖国，成为一个民主、统一、富强、康乐的新中国，这是我今后的方针。”他还坚定的表示：“为了群众，把满腔热血洒在舞台上（战场上），把大好头颅，扔在革命洪流里，……我愿以百折不挠的毅力把革命贯彻到底！”

当时，为了培养干部，在 1947 年 12 月成立了由东北局城工

部九台联络站领导的、九台县政府协办的一所军事化的学生大队。先是十几人学习，后来达到几十人，则编成大队、中队、小队、分队建制。廉中辉被任为二中队三小队一分队分队长。学员虽都有一颗赤诚的心，但对中国革命和党的政策了解很少，尽管学习条件艰苦，却感到一切都很新鲜，所以要从头学起。廉中辉同志的学习情绪很高，在阅读文件、听学习报告和讨论发言时，处处起带头作用。在成立学生大队俱乐部时，他被选为俱乐部主任，为活跃文体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如组织球赛、周末晚会，出墙报、借阅图书等等。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学生大队的领导同志亲自组织排练秧歌、秧歌剧，廉中辉带队到驻地到小河沿农会向农民演出，随后又到县城向县政府、向工厂工人演出。俱乐部的工作丰富了在这个革命摇篮里学习的青年的学习生活。当时九台城郊小河沿是接近敌人的前沿阵地，学生大队要求生活军事化，组织纪律很严，比如就是三九天也是在井沿洗冷水脸，起床、出早操和吃饭都要动作迅速。廉中辉就是在这里，受到革命洗礼的一员，在学习时他那洪亮有力的发言，在晚会上他那高昂雄壮的男中音歌声，在篮球场上他那作为前锋的飞奔投篮动作，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志们都愿意和他聊天，愿意和他接近。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廉中辉于 1948 年 3 月中旬被抽调到中长部前线民运工作队，到卡伦一带农村开展群众工作。他到工作地点后立即按照上级的要求，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很快地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成立了农会，很快把青年、妇女、儿童也都组织起来。

1948 年 4 月下旬，工作队在卡伦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春耕活动，廉中辉同志在卡伦北二道沟屯开展工作，在他发动群众互助合作搞好春耕，支援前方的时候，突然从北面窜来一股被我部队围剿的土匪，他们骑着马飞驰而来，在来不及转移的情况下，廉中辉一面组织群众疏散隐蔽，一面就近找到一块小树林向敌人射击，掩护群众撤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廉中辉同志中弹牺牲。

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开，工作队立即组织一批队员追杀敌人，先后处死了几个敌人，为烈士报了仇，在当地农会、群众协助下安葬了烈士。为了悼念廉中辉同志，中长部民运工作队在驻地梨树园召开了追悼会。中队长张诚华同志主祭，全体队员、农会干部与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向烈士献了花圈，并挂上了由郭桑同志写的挽联，丁凯同志按“五月的鲜花”为烈士写了一首挽歌，组织队员合唱。张诚华同志代表组织对廉中辉同志为革命、为人民与敌人誓死战斗，最后献出年轻生命，给予高度评价。消息传到九台西小河沿长春学院（原学生大队改名），师生们为牺牲一名好同志都十分难过，并召开了追悼大会，很多同志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烈士廉中辉同志报仇。参加追悼会的当地贫农代表也为这位年轻同志的光荣牺牲而难过惋惜。

烈士牺牲了，家属得知后更为悲痛。他的二姐廉慧灵和二姐夫关永丰，怕烈士的母亲承受不了儿子牺牲的巨大悲痛，一直没有告诉她老人家。他们背着母亲于 1949 年 4 月到烈士牺牲的卡伦北二道沟，把烈士灵柩运回哈尔滨安葬。他二姐为了不让老母思念儿子，解放后，与在吉林大学学习的黄化民同学联系，黄以廉中辉的名义，给老妈妈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信，用来安慰老人。

烈士的母亲日夜思念儿子，与儿子只见信不得见面。但由于他二姐对老人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人一直活到 1979 年，终年 96 岁。在老人临终前，他二姐才把弟弟牺牲了的事实告诉了老人，老人也明白了女儿爱母亲的一片孝心。

（作者离休前为长春市种子公司调研员，县团级）

三位革命烈士

岳维中　郭锋　张智

胡越民、年文学、张雷都是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同在长春大学学习。他们在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后，先后参加革命或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因而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下面是他们的简要情况，记下来用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胡越民**　原名胡宝祥，1926 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丧父，靠母亲扶养成人。1944 年 1 月考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同年 10 月加入反满抗日组织“铁血社”，和同一组织的成员毛宪智、于清涛一道，传播《资本论》等书，激励同学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1946 年 11 月入长春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二年。1947 年春，参加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吉北联络处陈少中领导的以那守田（“军校”同学）为首的长春大学学运小组。他和该组织的成员杜仲

舒（“军校”同学）一道，利用深夜人静时间，向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同学的书桌里送《土地法大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众哲学》、《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革命材料。他向同宿舍的同学王兆一、杨震寰等传播《西行漫记》、《整风文献》等革命书籍，积极在同学间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还和杜仲舒一道到南岭观察国民党设置的碉堡，了解国民党的兵力配备情况，绘成图、写成材料交给地下组织。1947 年 10 月 11 日，因组织暴露，奉命在撤离长春时不幸在长春站被捕，长春解放前夕，牺牲于国民党长春军警联合督察处。

●**年文学**　1925 年 3 月生于沈阳市。1943 年毕业于奉天省立第二国民高等学校。1944 年 1 月考入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1946 年 11 月入长春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到长春大学后，随着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认清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反动面目，相信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出路。1948 年 1 月由郭锋同志吸收他参加了地工组织。

在工作中，能严守纪律，服从分配。曾向同学散发过党的文件，积极参加过反对李鸿强迫松北联中学生当兵和反对迁校等斗争。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因而被敌特视为眼中钉。1948 年 4 月 24 日，在国民党出动军警宪特对长春大学师生进行逮捕时不幸被捕，在长春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当时年仅 23 岁。

●**张雷**　原名张文茂，辽宁省营口人。1943 年 1 月考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五期）。1946 年 11 月入长春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专攻俄语专业。在长春大学学习期间，他目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的现状，心向共产党，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诗歌。1947 年 10 月 18 日，以“蕾兵”笔名在《新生报》发表了《大辛和二

辛子》一诗，写姐弟俩为生活挣扎，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穷苦人的生活。他的诗在报纸和《北辰》壁报发表后，在读者中反响较大。不久，被国民党督察处逮捕，长春解放前夕牺牲于督察处。

（作者之一的岳维中，军校六期生，沈阳市第一机床厂厂长）

飞 向 光 明

周 正

我原名周梦龙，1924 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双山子乡黎明村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家里仅靠种数亩薄田维持生活。由于日寇的奴役统治，房被烧，地荒芜。父母迷信，认为梦示我是什么龙，因而取名“梦龙”，幻想将来我能有出息。我少年时学习成绩较好。因优免费，勉强读完了国民高等学校。1942 年考入伪满军官学校，以期将来能有个生活出路，为家里减轻生活负担。多年的奴化教育，并没有使我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记得伪军校预 科毕业前，本区队的同学曾搞了一个集体在照片上题字的活动，有人题写“日满亲善”。见此我非常气愤，鼓起勇气写了“念祖”两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东北光复后，1946 年 2 月，我被国民党收编入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七期，初在成都受训，后到杭州笕桥学飞行。我曾一度幻想，日本鬼子打垮了，今后该

建设祖国了。因此，当时想要刻苦学习，以期将来成为一个有技术、有文化的飞行军官，报效祖国。可是幻想不久就给残酷的现实打碎了。

1946 年 7 月，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蒋介石、白崇禧气势汹汹地叫嚣："只要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中央社也天天吹嘘国军如何取得赫赫战果。但没过多久便矛盾百出，八路军、新四军竟越剿越多。军事上节节失利，经济上更是一塌糊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贪官污吏横行，国人怨声载道。这期间，我看过《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许多进步书刊；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一些情况和议论，早有传闻；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也从侧面略知一、二；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为了和平建国，不畏虎狼，亲赴重庆的大无畏精神和胆略常为人称道；闻一多、李公朴事件令人义愤填膺。所有这些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启迪，意识到要做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分子，只有到解放区去。

从伪满军官学校转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有 7 个人。虽然我们都被蒋介石亲口称为他的"心腹"，却不断有人对他离经叛道，不辞而别。早在 1946 年秋，王永熙就翻然醒悟，第一个回到了解放区。继而黄志仁又以肺部有阴影为借口离去了。1947 年夏，王兆庆又于深夜潜离杭州。剩下的只有刘清田、李延森、葛长春和我。当时，因器材缺乏，训练进度一拖再拖，而国内战争形势又迅速发展。这样，我们几个原希望于毕业后飞走的打算已不现实了。怎么办？在苦闷焦急中，我们又串连了谢澄宇、王露兴、张森、吕芝溪和邓采国等同学。随后不久，李延森等又通过浙江图书馆的洪超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我们想从地面走，但等了近半年都未走成。以后又想驾机飞往江北解放区，只是担心路远油不够；想飞往四明山浙东纵队游击区，可同学们都说没跳过伞，而在山区跳伞更成问题。刘清田等不及了，他趁换飞前座之机，佯装身体健康不佳，精神恍惚，故意胡乱操纵飞机，终于争得个技术淘汰，离去了。

1949 年初，有消息说空军军官学校将迁往台湾，一些军官的家属已经在准备搬迁了。风声紧迫，我们为此心急如焚。

1 月 25 日上午，我从《中南日报》第四版看到一则小消息，中央社 24 日电："合肥国军撤退"。好哇，合肥解放了！我急忙打开地图——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张百万分之一的行政地图。经测量计算，PT—17 型机用巡航速度三小时即可到达。特别是沿途无高山，如无大逆风，加满汽油，航线飞行高度保持 3 000 英尺即可安全通过。合肥是否有机场虽不清楚，但考虑到既然是省会所在地，总该有一个小通讯机场吧。我把航线画出一看，起点、检查点都很理想，从鲁港过大江，以后有铁路通巢湖。即使油不够，也可在湖边迫降，投奔解放区。这个主意拿定后，当晚我就找那七位同学到没有放水的游泳池详细讲了自己的想法。多数同学都同意我的意见，个别人觉得没有飞过转场，怕没有把握。张霖说，希望大家编队走，并愿做我的僚机。我认为这很不现实，主张能飞走一个也是胜利。

1 月 26 日，是甲班飞行。葛长春、谢澄宇等在甲班。原计划让他们先飞走，但都没有走成，当天晚上我们又在老地方进一步研究乙班飞走的问题。这次航线研究得很细，心里更有把握了。27 日晨有浓雾，考虑到雾后多是晴天，我们做好了飞走的打算，为了防寒，我穿了三层海福绒飞行装。当时，加拿大飞行衣共四层，在杭州一般只穿外两层即可。在整队去机场时，好友叶蒲悄声问我为什么穿海福绒衣？我说感冒了怕冷。他语意双关地说："天气可不太好呀！"

开飞前，教官下达的任务是五名飞行生各带飞三个起落，我排在第二。为了争取单飞，我请求教官给一次单飞特技空域。教官以为我要出去玩，我认真地保证说："绝不违反纪律，只想能在春节前单飞一次。"教员开恩了，答应带我飞一个起落，若飞好了就让我单飞空域。但不巧第一名没飞好，教官一连带他飞了五个起落才滑回。这样一来，到合肥的油量肯定是不够了，我只得设

法避开第二个飞，于是急忙跑人厕所。当看到教官指挥第三名同学上了飞机后，我才赶忙跑到飞机前敬礼报告。教员申斥我："为什么该你飞时上厕所？等下一名再飞吧！"我高兴地答："是！"送走飞机后，我就去关照加油兵，叫他准备给52号机加满油。此时王露兴滑出了，他遗憾地瞅了我一眼。我看到教官在他后座，知道他今天是飞不走了。我又去问张霖，他说是第五名单飞空域，希望我能在空中等他一起走。我说这是自取灭亡。他说，那你就先走吧！我说："解放区见。你油量能保证过江就走。"他说："一定。"

52号机滑回来了。我指挥关车加油，可是教官不同意，说再飞一名。我一看糟糕，于是大声问教官："不是要放单飞空域吗？"他答："是呀！"我说："那加油后我再飞不是更好吗？"他说："对，叫王毓仁先飞。"王一边戴飞行帽，一边嘟囔："太不象话了！带飞，你要单飞；让你第二个飞，你又改为第四个飞，都成了你的了。"我笑着说："实在对不起，就这一次好吧？"王起飞后，李延森又来找我，说他排在第六名，怕今天飞不到了，希望等下一个飞行日再走。我说："机会难得，绝不能等。"他说："那我就乘你的后座。"我说："不行，这是自我暴露。"他说："那我怎么办？"我突然看到57号预备机停在那里，于是说："你飞预备机不行吗？"他说："对哇，我偷预备机。"我说："不行，还是请示教官，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从地面走。"他立即去找教官，结果如愿了。我见他愉快地背伞，进座舱，滑出……我高兴极了，但也有些害怕。如果我30分钟以内还不能起飞，就有可能泄露天机，后果不堪设想。我等呀，盼呀52号机总算回来了，我立刻指挥加油。为了防止教官不让加满油，我故意站在飞机的正前方，面对教官无话找话地问单飞特技动作等问题，直到油加满了我才算完。这时教官一回头，急忙说："油都加满了，快上飞机。"我顺利地飞完了一个起落滑回来了。但在等教官下机时突然听教官说："你下去，我再带杨伟鉴飞一个起落，剩下一个小时你俩各单飞30分钟。"唉！情况又变了，只好服从。杨飞完起落滑回来了。怎么办？一定要把

他骗下来。于是，在教官解安全带时，我跳上机翼喊："杨伟鉴，你下来。"杨以为是教官的意思，就跨出了座舱。我急忙跨入。教官问："怎么?"我一边扣安全带，一边说："不是决定我第四名飞吗?"教官"噢"了一声。这时，杨才反应过来，埋怨我说："咯老子，你叫我下来干啥子，我先飞不是一个样吗?"我说："你休息一下不是更好嘛!"他说："你可别占我的时间哟!"我说："飞30分钟就回来，你等着吧!"

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开车就往外滑，连起飞前的检查也免了。我对正跑道就起飞，一直用110英里的速度慢慢上升到3 000英尺才改平飞。太好了！今天微风，油量足够，可以大胆地飞。横渡大江后，我沿铁路直奔巢县，再前进，看到合肥了。瞧，在合肥上空盘旋的不正是李延森吗！机场就在腹下了，他沿小草地机场的对角线加入航线，准备着陆。我也设法急速作三圈螺旋，下降高度，到700英尺。李此时正在下滑，我也加入着陆航线。李着陆后不到一分钟，我也落地了。他将飞机停在机场的西北角，我滑向他的左侧关了车。我俩跨出了座舱，各自笑逐颜开地站在飞机的机翼上，向南遥望正向我们匍伏而来的解放军同志。当相距二三百米时，忽听其中一个同志喊："同志，是从哪里来的呀?"我俩几乎同时回答："从杭州来的。"又问："后面还有几个?"我说："可能还有一个，他油量不够，大概要落在巢湖边上。"这时有人喊："巢县还没解放呀!"许多人接着喊："打巢县哪！"向我们跑来的解放军同志沸腾起来了，有的还把枪向上抛出一两米高。跑呀！跳呀！我俩也尽情地挥臂跳跃。人们聚拢来了，我俩也急忙跳下飞机，和大家热烈拥抱。忽然一声令下，大家都安静下来。一个年轻的教导员和一位战地记者走过来和我俩热情握手，问候，我们在飞机前合了影。我说："飞机这样放着不行，会被敌人发现炸掉的，应该伪装一下。"战士们一听，立即把积存在稻田里的稻草一捆捆地抱过来，不到几分钟两架飞机就给盖起来了。我们一路说说笑笑进入合肥市去见首长。当时驻合肥部队是华东四纵队，孙

仲德纵队长、谭政委、宋日昌主任等首长热烈欢迎我们，还和我们一起照了像。

第二天下午，巢县前线来电话说没有发现飞机降落，这说明当天张霖并没有飞过来。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走后的第三天，其他几个同学在洪超的带领下从地面回到了解放区。1949 年 4 月份，我们在东北老航校又见面了，他们告诉我，我和李延森驾机起义后，当时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胡伟克大哭大嚷，说教育失败了。

（作者为军校四期生，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吉林省副主委、吉林省政府参事）

“两航”起义前后

薛德文

“两航”即原国民党政府拥有的两家中美合资民用航空公司，一个叫中国航空公司，一个叫中央航空公司。1949年4、5月，南京、上海解放后，两家航空公司的总公司就迁到香港。当时两航公司共有飞机40多架，大部分是美制C46、C47型运输机改装的客机，有极少数是从英国购买的英制“空中霸王”号客机。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两航公司的营运航线在大陆上只剩西南的昆明、贵阳和四川的成都、重庆，另外就是台湾、海南岛和香港之间，海外其它各航线基本停航。

1

我曾是伪满军官学校三期生。1948年11月下旬，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沈阳到大连乘帆船经天津、北京辗转追到广州重新打入国民党空军第一军司令部二处，不久便获取了重要职务——空军司令部二处联络参谋，每日驱车进入国防部二厅、三厅有关处室，以

及广州绥署的二、三处军事机要部门向他们索取资料。我手中掌握了很多军事情报材料。当时的条件太好了，可是环境不象在沈阳那样随时可将情报密送给组织定的联络人。到广州后东北组织迟迟没有派人或用其它办法找我取联系，我每天都在盼着组织派人来。另方面我积极开展工作，找线索发展人员。老天不负苦心人，终于通过香港文汇报一位编辑的帮助，与香港华商报负责人杨琪同志会了面。在香港第一次碰头时，我向他介绍了东北组织给我的指示和我在广州的工作情况，并提出我能立即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材料，如从国防部三厅四处索到的一本兵力部署文件(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广东海南岛的详细的师以上兵力驻地番号名册，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秘密武装名册等等)，我俩研究了我密写的寄送方法，他当时给我的收信地址是九龙深水涉某号，收信人是他的另一个名字杨焕奇。

截至10月中旬广州解放前，我以密写书信的方法向他寄送材料。有时我截留的重要资料太多，有的是成本的或页数多的无法密写就派人乘船或搭火车秘密送出。其间我曾亲自去港两次，既送重要材料又与杨研究下一步的活动安排。在最后一次碰头时，他告诉我解放后的广州军管会主任将由叶剑英担任，嘱我在广州解放后向军管会秘书长写一份工作报告，又告诉我广州解放后他准备到广州筹备出版《南方日报》等等。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了。我和我秘密发展的同志们把我们的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送到军管会，亲自交给秘书长肖桂昌。根据指示又到驻在东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航空接管处报到，并将留在天河机场附近以及东山一带各仓库的航空器材和军用物资清理造册向接管处交待。

交接工作一直持续到11月初。这时，中国共产党华南分局在两广地区的机关报《南方日报》终于在广州出版发行了。见到报纸后我立即赶到广州西关去见杨琪同志，向他致贺。杨琪已被任命为《南方日报》社副社长。他知道我在航空接管处的情况后立

即写一封证明信，说明我是由东北派来的，在广州解放前向组织提供了很多重要军事机密材料等等。并亲自将证明材料交给处长张孔修。根据杨琪的这份证明信，张孔修处长对我的来历身份清楚了，知道是自己人。

2

1949年11月4日晚，张处长亲自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落座后，即向我提出了一项紧急而且是很光荣的任务，说他刚被叶剑英总长（当时还习惯地称他叶总或叶总长）召去，叶总接到北京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说“两航”公司总经理已密电周总理决定起义，投向祖国怀抱，为新中国服务。关于行动的具体细节安排要听候北京政府派人来港商谈后再做最后决定。对此，中央已有了安排，并把这安排和建议告知叶总，让叶总在广州就地物色好人选火速去香港九龙找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黄作梅接头，由黄作梅安排与两航公司总经理会晤，传达中央的安排和建议，并听取对方的意见和要求。叶总和张处长研究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执行。张处长传达完以上情况后就把中央的安排告诉我：起义日期定为11月9日；江西省南昌以北，长江以北的华北地区所有机场均可安全降落；安全降落示意信号：因为有些可降机场尚无无线电通讯设备，确定凡起义飞机临近机场低空绕飞时两翼上下摆动，地面即确认；11月9日，在这一地区的各机场，政府将密令各有关部门密切注视迎接，领空之内也绝对保证安全。中央对“两航”总经理的建议是：1月9日这天起义飞回祖国的飞机越多越好；2、飞回来的飞机上尽量多装载常用零部件、航空航行器材和航空通讯器材等。

11月5日凌晨领导驱车送我到广州站，我搭火车去香港，当日下午抵九龙按地址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黄作梅。见面时，他已知道我的来意和使命，经过磋商，他即向住在九龙半岛大酒店的两航公司总经理联系，安排会见时间。11月6日下午在黄作梅陪同下，我到了半岛大酒店两航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客室，见到

两位总经理后，首先由黄作梅向他们介绍我的来意，并很有风趣地向他俩说这是在“两航”起义前夕中央派来的最后一位使者。随后我就把周总理对此次起义的安排和中央的建议、希望等一一传达给了他们，然后大家又一一做了研究。他们对中央政府安排在11月9日这天起义表示赞同。他们说，降落地点可按中央安排的地区根据情况决定。关于建议多多起飞飞机一事，两位总经理说：“我们何尝不愿把这几十架飞机都带回去呀，你可知道香港这边只有启德一个机场，而且不止我们两个航空公司，还有好多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都使用这一机场，而且在飞机起飞前我们都是处在秘密活动之中，中央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这项建议和希望我们视情况尽可能照办。”然后又向我介绍了两个航空公司的空地人员、公司职员们的心态，美方股东和外籍职员的意向，表示在行动前抓紧时间处理解决，估计不会出现大问题。估计飞机在港宣布起义之后，港英当局将在台湾政府及其特务们的唆使下，对留港职员以及停在机场的封存飞机采取破坏和干扰活动，要求在起义后，政府再派人来港联系。如果港英对起义后留港人员及封存的飞机和物资财产强加干涉或有什么无理要求等预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请中央政府出面给港英当局以压力（这压力二字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宣布起义后，除飞赴祖国一部分、飞机带去一部分主要人员和装走一些必要的部件、器材等以外，还要留下一大部分飞机以及护机人员，留待今后伺机分批飞回祖国，所以总经理对后事很不放心，只提这一项要求。会谈结束后我火速乘火车于11月7日返回广州，向张孔修处长汇报了全部情况。

3

11月11日清晨，张处长又急忙找我，告诉我说：叶总打来电话，说北京来电告知9日“两航”公司总经理已乘空中霸王号巨型客机率10架起义飞机安全飞抵北京。命我再一次去香港，按第一次与两位总经理会谈时对方提出的要求，去港了解起义后留港人员的动态和港英当局对“两航”起义的反应。第二次

去港是按第一次会谈时的约定找原中央航空公司香港分公司何经理。他是起义后留在香港的负责人。他向我报告说，起义后留在启德机场的飞机全部抽出燃料并由护场人员看护。美国资方人员闻讯后，表现为无可奈何的平静。港英当局尚无什么反应，唯港九各报，以及海外报社对此次起义大肆宣传，使起义震惊中外。

我将登载两航起义消息的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等多种报纸带回广州交给了航空处张处长。张处长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

（作者为军校三期生，退休前在辽宁省物资局建材公司工作）

跨过鸭绿江

——过江作战的几件事

李联藩

1949 年 2 月，北京解放不久，在景山公园后面的一所院落里，我与许多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开始过着一种崭新的生活。自那以后转驻天津、北戴河、许昌等地，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随所在部队入朝。我所在的单位是炮二师司令部。我的工作是炮兵侦察。当时很多人是新兵，部分人是知识分子，缺乏战斗经验。我们对敌机主要是防空隐蔽为主。因此敌机有恃无恐，到处轰炸扫射，有时甚至超低空飞行。一次夜行军，我师的 100 多门大炮开赴前线，由于行动规模较大不时招来敌机骚扰，我们只有仓促应战。高射炮射击几发之后出现了故障，连长下令隐蔽。眼看一场灾难就要临头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情况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名叫党谢娃的山西籍战士，在听到连长命令后没有立即离开炮位，他捉摸着炮弹不响可能是雷管有问题，就大胆地又换上新的一发，这时敌机又按照原来的飞行路线飞转来，他自己及时地打出这一发炮弹，想不到敌机立即中弹起火，拖着一缕黑烟，一头栽在路旁的稻田地里。战场上响起欢呼声，另一架敌机仓皇遁逃，人们的心情由紧张转入兴奋！

敌机不时地骚扰、空袭我们的驻地，有一次敌机低空扫射时，被我们隐蔽在山上的战士用步枪击落，并俘虏了敌驾驶员。

在执行侦察任务中，我走过三八线南北的很多地方，接触过

饱经战火的许多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是：这里是英雄的土地，这里有英雄的人民。

在春川附近的一个朝鲜游击队的驻地，我意外地结识了两名受了重伤的年轻人，男的十四、五岁，女的要大些。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借助日语和他们交谈。从谈话中知道他们的父母被美国空中强盗炸死，为复仇他们参加了游击队，在受命炸毁敌人坦克时被打成重伤。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表示："养好伤还要去战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朝鲜人民的希望。

一次我们执行任务，夜宿五里亭。清晨刚刚睡醒，四架敌机就来光顾了，它对附近人家大肆扫射之后，就转向这里的交通沟进行纵横交错的轮番扫射。当时我仰卧在交通沟里，看得很真切。所谓交通沟其实深浅只 1 米左右。好一阵子以后，敌机看没有甚么动静，就转移了目标，经过伪装的几辆友军汽车，被击中起火了。我抖了抖身上溅满的土坐了起来。看到穿着白色衣裤（裙）的朝鲜老人和妇女在敌机扫射下，依然驱着牛默默地耕作着。

有一次我接到去炮一师接收部分观测器材并将它们运回后方巨里所里的任务。我带着冯排长和几名侦察员乘一部中卡车连夜出发。途中多次受到空袭，天亮后好不容易地找到师部驻地，见到了文师长，办好了交接手续，想趁夜幕来临之际上路。不料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时，不远处传来了敌机的扫射轰炸声，形势对我们是不利的，但我们还是毅然出发了。夜里，路上，我们看到朝鲜人民支前的牛车车队在缓缓地前进。敌人不时地扫射轰炸，投定时炸弹、三角钉，而车队却继续前进。有的路段被炸坏，朝鲜妇女用头顶着箩筐，在敌机的骚扰下往来运搬土石进行抢修。

在五里亭，我受命带着侦察员和联络员徒步去侦察新的驻地。跑了一天，总算找到一个虽不理想但还比较安静的地方。天黑时，我们全体侦察人员整装上路。刚刚离开五里亭不远，就听到了路旁报警的枪声。这种枪声是防空监视哨的报警信号，它预示敌机

已经接近或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的千里运输线就靠它来担任警戒，这样我们的车灯就可以由大到小或小到闭灯前进。但这次监视哨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告诉我们坡下面有定时炸弹。可我们顾不了这些，要强行通过。

前面的车总算是顺利地通过了，我们的中卡车挂着拖车却开进了一个黑鼓隆冬的大深坑边缘。司机忙打开车灯，我们一看，都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偌大的炸弹坑挡住了前进的道路。司机忙着倒车绕行，哪知越忙越出错，拖车上的报话机班长却从拖车上掉了下来，骑在卡车的牵引钩上，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时后面又开来几辆卡车。我们要尽快地离开这鬼地方。就在我们刚刚上路的一刹那，一声轰然巨响——定时炸弹爆炸了。后面汽车的司机手被炸伤，报话机班长也负了伤。尽管如此，我们还在前进。敌人的定时炸弹并没有阻止住我们前进。

我们取得五次战役的胜利，战场上有很多敌人遗弃的汽车需要运回来，师里就组织我们一些人去打扫战场。一路上不时看到从前方开回的卡车，卡车由我们的步兵战士押着的美军俘虏来驾驶，他们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

公路上，工兵同志在排除地雷，把起出来的地雷摆在公路旁，地雷种类繁多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们沿着山边的公路前进，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但车子只能在公路上行驶。敌人的直升飞机指挥着炮兵封锁这条公路，不时地打来一排排的炮弹。我们肤接敌人射来的炮弹至最近距离，观察研究封锁射击的规律，最后决定当一阵急促射之后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通过这一封锁地段，进入比较安全的地方。这里有美军遗弃的尸体，也有横七竖八的军用品。

一个受了伤的美国佬，赤手空拳，孤零零地坐在地面上。我们只顾开车前进。没有人去理他。

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作战科高参谋和通信员跟我们打招呼。他说前面有很多美军吉普车，都被美军飞机打坏了，实

在是可惜！他要先赶回去。

公路两旁两山壁立，是个天然屏障，美军吉普车足有20多部全部报废。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看见逃难回来的朝鲜老乡踏响了地雷；我们的朝鲜族联络员老金也在山边的一条路上遇了难，大家遍寻无结果，只好忍痛离开！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再次通过这个危险地段。

我们稍稍喘息继续向前走，不远处看见高参谋独自一个人在吉普车旁徘徊，他神情沮丧，军服袖子缺了半截，脸也黑黑的。“怎么啦！小通信员呢？”我们不解地问，他悲伤地说：“我们的车子压上了地雷被崩了起来，小通信员随着腾空而起，落地后就断了气！我用捡来的军毯，将他的尸体掩埋了。我因为紧握着方向盘才幸免于难！”大家听后，不禁愕然！

小通信员是个湖南小鬼，人长得很漂亮，也聪明。小小的年纪，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

五次战役后，敌人为挽回败局大举反攻。我们接到紧急命令，立即后撤至001线，情况非常急迫。薄暮时，大家分乘多辆吉普车匆匆上路。我和冯排长，文书小褚以及两名侦察员同乘一辆车走在最后面。司机小孙是个东北人，他不安地向我报告说水箱漏水，怕中途出问题。我说顾不了这些。经过简单处理后，准备一筒水备用。等我们出发时，前面的车子已经是无影无踪了。沿途步兵部队络绎不绝，道路上十分拥挤。

当我们的车子开进山坳间的开阔地段时，夜空已经挂了好几颗照明弹，地面一切清楚可见：路上停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满载着各种物资的军车、公路两厢隐蔽着密密麻麻的步兵连队战士。两架敌机沿着公路疯狂地扫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只好停车暂时隐蔽，大约经过五六分钟之后，地面上的步兵对空射击部队开火了。弧形的弹道划破夜空带着人们的希望在追逐目标，看来战斗一时不能够结束！

根据我们吉普车的水箱漏水情况，必须当机立断，冒着生命

危险冲出这条封锁线，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命令把水箱加满了水，示意小孙全速行驶！

当我们的车子响起了马达声，箭一般地驶出时，路旁的其他车辆，也相继启动，于是战场上沸腾了。敌机迎头向我们开火，机关炮的火舌飞过我们的头顶，紧接着听到咕咕的响声，人们紧张到极点！但因为敌我是相向行驶，因而射击的准确性也就相对地减少。我们不顾一切地冲过爆炸起火的卡车，冲出开阔地，冲入敌机射击的死角，我们胜利了！

到驻地后听说政治部干事赵志诚同志在这次空袭中遇难，以后我在后方见到了他的爱人，将赵志诚遗物金笔和手表给了她。这是永久的纪念。

（作者为军校一期生，离休前为锦州四中教师）

面对敌“空中优势”

高联方

1950 年早春，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炮兵第二师三十团，衔命从宽甸鸭绿江上游跨江入朝，从东线向南挺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激励下，作为曾经深受民族压迫的东北男儿，斗志昂扬，特别是出身军校的北辰同学，其感觉则更胜一筹。我所在的炮兵三十团，全部为美式装备，从炮（一五五榴弹炮）到各种车辆，枪枝弹药，全系由黑山阻击战中缴获而来，其战斗力是相当强的，在这个师出国参战的北辰同学有：

一期生任师部参谋的李联藩、一期生任团部参谋的高联方、二期生任连长的孙须正、任营汽车管理员的齐凤鸣、任营参谋的张善友、任营参谋的毛世刚、任师军需的吕振泉，三期生任师干事的李锦涛等。未出国的北辰同学有一期生任师参谋的章全科、孙宪治、那成基，二期生任团军需的高景陆、任团管理员的富士贵、任团汽车教员的宁广义，六期生任团干事的沙福恒，还有一名五期同学。

入朝初期，敌机猖狂程度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他们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给我军造成许多困难。但敌人吹嘘的所谓空中优势，在我强大的空军反击中，很快地便成为痴人说梦—— 天空不是属于他们的。

入朝后，我军在清城镇以东一带集结，车炮全部对空伪装，并严令不准对空射击。一天凌晨一架敌机飞来，从标识上看是英国

的侦察机，它低空盘旋驾驶员左顾而右盼，驾驶员黄头发在风中飘动，一双蓝色的眼睛清晰可见。螺璇桨的风力将我军炮布掀起来，但因上级有令，谁也不能贸然射击。敌机绕了两周后飞去了。当时涡轮式机还未出现，敌机种多为B_{52}轰炸机、轻轰炸机、P_{51}野马战斗机，还有一种名为黑老婆的海军战斗机，装备着两门机关炮、轻磅炸弹和固体汽油弹。由于我们不还击，敌机更加狂妄，在温井岭，还撒了硫磺和空心三角钉，企图阻止我军前进，但这毕竟是痴心妄想，它阻挡不了我们的滚滚车轮。

当时我军的车辆是白日防空，夜间行动。最初是无灯驾驶步行诱导，继而使用微光灯，后来由于和敌机多次较量取得了经验，于是开大灯跃进，遇情况立即隐蔽，而敌机对我们却无可奈何。

北朝鲜的康平是唯一的开阔地，也是唯一通向南方的要道。敌机在这里设下关卡，每夜9时开始，在空中挂上照明弹，地面也投下照明弹，施行立体照明，以期达到封锁我军的目的。为了军事的需要，我军车辆必须强行通过。于是所有车辆都缚上树枝，行进起来地面便尘埃大起，使敌机难于捕捉目标，保证了我军畅通无阻。朝鲜公路很窄，车辆不能对行。敌机利用这一弱点，向我们进行攻击。有一次车辆受到敌机的追击，在敌机伏冲欲射时，驾驶员突然来个急刹车，敌机欲射不能又无回旋余地，终至撞山壁自爆。

一次我在执行任务中，看到两架敌机，对一条毫无情况可言的小河猛袭。放了阵机关炮，炸弹激起冲天水柱，才悠悠离去。后来得知，这是敌机反航前为回报上级完成任务而干的。敌空军的这种气质，岂不使人捧腹。

1951年伊始，我军转入全面反击，动员全军尽一切力量对空还击，于是到处都燃起愤怒复仇的火焰。当时我们一旦发现敌机，白日打，黑夜打，低空打，高空也打。我们的空军出动了，不是七架八架，而是四五十架的机群。情况急转直下，敌机闻风丧胆。过去那种嚣张的气焰，一下子降到零点，敌方不禁惊呼中国一夜

之间成了空中强国。

（作者为军校一期生，黑山县芳山镇西胜屯小学教师）

抢修飞机场记

鲁　羽

1950年10月，军委决定由南京和沈阳空军分别组织第四和第八工程大队赴朝鲜抢修机场。第八工程大队由沈阳组成一队，由吉林哈尔滨组成二队。我是伪满军校四期的学生，当时在长春市土建公司担任技术员。听到二队需要两名工程师的消息后，我当即提出申请，经城建局批准和韩风工程师一起编入二队，到安东换军装入朝。

到安东看到被 炸毁的房屋江桥和面临的不断的空袭精神上感到紧张。白天忙碌完出门的准备工作，黄昏我们便乘汽车过了江。沿路车人络绎不绝，敌机不断地投照明弹然后扫射轰炸。我对空监视哨鸣枪传信。我们听到枪声便下车躲进山旁树林里，一晚上不知躲多少次。有的人把水壶挎包都跑丢了。后来有的人干脆不下车。侥幸还未受伤。走了两个夜晚才到了永柔。

永柔有一大块平坦的稻田地。我们分散住在离工地十多里以外的小山村里。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挖防空洞，以便空袭时有躲避的地方。每天傍晚进工地，部队往工地运砂石和木材。没过几天敌机就来轰炸，每次炸弹都响七八阵，一旦听不到响声，我们便去查看弹坑和臭弹位置，他们每次都投下上千枚炸弹。弹坑深6米多，直径约10米。臭弹表面看只有十厘米左右的一个小孔成罗旋形。臭弹很不好挖。有一个工兵班好容易挖一个臭弹，战士正在吃饭时班长卸雷管时不小心爆炸了，一个班的战士全都牺牲

了。为防止发生类似事故，上级命令对臭弹一律采取引爆方法。每隔20多天刚刚把土基整平，敌机又来轰炸。运来铺机场的整套钢板堆放在山林里，一直没有铺上。为了防止轰炸，采取伪装办法在旁边另修一条跑道结果同样被炸。后来干脆选了个地方做假设机场，晚上机械去干几天，敌人以为又修了一个机场照样来轰炸。就这样来消耗敌人的弹药。当时我们的驻地到处都有敌特，他们甚至藏到衣柜里。一个里委员长在防空洞里向敌人发报，被我们抓获。由于敌特活动，所以敌人对机场位置、施工进度都了解得很清楚，投弹很准确。使我们认识到防奸防特的重大意义。

同年8月郭协理员和我带领40多人去顺川抢修机场。一天上工早了一点被敌机发现，听到投弹声我从山包上迅速往下跑，被什么东西绊倒，这时炸弹在山包上响了。土块落到我身上，幸而未被炸伤。晚上敌机投照明弹，我们就躲到材料堆后面。敌机过去继续施工，连续几个夜晚才完成任务回到永柔。

在永柔，机场一直没有修成，10月转到龟城。这时我们的飞机出动了，敌人不敢那么疯狂了。在一个河床卵石地带抢修了一个水泥混凝土跑道。后来也被炸毁。因是卵石基础炸弹坑不太深，臭弹只钻了一个坑，处理容易多了。由于油弹配套工程未修上也未能使用。

我们每到一个驻地都首先拿起扫帚扫院子，给驻地老乡的孩子们分饼干，老乡对我们很好。晚上老乡们前来闲谈，有时也唱歌跳舞。冬天除组织文化业务学习外有些同志还坚持自学。春节时慰问团带来祖国人民给我们慰问信、慰问品和节目给我们看，我深受鼓舞。

1952年3月转回国内在安东大堡抢修机场，7月完成混凝土跑道滑行道工程。很快地油弹库和营房配套工程也完成。苏军和我们空军立即进驻机场夺回制空权，扭转了被动局面，迫使敌人不得不在1953年在板门店坐下来和我们谈判。

（作者为军校四期生。退休前为长春市市政设计研究院高工）

英雄连长孙降生

刘凤卓　佟致忠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统治下的东北大地，孙降生中学毕业后，入伪满军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和东北人民一样狂欢，一样寄希望于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立志为祖国的振兴和富强而献身。但是，事与愿违，内战破坏了和平，他开始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不愿为蒋介石大打内战卖命，1948 年 2 月他和许多北辰同学一起参加了王家善的营口起义，部队起义后，改编为解放军四野一五 0 师，进军大西南。孙降生同志随军参加了鄂西、四川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 年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他同千千万万中国的英雄儿女一样，于 1950 年 10 月，雄赳赳地跨过了鸭绿江，1951 年新年之夜，彭总一声令下，我志愿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从西海岸到东海之滨，美帝吹嘘的坚不可摧的三八防线，被我各路大军一举突破。孙降生带领的七连，进汉城，过汉江，冒鹅毛大雪尾追敌人于 1951 年 1 月 17 日直插到三七线的阳智里。上级考虑到战线拉得过长对战争不利，于是决定不继续追击，就在这一带停止待命。三营七连在连长孙降生带领下受命在通敌要道一侧海拔 150 米的阳智里高地，阻击回头反击的敌人。七连指战员接受战斗任务后，在孙连长指挥下，情绪饱满地开始构筑阵地工事。虽然是冬天，但时间充裕，工事构筑得比较完备，特别是机枪掩体，根据敌人习惯战术结合地形选择在山沟上端精心加工加固，巧妙伪装。不到一个星期，敌人看我们不追了，真的回头反击。1 月 24 日上午 8 时许，

敌人纠集了10辆坦克、五架战斗机，在步兵进攻前，疯狂地向我阵地进攻，先是飞机投掷炸弹，接着轮番扫射，而后10辆坦克炮弹不分个地打过来，一时间阵地上土石横飞，烟雾弥漫，雪白的山头，顿时变成了火烧的荒山。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阵地进攻了。战士遵守孙连长的“敌人不到30米不准打”的命令。于是憋着气等待着、等待着，50米，40米，30米，连长一声令下：“狠狠地打!”枪弹、手榴弹倾泻在进攻的敌人身上。

败下阵的敌人，在阵前山脚下，又组织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七连战士在连长孙降生的指挥下奋不顾身地和敌人战斗着，就这样一天打退了敌人11次波浪式的冲锋，晚6时敌人不得不龟缩在阵地前的小高地外。

一天紧张激烈的战斗下来，战士没有吃一点东西，渴了只好用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这时孙连长下令抓紧战斗间隙修补工事擦拭武器，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

夜，死一般的沉寂，除了天空几个闪烁的星星和敌人不时射向空中的照明弹外，地上黑得对面不见人。孙连长在冰天雪地的阵地上，集合排以上干部，开了调整组织、动员再战会议，并且命令各排拂晓前准备好战斗。

1月25日6时许，敌人用同样战术出动了11架飞机、十几辆坦克，用一个团的兵力向我连阵地和二营阵地全面展开进攻。这一天9次的争夺战，使阵地的工事大部分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修补工程太大，时间也不允许。指战员伤亡较大，指导员第一天负伤，这一天排级干部伤亡已接近一半，战士也有一排左右的人伤亡。孙连长利用夜间战斗间隙，再次调整组织，临时指代配齐干部。

1月26日，敌人开始进攻的时间虽晚，但来势凶，光七连阵前的敌人就增加到一个半营的兵力。这天敌人进攻的战术是毁灭性的狂轰滥炸，炮弹的排击拉长到20～30分钟后再集中兵力猛扑。这时阵地工事已全不能用了，战士利用炸弹坑和敌战斗，枪

打坏了，就用手榴弹代替，机枪射手牺牲了，一位副班长就带着病抓过机枪就扫射。连长孙降生腹部受重伤仍然坚持指挥，为了充分发挥火力，他站起来向敌人射击。负伤的战士们在连长的带动下，和敌人混战在一起，那真是"挥戈战犹酣，不觉伤体残。"就这样一天打退敌人6次进攻。天黑了，敌人退下去了。上级下令"阵地转移"，七连集合起来清点了一下，包括轻伤在内只剩60多名战士和干部。三天的战斗，打死打伤敌人共有200多，缴获卡宾枪10多支，自动步枪6支，手榴弹30多发。

就是这次战斗，孙降生连长壮烈牺牲。当年他才28岁。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含泪默默地掩埋了自己的连长和战友，依依难舍地告别了和自己朝夕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和自己的连长，撤离了战斗三天三夜的战场。

孙降生为了自己的祖国英勇战斗到最后一息。战斗结束后，七连被评为英雄连，党给了孙降生英雄连长的称号。

英雄连长孙降生永垂不朽！

（作者均为军校二期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和孙降生是一个部队的。转业到地方后刘凤卓曾任本溪北台钢铁总厂副厂长。佟致忠，原名佟祥和，在离休前曾在瓦房店市一中从事教师工作）

长白山搜捕美特记实

吕殿元

1952 年 9 月 8 日接安图县公安局报告："我县一群众到县局反映，他在老岭山上发现两个可疑的人，他窝棚里的半袋小米也丢了，可能是他们偷去的。"9 月 14 日又接和龙县公安局报告："我县上老岭山上采蘑菇的老乡反映看到一个人穿戴和当地人不一样，很可疑。"当时我正在吉林省公安厅政保处任副处长。经过研究，认为这两个情况很值得重视，分析认定是外来的人，可能是朝鲜战场上的逃兵，也可能是国内城乡犯罪分子，潜逃深山躲藏；再一个可能是边境潜入的间谍特务。据此电话通知两县局：1、部署反映情况的群众，再回老岭山上，照常挖人参、采蘑菇，如能找到可靠的人，可以跟老乡一起上山，多带点大米、小米、各种咸菜、烧酒等，以备接近可疑人时食用或借予。以便观察其详情。要一周左右回县汇报一次。2、告诉两个县局，把通往老岭的大、小路，布置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严查出、入山人员的证件，发现可疑人立即送派出所转县局。

一处立即将上述敌情报告东北公安部一处。1952 年 9 月 25 日接东北公安部电报通知："发现你省长白山老岭一带，有不明的怪电波与日本东京茅茨经常通报。"一处同志们研究后认为：1、肯定老岭上有敌特并有电台；2、这组特务是由陆上潜来，还是空投来的尚不能肯定。决定去老岭侦察。上述情况向厅长作了汇报。经

批准吕殿元率一个侦察小组前往延边公安处共同研究上山侦察破案。9 月 26 日出发，28 日赴老岭。临行时带长白山地区 50 万分之一和老岭一带 5 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各一张。

9 月 29 日我和姚昕同志带几名侦察员乘吉普车到老岭北麓三道沟村。找一名跑山的老头领路向岭巅进发。3 日上午到岭顶，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发现有一个旧碉堡，当即决定把指挥部设在此。并搭了一个窝棚让侦察员们住。我们在军事地图上熟悉老岭地区的地形。

下午延边公安处派员送来新情况。9 月 29 日二道白河派出所电话报告："一个叫李军英的自首，他是美帝驻东京间谍学校空投下来的，任务是与今年 7 月空投在老岭的一组特务接头。"此人现在途中，今晚可押到公安处。为从李口中了解一些情况，姚昕同志立即回公安处。姚将李供出的情况电话报告省厅薛厅长，薛又向东北公安部报告。10 月 5 日东北公安部通知延边公安处，速将李军英送部。据李提供的情况老岭一组特务，组长是文士杰、电台台长是牛松林、组员有马志辉、张载文、许广智、于冠洲，他们每个人的年龄、学历、性格、面貌特征、任务等情况他也介绍了。公安部要延边公安处把这些情况同时报给公安部并命令延边公安处从五个县公安局各抽调一名局长率 20 名干警，带手枪便衣和两支冲锋枪，速到老岭指挥部待命。

10 月 10 日王吉仁副厅长与姚昕处长、三名科长、科员及五个县公安局长及 100 名公安干警到指挥部。指挥部将五个县干警按原建制组成五个搜捕队。

指挥部召集五个队长会议，讲明了最近的敌情和搜捕队的任务。各队从即日起，细致地勘察岭巅周围的地形地物，寻找可疑迹象。经过勘察，初步发现岭顶处一块 50 平方米的空草地，周围有四处树枝被砸断；有两处树枝上挂有白缘绳，又拣到纸烟头。肯定特务是在此降落的。

指挥部部署：以岭巅空地为中心，第一、二队搜查北大沟；第

三、四两队搜查西大沟；第五队为机动队，听临时调动。

对敌情分析研究，认为这组特务在老岭已立足，必设法向附近村屯铁路沿线推进，或潜入大、中城市。总的指导思想及侦察方针：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对这组伞特进行公开搜捕与秘密守候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发现敌人就要跟踪追捕。严防其逃走或自杀，力争活捉其全部。保全其电台及密码。

10月13日第五队报告：在距指挥部东南方2000米处，发现一个地下仓库，约一间房大小。其中：有用过的落下伞，木工工具，钓鱼具、两箱约100筒罐头。有各季服装、菜刀等，还有卡宾枪、子弹及各种器材。此外还有居民证、戳料、刻字刀具及伪造的人民币等。估计伞特们会来取所需物品及食物，部署第五队派两名干警在地下仓库附近守候，待敌人来取东西时，将其活捉。同时布置第一、二、三、四队注意寻找敌人的地下住室，重点是傍山靠水的山坡处。方法用木棍敲打或用脚踩试是否有空声。

10月15日，忽然有200名伐木工人也开进老岭山区，开始伐木，这就迫使伞特躲躲闪闪，增加了我们搜捕的难度。10月18日天下大雪，北风呼啸，在地下仓库守候的一名同志来指挥部报告：今早8时左右，发现有三人向仓库附近走来，左顾右盼，慢步前进，约距守候人员50米时，守候同志不沉着便喊："谁?"这三人听到声音转身就跑，指挥部立刻集合边防战士一个排，由厅侦察组带队跑至地下仓库，顺着伞特逃走的方向，跟踪追赶，但天下大雪又是密林，视线很短，看不到人影。追到古洞河，水深10厘米左右，伞特为了断其足迹，顺水而逃。我队也顺水追去找到敌人离河的脚印。因大雪覆盖，再找不到脚印。此刻已追了3个小时，仍无影无踪，只好返回。

10月19日，第一、二搜捕队报告：在古洞河山谷右侧发现一个地下住室，内用落下伞系绳绑的小松木竿的天棚墙和对面两层铺（似火车的卧铺），室内地上有些乱纸和空罐头盒子。

19日下午第三、四搜捕队报告，在西北叉一个大山沟上端左

侧山傍，发现一个地下住室，屋内构造与上午发现那个洞同。室内一室，尚有三块小石头摆的炉架，燃烧的化学燃料尚有余热。估计敌人已成惊弓之鸟，逃走不到半小时左右。

指挥部研究：敌人发现岭上最近有200名伐木工人、100名干警、一个连战士；地下仓库被我据守；两个地下居室也被我发现，他们不能再在附近活动，必远走几十里或百里重新建住地。

指挥部分析李军英自首交待：美间谍机关已电告老岭伞特组长，又投下李军英让他10月份到老岭或杨杖子一带去接头。认为这伙伞特很可能逃向杨杖子一带。

10月20日指挥部研究：选择两名老侦察员，化装成山区打猎的群众，去距老岭90里的杨杖子。以崔诚同志为首的两人小组当天出发。给他俩的任务，是在伞特接头地点蹲坑守候，待伞特组长来接头之际，将其活捉。敌人来人多，暂离开现场，装成路过此地稍加休息的样子。

鉴于前段，大批人马搜捕，以明对暗，惊跑了敌人，所以改变成以少数便衣侦察员化装成当地群众，以暗对暗，发现敌人能捕则捕的指导思想。

为了防止敌人出山潜入村屯，派人去和龙、安图两县公安局研究，发动周围的基层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严密监视山里逃出的可疑分子，发现就报告公安助理。

边防连已完成这段追捕的任务，介绍回边防连部。

10月27日指挥部为了总结前段工作、研究敌情、重新部署工作，集合全体搜捕人员下山到和龙县老岭南麓瓶瓮里村宿营待命。

11月2日上午10时左右，有两名可疑的人向杨杖子我守候处走来，走到距我20米左右的地方，崔诚同志问："谁？"对方转身就跑，崔边追边喊："站住！""再跑就开枪啦！"两人还跑，崔开枪打倒一个，另一个马上站住举起双手。崔上前搜身，搜出手枪一支，金元宝若干，将其活捉。又从死者身上搜出手枪和金元宝若干及手表等。初步审问活捉的那个人，他供认是伞特组长文

士杰，被打死的是组员马志辉，来杨杖子与李军英接头。崔与另一个同志将文士杰连夜送到指挥部。指挥部领导当面表扬了崔诚两位同志。第二天3日早饭后，先对文士杰进行政策攻心。未等他开口，我们就问："电台技师牛松林及组员们现在何处？"文一愣后答道："他们三人都在杨杖子山沟里。"又问："你昨夜一夜不回去，他们三人能否逃跑？"他答："不能，他们知道我俩出来接头，我俩未回去，会想到我们没接上头。"又问："能不能怀疑你自首或被捕？"文答："不能。"又问："你能立功吗？"他答："我决心立功。"又问："你怎么立功？"文答："我愿领你们去逮捕他们三人，并愿把美帝间谍机关，对我们训练、空投、任务等坦白交待。"我们说："你今天下午就出发领我们去捕他们三人。"午饭后全体搜捕人员集合，讲明伞待组长为了立功赎罪，愿带路去捕其余三名组员的情况，立刻整队出发，走了6个小时，约晚21时30分左右，到了距三个伞特住地约有2000米处，全队停止前进。这时已看见三名伞特为取暖点的火堆的红光。留两名老侦察员在看守伞特组长。大队人马摆成口袋形顺山沟肃静前进。第一、二队走右山腰；第三、四队走左山腰；中间是第五队和指挥部，告诉全体人员对方不开枪，我方不准打枪，要抓活的。走了一个小时约半夜23时左右，离那三名伞特尚有百米。因山沟两旁有很多干树枝，搜捕队100多人难免不发生响动。惊动了伞特，伞特开了枪，搜捕队也还了枪，我们一边打枪一边喊："交枪不杀。"包围圈缩小到伞特住址。只发现一个伞特坐在火堆旁烤火，立即将其逮捕。马上问："那两个哪去了？"他供："他俩打了一排枪后，逃往后山去了。"又问："你叫甚么名字？干甚么的？"他答："我是电台技师牛松林。"我们看他态度较好。对他进行了坦白从宽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的教育。又问："你们为甚么到现在还不睡觉？"牛答："准备半夜一点钟接东京来飞机空投的物资。五堆干柴信号摆好，就等到时候点火了。"又问："甚么时候点火？"牛答："零24时30分点。"又问："还有别的没有？"牛答："还要把示向

器打开。"当时我们看表已 24 时 15 分，叫牛松林将"示向器"打开。命第五搜捕队点燃五堆火，多加乾柴，使火势旺些。然后躲在附近大树下，待空投后搜集落下伞和物资箱。部署第一、二搜捕队去后山追捕两名逃特，追至天亮返回。第三、四搜捕队原地散开，隐蔽大树下，等候空投。临时宣布纪律：任何人不准吸烟、打电筒、鸣枪，空投后回此地集合。

11 月 4 日零点 55 分钟，听到东南方向有飞机声，3 分钟飞到我们所在地的顶空。飞机看到五堆火的暗号，在盘旋两周往低滑翔之际，七只伞挂着七大箱物资飘飘的往下落，很快都落在附近的树林里，飞机按原来方向飞去。

搜捕队员纷纷把降落伞及七大箱子搬到临时指挥部。打开箱子检查，六个箱子是特制食用罐头，只有一具箱子内装有：美间谍机关对特务们的指示信、备用电台、新密码卡片、化装服、卡宾枪、伪造人民币、酒和烧鸡等。

指挥部认为电台技师牛松林坦白彻底，在今晚空投一事方面他立了功。认定此人此台可以用。加上美间谍机关信中说："接空投后立即回电。"于是在我们监督下，告诉电台技师回电："全部物资都接到。"并请王吉仁厅长带领五名干警，将伞特组长、电台技师、电台、新密码卡片送回省公安厅转东北公安部。

11 月 5 日，王副厅长出发后的下午，三道沟群众将逃跑的那两名伞特捕获绑送公安助理处，后转交延边公安处送省公安厅。

11 月 7 日胜利的完成了这次搜捕伞特的任务，各县公安干警回本县。指挥部全体人员，将所缴获的物资，用汽车运到明月沟车站，运回吉林。第一个战役告捷。

1952 年 11 月 20 日王副厅长，东北公安部一处长张玉成，乔庄同志带几名随员，监听员，译电员及敌台技术员回到老岭北麓三道沟村。继续与美间谍机关保持电波联系，开始了第二个战役。

东北公安部，省公安厅，延边公安处三方来现场的领导同志，又重新组成指挥部。首先命伞特电台技师向东京茅茨美间谍电台

叫通：李军英已完成任务，拟于11月29日23时在三道沟南沟登机返东京汇报，希派机来接，信号三堆火成三角形∴，并有"示向器"领航向。11月25日接美间谍机关电报："按来电时间、地点、派机空取，要准备好。"

东北公安部已电告东北公安总司令部派人带四挺高射机枪，来三道沟村待命。部的意见，以接李军英诱敌机空取，准备打机擒敌。

11月29日21时，全体工作人员去三道沟南大沟、沟口堆好三角形三堆干柴。山沟两旁半山腰，架好四挺高射机枪，"示向器""空取架"设在沟口中央。留五个人在信号火堆附近有坐有站。一个人坐在已切断绳的空取架下。其余人员都隐蔽在周围的树下。21时点燃起三堆火。21时45分听到飞机声。一会儿飞机在我们顶空盘旋两周后，对准沟口伏冲空取之际，发出了信号弹，四挺机枪同时射击，飞机中弹，机头起火，撞到正面山腰上。机头与机身折为两段。埋伏在小山间附近的干警，看见机内有两人向西跑去，急忙追上去，这两人一看被包围了，举起双手，到跟前用手电一照，是两个美国军官。一个是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上尉，一个是约翰·托马斯·唐奈中尉，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京茅茨间谍训练所任教。从他俩身上搜出两支手枪，身份证明。用捕绳绑好送到村内指挥部住室设人看管。再到击落的敌机处去搜查。飞机是没有标记的美国C—47型。机头内有两个美特死尸，一名是驾驶员，一名是领航员。搜身后将尸体掩埋山坡。指挥部研究，派吕殿元带四名干警，押送两个美特回公安厅。向厅长汇报后，翌日登车送东北公安部。因美特涉及到国际问题和我揭露美帝阴谋等问题，很快又转送中央公安部。全案到此了结。

这次缴获的伞特物质，在省公安厅一处二楼办公室展览一周，省、市领导和机关干部持介绍信前来参观。

美帝空投间谍的飞机，运到北京展览。

美国务院一怒之下将当时中央情报局局长撤职。给美国情报

机关很大的打击。

当时周总理出席国际会议，也以美国往中国空投特务为例，揭露美帝侵略中国的阴谋诡计。

（吕殿元现名吕天，是军校第一期生，在校期间组织反满抗日组织“恢复会。”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江上军一团二营四连任少尉排长。1943年5月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1945年8月14日同40名军校同学组织江上军三个团起义。哈尔滨解放后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保卫部长毛诚领导下搞侦察工作。李兆麟将军被害后，他领导一个侦察小组专门对该案进行侦察，不久，该案告破。长春解放后，吕天调长春市公安局任科长“三五反”后调省公安厅政保处任副处长。后历任吉林市检察院检察长、吉林市公安局长。现离休。）

与日本交往的几点回忆

吴学文

东瀛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有着2000年的友好往来。但自甲午战争后之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中日人民间的传统友谊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日两国重建正常关系提供了可能，日本理应与新中国　和，清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责。然而，1951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召开的旧金山　和会议，竟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签订了片面对日和约。接着，日本政府又追随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和约”，敌视中国，致使中日关系处于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极不正常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在同美国、日本政府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

中日民间往来是从1952年开始的。从那时起我就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由廖承志同志领导对日工作，他对我们这些年轻同志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廖公知道我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亲切地对我说：“对日工作是长期的，你要准备干一辈子。”那时我还不到30岁，听到“一辈子”这句话感到是遥远的未来。谁想到，真的就是干了一辈子。今年我已70岁，仍在研究日本问题。在40多个春秋里，领导上和同志们对我的教导和帮助太多太多，值得回忆的也太多太多。这里只谈四件事。

两个区分的方针

1952 年 5 月，日本三位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应邀来中国访问，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同年 10 月，亚太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有广泛性的日本代表团应邀出席大会；1953 年春，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代表团来北京商谈遣返在华日侨问题；1954 年 8 月，中国政府宣布特赦在押的 417 名日本战犯。……

就这样，在中国政府的主动努力之下，中日民间往来开始了。日本各界人士怀着友好的心情前来中国。很多人为没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感到内咎，很多人表示要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也是在中国政府的主动努力下，像遣返侨民、释放战犯等本来应在缔结和约之后处理的事情都提前作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不知使多少日本人为之感动。

我在与日本交往的过程中，有时遇到问题常常与日本的侵华史联系起来，言词激烈，如日方有时不慎使用“支那”、“满洲”、“新京”等字眼时，我当即纠正应该，但有时大声批评，声色俱厉，闹得对方下不了台。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旁观两位日本客人下围棋，一位客人说：“这招棋我可以拿下华北五省了。”这位同志当即把他拿棋子的手按住，问他谈这话是什么意思，并要求他赔礼道歉；在北京，日本商品展览会广告上的日本旗，一夜之间被挖掉了；在沈阳，群众看到日本代表团在参观，便怒目而视。

中央领导同志注意到这一动向，及时进行在政策上两个区分的教育。一、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侵略中国的责任在日本政府，日本人民没有责任；二、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元凶大憝与一般官员和一般错误的人区分开。同时还要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随着历史的变迁，有的人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

政策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水平，也解除了来访的日本各界人士的疑虑。我的思想也通了，更自觉地投入工作。

从50年代中期起，中日民间往来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对日民间外交进展迅速。周恩来总理曾预言："照国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会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能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

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1954年10月，以李德全、廖承志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日本赤十字社的邀请访问日本。我是代表团的随员（当时不能以记者身份入境）。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总理说："李德全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小廖（总理一直这样称呼廖）要好好辅佐李大姐。""代表团要向日本人民说明，中日友好是中国的国策。"代表团按照周总理的细心安排，冲破美、日、蒋的种种阻挠，经由香港飞往东京。事后才知道，周总理在飞机起飞后，一直在等待代表团安全抵达东京的信息。

鉴于当时国际和日本国内的情况复杂，廖副团长决定我和纪锋同志（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负责人）作为先遣人员早两天去东京。我俩到达东京羽田机场，立即被日本记者包围，问东问西，纪锋同志都很有分寸地回答了。我当时只回答说："我又来到日本，很高兴。"回想1944年4月我同陆士同期同学张文善、王成美、韦兴炎离开东京决心去抗战区打日本时，真是心潮激荡，前途未卜。而今天，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再次踏上日本国土，心里充满着胜利感，怎能不高兴呢！

李德全、廖承志率领代表团到达羽田机场时的场面是极为动人的。机场外，欢迎代表团的日本群众如潮似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机场内，日本各界著名人士以最美好的语言热烈欢迎代表团的到来。代表团同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

平联络会以及政界、经济界、宗教界、新闻界、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说明中日友好是中国的国策，大得人心。这时我才领会到周总理说："李德全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的含义。

旅日华侨把代表团视为来自祖国的第一批亲人，欢迎之情更为热烈。代表团到达京都时，大阪、神户的华侨早已集聚在神户会场里等候代表团前来与他们会晤。日本警察当局得到情报说，台湾国民党特务要在京阪神户公路上袭击代表团，并且说："枪弹可能从右侧射来。"久经沙场的廖公那里理会这些，他微微一笑地说："我和小吴去神户。"汽车高速前进，在奔驰的颠簸中廖公竟然睡了。我坐在廖公的右侧，警惕地向车窗外了望。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访日获得巨大成功，它标志着中日民间往来已从只是日本人访问中国的单向交流发展为双向交流，意义重大。我是新中国第一个访问日本的新闻记者，有责任向中国和全世界报道这一重大新闻。但代表团随员的身份，发报只能按一般电文计价，耗资昂贵，且时效无保障，经过一番周折，得到共同社的帮助，终于拿到了新闻报道的许可证。我以"新华社东京电"发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报。

在更高层次上较量

到1961年，我已9次来往于北京、东京之间。但1962年和1964年，日本政府曾两次拒绝我入境。

1962年7月下旬，以刘宁一为首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即将去东京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日本政府突然宣布代表团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赵国强和中国记协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吴学文等三人为"不受欢迎之人"，拒发入境签证。日本当局的这一无理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总工会和中国记协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抗议。但，日本当局如此无理居心何在？中国代表团还去不去东京？大有研究的必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在拒绝我三名团员入境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此时正值美苏勾结搞"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限制别国发

展核武器，以保证他们的垄断地位，而其主要目标是限制中国。他们想使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通过决议支持这项条约，为此最好能阻止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大会。如果中国为抗议日本政府无理拒绝三名团员入境而不出席世界大会，则正中下怀。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作出决断：赵、吴等不去东京，代表团也如期出席世界大会。在世界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和日本各界人士及国际友人一道，挫败了美苏的阴谋。

1964 年 4 月，以南汉宸为首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即将应邀访问日本。我是随团记者。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全团，按名单点名。当点到我的名字时，总理说："吴学文，你不是被日本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吗？这次也去？"坐在旁边的廖承志同志说："这次是南老带去的人，不会被挡驾。"总理说："我看不见得。"果然不出总理所料，就在当天晚上，收到了日本法务省再次拒绝我入境的信息。中国方面立即对日本当局提出抗议，东京的各界朋友也行动起来要求日本法务省改变决定。在国会里，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前文部相松村谦三发表谈话，要求同意吴学文入境。法务大臣贺屋兴宣则说，如果一定要吴学文入境，他就辞职。稍见缓和的中日关系也紧张了。中国代表团也曾考虑是否取消这次出访，给日本当局以有力还击。为此写报告请示中央领导同志。

周总理指示说，代表团如不访日，你们就上当了。你们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考虑问题。吴学文这次不去了，南汉宸同志应按时访日。

总理的指示是英明的。当时，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存在着以石桥、松村为代表的主张日中友好派和以岸信介、贺屋为代表的反华派。贺屋等想用拒绝吴学文入境来阻止南老率领的代表团访日，达到破坏日中往来的目的。南老率团如期访日是对主张日中友好一派的支持，也扩大中国的影响。事实证明，南汉宸一行在日本的民间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功。就在南汉宸率团到达日本不久，松村谦三也率团访华，他同周总理、廖承志就进一步发

展日中交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日互派民间代表机构和交换新闻记者，从而使中日关系上了一个台阶，从民间往来发展成半官方关系。

中日关系的飞跃

中日关系之所以不能正常化，关键在于台湾问题。只有日本放弃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废除日蒋“和约”，中日关系才能正常化。

经过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民间外交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广泛社会阶层反对敌视中国、反对搞“两个中国”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对日本政府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

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也对日本执政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69 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从对苏战略考虑，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一项重要政策。1972 年 2 月的尼克松访华，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标志。这使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它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在这种形势下，有政治远见并勇于行动的田中角荣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确地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当时是新华社国际部编辑，负责编写田中组阁的新闻。初稿写得极为简单，送周总理审阅时被退了回来。总理批评编辑没有跟上形势，未能把田中讲话的积极而重要的内容写进新闻。经过学习总理指示，重新写了一条内容丰富的田中组阁新闻，引述了田中首相说日本“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大平外相说：“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应该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作出决定，”“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当日中完全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日台条约“仍然存在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重新编写的新闻送审后，周总理很快就批发了。但在即将发稿时，总理又让他的秘书打来电话，指示要在新闻中加上在野党

的反应。因为日本在野党为日中复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是有功的。

田中和大平的讲话表明，日本政府已同意了周总理提出的有关中日复交的三原则。因此，在新华社1972年7月18日发表田中内阁组成新闻后，周总理便在9日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特意提到日中关系。他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总理的这番话，在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7月18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对在野党议员提问的书面答复文件。文件说："为了谋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间开始进行负责的会谈，是当务之急。作为政府来说，认识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所谓关于邦交正常化的原则，（日本）政府作为基本认识是能够充分理解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以此为前提，参加政府间谈判。"

周总理亲自抓田中组阁新闻，抓的不是一篇稿件，而是抓住了中日复交的时机。这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经过中日双方会谈，于2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为庆祝中日复交，中国政府派出以廖承志为首的大型代表团访日。我作为代表团记者组的负责人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田中首相在同廖团长会晤后，和我照像留念，并连声说欢迎、欢迎。

（作者为军校二期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我的坎坷经历与归宿

——吕恩鸿

1945年8月末，军校解体，我回到家乡安东（现名丹东）。在家乡，走访了几家亲属之后，想到母校安东二高看看。在去母校的路上，遇到了原军校九连的李彦文（他是安东三高毕业的）。谈起军校，谈到前途。我们都盼望在东北回归祖国以后，能有机会继续读完军校。于是约定同去长春探听一下有无国防部接收军校的消息。到了母校以后，巧遇我的好友、原军校七连五区队的吴桂德。他也想去长春。于是我俩找到李彦文，于9月28日在凤城火车站会齐，一同乘车到了长春。这时已经是1945年10月了。

听说长春烟草公司已由原军校的几位教授接管了。为了生活我们造访几位接管烟草公司的教授，向他们说明情况，希望能在烟草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他们慨然应允，我们顺利地解决了生活问题。

在长春见到不少同学。其中有原军校七连五区队的郁春宣，安东二高同班同学、九连的高丕涵、张鹏飞等。大家聚到一起，谈论的就是前途问题。有人谈到，我们可以参加进驻长春的第四总队。不知什么原因，参加四总队必须先参加佛教协会。于是有一天我们到了四马路佛教协会，拜见了会长耿金宽。并参加了佛

教协会。耿把我们七八个人介绍给四总队的关团长。报到时，发现四总队的一些军官都是军校同学。他们对我们说，你们按预科毕业生待遇，在部队里见习一段时间再说。接着给我们发了衣服和被服。让我们当了上等兵。呆了没有几天，同学们感到这不是一条出路，于是又相继离去。此前，我和吴桂德参加1945年11月前后由军校一位姓于的五期生在长春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会，听了几次课，成员都是军校同学，本身也拥有一些枪枝。后来，在国民党势力占了优势的时候，这个研究会决定撤到解放区去。当时由于我和吴桂德在烟草公司有工作，而未跟去。

1946年4月，国民党在营口骗诱一些东北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军，在二0七师编制下成立了独立团。第一营全是原军官学校的学生，第二营是伪满各大学的学生，第三营是伪满国高的学生。第一营除营长和各连连长外，班排长都由军校同学自己担任。李彦文同学先去了营口参加了青年军。1946年7月，青年军独立团从营口开进了长春，驻在长春机场。李彦文到烟草公司看我们，谈起了青年军的情况。他说二0七师师长罗又伦答应将来把军校学生保送到黄埔军校。我和李彦文，吴桂德三人来长春的目的，就是要探听有无军校复校的消息。既然罗又伦能保送我们去黄埔军校，倒是一个机会。于是，我于7月15日也参加了青年军。当时一营的编制已满，正好有一个姓王的同学离队到“长官部”当官去了。留下一个空缺，我顶了上去。事隔不久，独立团宣布解散。原因是独立团的士兵都是受压榨十四年的“亡国奴”望眼欲穿地盼到了东北光复。看到接收大员们胡做非为，大失所望。就凭借一个军人的身份，到处打抱不平，特别是军校同学，义无反顾地公开与为非做歹的大员们、军官们做对。弄得大员们心绪不宁，坐卧不安。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军校七期的“楞小子”袁永海，对他们连长赵大同的行为看不惯。一天他进到连长室，操起连长挂在墙上的冲锋枪，硬是把连长教训了一顿。当时连长只好听训，事后，迫于军校同学的势力，也只好忍

气吞声。由于这一切因素，接收大员和为非做歹的军官们为保全他们的利益，决定解散独立团。

独立团解散时，宣布一条：军校同学愿意留下的可转送西安（今辽源）二0七师干训班受训半年后分配到正规军内任官。由于我有家回不去，烟草公司的工作已经辞掉，生活无出路，只好去干训班。同去干训班的约有150多名，大部份是六期和七期的，也有五期的。8月12日到辽源。到干训班受训的除军校的同学外，还有青年军六一九团，六二0团，六二一团抽调来的班长。我被编在二连三区队七分队。干训班成立时，内战在东北日趋激烈，高年级的同学陆续被调到二0七师及其附属的青二师任官去了。我们分队第一二任分队长先后被调走，我接任第三任分队长。李彦文同学也被调任青二师搜索营当排长去了。据说后来在八路军攻辽源时，师长下令要他负责烧毁辽源外围的民房。他抗拒命令而被逮捕。当时看守他的是军校的同学，同学们劝他逃跑。他怕连累同学而未逃，后被师长下令枪决。他的死，保存了民房，保全了同学们的安全，可谓是为革命做出贡献，是军校同学的光荣。

在内战激烈进行的时候，军校同学开始在议论：我们从军，想堂堂正正地当一名中国国防军的军官，在战场上甘洒热血，而现在是国共两党打内战，打的是自己的同胞。我们为什么要为国民党卖命!？于是在干训班的同学，开始有开小差的。“楞小子”袁永海第一个跑了。在干训班后期的一天，原军校一位五期同学专程从长春来到干训班，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明确通知：罗又伦说保送同学们去黄埔军校纯系骗局，同学们要死了这条心，重定前程。还说，目前，由于军校同学，团结奋斗，据理争取，教育部已同意，在沈阳复校的东北大学和在长春新成立的长春大学，接受军官学校和军医学校的同学入学。望同学慎重考虑！听到这位同学的通报以后，同学都在打自己的主意。就在这个时候，留在长春的好友吴桂德给我拍来一封电报：“母病重速归”

(我母亲早已去世)。意思是让我快去长春参加长大的入学甄审考试。我拿着电报到队部请了假,到长春参加了长大第四次甄审考试。我中学是学化工的,本想报化工系,但名额已满,只好报理学院化学系。甄审考试完后,我又立即赶回辽源(心中无底,不知能否录取)。正赶上干训班结业,在等待分配的时间里,长春来信说我已经被录取,我心中有了底,准备利用赴任的机会开小差。不几天,分配名单公布了,我被分配到二0七师四团(驻地就在辽源)。我到大队部领补助费时,大队长对我说:你的地方近,早一点去报到。领完钱以后,准备好通行证,与到外地赴任的同学一道,扛上行李,奔赴火车站。到四平换车时,用假通行证混过了宪兵的检查,顺利地到了长春。没几天听说二0七师已发现大批军校同学利用赴任机会开了小差,正在搜查。为防万一,我改名为吕震寰参加了长大最后一次甄审。工学院已满额理学院不能再报,只好报考有数理化的农学院森林系,又被录取。读完了一年级,在1947年7月和中学同班同学,军校六期生一道,从农学院森林系转到了工学院化工系。

在长春大学学习期间,第一年级还比较正常,第二年级就比较松懈,进入三年级后根本就不上课。1947年5月23日八路军第一次围困长春。第二次围困长春,是1948年好象也是5月。在长大校园内国共两党斗争是激烈的,在各种大会上,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各述已见,相当激烈。军校有两个同学,在大会辩论时表现是突出的,一是七期的康洗旭,一是七期的黄振忠(工作后改名为丁中),其实两个人当时都是无党派人士。在长大军校同学偏左激进的比较多,在我们寝室里经常发现有关宣传材料。一天清晨,国民党军警包围了长大,进宿舍搜查的是警察,他们逐室搜查,当查到我们寝室时,进屋的警察发现我们室内同学们脱下的衣服有不少是原军校的军服。那位警察问道:“你们这屋住的是军校同学吗?”答曰:“全都是军校同学。”这位警察二话没说,马上退了出去。事后得知参预搜查的警察中,有不少是军校

的同学。

1948年以后，内战更加激烈，在军校同学间南下或北上，是中心的议题。参加革命就北上，继续念书就南下。我的好友吴桂德就是1948年春夏之交时南下沈阳的。后来长春局势紧张，飞机落不下，长大决定南迁，也无法运走学生，只好宣布，愿意南迁的，自行去沈阳。我和张鹏飞（七期九连的）、孙世圣（军校六期的，后改名孙华）一道，于1948年7月31日走出长春。通过两军对峙的真空地带，进入解放区。8月上旬到达沈阳。在迁走的东北大学里住了一段时间。在沈阳的长大学生，于10月上旬，乘军用运输机到达天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2月25日东北局把到关内去的东北各大专院校学生接回东北。经过半年左右的政治学习，通过甄审考试，根据不同专业又分别编入在东北成立的各大专院校继续学习。我是工学院化工系的，被编入新成立的沈阳工学院化工系三年级学习。1950年，沈阳工学院改为东北工学院；1951年，我于东北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矿务局设计处工作。1952年设计处化工专业撤销，我被分配到西制油厂（现抚顺石油一厂）工作，担当过原油车间专责技术员。当时我们车间的人造原油产量是全国原油产量的50%，因此受到特别重视。我到这个车间以后，在留用日本人北胁金治的指导下，改进工艺技术操作，使原油生产产量翻番。由于我在技改中，做出一些成绩，遂被任命为车间专责技术员。1955年调离车间，搞研究工作，超前东德完成了粉末页岩压锭干馏试验工作。此项任务，当时燃料部一方面下达任务给工厂，一方面又委托东德进行。当东德来交试验室的结果时，我们早已完成了工业化生产试验，东德人不得不佩服地说："你们两年多的工作超过了我们107年的水平。"在石油厂我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厂先进生产者。

1958年9月，我被调到北京石油部工作。主管全国人造石油生产。在大庆油田问世以后，人造石油停止了发展。1963～

1965 年我被任命为新建的大炼厂的新装置开工工作组长。先后被石油部机关评为先进生产者。

1970 年，从干校出来调天津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任技术负责人。

1971 年，石油部根据国务院指示帮助广东拟用油母页岩解决广州市的民用燃料问题，将我从天津换回，主持油母页岩气化试验。

1972 年，燃化部根据李先念副总理指示，解决当时大化肥厂的原料改造。当时燃化部化肥厂共组织了三个攻关组。我担任广州氮肥厂组组长，首先完成了攻关任务。以后主持试制了全国第一台大型成型机，一次成功。

1975～1977 年，我提出的技术方案，被上海市工交办采纳，并由我主持完成了粉煤无粘结剂成型炼焦工业化试验。此技术属我国首创，被上海科技大会授予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8 年，燃化部组织地区规划时，我担任中南地区工作团的顾问，并具体负责整顿好湖南衡南氮肥厂和广东高鹤岭肥厂两个大庆式企业。

1979 年开始，给原石油部副部长刘放当技术助手，开始搞农村能源工作。到 1984 年初和几位老部长、司局长和老专家一道共同组建了中国能源利用技术开发咨询中心。开始担任秘书长、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86 年开始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工作到现在。1990 年 1 月，能源部批准并承担煤炭液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由于我对周易有一点研究，1990 年 9 月被陕西周易研究会聘为名誉理事长。

1990 年 6 月，被陇海兰新国际科技交流协会聘为名誉会长。陇海兰新铁路已在新疆阿拉山口与苏联接轨，形成了第二条欧亚大陆桥。陇海兰新经济带很有发展前途。

（作者现名吕振寰，军校七期生。中国能源利用技术开发咨询中心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传印法师

徐光军

传印法师原名吕毓岱，辽宁人，1927 年生。1945 年东北光复前曾就学于长春伪满军校，是六期生。他学品兼优，性格开朗坦诚，为人谦恭，常以助人为乐，怀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是同期学生中之佼佼者。他曾任七期生指导生，给下期生以良好教育和积极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

东北光复，军校解体。许多军校青年，积极寻求报国之门。但国民党挑起内战，内战风云骤起。面对政治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一位刚刚欢呼过抗战胜利的青年思想上陷入了极端痛苦和迷惑之中；火热的爱国之心也蒙受到激烈的震撼与冲击。慷慨悲歌之余，法师悟澈人生，“皈依佛门”就成为他最终选择的人生之路了。他切实凭借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救群众于苦难，建乐土于神洲，为宏扬佛法而献身。

他之所以选择出家为僧这条路，决非出于偶然决定，而是缘于自幼受到的家庭影响。他在小学时代，慈母已吃斋信佛多年，稍后姐姐也信仰了佛教。家中常年供有佛堂，每值初一，十五都要上供、拜佛、念经，平常每天也要朝晚焚香、膜拜。加之还有和尚、法师常来讲经等佛事活动，这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打上烙印。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文化水平提高，对佛教学说的

钻研和信仰逐渐深化。1947 年回到家乡时，母亲和姐姐便领他去拜谒法师，秉受"三皈"，成了正式佛教徒。从那时起，便按佛教要求开始布衣素食，剃落长发，人虽尚未出家，其心已坚如铁石般地奉献给佛门圣业了。

1954 年正式出家，拜江西省云居山真如寺当代高僧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为师。1956 年又被选任老和尚的随身侍者达六年之久。加之他晨钟暮鼓，锲而不舍的虔心修持，因而对博大精深的佛教经、律、论三藏学说，有了很深的理解和造诣。

1960 年，由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和人民政府宗教处推荐，他来到北京中国佛学院（校址在法源寺）学习五年。1965 年秋，以优秀的成绩从该院毕业，重新回到江西云居山真如寺。1966 年夏他所在的地区"文革"一开始，全体僧人便被赶出寺庙，放逐到云居山下各国营垦殖农场强迫劳动。他被分配到城山去种菜，前后达九年之久。在此期间，虽然遭到了种种磨难，但因他信仰坚定，毫不动摇。在这一非常时期中，他曾往庐山、安徽九华山、浙江天台山等地搜集劫后幸存的佛经数百卷，白天劳动，一到夜间便坐于油灯下阅笔记，诵佛经，坐禅从未间断。并常以诗抒情。

1975 年，由城山转到与之毗连的梅棠人民公社祥林大队排头生产队，为队里管山林竹园。此处名曰旸岭山，原有明代所建佛寺在"文革"中被毁，在其废墟上，以残砖旧石砌成三间茅草屋，与一位同参禅友共居于此。早晚礼诵修证，功业益坚。更因此处远离人烟，朝晚颇为幽寂，又无俗人干扰，故修行功夫大进。

1976 年，他所管的山林竹园，遍山长满了毛竹，而大队在山上种植的玉米也获大丰收。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国家得到了拯救，而宗教界也随之获得了重新解放。

1979 年秋，应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邀请，他离开旸岭山去国清寺居住。未几，由北京国务院宗教管理局发来公函，调他入京

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他虽再三推辞，终因工作需要，便在这一年的12月到京报到。其任务是奉“佛协”派遣，代表该会，直接参与组织、筹划将在1981年进行的几项重要国际性法会的具体活动。

1981年是中国佛教协会展开佛教国际性法务活动的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要办好三件大事：

其一，东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鉴真大师像，由奈良招提寺渡海回国到他的家乡江苏扬州大明寺“探亲”，并迎接到北京供奉；其二，西安香积寺善导大师（初唐高僧，被日本净土宗尊为高祖）崇灵塔修复大殿佛光，祖师善导像开光法会。届时日本净土宗僧侣将有百余人参加；其三，浙江鄞县天童寺举行日本道元禅师（相当于中国宋朝时人）得法纪念碑揭幕法会。道元是日本禅宗之曹洞宗（五派之一）的祖师。日本曹洞宗徒以贯主（法主）为首共百多人届时将来参加。

在这些活动中，法师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渊博的佛学修养，以及在外事活动中的民族气节和多方面的国际交往能力。

1981年，经日本佛教大学与中国佛教协会协商，选派他赴日进修、讲学和学术交流。于是他东渡日本，直到1984年春才重归祖国。在日本进修期间，因为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位应邀赴日的中国僧人，他的举止和活动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由于他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在学习上能潜心修行，勤于钻研，故道功与学识都有很大提高，终以优异成绩完成了进修。1984年，有4名中国佛学院的学生派往日本佛教大学学习。原定4年，后奉命提前一年回国。他们的毕业论文是在回国补课后用日文书写的。这些论文是佛教大学授权委托法师个人给予评定的。可见日方对他的信赖和敬重。在日学习时间，他遍访日本佛教重地，广泛结识日本佛教界高僧大德以及一般群众，增加了相互了解。归国前夕，作为毕业旅行，在日本佛教大学的组织下他曾到印度、尼泊

尔等国访问了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禅友间的联系。

1984 年春回国后，奉中国佛教协会的调派，任北京中国佛学院教务长。到 1987 年，因其办学有方、业绩突出，被升任该院副院长。直至今日。

北京中国佛学院是我国佛教界汉语系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故又称高级佛学院，学制四年。其下面有由各省市“佛协”主办的中级佛学院约 10 余所(学制二年)，以及由各地著名学院自行主办的初级佛学院，组成了我国培养佛教人才的完整教育体系，而北京佛学院是这一体系中的最高层次。

领导这样一所高等宗教学校，不仅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也有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自 1984 年他任该院教务长，特别是自 1987 年任学院副院长以来，因院长赵朴初先生事务繁忙，无力抽出很多时间来规划、指导学院的具体工作，所以学院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主持的。

佛教学说，渊博而高深，这方面的教师极为缺乏。但为了完成教学计划，他除了要负责处理全院教务行政诸多事宜外，还亲自担任教学任务，有时竟一人同时兼任三门课程。加之所授课程又多无现成教材，讲义得自编、自刻、自印，工作实属繁忙，每当夜幕降临别人已经休息的时候，他总是独坐灯下深研佛学、编写讲义、批改作业，以及处理其它院内事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暑，长期如此。面对此情此景，院内广大僧俗师生员工，无不为其崇高精神所感动。

北京中国佛学院，今天已成为远近知名的一所佛教高等学府。它为国家和佛教界培养出一批批合格的高级人才，这些成绩的取得，有法师心血的凝结。

（作者为军校六期生。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副教授，为传印法师方外挚友）

走向光明　建功立业

刘汉中

伪满军官学校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长春设置的意在培植其势力的一所军事学校。学校招收日人，韩人训练的同时，亦招考众多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由于抗日爱国思想的影响，由于强烈的民族自尊，这些青年，绝大多数，虽在日本军国主义严加统治之下，但反满抗日的意识与日俱增，爱祖国，反奴役的精神没有泯灭。早在军校学习时期，各种反满抗日活动没有间断，这些活动奠定了绝大多数青年们走向革命的基础。

光复以后，军校的大多数中国师生，很快汇集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的旗帜下，在解放事业中建功立业。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革命的军校师生，又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流之中。

日月荏苒，50 年过去了。在霜染黑发的时候，在安度晚年的时候，原伪满军校的师生有了更多的联系，1993 年在长春召开了原军校师生联谊会，目的是加强联系，为长春的现代化建设尽心尽力。

在加强联系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了解到原军校师生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共 700 余人，还了解到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的卓越成就。

从日伪统治下反叛出来是一个飞跃；由接受军事教育转向学术领域是再一次飞跃。就我们所知，在下面介绍几位在科教文战线有突出贡献的同志，以点滴的记录展现数百名同志建功立业的成就。

朱　寰（原名朱敬文）　伪满军校六期生。中共党员。1947年在长春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后就读于东北大学（后改为东北师大）历史系。

毕业后，留校执教。几十年来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1978年被评为副教授，一年后晋级为教授，并担任硕士生导师。1983年任东北师大历史系主任。同年被任命为国家教委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评审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历史学科组评审委员。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担任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兼职有中国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研究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编委、欧洲史副主编；吉林大学、湘潭大学、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兼职教授。

他多年来潜心于历史学的探究，主要著述有：受党中央宣传部和国家高等教育部委托主编的中国第一套普通高等学校教材《世界通史·中古部分》，此书印刷80多万部，70年代被排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阅。1979年，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重新排版印行，销售于世界许多地区。这部书1988年获国家教委首届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主编的《世界中古史》（1981年出版、1986年修订再版）获光明杯全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二等奖。全国电视大学教材《世界上中古史》1992年获国家教委第二届优秀教材二等奖。主编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他为全国高校编制的中外历史系列幻灯片，1990年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优秀音像教材三等奖。上述著作和其它一些著作共约200多万字。另外，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

论文 40 余篇，约 50 多万字。

他于 1988 年应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世纪史研究所邀请，去美国卡拉马祖参加国际第 23 届年会。1990 年应日本东方学会邀请参加日本东方学第 40 届年会。并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讲学。先后共培养硕士生 34 名，博士生 10 名（已毕业 5 名），其中一名博士副教授已取得“特殊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留学。

朱寰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教授，是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王健群（原名王起先） 是伪满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1947 年在长春大学并读书时和朱寰、郭锋一起参加了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学运小组一新文化行动同盟的活动。1948 年春到解放区，先后在长春学院、东北大学学习，毕业后，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回长春后从事考古工作。曾任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吉林省考古学会副会长，东北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吉林省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纂，四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在国际上是三个史学会执行委员兼评议员。

四十年来长期奔走在考古工作第一线上。常到山野各处进行发掘。著有《好太王碑研究》、《二十四史提要》、《库伦辽代壁画发掘报告》、《三、四世纪的东亚和日本》、《环日本海文化》、《好太王碑和高句丽遗迹》等 10 部专著和 70 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好太王碑研究》被译成日文、朝鲜文，在日本、韩国出版发行。《好太王碑研究》、《好太王碑和高句丽遗迹》和其它很多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好太王碑是义勾师王朝遗留下来的一座大型墓碑，距今已近 1600 年，因为碑文中涉及中、日、朝三国关系，百多年来国际学术界聚讼不已，特别是关于高句丽王国的归属问题和历史上的领土问题，更是各执己见。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他多次进行实地调查，逐字逐句地核实文字，获取了大

量的第一手材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碑文中各项记述和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公允的结论，终于解决了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争论。《二十四史提要》是他在通读《二十四史》基础上，对各朝正史做出的概括的叙述和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二十四史》共3239卷，卷帙浩繁，他摆脱冗务通读全书，写出这本专著，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库伦辽代壁画发掘报告》是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编有英日文提要，供国外学术界参考。此外《三、四世纪的东亚和日本》都是用日文发表的，受到东亚各国学者所赞许。《吉林风物志·历史沿革》对吉林省几千年的历史做了概括归纳和记述，发凡起例，对后来者的研究有所裨益。

1985年至今，在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参加十余次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在日本参加东亚史国际学术会议，日本《读卖新闻》在专拦即当今新闻人物专栏中刊登他的大幅照片和事迹。能刊人该报专栏者，多为日本实业界人物。自明治维新以来学术界人物获此殊荣者不过20余人，刊登他这样的外国人则是首次。1987年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及1989年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延世大学讲学，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都曾受到很高的礼遇。多年来，他受到过多次奖励，曾评为吉林省宣传战线标兵、文物战线标兵、省劳动模范等，并获一等功，吉林省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文化部金质奖章，事迹列人吉林省英才馆。并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朱绍禹　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1949年12月由东北大学文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和从事语文教育研究工作。

1983年国家批准他为硕士生导师，第一批获得语文教学法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为国家培养了第一名以语文教学法为专业方向的教育科硕士，前后共培养6批，14名硕士生。

朱绍禹同志担任的主要社会学术职务有：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曾任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理事长11年，现任该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十年来，他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了全方位、多元的探索，除参加国内的许多语文教育学术活动和两次赴香港参加中文教育研讨活动外，还经国家教委批准，于1986年至1990年在东北师大举办了三期全国语文教学法学科讲师级研讨班。

朱绍禹自1955年至今，在国内的语文教育期刊、高校学报和语文教育论文集中，陆续发表了学术性论文约百篇。主要著作有《中学语文教育概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语文教育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主编的有：《语文教育辞典》(延边人民出版社，1989年)、《美日苏语文教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中学《语文》课本（东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等。此外，作为主要执笔者和统稿人，还参编了《语文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由他主编的《国际中小学母语教育比较研究》一书也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朱绍禹同志注重基础理论和相关科学的研究，对教育哲学、语言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思维学等学科，都有所涉猎。1980年以来，应诸多同行和友人之约，先后为他们的计90余部专著撰写了序言。近经整理，结集为《语文教育序文集》，已交出版社预定出版。

朱绍禹同志离休后仍坚持读书和写作。1992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吴乃恭（原名吴永开）　伪满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于1948年在长春大学读书期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51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3年和1956年～1958年先后两次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进修哲学和中国哲学史。

1979 年任副教授，1985 年晋升为教授。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大陆东北咨询中心学术顾问、吉林省中国哲学史理事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吴乃恭长期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主要专著有《儒家思想研究》被评为吉林省图书发行学术著作一等奖。还有《宋明理学》。他是《中国哲学史稿》一书的主要编写人，该书被美国北卡罗莱拉州大学译成英文。参加注释《韩非子选注》和编著《哲学辞典》中的《中国哲学史》辞条工作。并在有关刊物和学术论文集上发表论文 24 篇。

曾四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朱熹理学范畴》论文；在《孔子诞辰 254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略论孔子人学》论文；在《纪念朱熹诞辰 86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评朱熹理学的社会作用》论文，在《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儒家思想与现代精神文明》论文。

卫　中（原名卫新起）　伪满军校二期生。50 年代末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南京市小学任体育教员。

60 年代初到南京市雨花路小学任体育教员，到校后就把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在全校开展起来。由他组训的女生乒乓球队，荣获全国比赛第六名，队员和卫中受到周总理的接见。由他组训的卫岗小学的小“八·一”足球队驰名全国。70 年代下放农村时，他把淮阴县城初中女生排球队训练成淮阴地区的冠军。1978 年回城后，他任教的南京正学路小学女排是南京第一名。

1980 年离休，不久被南京市小西湖小学聘请，担任女生篮球队校外辅导员，在 12 个年头里，学生一届又一届，但是以他为主组训的篮球队，先后 9 次荣获市的冠军、省的冠军和亚军、1 次全国第 5 名。80 年代曾两次战胜访华的日本国爱知县小女

篮。学校被评为女篮传统学校。卫中同志的成绩在许多报纸、体育刊物上多有报道，《南京日报》在1989年8月9日以“常胜教练”的标题报道了他的成绩。

卫中同志热心祖国的体育事业，抓训练坚持不懈。他编制了一套球类游戏训练项目，把专项基本技术训练与身体素质训练结合起来，寓对抗性于游戏之中。他训练的运动员学习成绩也好，小西湖小学女篮1993年毕业的8名队员，期中考试语文分高出年级平均分2.4分，算术高出7.7分。由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重点中学、体育院校、南京部队输送了合格的学生和运动员。

近年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分别以《年逾花甲不服老》、《古稀教练重晚情》的标题报道了卫中离休后12个春秋，为体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程国庆　伪满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50年代讲授《人体解剖学》，1965年开始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修研究两年。程国庆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探索人体在体育运动过程中的力学问题，特别是运动员在创造成绩时如何发挥力的作用。国家教委对这项研究成果极为重视，决定在高等学校体育课中增设人体生物运动力学内容的教学。程国庆同志著述的第一部高等学校教材《人体生物运动力学》出版后，由国家教委召集全国高等学校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来东北师范大学进修，由程国庆同志负责主持并担任主讲。

这部教材填补了体育课的一项空白，是程国庆同志多年来研究的结晶。这部著作获得1988年首届高校教材一等奖。1978年程国庆同志被提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共培养十多名硕士研究生。

程国庆于1994年2月7日因病逝世。

丁　中(原名黄仕忠)　伪满军校七期生。民主同盟成员。1947 年在长春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8 年长春解放后，立即投入了化学工业的教学、科研和工程建设工作。曾任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代总工程师、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院民盟主任。

主要科研成果之一:用两种工艺分别研制成功重交沥青。已用于沈大、京津塘高速公路及京、津、沈和辽、吉、黑、冀、晋、鲁、豫等省市的高等级公路上，获得了国家及省、部级一等科技进步奖。成果之二：研究成功丙醇尿素脱蜡工艺，获国家科学大会奖。成果之三：研究成功合成橡胶防老剂新工艺，获国家发明奖。从事这三个项目生产的工厂均已获上亿元效益。

此外，尚获国防科工委及部、省级科研及专利奖十余项。曾在国外学术会议上四次发表论文。曾担任《中国页岩油工业》和《中国消防辞典》编委。早年从事人造石油，参加石油一、二、三厂的恢复与开发，主持茂名人造油的开发研究。60 年代开始从事液蜡、石蜡、地蜡及特种蜡的研究与开发。研究成功炼油“五朵金花”之一——尿素脱蜡。开发成功三相沸腾床工艺，近来从事精细化工产品开发。

丁中同志的贡献卓著，他的名字与主要成就被载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

程希翱　伪满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1951 年由东北工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选矿工艺矿物学研究工作。现任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兼任西安冶金建筑学校教授、硕士生导师。被选为湖南省六、七、八届省人大常委，九三学社湖南省科委主任，湖南省地质学会理事，中国金属学会选矿学会工艺矿物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矿冶工程》编委，《工艺矿物》副主编、《中国冶金百科全书》选矿卷编委，《工艺矿物学手册》副主编。

程希翱同志在选矿工艺矿物学研究方面对全国各大中型矿

山选矿厂的矿石物质组成及工艺矿物研究，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及科技进步奖计11项（其中含一、二、三、四等奖）。在技术方面，为研究内容与方法，技术操作与运行和建立实验室等方面提供了整套参数和数据。在学科方面，1979年在选矿学科领域内首先创立"工艺矿物学"，程希翱同志是这一新的边缘学科的奠基人。1980年以来先后发表这方面的论文50余篇。1984年编著《工艺矿物学概论》，1988年编著《选矿工艺矿物学》，并主编《选矿手册·工艺矿物学》。1982～1989年培养硕士研究生四人。1985年赴日本考察现代测试技术并进行学术交流。参加和主持"87提取冶金与材料科学"、"92首届现代化工艺矿物学和矿物工程学"国际会议。

程希翱同志为工艺矿物学的创立和发展，为提高冶金矿山选矿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王泽汶　　伪满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1948年在长春大学理学院地质系读书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同年9月入东北大学。1949年8月毕业后留校任地质系助教。1953年调东北地质局任技术员，1955年调西北地质局后就一直在青海从事地质调查、找矿、科研等工作。先后任队、局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局长、局技术顾问等。1985年离休。

在青海工作30年，他先后于1956年带领三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在锡铁山外围普查时找到一处中型铝锌矿床。60年代他从事区域地质调查。为了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他撰写了题为《正确处理区调工作中几个关系》的论文发表于《中国地质》1966年3月增刊号。70年代他编写了《1：100万玉树幅（约25万平方公里范围）矿产报告》一部（约30万字）；还编制了《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图集》青海省部分（内部版）。80年代为总结青海区域地质调查成果，以板块观点分析青藏高原形成机理撰写了《青藏高原北部的构造轮廓及其有关大地构造问题》一文，

获青海省科协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并以此论点在“国际喜马拉雅地质学院学术讨论会”及地质矿产部“青藏高原第二次地质科学讨论会”上进行大会发言。先后多次主审过青藏高原地质科研专著。曾担任青海省地质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青海省科协科技咨询中心理事。1992 年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刘浚哲　（原名刘雨生）伪满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1951 年东北工学院毕业后即投入新中国的冶金工业建设。1982 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86 年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吉林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还兼任中国金属学会理事、吉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吉林省金属学会理事长，吉林省能源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刘浚哲同志从事冶金工业建设 40 余年，在鞍山钢铁公司设计院期间担任设计总负责人，完成了鞍钢年产 500 万吨钢的总体配套设计。1965～1966 年担任设计总负责人完成贵州省水城钢铁厂（年产铁 50 万吨）设计工作。1970 年调来吉林省工作后，参加主持完成了通化钢铁公司“四五”、“六五”、“七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设计和施工建设工作。使通钢由亏损大户转变为省内的盈利大户，1992 年年利税总额达 2.6 亿元，1993 年超 6 亿元。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跨入先进行列。刘浚哲同志将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写成的论文发表于《吉林冶金》、《吉林经济计划》等杂志上，《对吉林省钢铁工业发展战略的探讨》一文，被中国金属学会评为 1990～1991 年度优秀论文。

王士君　伪满军校七期生。中共党员。1951 年毕业于东北农学院森林系。曾任长春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北方绿化中心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吉林省林业高级技术职称评委。退休后应聘主编《长春市志·林业志》。

王士君同志从50年代初开始，在净月潭林场工作，通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将林场建设成为经营水平高，生产经验丰富，科技成果多，有示范作用，知名于省内外的实验林场。经中央绿化委员会批准，在这里成立了北方绿化中心，现又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由王士君同志完成并应用于生产的20多项科技成果中，主要的有樟子松引种造林，已推广于全国12个省（区）并获国家科技成果推广奖。合作完成的“松毛虫赤眼蜂利用的研究”成果，推广于北方9个省（区），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主持完成的“天然次生林立体经营研究”，经鉴定确认具备省内领先水平。由他指导完成的“绿化用草坪的开发研究”获吉林省科技成果进步三等奖，长春市科技成果进步二等奖。其他尚有5项，获省、市奖。

做为编委的主要成员编写《吉林森林》（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的著作有《东北的林业》（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还有《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主持编译《伪满时期东北林业史料译编》，由吉林市林业局内部发行。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的研究报告、论文、译文计9篇。王士君同志先后10次被评为省、市政府、学术团体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其事迹曾在长春市、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并被收录于《中国林业专家大辞典》。1993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忆爱新觉罗·溥杰师

李天成

溥杰师在1994年2月28日于北京溘然长逝了，他生于1907年4月16日，享年87岁。在溥老漫长的一生中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这三座城市曾经是他活动过的重要舞台。北京自不待言，他出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青年，经历了严峻的人生风暴之后，后半生又回到北京。最后，在那里辞别了人世。日本东京是他所受的教育中，最主要的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最后的学校——日本陆军大学的所在地，也是他的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妻子嵯峨浩家的所居地，对溥老一生的影响也是至关重大的。长春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溥老的兄长溥仪，先是以执政，接着以皇帝的名份，前后在这里当了14年的傀儡元首。溥老以御弟的身份，除了在日本就读和短暂的在沈阳、日本工作之外，都是在长春度过的。其中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执教于伪满时期新京陆军军官学校。

在长春、溥老在他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因为在政治抉择上跟从了哥哥溥仪，而蒙上了耻辱的灰尘。也是在长春，他亲眼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震醒了他政治上的黄粱梦。命运对于他是一个急转弯，由皇室贵胄变成了苏联军队的战俘，继而成为人民中国的阶下囚。因此，长春，对溥老的一生有特殊的意义。

经过深刻的人生反省之后，溥老找到了新的人生起点，他以赎罪的心情，与新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新中国改天换地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后半世余生，博得作人的尊严，受到人民的尊重。溥老对他一生中这一带有关键性的戏剧性的变化，感铭至

深。他在1989年写的一首诗中道：

概得一生辉重笔，借题惩毖鉴前车；
抚衷回首沧桑易，伏枥黄粱梦觉时。
口碑市巷争先睹，不胫欣传贵洛阳；
革命洗心何等事，古今中外莫寻常。

这首诗虽然是溥老在读过《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后写的感受。但是诗、词、歌最容易揉进去作者本人身世之慨。而且溥老与溥仪的政治遭遇又是那么雷同，像“抚衷回首沧桑易，伏枥黄粱梦觉时。”“革命洗心何等事，古今中外莫寻常。”除了是感叹溥仪的一生，弦外余音，不也是溥老自己的身世之咏吗？

溥老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预科一连为三期生担任连长的时候是1941年和1942年。在1941年年末，在伪满洲国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日本人12月30日在东北全境展开的政治大搜捕，就是以后在历史上被称作的“一二・三0”事件。军校当时学生中反满抗日思想高涨，有几个抗日秘密小组在活跃。在“一二・三0”事件中溥老担任连长的第一连中第三区队学生孟宪昌、常吉被捕判刑。陈东升在遭追捕时撞火车牺牲。一期生崔黎夫被捕判刑。“一二・三0”事件使学校里中日师生都吃一惊。日本人领导干部、教授、教官感到吃惊的是，经过学校严格考试，录取的学生中竟有这么些人脑后有反骨。中国人教授、教官吃惊的是，对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不能等闲视之，后生可畏。使学生感到吃惊的是，没有参加革命活动的同学，打开了眼界，知道在自己周围的同学中志高胆大者大有人在，使顽者廉、懦者立；已参加秘密活动的同学，看到敌人磨刀霍霍，加强了战备，提高了警惕。

溥杰少校作为一连之长的态度，分外引人注意，由于他是皇帝的弟弟，又是日本名门豪族嵯峨家的乘龙快婿，这一特殊身分，受到了日本人的注目，同时也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中国学生既然对日本人的统治深恶痛绝，当然就对代表日本、伪满洲国价

值的一切事物无不反对。溥杰少校在学生们的眼中是师长又是值得怀疑的人物。“一二·三0”事件，使得一些学生对溥杰有了新的认识。第一连百余名学生中，突然销声匿迹了三名，是被一种巨大的政治势力吞噬了。可以想见，在师生中的反应如何强烈。第三区队长王开诚上尉（王老于1947年在国民党五十八师任职，随同全师起义，现已作古）见区队中一死亡二被捕，第二天光洁的嘴巴，长满了燎口大泡。同学们满以为连部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搜查学生的书物，唆使学生相互检举……结果完全不是那样，溥杰连长仍然是军装笔挺，儒将丰姿，一如平素，镇静自若。没有为“一二·三0”事件在全连师生聚会上讲过一句对学生责备不满的话。以后也没有看到外松内紧，加紧控制的蛛丝马迹。

据田羽、范迪厚在《缅怀我们的领路人佟志杉同志》一文（原载1991年的《长春文史资料》第二辑）说：“在孟宪昌同志被捕不久，溥杰少校连长好似听到了什么，找徐尚丰、范迪厚分别谈了一次话，最后告诉我们说：‘你们年轻，要好好学习。’很关心地嘱咐我俩。”和“一二·三0”事件有关的找学生谈话，这算是一次。寒来暑往，时光迅速，40几年过去了。在1987年，长春史志委召开的一次“一二·三0”事件的座谈会上范迪厚兄回忆当时溥老找他谈话的情况说，溥杰连长可能对学生中继续存在的政治活动有所查觉，由于掩护、关怀，才找我们谈话，以后也未见到任何伤害学生的事情。会后范迪厚给溥老去了一封信，了解当时他的心情。溥老很快地回了信。范兄曾特地拿给我看，虽然是用钢笔写的，也如毛笔字的娟秀端庄。原信我曾影印了一伤留以备用，惜乎书、牍信手放置，到用的时候却又找不到了。但大意我还记得，溥老在信中说，以他那时的思想来说，是不会同情反满抗日活动的，这是与他的家族的根本利益相悖的。找他们谈话只是为了息事宁人而已。并为在校期间未能做到“为人师”的责任而表示歉意。毫无表功的意思。从这封信中也可以

看出溥老的真诚。不论是哪一个时代的人是彪炳百世，还是草芥之士贵在于“讲真话”，“心口如一，”做到了这一点，才算具有了人的尊严。

溥老在军校的生活中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稳重、寡言、宽厚、聪明。“一二·三0”事件是学生们对溥杰少校的一番无卷考试。不久以后发生的另一事件，使得这位文质彬彬的34岁青年将校，在同学们的眼中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日本学生二期生和中国学生三期生在1942年同时毕业，本来应当是同期，他们入学的时间也是一样。因为把日本学生编为二期生，遂使他们在三期的中国学生面前，俨然以上级生自居，正值少年气盛的中国学生又满脑子的仇日思想，自然对此不买帐。这本来是学校当局编制上的失误，从第五期开始做了纠正，日本学生空了第五期，从六期开始，中日学生同期同年入学，同年预科毕业。

头一天日本学生二期和中国学生三期已经举行了毕业典礼，第二天双方的值周学生去厨房取饭相遇。日本学生傲慢地指责中国学生为何见着上级生不敬礼，中国学生以更傲慢的态度反责日本学生的无礼，于是口角起来，中国学生第一连、第二连，日本学生第五连，都到食堂就餐，大家跟着相互用日语责骂，继之大打出手。双方剑道、柔道的技术、体力都不相上下，但人数上却是2：1，胜败立见。顿时饭碗飞空，菜饭遍地，相互厮打，食堂大乱。日本学生有先天的弱点，戴眼镜者居多，中国学生按照孙子兵法攻其弱点，先把对方眼镜抓下摔之于地，然后向如同盲人的日本学生拳脚交加，中国学生大获全胜。最后三个连的值周军官，赶来喝止，日本学生中已有多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日本学生吃了大亏，向校方哭诉。由于是日本学生先行挑衅，更主要的第一连连长是溥杰少校，第二连连长是张挺少校（其父为清末第八镇统制本人与溥仪关系深厚），二人袒护自己学生，既不责怪学生，也不反躬自责。溥杰，一如往日，不动声色。如同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校长南云亲一郎中将，为中日学生以后的长远关系考虑，没有责备任何一方。由校部附秋山少将（日本人）率领中、日三个连的学生，在学校祭祀天照大神的元神殿前列队，由秋山带头宣誓高呼："今后不再打架"而寝息此事。

我在军校在学时，溥老是第二次任教于军校，是1945年，他任预科学生队队长，军衔为中校。没有直接接触过。

我的同期同学王文达（已故），在看到浩失人在日本出版的她所写的《流浪的王妃》，认为应当向中国人介绍，遂与几个人翻译成中文，由吉林省政协文史委于1985年4月在长春出版发行，书名为《流浪的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文达为在中国出版此书曾赴京拜谒溥老，溥老热诚帮助，为此书扉页写了《旧话重题》几个字。还为中文本作了"去粗去伪的加工和修改"并把这一经过写成了跋语。印在书后。还提供了几帧照片。溥老在《流浪的王妃》原日文版中，曾为浩夫人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言。序文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虽愚顽地走错了半辈子路，可是面对美好的今天，我在感戴之余，怎能不扪心悔恨自己的过去。为了能够成为新人，将来能走上光明的大道，为使自己的后半生生活得更有意义而努力奋斗。这不是理所所当然的么。"这些真诚的话，象征溥老展翅遨翔的决心。文达回来后带来溥师对长春同学的问候。我们也都在长春遥祝溥师在后半生能有新的作为。

第一次有缘和溥老见面，是在1986年5月，我随长春医疗队去西藏，路过北京做暂短数日停留。当时正值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国见康弘大佐，奉令要调走，新任武官长野洋一大佐到京履新接职，在二战后日本军官都是防卫大学毕业，这个学校与战前的陆士渊源甚深，甚至有人把防卫大学毕业的期数也接续在已不存在的陆士期数后面，以示亲密。因之，旧武官算是七十六期，新武官是七十八期。陆士与伪满军校关系也非常密切，军校七期相当于陆士六十期。溥老应是四十七期。故每任日本驻华武官到

京后，礼节性地去溥老和北京中国同学这些老前辈处拜访。北京同学正拟宴请一次新旧武官，也请溥老出席，沈阳的同学温乃武也恰好在京，我与乃武适逢其会，在被请之列，大约一共有20几人的样子，北京的同学中有沙青、沙福恒、陈贵民、杨桦、高守维、王健众等。那天，张挺师陪同溥老一起来的。溥老当年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不高的身材，瘦小的躯干，一口与年龄不大符合的略显清脆的北京话。步履虽细碎，还颇轻快。思维敏捷。温厚祥和，一副乐天知命好好先生模样，是一个标准的知书达理的中国老头，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一位曾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并曾从事军官职业的人。握手时轻轻的捏住对方的手。相反，张挺师则身体高大，笑声洪亮，语言豪爽，动作利落，仍然象一位老军人。溥师听说我自长春来，认真地打探长春的情况。进餐时，大家礼貌地向溥老敬酒。沙福恒介绍说溥师偏好茅台，我们也跟着喝茅台。溥师对敬者不拒，酒量颇豪，那天约能喝有三两的样子。几盅酒过去后，溥老仍然稳重如前，还是那副安详高贵的丰姿。

1987年6月20日，溥老的妻子嵯峨浩因肾病久治不愈去世，享年73岁。溥老曾给我寄来一封讣告我曾拍去唁电为吊。浩师母一生与溥师忧患与共，生死不渝，浩夫人撒手人寰，可以想象出溥老的凄凉心情。

1978年中日签订友好条约之后，在日本的军校同学来华访问者日众，来访的路线中北京和长春是必到之处。每到京，都要拜访溥师。溥师在日本同学们眼中，由于他是末代皇帝的弟弟，他与日本华族（嵯峨侯爵家的爱婿）、日本皇族（昭和天皇的母亲，大正天皇的妻子贞明皇后，非常喜爱溥师与浩夫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师长的敬意。溥老夫妇在1974年曾经去日本探亲，日本皇室秩父宫妃、高松宫夫妇、三笠宫夫妇均曾设宴招待。在三个月的停留期间去日本各地探亲访友，广泛撒下中日友好的种籽。1988年溥老一个人再次来到日本将浩夫人和长女慧

生的的遗骨送回日本安葬。由于浩夫人的弟弟嵯峨公元先生和京都中山神社的关照在埋葬着嵯峨家历代先祖的中山神社内新建了一座爱新觉罗神社。浩夫人和慧生的遗骨一起安葬在这里。溥老并表示："我想，我将来死后，我的遗骨一半留在祖国中国内，一半也将放到中山神社内的爱新觉罗神社。"（1988 年 2 月 14 日在日本答《每日新闻》记者问）溥老对于中日友好是生死一以之！溥师这次东渡与日本皇室也有来往，皇太子夫妇（现在皇太子已即位为明仁天皇），设宴东宫招待溥老和二女儿嫮生。

溥老的书法名高海内外，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可称之为"秀而不媚，丽而不俗，平中见贵，丰采高雅。"1992 年，原军校的旧址，今日的解放军长春装甲兵技术学校领导，希望长春的军校同学代向溥老请求，写一张条幅，溥老慨然允诺，写了"讲武育人"四个大字。笔锋秀中有刚，娟而有力，烘托出溥师笔体的炉火纯青的水平。这可以作为溥杰师对长春的最后遗墨了。

1993 年 7 月有一批日本同学、台湾同学、在各地的中国同学，包括夫人、子女近 300 人在长春聚会，重游故地，共话沧桑，亦是晚年之乐事。我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溥师，他当时已身卧病床，特由北京六期钱致光同学捎过话来，因身体抱病，遗憾不能与诸君携手参与盛会，遥望长白故园给大家寄去良好的祝愿！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溥老虽然未直接向我传授过什么，却向我的上两班生授过课，同在一校当然也是我的师长。他当时又具有御弟的身分。正如他在若干年后自己回忆所说："我和我的哥哥溥仪同日本合作，以相互利用的形式企图让清朝的后代从满洲国皇帝及其弟弟的名义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曾经想实现自己的野心。（见前答日本《每日新闻》读者问）而那时我们一些学生，朝思暮想的心愿是推翻满洲国，赶走日本人。无疑，一朝我们掌握了军队，时机成熟，就会与溥老所代表的统治势力兵戎相见了。所以一些思想先进的学生同他貌合神离是很自然的。一场人民革命的巨浪，改变了中国的的国际地

位，改变了国内的阶级状况，也使溥老丢掉了历史的包袱，改变了立场，与世人融为一体。大浪淘沙，在溥老的身上冲洗掉泥土，只留下了师长的光彩，凸露出他的优秀品质。在1959年以后的35年溥老以其睿智、品格、实践为新中国为旧友、学生做了不少工作，在军校的中外同学中更增加了师长的魅力。从师之道不一定要亲听说教，心仪其人，而私淑之，亦是学习的一法。

1994年3月初溥师已归道山的信息传来，不胜悼念之情，我与汪静岳、刘群、张智、刘汉中代表长春原军校同学致唁电，以志哀思。

斯人已去，风貌长存！

1994年“五·一”前夕

溥杰先生与长春

——写在溥老病逝之际

王庆祥

溥杰先生去了。当我从电视上获悉噩耗的时候，不胜惊悼！与先生交往的历历往事又浮现眼前，心中涌起不尽的哀思。

我最后一次见到溥杰先生，是1992年12月2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与韫颖（金蕊秀）女士遗体告别仪式上。当哀乐奏响，溥杰先生由人搀扶着，走到队列的最前面，满怀悲痛地与胞妹"三格格"告别，他的亲笔悼诗安放在三妹遗像之下：

同胞骨肉兹分袂，回首前尘倍痛心，
悃愫抚衷今胜昔，无端死别痛愈深。
岁次癸酉季冬与亲妹金蕊秀遗体告别
赋此志吾衷怀悼痛之一端

诗中"悃愫抚衷今胜昔"一句，确是溥老后半生心态的真实写照。时年86岁的溥老虽然走路已需搀扶，但气色仍好，看上去很健康。不料才过去两个多月，就听说溥老患前列腺癌已住院，病情严重。其间每次去京我总要询问溥老的病况，听说时好时坏，不稳定。由于探视方面的严格规定而未便榻前问候，尚以为溥老身体素质好，加之现代医疗条件，可以多活几年，不料竟这样快就去了。

回想第一次见到溥老，是1980年5月2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溥仪先生举行的追悼会上，当我与这位古稀老人握手并向他表示慰问的时候，已经走上了溥仪生平研究的道路。

从此后我常到北京西城护国寺街52号溥老家中拜访，向他请教、核实有关的历史细节，或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或某一时间地点，溥老总是十分认真地答复我的问题。为了把握史实准确，他时而当场查阅祖父奕譞的诗集或自己的诗文手稿，支持我摘录或复制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他还把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数十本家族影集搬出来让我参考，并允许我翻拍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照片。

记得有一次，谈到殉情而死的溥老的大女儿慧生，他指着悬于客厅壁上的慧生生前的绘画作品，讲述女儿儿时的生活情节，我真切地看到泪珠儿在他的眼眶内闪动，从而感受到一位慈父的深情。后来，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但写进了当时的感受，还引录了溥老的《哭慧女三首并序》等催人泪下的诗作。

还有一次，我和溥老正交谈时，来了一位客人，溥老把他迎入院内，随即引向南房和我见面。溥老介绍说，他叫张挺，即清末时驻防武昌的第八镇统制张彪之子，1925年溥仪到天津所住的张园便是他家的房子，伪满年代他也一直跟随在溥仪身边，与溥杰亦有多年的交往。伪满垮台以后张挺率部投诚参加革命，解放后定居北京。溥老所以向我介绍张挺，是希望我多向知情人士采访第一手资料，把史实搞得更准确，溥老严谨求实的学风令人感动。

为了鼓励我的研究工作，溥老还多次与我合影，为拙著《伪帝宫内幕》题写书名，而且挥毫泼墨，以他那俊俏秀丽、妩媚得体、别具一格的书法，把白居易的《赠友诗》写成条幅送我，以表达他的一片友好感情：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唐白乐天赠友诗，甲子季秋上浣

书贻王庆祥同志留念。　　　　溥杰

我每出版一种著作，必寄呈溥老乞教，他不但认真阅读，还

提出一些很具体的意见，希望我不断修订，提高研究成果的水平。

1984年春天，我受托于长春市政协的领导同志，登门向溥老求赐墨宝，并代送两株当时颇为名贵的君子兰花。溥老非常高兴，亲手把花盆安放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上，然后说，他对长春是有感情的，"愿以赎罪的心情为长春人民做些事情，当即铺平桌毯，展纸运笔，写下"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6个大字，作为悬于会议室的横幅，同时又为《长春文史资料》题写了刊名。

正当溥老笔走龙蛇的时候，忽然门铃振响，嵯峨浩夫人从医院回来了。溥老立刻停笔，亲往大门外搀扶夫人进院入室，并指着我向夫人介绍说："这位是从长春来的，让我为长春市政协题字。"夫人非常礼貌地用略显生硬的汉语说："长春也是我们的家乡！"我看溥老夫妇都很高兴，便乘势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请溥老再给《长春文史资料》写一两句话，以支持这个创办未久的内部刊物，溥老略一沉思，挥笔写出一首五言诗来：

董史华生笔，如椽资毖惩，
把卷堪车鉴，沧桑志废兴。

甲子暮春题贻《长春文史资料》

说起溥老夫妇与长春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8月。那是溥仪当"康德皇帝"半年之后，当时溥杰是第四十七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利用暑假回"新京"探亲，这是他第一次到长春。

1935年6月末，溥杰从位于东京牛込市谷台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获得日本陆军大臣赠送的一块银表和伪满驻日公使赠送的一把军刀。毕业之后，作为见习士官在日本宇都宫的步兵第五十九连队（团）任职见习三个月，联队长为李王垠大佐（原朝鲜李王朝王裔）。

1935年10月，溥杰回到长春，被派为伪满陆军步兵中尉，

出任伪禁卫步兵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时年 28 岁。

1936 年 9 月，溥杰作为机枪和炮兵的实习生，被派往日本千叶县陆军步兵学校，学习步兵炮（包括联队炮即山炮与速射炮即对战车炮）、重机关枪及一般训练。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曾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大将策划，实现了溥杰与嵯峨浩的“政略婚姻”，他们是在 1937 年 4 月完婚的，嵯峨浩是日本天皇的亲属，其父嵯峨实胜是位侯爵。

1937 年 9 月，溥杰从步兵学校毕业后回到长春，被派为伪满陆军步兵上尉，出任伪禁卫步兵团第二营第三连连长，仍担负保卫伪皇宫的任务。两个月后，他的已怀孕的妻子也来到长春。这时，在西万寿大街 117 号（今地质宫西侧），为溥杰夫妇建造的新居已落成（现为白求恩医科大学职工幼儿园），他们就在此共度了与长春结缘的时光。1938 年 2 月 26 日，他们的大女儿慧生诞生在“新京市立医院”（今长春市医大二院）的产房里。

1938 年 9 月，溥杰奉调赴伪满驻日本东京大使馆，任见习武官，辅佐伪满武官及辅佐官，在武官室负责交际、宴会、视察等事务，当武官或辅佐官公出不在时代行其职务。此间，溥杰携妻子和女儿定居于东京牛込若松町的临时寓所，暂时离开了长春。

1939 年 9 月，溥杰又调任奉天（今沈阳）军官训练处教官，夫人嵯峨浩因有第二胎身孕而暂留东京。翌年 3 月，在顺天堂医院分娩，诞下次女嫮生。

1941 年 4 月，溥杰调任伪满陆军军官学校预科生徒队三期生第二连连长，又回到长春来了，夫人嵯峨浩这时也已携了两个女儿从日本归来，这一家人重新开始了在西万寿大街的家居生活。1942 年 8 月，溥杰调任伪满治安部参谋司第三科科员，职务变了，却没有离开长春。

1943 年 11 月，溥杰前往日本陆军最高学府——东京陆军大学，作为特别旁听生学习幕僚，军务，即学习师团以上的大兵

团战术及对美对苏作战概略知识而以岛屿防御及登陆作战为重点，兼及火箭炮等新兵器的概略常识。溥杰这回又把妻女带在身边了，他们就住在日本青山陆军大学附近麻布狸穴里的临时寓所。

1944 年 12 月，溥杰结束在陆军大学进修的战术课程，携眷返回长春，就任伪满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高级科员。因慧生已经到了上学年龄，便留在东京姥姥家了。

1945 年 8 月 3 日，日军败局已定，溥杰调任伪满陆军军官学校预科生徒队队长，到同年 8 月 11 日即奉临时命令转任侍从武官室武官，扈从溥仪前往通化，从此离开了长春，而那栋位于地质宫西侧的日本式住宅，还有卫生间里的大浴盆保留至今。

嗣后，溥杰在沈阳与溥仪一起被苏军俘虏，又经历了囚居于赤塔和伯力的 5 年，而于 1950 年 8 月 1 日由绥芬河引渡回国。当溥杰坐在糊了窗子的战犯列车上途经长春的时候，他心里自然会有无尽的感触。其间，浩夫人带着小女儿嫮生在东北各地、在上海和北京流浪了几年，虽然也几次途经长春，却已不可能再回那到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家了，后来终于返归东京的娘家。

1957 年 6 月上旬，溥杰随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的战犯参观团，再次回到长春，先后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容、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等单位，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春的新面貌。这竟是溥杰先生留在长春的最后的脚印了。

长春市政协的领导同志曾让我转告溥老，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再回长春看看。溥老也表示，只要时间允许，身体状况允许，他愿意重游长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获成功。

溥老虽然没有来，一些日本的历史学家、英国的族谱学家以及其他国际友人，却先后来看过他的旧居，似乎要从这里找到他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区别。帮助他写自传的叶祖孚先生也来过了，我们也曾在长春市政协的会议室里探讨与溥老生平相关的

观点问题和史实问题。遗憾的是，溥老竟未及看见自传出版就匆匆去了。据我所知，早在10年前溥老就有了写自传的计划，然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他的社会活动太多了；作为知名度很高的国内少数几位书法家之一，向他索字的单位和人士也太多了。他只好把价值很高的自传作为“个人小事”而一拖再拖，以至于有了今天的遗憾。不过，现在这本书就要出版了，它所记载的溥老的后半生，与溥仪先生的后半生一样，充满了光荣。

（作者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韩国总统朴正熙

〔韩〕金润根文
李天成　编译

关于朴正熙和其他韩国同学在韩国的活动，在70年代以前，我们听到过不少传说，但是皆不准确。这次从金润根所写的7万字的《朴正熙将军与1961年的军事革命》文章中，使我们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惜乎限于篇幅，在本书中不能刊登全文，只好编写，但仍可管中窥豹。此文稿原作者是韩国原伪满军官学校学生金润根。原稿是金润根为原军校第七期生日本同学宫岛精一君拟编的《空白的同德台史》而作。后因此书停刊。金润根君又乘日本同学谷牧昭来中国之便，带给沈阳的原军校一期生孙宪治兄。谷牧昭来长春时将原稿交给了长春同学。

恰好原伪满军校的学生们的回忆文章要出版，笔者匆忙将金润根未发表的日文原稿摘译成中文并压缩编写，未做观点内容上的改动。笔者认为此文可以从某个方面反映原伪满军校中韩国人学生及朴正熙本人的一些情况，供读者参考。除金润根文章外，也参加了少量的其他人提供的资料。所有文章、资料，均未来得及征求作者关系者的意见，在此致歉，并表谢意。

青少年时代 朴正熙（1917～1979）于1917年出生在朝鲜庆尚北道善山郡龟尾面上毛洞，父亲朴成彬、母亲白南义。他的父母生五男二女，他是最小的儿子。小的时候家中种田，很穷，住的地方偏僻，念小学要去离家有8公里的龟尾郡。家贫没有钟表，在登校的途中以能否遇到按时在路上走的邮局投递员，来判断是否会迟到。另一个可以判明时间的标志是看京釜线铁路上急驰而过的火车，是否开过来了。

作为9岁的孩子要每日往返走16公里路是一个不轻松的体力活动，特别是雨天和大雪天更是艰苦异常。中午饭带饭盒。有一次，冬天饭盒里的饭冻成了一个冰团，朴正熙就那么吃了，吃后就全部吐了出来。第二天早晨仍然感到肚子不适什么也没有吃，空腹上学了。妈妈心疼、不放心，等到放学回家，妈妈领着去村里一位针灸大夫处去治疗。使朴正熙感到奇妙的是，竟然很快治好了。一直到长大成人，在朴正熙的右手大姆指根部，仍然残留有针刺后的红色斑点，始终未褪。这也可以说是幼小的朴正熙与中国文化的头一次接触。朴正熙回忆说，我的哥哥们长得又高又大，只有我长得矮小，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影响了我的身体发育所致。

上学的学费一个月是6角钱。6角钱在日本城市的孩子不被当一回事，在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农村的农家来说，却不是轻易能拿出来的，朴正熙的母亲好不容易地一分钱一分钱地为他每月凑足60个一分钱。等到朴正熙要买学习用品时，母亲就把家中鸡所生的蛋，从隐藏的地方拿出二、三个，由朴正熙拿着到日本人在学校前开的文具店去换铅笔和笔记本，狡猾贪婪的店主按每个鸡蛋1分钱来作价。后来朴正熙掌握了政权，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实施韩国经济发展计划，发誓要在城市和农村消灭贫困，这

与他年小时身受贫穷之苦有关吧!

常常有大邱的步兵第八十联队的军人到龟尾郡进行野外训练，军人的姿态打动了朴正熙的心灵，他产生了长大以后要当军人的念头。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看了作家李光洙著的平定壬辰倭寇之乱的水军统制使李舜臣传，非常崇拜这位民族英雄，在6年级时看到了《拿破伦传》，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又成为他崇拜的偶像。

从小学4年级到6年级，朴正熙都是班长，在班里有一些人比他个子高力气大，对矮小的朴正熙是不屑正视的。朴正熙想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桀傲之辈听从尊重班长呢？最好的方法是“以德服人”、“攻心为上。”于是朴正熙在老师讲的算术课下课之后，主动亲切地为不会的人再讲解一遍。这位班长逐渐地赢得了威信。

1932年朴正熙考入大邱师范，入学考试竞争激烈，报名者与录取者的比例是10比1。当时报考师范学校的都是家庭贫寒的学习优秀者。朝鲜的师范学校毕业后有做教师的义务，官费学生要在4年之后，私费学生要在2年之后才可以投考上级学校。朴正熙在这个学校读了5年书，于1937年3月毕业，到庆尚北道闻庆郡闻庆普通学校（即小学校）任教师，时年20岁。

朴正熙在任教师两年之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扩大之际，政府当局要求全国进入战时体制，鼓励国民都要穿国民服，男人要剃光头。朴正熙虽然不能免俗地穿了国民服，但仍然头发长长的。因而受到学校的非难。朴正熙提出了辞职书。他到了中国的东北，当时的伪满洲国都新京（长春）。曾经在师范学校担任过军事教官的有川大佐，在关东军任职。朴正熙去他家拜访。有川劝说他投考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并愿意为他写推荐信。朴正熙虽然没有任完做4年教师的期限，有了有川的推荐信，顺利考入军校。

从军校到返回韩国　朴正熙考入伪满洲国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是1940年4月，为二期生。那时入学的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20岁之间，朴正熙已经是23岁，因为他身材矮小，没有人把他看成是

老大哥。

军官学校教育的内容很适合朴正熙的愿望，他热心学习，成为当时的校长南云亲一郎都知晓的优秀学生。有一次南云校长把朴正熙和数名其他学生介绍给他的儿子南云克郎。克郎时为关东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旗手，对朴正熙的言谈举止，感到气魄雄伟，英气逼人，对其他学生也深感意气风发，不是等闲之辈。预科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得到了溥仪的奖品金表1枚。与预科毕业的240名日本学生、70名中国学生、另2名（李翰林、李燮俊）韩国学生一起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留学。

对他在日本陆士学校期间的风评不太多。他的邻床学友现在日本国士馆大学事务长日本人竹泽氏说："朴正熙是一名诚实寡言的学生，没有什么生活的逸闻趣事，使人注目。"另一名日本同学折口氏说："朴正熙对一位叫做榊的区队长尊重之情溢于言表。这位区队长被称作脑后有反骨的人，他经常对学生们说，'不要好久，日本就要战败了，大家一定要活着等到最后。'"同期生的韩国人李燮俊回忆说：陆士禁止学生吸烟、饮酒。朴正熙在星期日休假外出之时，还是沉浸在烟酒乐趣之中，可以看出他蔑视清规戒律，玩世不恭的一个侧面。在日本陆士本科毕业时，名次是第三名，又反映出他在学习上不甘平庸，严肃郑重的侧面。

朴正熙在日本陆士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关东军六三五部队担任见习军官勤务3个月，继而分配到热河省满军第八团任少尉，担任团长副官。这个团的韩国人军官还有军校一期生李周一中尉和方圆哲中尉，此外还有1名上尉申铉俊连长是奉天陆军训练处出身，共4人。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展开攻势，第八团当即受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多伦挺进。从八团驻地的半壁山到第一个行军目的地兴隆，途中全是险峻的山岳地带，进军中又逢倾盆豪雨，好不容易在8月17日全团到达兴隆。因为通信机械效果不好，与外界联系断绝，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广播也没有听到，

到达兴隆后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日本人军官自然被中国人军官缴械。4 名韩国人军官，也做为外国人被解除了武装，当作客人看待。

伪满洲国终于垮台了，满军第八团变成迷途的羔羊，团长唐际荣上校对投向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举棋不定。为了了解国共两党的情况，唐际荣率领部队向靠近北平的密云移动，以便探听形势。方圆哲在前几日去了沈阳，其余 3 名韩国人军官在抵达密云后，也与第八团告别，乘汽车去北平，去迎接新的生活。

朴正熙、李周一、申铉俊 3 人在北平的韩国难民收容所会见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东北办事处长崔用德将军，他当时是中国空军中将，也是韩国空军中将。他要他们 3 人把收容所内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编成韩国光复军第三支队第一大队。申铉俊上尉为大队长，李周一中尉、朴正熙中尉为中队长。干部的工作主要是为收容所中的人筹集粮食。驻韩国美军的政治态度是不承认在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她领导的光复军。因此不能以光复军成员的身分回归韩国，光复军的年轻人与难民一起，作为难民回归祖国。

朴正熙乘美国军队提供的 LST 船做为难民在 1946 年 5 月回到韩国釜山，旋即返归故乡善山，在家中悠闲地休养了 3 个月。到 9 月去汉城参加国防警备队士官学校，作为二期生入学。

参加韩国军队　第二期学生有 260 人左右，其中在中国军、日本军、“满军”作过军官的有 35 人，其它就是曾是日本军的军士和兵，或者全然没有过军事经历的人。学生年龄为从 20 岁到 30 岁中间。朴正熙当年为 29 岁。国防警备队在创建的初期，制度不健全，后勤工作落后，到了冬季发不下冬服，仍然穿着夏服。经过 3 个月的训练，在 12 月 14 日，朴任官少尉，任地为春川的第八联队，当时第八联队担任山岳地带的三八线的警备任务。朴正熙少尉指挥的排部署在松川地区的正面。1947 年 5 月，第八联队结束了三八线的警备任务，朴正熙被任命为联队部的代理作战参谋。当时曾任这个联队的警备中队长的金点坤（陆士一期，以少将退役，

庆熙大学教授）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李在福的人曾经数次来找过朴正熙，朴向人介绍说是他的亲戚，在韩国整肃军队以后才知道，这个人是朝鲜共产党在南韩的军事负责人。

由于朴正熙从中国回来的晚一些，入警备队的时间也晚了一段时间，伪满洲军官学校（以下简称同德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下简称相武台）的下班生都成了朴的上级。朴正熙在警备队士官学校时，学生队的两名中队长，一名赵炳乾上尉为相武台六十期，一名吴一均上尉为相武台六十一期，而朴正熙是同德台二期，相武台五十七期。同德台五期的姜文奉当时是上尉任警备队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在同德台时的同期又是从那个时期就是竞争对手的李翰林少校已经任驻在光州的第四联队长。也是同德台二期的同期生李丙胄少校担任驻在泰陵的第一联队的大队长。在警备队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大家都公认朴是陆士二期中突出的人才可是与同德台、相武台的同期生和后辈相比，在警备队的职务已经低了。

在1945年9月占领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的美军司令哈纪中将认为，朝鲜将来应当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由民主的国家，允许从极左到极右的政党自由活动。一时出现了上百个政党，政治上极为混乱。在三八线以北的苏联军仅支持朝鲜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是朝鲜北部唯一的政治力量。北部还支援南方的共产主义活动，在南部的公共机关，甚至私人团体都有共产党人在活跃，在国防警备队内也有很多共产主义者人队，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活动。

1945年8月初，日本在朝鲜的总督阿部信行大将，为了维持日本战败后的朝鲜的治安，曾与汉城的保守政治势力的几名代表联系，请求帮助，但遭到了拒绝。阿部无奈去找左翼政治势力的代表吕运亨，吕氏欣然允诺，他立即组织了“建国准备委员会”，同时组成委员会所属的武装“直属治安队”，由朴胜动（相武台二十六期、满军上校）任队长，朴承焕（奉天训练学校五期、满军

上尉）任参谋长。由于吕、朴出面联络，有不少曾在日本军和满军担任过军官的人都出来参加了治安队。

同德台五期、六期，相武台五十九期、六十期的学生在战后的日本返国，大家一起先到达汉城，暂住在那里。其中一部分回故乡，大多数参加了直属治安队。参谋长朴承焕受吕运亨的政治影响，思想已经彻底共产主义化，他按照吕的指示对军官候补生进行思想教育。1945 年 9 月 7 日美军进驻汉城，15 日美军命令解散所有的武装组织，治安队也在其内。治安队解散之后大多数军官和军官候补生回归故乡，一部分人为了入大学念书，暂住在吕运亨为他们准备的集体宿舍里。

1947 年 9 月，已经晋级为上尉的朴正熙从驻春川的第八联队调转到警备队士官学校任第一中队长。黄泽林中尉（同德台五期），金鹤林中尉（同德台六期）是其属下的区队长。这两个人和前任中队长赵炳乾上尉（相武台六十期），吴一均上尉（相武台六十一期）一起，受朴承焕的影响积极参加左翼的活动。朴正熙当时在国防警备大队士官学校的五期和六期生的心目中是一位遵守法制的中队长和优秀的战术教官，受到人们的尊敬，没有人听到他进行过什么政治宣传。

1948 年 5 月，朝鲜南部举行大选，召开制宪国会，制定宪法，定国名为大韩民国。选出李承晚为首任总统，8 月 15 日总统就任宣誓，将国防警备队改为陆军，海岸警备大队改为海军。

1948 年 10 月驻丽水第十四联队在左翼人士的策划下举行武装暴动，枪杀了营内的军官后，分成两队，一队占领了丽水市，一队袭击顺天市，逮捕政府官员和右翼人士，组织人民审判，枪杀 1500 余人。陆军立即在光州设立镇压司令部，开始镇压作战。任命原是第八联队的中队长金点坤少校为作战参谋，金氏调来原是他的中队的小队长朴正熙少校为辅佐官。

国防部长为了预防再发生叛乱事件，命令在陆海军内部整肃检举公开和隐蔽的左翼人士交付军事法庭判罪。赵炳乾少校（相

武台六十期）、黄泽林上尉（同德台五期）、金鹤林上尉（同德台六期）吴一均少校（相武台六十一期）均被检举，提交军法会审分别被判处死刑和徒刑。

挫折和再起 朴正熙少校于此时也遭到检举，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可是上级看到他率直地承认和改正前非，爱惜他的才干的陆军本部情报局长白善烨上校积极为之说情，挽救他的性命。最后免除了死刑，只是罢免了军官职务。由于白上校的关怀，任用朴正熙为陆军本部情报局的非正式文官，继续服务。这一段经历始终成为朴正熙军旅生涯中的包袱，压在心头。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半岛战争开始，28 日北朝鲜军队攻占汉城。朴正熙因为母亲亡故一周年返回故乡善山，他听到开战消息，在 26 日午后急速返回，27 日到情报局。这时，陆军本部已经撤走。朴正熙与其他还未撤离汉城的军官，驾着汽车驰向汉江大桥，道路上挤满了出走的难民，汽车行动困难，突然看到汉江大桥火光一闪，接着一声巨响，汉江大桥被炸坏了。

朴正熙一行丢掉了汽车徒步向西冰库奔去，坐船渡过汉江，继续走往水原，到底追上了陆军本部。这时的情报局长是张都暎上校，正在怀疑朴正熙文官，能够追赶来否？看到风尘仆仆赶到的朴正熙，对他的怀疑全部消除。真是“疾风知劲草”，张都暎立即推荐朴正熙恢复现役军官。陆军本部退到大田，发出朴正熙少校复归现役的命令，仍在情报局服务，9 月 15 日晋级为中校。

10 月中旬，张都暎调任新编第九师团长，张推荐朴正熙任该师团参谋长。1951 年 5 月新任的情报局长金宗勉举荐朴正熙任新设立的情报学校校长。1951 年 12 月，就任陆军本部作战局长的李龙文准将（相武台四十期）又力荐朴正熙任作战局次长。1953 年 1 月，朴正熙已晋级为上校，为了培养他为炮兵团长，送往炮兵学校入学。1953 年 7 月学习结束，被任命为第三军团炮兵团长，创设新的炮兵团。这时第三军团长是同德台五期出身的姜文奉少将，而朴正熙是同德台二期出身。姜对把先辈的朴置于自己的麾下，时

感不安，朴也为不得不向自己的后辈请示报告而感到不如意。1953年11月朴正熙晋级准将，决定派他去美国陆军炮兵学校学习。这时听到有人认为朴正熙有过政治上的判刑问题，不能出国学习的说法，朴正熙甚为恼怒，最后还是去美国了。1954年6月朴正熙准将从美国学习归来，调任张都暎少将任军团长的第三军团所属炮兵团长，10月任炮兵学校长。1955年在张都暎军团长推荐下，白善烨参谋总长的关怀下，朴正熙被任命为第五师团长。1956年9月去陆军大学进修。1957年3月由陆大毕业，任第六军团副军团长。10月任第七师团长，晋级少将。此时李承晚总统的秘书官又提出了朴正熙历史上的与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白善烨参谋总长以个人保证，遂又化险为夷。1959年2月宋尧赞中将任参谋总长，调动朴正熙少将任警备京畿地区要职的第六管区司令官。10月调任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1960年5月调任作战参谋副长。军内有一些人又提出朴正熙的政治问题，通过美军顾问团向韩国施加压力拟解除朴的作战参谋副长职务编入预备役，第二军司令官张都暎再次伸出援助之手，调任朴正熙为第二军副司令官。

筹划军事革命　韩国社会于1959年后政治经济形势极不稳定，选举舞弊，学生罢课，政党争利，贪污腐化，经济萎缩，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治安紊乱。全国对政府一片不信任之声。

朴正熙等一批40岁左右掌握军队兵权的实力人物，对韩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早已心怀不满。

当时，军部的将领阶层被誉为是韩国社会的最进步和开明的集团。自1952年以来，韩国有几千名陆海空军官去美国留学，不仅学习到美国的最新的军事知识，也看到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的状况。他们站在韩国社会的最前端，怀有改造社会，追赶列强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社会上，也有一种思潮，对民主党、自由党等政党和政客丧失了信心，认为可以信赖的只有军部。因此在军部内外等待军队有所作为的气氛，日益浓厚。干柴越堆越高，风力愈刮愈大，只消一个火种，就会燃起熊

熊大火。

在当时策划军事革命有三个集团。第1个集团是以朴正熙少将（同德台二期，相武台五十七期）为中心的一些满洲同德台出身的军官和韩国陆士五期生（朴正熙曾是他们的老师）。第2个集团是以金钟泌预备役陆军中校（陆士八期）为中心的一些韩国陆士八期生。第3个集团是以金润根海兵准将（同德台6期、韩国陆士1期）为中心的海兵队军官们。这3个集团成员的共识是：目前局势除了采取军事革命的行动，没有办法将祖国从累卵之危中解救出来。三个集团到了1961年3月都集中到朴正熙的麾下，拥戴他为领袖。

在汉城近郊服务的同德台出身的军官在长夜漫漫的日本奴役时期，在中国的东北长春，有过一段永生难忘的同学生涯，友情深厚，每到周末都到汉城市内一所名为“大观园”的中国饭店聚会，边喝酒边聊天。朴正熙在汉城服务时经常是集会中的座上客，就是调往了外地工作，有到汉城的机会，也一定到“大观园”与大家欢聚。最初，这种聚会只是为了叙述旧情，不知不觉就成了纵论天下大势·倾吐忧国悲愤之会，经常讨论挽救祖国的道路，结论是唯有发动军事革命。韩国才能得救。经常到“大观园聚会的有同德台一期生朴林恒、李周一、金东河、崔昌彦、尹泰日、方圆哲、金敏奎等。同德台二期生有朴正熙、李再起、金默、李燮俊等。同德台三期生有姜泰敏。朴正熙任军需基地司令官时在“大观园”聚会时就表示了要发动军事革命决心，得到了参加“大观园。聚会的同学们的赞同。

朴正熙在任韩陆士五期中队长之时，他的学识 风度 教育方法与其他军官相比如同鹤立鸡群，是一位胸怀大志，胆识超群的非凡军人，受到学生们高度的信仰与崇敬。在1960年前后，陆士五期生中的优秀人才已经担任了师团长的职务，牢牢地掌握了师的兵力。经过朴正熙的个别接触，他们都愿意接受领导。陆士八期的军官们在1960年前后，军衔大体为中校、上校，担任陆军本

部、军司令部、军团司令部的中坚参谋，或者是第一线部队的联队长、大队长。他们的中心人物金钟泌，曾经在陆军本部情报局与朴正熙共事一年，敬重朴的为人。海兵准将金润根是同德台六期生与第一海兵师团长金东河（同德台一期）友谊深厚，通过金东河，金润根也愿意接受朴正熙的主张。

为汉城西北门户的金浦半岛，有海兵第一旅团在那里布防。恰好此时调金润根准将任旅团长。旅团长的更迭，朴正熙比金润根还要高兴。

朴正熙在 1961 年 5 月 14 日召开了骨干人员的作战会议，定于 5 月 15 日夜间 24 时部队出动，举行军事革命。能听从朴正熙指挥可以参与军事革命的部队有在金浦半岛驻在的第一海兵旅团，在金浦空港附近的陆军空输团，在汉城北部和西部的第三十师团和第三十一师团，在汉城东北抱川附近的第六军团炮兵团，汉城东北加平的第五师团。

军事革命成功　定于 1961 年 5 月 15 日举事的各个部队，已经在各个驻屯地做好出动准备，第三十师团的作战参谋李白日中校向一位联队长已经讲明届时率部出动参加军事革命。李白日参谋在当晚 20 点下达命令，令预定出动的部队在练兵场集合。没有想到这位联队长临时动摇，到师团长私宅报告：“今夜，用夜间训练的名义，出动空输团、第三十师团、第三十三师团拟举行军事革命。”师团长事先没有参加预谋，听到后大吃一惊，连忙给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暎中将私宅挂电话，不巧总长不在。师团长立即驱车去汉城地区防谍队，要求急速找到总长。总长很快地到达防谍队，听到三十师团长的详细报告。张总长立刻用电话找到空输团、三十师团、三十三师团的值日司令，命令：“今夜，原计划的夜间训练取消，没有参谋总长的许可，禁止举行任何训练。”同时，张总长通知宪兵司令官，逮捕第三十师团作战参谋李白日中校。派遣一个宪兵中队扼守汉江大桥，没有参谋总长的的命令任何部队不得通过大桥进人市内。派遣特战参谋赶赴空输团监督停止夜间训练

的执行。

在永登浦的第六管区司令部定为革命指挥本部，参谋长金在春上校和作战参谋朴圆彬中校（陆士八期）受命担任革命部队的指挥本部的工作。他们在 21 时听到了参谋总长的命令，知道机密已泄急速用电话通知了朴正熙。这时尚不知起义行动已经泄露的消息，参与革命的指挥人员（主要是陆士五、八期）正向指挥本部集合。

陆军犯罪搜查队长李光善上校到达第六管区司令部，受参谋总长命令逮捕朴正熙。使李光善上校格外吃惊的是，聚在那里的参加军事革命的校级军官意外的多，感到了起义行动颇得人心，有些踌躇。同期生金在光上校，趁此机会，向李光善慷慨陈词，说服他改变了态度，也站在同情军事革命一边。

在金浦半岛北端的第一海兵旅团的起义部队的兵力有 1 个海兵大队，1 个坦克中队由旅团长金润根准将率领，在午夜 24 时向汉江大桥出发，与朴正熙会合。金润根已经知道陆军部队出动受阻的消息，他的决心是，现在没有后退的余地，只用海兵队的兵力也要一搏！行至汉江大桥，陆军宪兵中队已经在桥头设置了路障，向海兵队高喊，不准通过！没有陆军参谋总长的命令，任何部队禁止通过。在平素，海兵队和陆军宪兵发生冲突是家常便饭。走在海兵队前头的中队长厉声回答说："我们是海兵队，如果有海军参谋总长的命令还可以，我们不听陆军参谋总长的命令。"率队强行通过。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战斗力很强，士气旺盛的海兵队在枪战中迅速击退宪兵队，接连通过三道路障，进入汉城。在枪战中双方损失轻微，只有海兵 3 名，宪兵 2 名负轻伤。

海兵队的行动消息，使空输团的军官大为振奋，他们立即把张总长派来监督停止演习的特战参谋软禁起来，率领空输团投入起义。

第六军团炮兵团由文在俊上校（陆士五期）率领 5 个大队，向市内进军，时间是 16 日凌晨 2 时。路过一个宪兵检查所，宪兵并

没有接到阻拦指示，部队顺利通过。炮兵团的任务是占领陆军本部。没有遇到抵抗便完成了任务。海兵旅团的任务是占领内务部、治安局、汉城市警察局，也是兵不血刃完成使命。空输团的任务是逮捕政府要员，占领汉城市政厅，占领广播电台。因出动延迟，政府要员已从家中逃避一空，没有抓到。只占领了市政厅和广播电台。朴正熙也到达电台，要求广播员播送军事革命的消息。在5月16日早晨5时清晨新闻节目时间向汉城、韩国、全世界播发了爆发军事革命的新闻。

朴正熙等革命核心人物，为了找一个在国际国内威信较高的人物，作为领袖，遂推戴陆军参谋总长陆军中将张都暎为军事革命委员会议长。新闻播送完了，朴正熙等革命领导人即去张总长处要求他出山，最初张都暎迟疑不决，一直到16时才承诺下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从第1号到12号的命令，有非常戒严令、国际空港团锁布告、解散国会命令等等。

全国各地听到了5月16日早5时汉城发生军事革命的新闻，早就与朴正熙有联络的地方各主要都市的驻军，也开始行动投入军事革命。釜山市在军需基地司令官全容珣准将（陆士三期）指挥下占领了庆尚南道道厅、警察署、釜山市政厅，大邱市、光州市、论山市、大田7市的驻军也纷纷举事参与起义。这些主要城市的起义部队都由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长李周一少将（同德台一期）指挥。

朴正熙掌握了统治权　军事革命委员会改称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掌握了韩国的统治权。议长为张都暎，副议长为朴正熙，但实权在朴的手中。1961年7月朴正熙名实俱符地坐上议长的位置，任李周一将军为副议长（同德台一期）任金东河（同德台一期）为财政经济分科委员长，金润根（同德台六期）为交通递信分科委员长。决定革命政府政策的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常任委员会共9名成员（议长、副议长、7名分科委员长），其中同德台同学占4名。又任命尹泰日将军（同德台一期）为汉城特别市长。朴

林恒将军（同德台一期）任第一司令官，调任步兵学校校长崔昌彦将军（同德对一期）为第三军团长，调第三十一师团长崔周钟将军（同德台三期）为布置在汉城近郊的第八师团长，任命方圆哲上校（同德台一期）为内务部治安局情报课长。同德台同学被安排在重要岗位。

军事革命之后不久朴正熙去美国访问，中途在日本停留。于东京目白宾馆，请军校前校长南云亲一郎和他的儿子南云克郎（日本陆士五十四期，战后曾任自卫队第七师团长）去作客。他说：我正在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请你们帮助我收集那时日本政府有关政治、外交、军事、教育、经济方面的旧书。南云克郎很快地从东京神户的旧书店，为他买了三箱（装蜜柑的纸箱）旧书。

1963 年 11 月结束了军政时期，朴正熙当选为韩国总统。李周一被任命为监察院院长。

朴正熙担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有两年半的时间。任总统长达 15 年半，共统治韩国 18 年。

从 1964 年到 1967 年的 4 年间，朴正熙努力塑造自己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总统的形象，每年春季和秋季，在总统官邸的青瓦台庭园为市民开放，招待来游春和赏红叶的群众。每年新年有不少市民到青瓦台贺年。从 1967 年再度当选为总统之后青瓦台的门坎高起来了，典礼和安全警卫制度也有了严格的规定，总统逐渐与人民疏远了。

1979 年朴正熙被情报部长金载圭枪杀于总统任内，时年 62 岁。

朴正熙在掌握政权之后十分认真从事韩国的经济开发，他为自己规定的座右铭：在经济发展方面一定要胜过北朝鲜。他为经济开发提供政治安定的环境。朴正熙鼓励产品出口，每月亲自召开输出促进会议，召集各部部长和输出业者的代表研究情况，解决问题，推动出口业务。亲自去经济企划院制订经济开发计划。注重港湾施设的扩充，建设高速公路。1964 年韩国输出总额仅为 1

亿美元，到1979年（朴正熙被杀害之年）已经增长为350亿美元。到1970年，韩国已经和新加坡、香港、台湾一起被称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4小龙。韩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甩掉了贫穷的帽子。

为了建设被称为韩国大动脉的连结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朴正熙领着建设部的有关人员，巡视现场，决定路线，与有关的郡守、市长商量如何购买、征用土地。起用第一军司令官李翰林（同德台二期）为建设部长负责此事。李翰林的诨名为秦始皇，他果然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的魄力，在限期内完成了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设费用为1.13亿美元，公路总长438公里。

朴正熙被誉为以非凡的判断力，过人的热情，不屈不挠的毅力，推进了韩国的经济开发事业，达到他念念不忘的“把挣扎，继之在饥饿线上的韩国人解求出来”的目的。先是金润根1984年来长方圆哲1994年来长，他们都与朴共过事，都谈过朴的情况。韩国舆论认为，到了1993年韩国已经是世界第6位制铁工业国，第1位造船工业国，第6位汽车输出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工业国，其基础就是在朴正熙执政时代筑就的。朴正熙对韩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为世人瞩目，但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却受到很多批评。总之朴正熙是一位对韩国历史有影响的世界性人物。他的一生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在韩国部分同德台同学的简况

期别	姓名	军衔	主要经历
第一期	李周一	陆军大将	第十二师团长　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副议长　监察院长
	金东河	海兵中将	第一海兵师团长　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财政经济委员长　韩国马事会长

期	姓名	军衔	经历
	朴林恒（亡）	陆军中将	第五军团长　第一军司令官　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员　建设部长
	尹泰日（亡）	陆军中将	第三十六师团长　汉城特别市长　大韩住宅公社社长　国会议员，建设分科委员长
	崔昌彦（亡）	陆军中将	首都师团长　第三军团长　国防大学院长　忠州肥料工业公司副社长
	李奇建	陆军准将	第二十六师团　第二军团炮兵团长　内外通信社社长
	金永泽	陆军准将	陆军经理监　国防部财务局长
	方圆哲	陆军上校	首都师团机甲联队长　内务部治安局情报课长
	金敏奎	陆军上尉	中队长　韩国电力公司仁川支社长
	崔昌伦（亡）	陆军上尉	中队长
	姜在淳	陆军上尉	中队长

（朝战后消息不明）

赵远永

（二战后消息不明）

李　淳（亡）

期	姓名	军衔	经历
第二期	朴正熙（亡）	陆军大将	第七师团长　第一军司令部参谋长　军需基地司令官　第二军司令部副司令官　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　总统
	李翰林	陆军中将	第二师团长　第六军团长　第一军司令官　韩国水产开发公社社长　建设部长　驻澳大利亚大使

	金　默	陆军少将	陆军工兵监　国防部建设本部长　大韩住宅公社　专务理事
	李再起（亡）	陆军上校	第三十六联队长　第六管区司令部参谋长　大韩通运公司支社长
	李　俊（亡）	陆军少校	陆军工兵团大队长　釜山海运公司社长
	李丙胄	陆军少校	第七联队长　（朝战后消息不明）
	姜昌善	陆军少校	第八联队长　（朝战后消息不明）
	安永吉	陆军少校	陆军工兵团大队长　（二战后消息不明）
	金任		（二战后消息不明）
	金元吉		（二战后消息不明）
第三期	崔周钟	陆军少将	第八师团长　军需基地司令官　大韩住宅公社社长
	姜泰敏（亡）	陆军准将	海士生徒队长　第五军团炮兵团长　第九师团长
第四期	黄　寿（亡）	陆军上校	陆军本部作战局作战课长　陆军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官　兵学社社长　三安产业公司社长
	张银山（亡）	陆军中校	陆军炮兵团长
第五期	姜文奉（亡）	陆军中将	第一师团长　第三军团长　第二军司令官　国会议员　驻瑞典大使
	黄泽林	陆军少校	（朝战后消息不明）
	李容述		（二战后消息不明）
	金泰钟		（二战后消息不明）
	李　某		（二战后消息不明）
第六期	金润根	海兵中将	第一海兵旅团长　首都防卫司令官　国家再建最高会议交通递信委员长　湖南肥料工业公司社长

	金丰勳（军医）	工学博士	汉城大学校工科大学教授　汉城大学校工科大学副学长　金属学会会长
	陆宏修（军医）	工学博士	韩国机械工业公司技术理事　仁荷大学校工科大学教授　韩德实业高等学校校长
	金世鉉	陆军上尉	平昌高等学校教师　工兵中队长
	郑正淳（亡）	陆军少校	第三联队副联队长
	金鹤林	陆军少校	陆士生徒队中队长　（朝战后消息不明）
	金昌珩	陆军上尉	陆军工兵团作战参谋　（朝战后消息不明）
	金锡权	陆军上尉	陆军工兵团中队长　（朝战后消息不明）
	李禹福		（二战后消息不明）
	安某（军医）		（二战后消息不明）
	崔某（兽医，1945 年死亡）		
第七期	金光植	陆军少校 工学博士	陆士教授部机械工学科长　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咨询委员　汉阳大学校工科大学教授、学长
	田相赫	陆军中校	第八联队副联队长　汉城建筑安装公公司监事
	金允善		（二战后消息不明）
	韩珍一		（二战后消息不明）

《伪满军官学校》（《长春文史资料》总35辑）

目录

（《伪满军官学校》于1991年在《长春文史资料》总第35辑刊发）